家庭关系中的权力导向结构与自主形成

权力文法、结构性信任、价值边界与组织伦理

HUANG WANHONG（黄万鸿）
huangwanhong@serendip.ngo

摘要

本文构造一个用于分析家庭关系中权力导向结构的概念框架，并讨论持续性权力不对等条件下自主、信任、价值边界及组织角色完整性如何彼此关联。研究对象不是固定的“家庭类型”，也不是对成员人格或临床状态的判断，而是一个可在有限关系配置中识别的机制集合：决定能力、解释优势、规范修改能力、关键资源接口与退出成本如何集中、相互转换并在时间上延续。为提高概念精度，文章首先区分权力能力、权力行使、结果控制与规范正当性，并将“权力文法”界定为二阶关系规则：它决定何种位置差异、资源差异、资格主张和拒绝成本能够被转换为有效决定、有效解释和规则修改。由此，权力文法并不等同于资源、命令或控制行为，而是连接多种权力接口的转换结构。

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结构性信任与认识自主的条件模型，把可信性放在权力约束、规则稳定、可争辩、可验证、可纠错及现实退出能力中分析；同时把自主建模为经济、制度、关系网络、认识、价值处分与退出能力组成的多维结构，并进一步区分资源可得性、主体控制度和抗干预稳健性。文章随后提出渐进式可控性与分布式自主两种互补路径，说明主体如何在降低单点依赖的同时维持局部责任可追踪。进一步地，本文引入正义论、法理学、解释学、语言政治经济学与家庭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正义论用于区分分配、能力、关系地位与非支配，法理学用于讨论私人秩序、授权、规则稳定与程序边界，解释学用于分析关系历史、叙事身份与责任归属，语言政治经济学用于说明合法表达、语言资本与制度翻译如何获得物质和组织后果，家庭政治经济学则分析资源、照护、市场、国家与外部选择如何改变内部议价位置。关于价值边界，文章区分共同池化、馈赠、授权管理与未经授权中介性转移，并以知情、授权、可撤回、可追踪和问责条件识别风险。关于组织伦理，文章把私人网络外溢处理为角色接口治理问题，区分私人压力、可识别通道与现实角色捕获，并给出披露、隔离、权限最小化、双重控制、回避与审计等制度回应。

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有三点：其一，把“权力文法”从描述性隐喻推进为可区分于资源权力、解释结构与具体话语的二阶转换概念，并为其补充正义论、法理学、解释学与语言政治经济学基础；其二，把结构性信任、自主形成与价值边界连接为同一关系机制的不同截面；其三，把家庭内部权力结构与组织角色完整性之间的接口明确化，同时保留照护、合法授权、紧急代理、共同生活与文化差异等边界情形。全文的形式化用于提高定义、推论与经验检验路径的透明度，并不被当作已经获得参数估计的定量模型。文章最后给出可证伪的分析命题、变量操作化方向、替代解释和经验研究设计，为后续案例比较与规范理论研究提供可扩展框架。

关键词：家庭关系；权力文法；关系自主；结构性信任；正义论；法理学；解释学；语言政治经济；家庭政治经济；组织伦理

初步研究说明

本文是一项关于家庭关系中权力导向结构的概念与形式研究。其直接对象是这样一种关系机制：决定能力、解释优势、规范修改能力、资源接口与退出条件如何在关系中发生持续集中、相互转换并跨时间延续。文章围绕这一机制提出“权力文法”概念，并据此把结构性信任、关系自主、价值边界与组织角色完整性连接到同一分析框架之中。

本研究采取有限的结构分析与规范分析立场。它不把“家庭”预设为单一行动者，也不从局部权力不对等直接推出任何人的终极道德身份或临床状态。全文始终区分权力能力、权力行使、结果控制与规范正当性。文中的数学表达与结构示意图仅作为澄清性表征，其适用范围、前提条件与推论限度必须保持明确。

形式经济与概念纪律是本文的重要约束。文章继承关系自主、正义论、法理学、解释学、语言政治经济学与家庭政治经济学等研究传统，只在既有词汇不足以精确表达时才引入新的符号。诸如“权力文法”“结构性信任”“分布式自主”“未经授权的中介性转移”“角色接口治理”等术语，都只在相关对象、关系与条件被明确界定之后才获得其技术含义。

本次发布包含该论文当前的完整多语言版本。它反映了多轮结构、逻辑与文风修订，包括概念定义的澄清、自然语言论证的扩展、理论基础的补足、公式引用的统一，以及联合国六种正式语言版本的整理。经验校准、比较案例检验与若干进一步的形式扩展仍属于后续工作。

负责任使用与权利保留

作者鼓励善意讨论、批评、独立探究以及对本文材料的负责任使用。除许可协议的法律条款外，作者也请求使用者在改编或应用本文框架时考虑可预见的潜在风险与伤害。这一伦理性请求并不改变许可协议中已经规定的授权范围或限制。

作者保留 CC BY-NC 4.0 所保留的一切权利，并可就违反许可协议或侵犯其他独立适用权利的行为采取依法可得的救济。对本文的再利用并不意味着得到作者背书。若涉及第三方权利，仍须获得相应权利人的授权；法定例外与限制继续完全适用。

说明事项

状态。本工作稿包含关于家庭权力、自主、信任、价值边界与组织伦理的当前完整论文，并同时提供联合国六种正式语言版本。本轮修订检查了概念定义、论证连续性、公式引用、交叉引用、页面版式以及跨语言一致性。本文仍属于初步研究说明；经验验证以及若干开放的形式与比较扩展问题仍有待未来工作处理。

许可。除另有说明外，版权 © 2026 Wanhong Huang。本文依据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ce（CC BY-NC 4.0）发布，并受该许可条款约束。

关于语言模型使用的声明。本文的探索性讨论与写作准备过程中使用了 OpenAI 的 ChatGPT。ChatGPT 提供了探索性对话、多语言转写、起草协助、LaTeX 排版与技术检查支持。研究问题的选择、理论立场与主张的认识论地位由作者确定并批准；论文中的定义、形式构造、论证、结论、翻译及任何错误，均由作者本人独立负责。署名权仍归属于人类作者。

1 引言

家庭同时是亲密关系、照护安排、资源配置、身份形成与规范学习发生的场域。正因为这些维度高度重叠，家庭中的权力往往难以用单一的“命令与服从”图式描述。许多具有决定性后果的互动并不以显性强制出现，而是通过谁有资格定义问题、谁能够把自己的解释写入共同规则、谁掌握账户与文件、谁能够代表家庭面对外部机构、谁承担拒绝与退出的成本而发生。这样的权力既具有物质基础，也具有解释基础；既可能来自法律和制度赋予的权限，也可能由长期惯例、照护关系、语言能力与共同历史形成。

本文处理的并不是“家庭中是否存在权力”这一宽泛问题，而是一种更有限的结构性问题：当决定能力、解释优势、规范修改能力、关键资源接口与退出成本在一段关系中持续向特定位置集中时，这些差异如何被转化为实际有效的决定、解释和规则；这种转换又如何影响结构性信任、认识自主、价值处分以及主体进入组织角色后的受托完整性。文章把这一转换层称为**权力文法**。这里的“文法”不是语言学语法的同义词，也不是把所有沟通问题重新命名为权力，而是指关系中决定“什么样的理由会被承认为有效、什么样的拒绝能够真正停止行动、什么样的解释能够进入后续规则”的二阶有效性结构。

这一问题处在若干成熟研究传统的交叉位置。家庭社会学和权力依赖研究长期分析资源、替代选择与决策位置之间的关系 (Blood and Wolfe 1960; Emerson 1962; Hesse-Biber and Williamson 1984; Komter 1989)；关系自主理论强调自主并非孤立个体的内在属性，而由社会关系、制度条件与承认结构促进或削弱 (Mackenzie and Stoljar 2000; Friedman 2003; Westlund 2009; Nedelsky 2012)；家庭政治经济学则指出，家庭既是合作单位，也是利益、照护、时间与资产发生不对称分配的制度场域 (Sen 1990; Agarwal 1997; Folbre 1994)。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必要基础，但它们通常分别处理资源、规范、议价或自主。本文希望进一步说明：这些不同层面的差异如何在具体关系中被转换为“谁的理由具有现实效力”。

因此，本文需要比家庭权力理论更宽的规范与解释基础。首先，正义论提醒我们，家庭内部的评价不能仅停留在资源总量或形式平等。Rawls 的正义理论提供了制度公平与基本结构的经典背景 (Rawls 1999)，Okin 则明确批评了将正义停留在家庭之外的倾向 (Okin 1989)；Young 对支配与压迫的讨论显示，正义问题还涉及决策结构、文化表达与社会分工，而不只是可分配物的多少 (Young 1990)；Sen 和 Nussbaum 的能力路径进一步把评价焦点转向主体实际上能够做什么、成为什么，以及资源能否转化为现实能力 (Sen 2009; Nussbaum 2006)。这些理论并不构成一个无冲突的统一体系，但共同提示本文：家庭中的正义判断需要同时观察资源、能力、地位、程序与支配结构。

其次，法理学说明私人关系并不处于法律秩序之外。财产权、婚姻与亲子身份、合同能力、监护、社会保障、住房和救济制度持续改变家庭成员的可行动集合。Fuller 对法律性的讨论强调规则的一般性、公开性、可理解性、相对稳定与规则和实施之间的一致性等要求 (Fuller 1969)；Habermas 从法与民主的关系讨论合法性、程序与公共理由的条件 (Habermas 1996)；Nedelsky 则直接把法律理解为塑造关系并由此促进或损害自主的制度形式 (Nedelsky 2012)。本文不会把国家法的全部要求机械移植到家庭生活，但会借用这些法理直觉，分析为什么可预期规则、说明义务、争辩空间和可复核性会成为私人权力受到约束的重要条件。

再次，解释学与语言政治经济学使“解释权”不再只是心理层面的意见差异。Gadamer 的哲学解释学强调理解总是在历史与传统之中发生 (Gadamer 2013)；Ricoeur 对行动、叙事与自我

解释的研究说明，主体身份与责任归属会通过叙述结构获得持续性 (Ricoeur 1992)；Cover 与 White 的法与叙事研究则显示，规范并不是脱离意义世界而独立运行的命令，法律语言本身参与建构共同的规范世界 (Cover 1983; White 1990)。更进一步，Bourdieu 将语言放在“语言市场”、象征资本和合法语言之中分析 (Bourdieu 1991)，Irvine 与 Gal 明确把语言现象置于政治经济过程之中 (Irvine 1989; Gal 1989)，Heller 则讨论全球化条件下语言与身份的商品化 (Heller 2003)。由此，家庭中的词语选择、资格称谓、行政表达能力和制度语言能力都可能具有分配后果：并非所有说话者都拥有相同的“被听见”和“使陈述产生制度后果”的能力。

本文的理论任务因此有四层。第一层是描述性拆分：把权力区分为决定、解释、规范修改、资源与退出接口，并进一步区分能力、行使、结果与正当性。第二层是转换机制：提出“权力文法”概念，解释资源、位置、语言与规范如何被转化为关系中的有效性。第三层是规范评价：把结构性信任、关系自主、非支配、程序稳定与正义条件放入同一框架，同时保留照护、代理、共同生活与合法授权等边界案例。第四层是外溢分析：考察私人关系中的价值边界如何在主体承担组织角色后转化为受托权限与组织正义问题。

方法上，本文采取概念重构、跨理论整合与最小形式化相结合的路径。公式的作用不是把复杂关系压缩为可计算分数，而是明确变量、作用方向与推论前提；自然语言论证则承担解释概念来源、规范含义、反例与制度语境的主要任务。本文因此有意保留形式模型，同时要求每个形式对象都能够由充分的社会理论、法理学和解释学论证支撑。

全文结构如下。下一节限定研究对象、分析单位与方法边界；随后两节分别建立正义论与法理学基础，以及解释学与语言政治经济基础。此后文章进入形式模型与权力文法，继而讨论结构性信任、认识自主与多维自主；家庭政治经济部分把资源、照护和议价位置重新接入关系结构；价值边界与组织伦理部分分析私人价值流动和受托角色的制度外溢；最后通过关系重构、经验命题与适用限制，说明框架能够支持的结论及其需要进一步验证的部分。

2 研究对象、分析单位与理论任务

本节限定论文能够支持的论断范围。文章处理的是家庭关系中的一种**权力导向结构**，分析单位是持续互动中的**关系配置**与**机制接口**，而不是“家庭”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也不是任何成员的固定心理属性。该限定具有方法论意义：同一个家庭内部可以并存照护、互惠、依赖、合作、冲突与权力不对等，不同成员也可能在不同事务域中处于不同位置。本文因此只讨论一种条件性结构：若决定、解释、规则修改、资源和退出成本持续呈现方向性集中，这些维度如何共同影响自主、信任、价值处分与组织角色。

这一分析单位还意味着，家庭不能被预设为一个内部偏好完全一致的“单一行动者”。家庭确实能够形成共同目标、共同预算和长期承诺，但共同性本身需要被解释：哪些事项被共同决定，哪些事项保留个人决定权，谁能够定义“共同利益”，成员是否具有提出异议和重新协商的现实能力。只有把这些内部过程显式化，家庭中的合作、义务与权力才不会在概念上被压缩为同一现象。

本文也避免把家庭理解为与法律、市场和公共制度分离的纯私人空间。住房、劳动收入、婚姻与亲子身份、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制度都会改变资源接口与退出成本。家庭内部权力由此具有双重嵌入性：一方面，它形成于长期亲密关系和共同历史；另一方面，它受到外部制度赋予的权利、财产、收入机会和社会支持所塑造。后文的法理学与政治经济学讨论正是为了把这一外部结构重新接回本文的关系模型。

2.1 有限关系配置与范围条件

本文把**有限关系配置**定义为：在可识别的时间区间 T 和事务域 $d \in \mathcal{D}$ 中，一组参与者、资源接口、规则、解释实践和退出条件形成相对稳定的相互作用模式。该定义保留三个范围限制。

第一，文章不把家庭不平等直接等同于权力导向结构。照护分工、年龄差异、专业分工、临时代理、疾病照护或紧急状态都可能产生不对称，而不对称本身不能给出其正当性结论。第二，文章不把权力导向结构直接等同于虐待、胁迫控制或病理状态。胁迫控制研究关注一组更具体的限制、隔离、恐惧与行动空间压缩机制，具有自己的经验与法律语境 (E. Stark 2007; Choudhury et al. 2025)；本文的概念范围更广，因此只能在满足更强证据条件时与该文献发生交叠。第三，文章不把单次冲突当作结构。结构判断要求重复性、跨事件的方向性和一定程度的时间持续。

范围条件还包括事务域差异。同一成员可能在医疗决策中因为专业知识而具有较大影响，在共同财务中却受到严格的双向授权约束；某种合理的不对称也可能只在紧急时期成立。因此，本文不把“谁总体上更强”作为充分分析单位，而要求说明权力差异发生于何种事务域、持续多久、是否跨域扩张、是否能够改变其他成员的替代选项。这样做既降低过度诊断风险，也为后续经验检验提供可观察边界。

最后，本文区分描述性范围与规范性评价。识别出权力集中，只说明某些主体拥有更强的行动塑造能力；是否构成支配、不公、剥削或违法，还需要额外的授权、比例、程序、损害与制度背景判断。本文的规范分析因此采取分层方式：先识别结构，再讨论这种结构受到了何种约束，最后才进入更强的伦理或法理评价。

2.2 能力、行使、结果与正当性的区分

权力分析容易发生概念滑移。为避免“拥有能力”“实际干预”“结果发生”和“干预正当”被写成同一件事，本文使用四层区分：

1. **能力（capacity）**：主体在给定关系和情境中改变他人可行动集合、解释条件、规范、资源通道或退出成本的潜在能力；
2. **行使（exercise）**：某一能力在具体事件中被启动；
3. **结果（outcome）**：行使之后实际发生的行动、资源、规则或意义变化；
4. **正当性（legitimacy）**：该能力和行使是否具有授权、理由、程序与边界上的规范支持。

这四层可以彼此分离。某主体可能拥有很强能力却长期不行使；某次行使可能失败；某个结果可能由多重原因共同产生；某项高度有效的干预也可能具有充分授权。因而，本文的核心对象是**结构性能力与转换机制**，而规范判断需要额外考察授权、比例、可争辩与问责条件。

这一四层区分对于家庭研究尤其必要。亲密关系经常以代理、照护、共同预算和非正式分工运作，同一种外部可见行为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关系含义。例如，一方代管账户可以是双方基于便利作出的可撤回授权，也可能是另一方缺乏访问权和核验能力的资源集中；父母为未成年子女设置限制可能是具有发展阶段理由的保护，也可能在时间上失去必要性而继续扩张。若只观察行为形式，研究容易把“干预”与“支配”混为一谈。

反过来，只讨论主观善意也不足以说明结构是否安全。一个参与者可以真诚地相信自己正在照护他人，却同时拥有单方面改写规则、控制文件和阻断外部信息的能力。规范评价因此需要同时保

留主观理由与客观结构两个维度：善意可以影响责任评价，却不能替代对权限边界、程序和可逆性的审查。

2.3 概念重构的方法

本文属于概念理论与机制重构研究。方法由四个步骤构成。其一，提取反复出现的关系变量，例如决定能力、解释优势、规范修改、资源接口与退出成本。其二，对变量进行类型区分，减少“权力”一词承担过多含义。其三，用最小形式化表达变量之间的作用方向，并明确公式只承担概念澄清功能。其四，为每个机制提出可观察含义、反例与可能的替代解释，使框架具有后续经验检验空间。

这里的“最小形式化”并不意味着用数学符号替代社会理论。相反，形式表达只在三个场景中具有正当作用：第一，防止同一符号在不同段落中改变含义；第二，把因果或规范推论所依赖的中间环节显式化；第三，帮助识别一个命题需要何种经验材料才能被支持或反驳。凡是公式不能提高这三类透明度的地方，本文优先使用自然语言论证。因而，本文的形式模型应当与较充分的概念解释、制度背景和反例分析共同阅读。

方法上还需要区分三个推理层次。描述层询问关系中发生了什么、谁具有何种接口；机制层询问这些接口如何相互转换并形成路径依赖；规范层才询问这些结构何时与自主、信任、正义或组织伦理发生冲突。本文有意避免从描述层直接跳到规范层。这样的层次化也使法理学和政治经济学能够进入同一框架：法理学提供权利、授权、程序与私人秩序的规范结构，政治经济学则解释资源、照护、市场与国家条件如何改变关系中的实际能力。

这一方法与家庭权力、资源理论和权力依赖传统相邻。资源理论长期讨论资源分布与家庭决策位置之间的联系 (Blood and Wolfe 1960; Hesse-Biber and Williamson 1984)；Emerson (1962) 把权力置于相互依赖与替代选择中理解；Komter (1989) 进一步强调婚姻权力不能只看显性的“权力分配”，还需要分析使不平等持续的隐性互动机制。更一般的权力理论则提醒研究者区分可观察决定、议题控制、偏好塑造、支配与赋能等不同维度 (Lukes 2021; Allen 1998)。本文在这些工作之上提出一个更局部的概念任务：解释多种权力维度**如何被关系规则转换为实际有效性**。

2.4 理论贡献的限定

本文的贡献不在于提出一个能够替代既有家庭权力、正义论、法理学、解释学或自主理论的总理论，而在于建立若干跨层接口。第一，**权力文法**被定义为二阶转换结构，用于说明资源、位置、解释和规则修改能力如何成为“在这段关系里真正有效的理由”。第二，**结构性信任**与**关系自主**被放入同一模型：主体愿意承担关系暴露的程度，部分取决于其边界是否可执行、事实是否可验证、规则是否可争辩以及退出是否现实。第三，**解释结构**与**物质结构**形成接口：语言、叙事与资格分类只有在能够改变规则、资源或制度访问时才进入权力机制，从而避免把一切意义差异都写成权力。第四，**价值边界**与**组织角色完整性**形成内外接口：家庭内部的授权和资源控制问题在主体进入受托角色后，可能转化为公共或组织层面的权限、披露与问责问题。

表1将全文的概念边界集中呈现。后文的形式化与命题均依赖这些区分。

表 1: 核心概念、分析层级与排除项

概念	工作性定义	需要排除的混淆
权力能力	改变他人行动、解释、规则、资源或退出条件的潜在能力	不等同于实际行使、成功结果或正当授权
权力导向结构	多种权力能力在时间与事务域中呈方向性集中，并稳定影响冲突处理	不等同于任何不对称、单次命令或家庭类型
权力文法	决定哪些位置差异和理由能够被转换为有效决定、解释与规则修改的二阶关系规则	不等同于措辞风格、单一资源或某一具体控制行为
结构性信任	对权力边界、规则、事实、异议与退出条件具有最低稳健性的可预期状态	不等同于对他人品格的总体好感
关系自主	在社会与制度关系中形成、表达并执行基本生活判断的多维能力	不等同于孤立、自给自足或完全免受影响
价值边界	价值流动的知情、授权、撤回、追踪与问责结构	不等同于禁止共享、馈赠或共同生活
角色完整性	组织角色资源、判断和代表权维持在授权范围内的状态	不等同于拥有私人关系本身构成利益冲突

3 正义论与法理学基础

本节建立全文的规范基础。本文并不试图从单一正义理论推出家庭关系的全部评价，也不把家庭直接等同于国家制度。更谨慎的做法，是从若干互补传统中提取与本文机制直接相关的规范维度：资源与机会的分配、实际能力、关系中的地位、免于任意支配、规则的可预期性、程序中的争辩与复核，以及法律如何塑造私人关系。这样处理可以避免两个相反的简化：一方面，把家庭正义缩减为“谁得到多少”；另一方面，把所有亲密关系问题都转化为正式法律争议。

3.1 分配、能力与关系结构

现代正义论常以制度如何分配基本权利、机会、收入和社会合作收益为中心。Rawls 的理论为这种制度性视角提供了经典表达：正义并非只评价个别善意，而要评价塑造社会合作背景的基本制度安排 (Rawls 1999)。这一视角对本文的重要性不在于直接把家庭写成完整的“基本结构”模型，而在于提醒我们，个体能否自主生活取决于一组长期存在的制度条件。家庭内部的住房、财产、教育、照护与职业分工会改变成员未来的机会，因而不能只以一次消费分配是否平均来判断其长期效果。

Okin 对家庭与正义关系的批评进一步指出，如果正义理论把家庭视为无需内部评价的私人领域，家庭中的劳动和性别分工可能反过来塑造公共领域中的机会与地位 (Okin 1989)。本文吸收这一结构性洞见，但把适用范围扩展为更一般的机制命题：任何长期家庭安排，只要能够系统改变成员的资产、时间、职业资本、制度知识和退出条件，就可能成为后续公共能力差异的生产环节。由此，家庭并非公共正义的外部背景，而是公共能力形成的中介场域。

分配视角仍然不足。Young 对将正义缩减为可分配物的批评强调，支配、决策权、文化表达与社会分工本身也具有规范意义 (Young 1990)。这与本文的权力文法高度相关：即使两名成员最终获得近似的货币资源，如果只有一方能够定义问题、改变程序、解释他人行为并决定哪些理由算作“合理”，关系仍可能具有显著的不对称。正义分析因此需要把“得到什么”与“谁能够参与决定、谁的解释具有资格、谁能够修改规则”同时纳入。

能力路径则进一步改变评价对象。Sen 强调对现实可行生活和实际自由的比较，而非只比较资源或形式权利 (Sen 2009)；Nussbaum 也把社会正义与主体能够实现的重要能力联系起来，并

特别关注依赖、残障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合作问题 (Nussbaum 2006)。本文据此区分资源可得性、实际控制度与抗干预稳健性：一项权利、账户或收入只有在主体能够实际访问、使用，并在冲突时不被轻易剥夺时，才真正扩展其可行动集合。形式平等因而可能与实质能力差异并存。

这些传统共同提供一个重要限定：本文不把“正义”定义成单一指标。资源分配、能力、关系地位与决策结构可能彼此一致，也可能发生张力。一个安排可以提高家庭总体福利，却降低某一成员的长期能力；可以形式上尊重所有权，却让一方长期承担不可见的机会成本；也可以在分配上近似平均，却维持高度不对称的解释和规则修改结构。严谨分析应当明确是哪一种正义维度发生问题，而不是用“公平”一词覆盖所有评价。

3.2 非支配、关系自主与权力限制

本文关于权力约束的规范方向与共和主义的非支配直觉存在亲缘关系。Pettit 将自由理解为免于他人任意支配，而不仅仅是当前没有受到干预 (Pettit 1999)。这一点对家庭关系尤其重要：某成员可能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实际阻止另一方行动，但如果其拥有可以不受有效约束地改变住房、账户、文件或基本规则的能力，后者的行动仍然需要持续预测前者的许可。问题由此不只在“干预发生了多少”，还在“干预能力是否受可执行边界约束”。

非支配也帮助本文解释为什么能力增长不等于支配增长。弱势位置获得独立收入、法律知识、外部网络或退出选项，会提高其反制能力，却未必意味着它获得了任意控制他人的资格。本文因此区分**边界性能力**与**支配性能力**：前者用于确保个人最低决定空间、拒绝权与事实核验；后者则能够把自身偏好跨域扩张为他人的行为条件。自主形成的目标是扩大前者，使协商成为可承受的选择，而不是复制后者。

关系自主理论为这种区分提供了更细的社会基础。Mackenzie 与 Stoljar 所代表的关系自主研究把自主放在社会关系、身份与能力形成过程中理解 (Mackenzie and Stoljar 2000)；Friedman 强调亲密关系与自主并非天然冲突 (Friedman 2003)；Westlund 则强调一种对他人提出并回应规范性要求的能力 (Westlund 2009)。Nedelsky 更直接提出以关系为单位思考法律与自主 (Nedelsky 2012)。这些研究共同说明，主体并不需要退出关系才能自主；重要的是关系是否保留反思、表达、修正、拒绝与重新协商的空间。

这种关系性理解也防止将家庭照护误写为自主的例外。照护本身可以扩展被照护者的实际能力，也可以使照护者获得意义、身份和互惠；问题出现在照护依赖被转换为无边界的决定资格，或照护者的贡献长期无法进入资源与规则的共同决定。本文后续关于资源接口与权力文法的分析，正是试图区分“促进能力的依赖”和“形成任意控制的依赖”。

3.3 法律性、规则稳定与程序理由

法理学为本文关于“规则稳定”“可争辩性”和“纠错”的主张提供了重要基础。Fuller 对法律内在道德的分析强调规则若要作为规则发挥作用，需要满足一般性、公布、前瞻性、可理解性、相对稳定以及官方行动与公布规则之间的一致等条件 (Fuller 1969)。家庭互动当然不是国家法律体系，本文也不把 Fuller 的八项要求直接当作家庭规范标准；但其核心法理直觉可以迁移：当某些规则持续塑造成员的基本生活利益时，如果规则只能事后改变、无法被知道、标准相互矛盾或执行完全脱离既定规则，主体就难以据此规划行动。

因此，本文将**可预期性**理解为一种最低程序条件，而不是要求关系僵化。家庭规范必须能够随年龄、疾病、经济情况和共同目标变化；关键在于变化是否具有可说明的理由、可辨认的程序以及

对既有利益的过渡处理。规则稳定的反面不是变化，而是**任意性**：标准只在结果出现后由单一位置重写，使另一方无法通过遵守既有规则获得稳定预期。

Habermas 对法、程序与公共理由的讨论则提示，合法性不能仅由结果的“好坏”决定，还涉及受影响者能否在一个具有回应性的程序中提出理由并参与规范形成 (Habermas 1996)。本文不把家庭协商等同于民主立法，但借用一个更弱的原则：越是影响主体基本生活轨迹的私人规范，越有理由要求其能够被说明、质疑和复核。这样的程序性要求并不保证一致同意，却能限制单方面把位置优势直接转换为规范修改权。

程序理由还具有认识功能。争辩、记录与复核不仅使决定更“公平”，还增加错误被发现的机会。家庭成员可能因为信息不全、记忆偏差、专业知识差异而产生真实分歧；如果任何异议都被理解为不忠或不成熟，关系就失去了纠错机制。相反，当事实与规范可以分开讨论、证据可以保存、规则变更具有记录时，解释冲突更容易被限制在争议本身，而不扩张为人格资格冲突。

3.4 私人秩序、法律阴影与关系塑造

家庭中的大量规则并不由正式合同产生，而来自惯例、默示委托、代际期待和长期共同生活。这种**私人秩序**具有现实必要性：如果每一项照护、支付或代理都需要正式程序，亲密关系将承担不可接受的交易成本。然而，私人秩序并不意味着法律无关。Mnookin 与 Kornhauser 关于离婚谈判的经典分析指出，私人协商发生在法律权利和可能后果的背景之下 (Mnookin and Kornhauser 1979)。即使没有诉讼，财产权、居住权、监护与救济制度也会改变谈判位置。

Nedelsky 的关系法理学进一步说明，法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划出个人与他人的边界；法律持续构造人们相互依赖的方式 (Nedelsky 2012)。同一种“共同管理”安排，在不同产权、社会保障与身份制度下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自主效果。法律由此通过两个渠道进入本文模型：一是直接改变主体的权利与资源；二是改变某一主张能否获得外部机构承认，从而改变它在家庭内部的现实有效性。

私人秩序还需要区分**任务委托**与**地位权能**。一方长期负责缴费、与学校沟通或管理文件，可能只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分工；如果这种分工逐渐被解释为“因为一直由我处理，所以我可以决定全部相关事项”，任务就被转化为资格。本文的权力文法概念正用于描述这种转换：惯例何时成为权限，权限何时跨域扩张，以及其他成员是否仍能撤回、分担或复核。

法律对私人秩序的介入也需要比例。正式化过度会损害亲密关系中的灵活性与互惠；正式化不足又可能让重大资产、身份文件、第三方权利和不可逆决定处于无法问责的状态。本文因此主张一种分层的法理评价：事务越接近日常低风险协作，越可以依赖惯例；越接近基本生活、重大资产、第三方责任与高不可逆后果，越需要明确授权、记录、复核和救济接口。

3.5 规范桥接：家庭权力何时进入正义问题

上述理论并没有给出一个单一阈值，用以宣告某段关系“正义”或“不正义”。本文更谨慎地提出五类**规范桥接条件**。第一是**能力剥夺**：某种安排持续压缩主体实现基本生活判断的实际能力，而非只造成一般不便。第二是**地位降格**：一方的理由和经验在结构上被排除出共同判断，形成持续的资格不对等。第三是**任意支配**：某一位置能够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改变他人的基本生活条件。第四是**程序失衡**：规则修改、事实认定与纠错缺乏可预期程序。第五是**累积性再分配**：短期安排通过资产、时间、照护与制度资格积累，持续改变未来谈判和退出能力。

这五类条件分别与能力正义、关系平等、非支配、法治式程序和政治经济分配相联系。它们可

以同时出现，也可以分离。例如，某项照护安排可能造成明显资源不均，却在授权、互惠和长期安全上保持正当；某段关系的货币分配可能近似均衡，却因解释权和退出接口高度集中而具有支配风险。由此，本文拒绝把正义问题压缩成单一结果指标。

规范桥接也限制了本文的用词。只有在上述条件得到充分材料支持时，才有理由使用更强的“支配”“剥削”“不正义”等概念；否则，更合适的表述是权力集中、边界薄弱、规则不稳定或风险上升。这样的层次化可以把理论敏感性与判断克制结合起来，也为后文的经验命题保留可证伪空间。

还需要区分**局部正义**与**结构正义**。某一次资源分配即使具有充分理由，长期重复后仍可能通过资产、知识和职业机会形成累积差异；反之，一次看似不均的安排也可能是为了修复既有劣势或满足特殊照护需要。因而，评价家庭权力不能只抽取单次事件，而应同时观察事件序列是否不断把同一主体推向较弱的未来位置。这也是本文强调关系历史和路径依赖的规范理由。

正义论在本文中的作用最终是给出**评价坐标**，而不是为每个家庭提供统一生活方案。不同家庭可以在共同财产、代际支持、照护分工和角色授权上形成高度多样的安排，只要这些安排能够说明其理由、保留必要能力、避免任意支配并允许受影响者进入修改程序。多样性与规范约束并不矛盾；规范约束真正限制的是把某一生活形式的内部惯例转换为不可争辩的单方面资格。

4 解释学与语言政治经济基础

权力文法之所以需要解释学与语言政治经济学基础，是因为关系中的“有效性”既不是纯粹物质结果，也不是纯粹语义结果。一项声明会被谁理解、以何种历史背景理解、被什么词汇分类，并通过哪些语言和制度渠道转化为后果，都会改变权力关系。解释不仅描述世界，也参与构造责任、资格与规则；语言不仅传递信息，也可能是一种稀缺能力、制度资本与进入外部资源的接口。

4.1 理解的历史性与关系位置

Gadamer 的哲学解释学强调，理解并非从一个无历史、无前见的位置开始；理解者总是处在传统、语言与既有问题意识之中 (Gadamer 2013)。对家庭关系而言，这意味着同一句话并不会在真空中获得意义。“我需要自己决定”“这是为了你好”“一家人不应计较这些”之类表达，会在过去的照护、承诺、冲突与角色期待中被理解。关系历史 h_t 因而不是形式模型的附加变量，而是解释条件的一部分。

这种历史性并不等同于相对主义。过去如何影响理解可以被分析、比较和质疑。某一成员可能把边界声明理解为不忠，另一成员把同一声明理解为正常的权限划分；研究任务不是立即宣布某种解释“真实”，而是考察两种解释如何进入共同决定、哪些证据可以支持或修正它们、谁拥有定义后续规则的能力。解释学由此与本文的认识自主发生连接：理解始终有位置，但位置不应免于反思和校验。

关系位置还影响哪些背景被视为“无需说明”。长期负责某项事务的人可能把自己的程序知识视为自然常识，新进入者却无法理解其隐含规则；长辈、专业人士或掌握主要制度语言的人也可能无须解释自己的判断，而其他成员必须不断证明自己具有资格。这样的不对称并不自动构成压迫，但它会改变说明负担和可争辩性，是解释权能够稳定化的重要机制。

因此，本文所谓解释权不是“谁更会说服人”，而是**谁更有能力把自己的解释变成关系的默认前提**。默认前提一旦进入账户管理、家庭角色、第三方沟通或组织记录，就可能继续改变现实资源。解释学在这里提供的基础，是让这种从理解到结构后果的过程可见。

4.2 叙事身份、责任归属与关系连续性

Ricoeur 对叙事身份的讨论表明，主体的持续性并不是单纯由不变属性构成，人们通过叙述把行动、承诺、责任与时间经验组织成可理解的自我 (Ricoeur 1992)。家庭关系尤其依赖这种叙事工作：谁一直是“负责的人”、谁“容易冲动”、谁“最懂外面的制度”、谁“需要被照顾”，这些身份叙述会帮助协调长期生活，也可能逐渐与特定权限绑定。

叙事的规范力量来自其连续性。一次事件如果被嵌入“他一向如此”的故事，就可能影响后续事件的举证负担；一方的失误可能被解释为稳定人格，另一方的类似失误却被解释为偶然情境。这样的叙事不对称不是仅靠纠正某个事实就能改变，因为争议涉及的是事件如何被放入长期身份结构。本文因此需要把解释状态加入关系历史，而不是把每次冲突当作独立样本。

叙事也可能支持自主。主体能够重新描述自己的经历、区分过去角色与当前能力、拒绝把临时依赖固化为永久身份，是关系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自主由此不仅是拥有正确事实，还包括拥有足够的概念资源来描述自身处境，并让这种描述能够进入共同判断。外部专业语言、法律概念或新的社会关系有时会提供重新叙述的工具，但它们也可能带来新的权威不对等，因此仍需要反思。

这一点与本文对“标签”的谨慎态度相呼应。诸如“不成熟”“自私”“不负责任”之类评价可能在具体情境中有事实基础，也可能是长期角色分配的组成部分。研究者不能因为标签具有负面含义就自动判定其为控制；真正需要考察的是标签是否可以被质疑、是否有稳定证据、是否跨域扩张，以及它是否直接触发资源或权限后果。

4.3 规范世界、法律解释与翻译

Cover 的“nomos and narrative”把法律置于由叙事、历史与规范共同构成的意义世界中 (Cover 1983)。White 则把法律理解为一种构成性语言实践，并用“翻译”讨论法律如何在事实、传统与共同体之间建立意义 (White 1990)。这两条思路对本文具有方法论价值：规则不是脱离解释而独立存在的命令，任何规范都需要被放入“这条规则为什么存在、适用于谁、与过去承诺如何相连”的意义结构中。

家庭中的规范同样具有这种解释性。一个“共同财务”的规则可能被理解为完全共有、按用途授权、固定比例共享，或仅仅是便利性的共同账户；一个“尊重长辈”的规范可能意味着提供照护、听取经验、在重大事项中咨询，也可能被某些关系解释为最终服从。只有说明具体叙事与实践，研究者才能知道同一个词在实际关系中提供了什么权限。

“翻译”在这里还有第二层含义：家庭内部语言需要不断翻译成外部制度语言。医疗、学校、银行、移民、税务、合同和组织程序都有自己的术语和文件要求。能够把家庭经验翻译成被机构承认的类别，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如果只有一名成员掌握这种翻译接口，其解释权便可能通过制度承认获得额外强度。反之，外部机构提供多语言服务、独立说明和直接访问渠道，可以降低单点解释依赖。

因此，法理学与解释学在本文中不是分离的。法理学关注权限和程序，解释学关注规则如何被理解与叙述；二者在“谁能够把某种解释转化为有效规范”这一点上汇合。这正是权力文法概念需要处理的中介层。

4.4 语言市场、象征资本与合法表达

Bourdieu 对语言与象征权力的分析拒绝把语言仅视为中性的沟通工具。他把语言实践放在“语言市场”、语言资本与合法语言的结构中理解：同一句话的社会效力取决于说话者位置、场域认

可和表达形式是否具有合法性 (Bourdieu 1991)。这一视角为本文“理由有效性”提供了直接启发。家庭成员形式上都能发言，并不意味着其语言具有相同的社会或制度购买力。

语言资本可以来自教育、职业、法律知识、行政经验、标准语言能力、外语能力或对专业术语的掌握。它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语言能力能够显著提高家庭与外部机构沟通的效率，是一种真实的共同资源；另一方面，当所有外部信息都必须经过同一成员翻译、解释和筛选时，它也可能形成解释接口与资源接口的耦合。此时，语言优势不再只是“更会表达”，而可能决定谁能看见选项、谁能核验事实、谁可以直接接触第三方。

“合法表达”还涉及风格和情感规范。某些关系可能只有冷静、正式、符合某种教育风格的表达才被承认为“理性”；另一些关系则可能把情感强度、年龄地位或牺牲经历当作主要资格。本文不预设哪一种表达风格天然优越，而要求分析这些标准如何形成、是否对不同成员施加不对称负担，以及是否存在把合理异议排除为“不合适表达”的机制。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权力文法不是纯粹关于内容真伪的模型。即使两个主张具有相似内容，其表达者的地位、语言形式和制度可识别性不同，也可能产生不同后果。研究者如果只记录“双方都表达了意见”，就会遗漏这种效力差异。

4.5 语言的政治经济与制度可达性

Irvine 明确指出，语言现象可以直接进入政治经济：语言形式能够索引社会分工，语言能力可以成为交换对象，语言实践本身也与物质关系相连 (Irvine 1989)。Gal 对语言与政治经济的综述则系统讨论语言差异如何与阶级、劳动、制度和社会再生产相互关联 (Gal 1989)。这意味着，语言在家庭权力中的作用不能只放在“沟通是否顺畅”这一层面。

例如，能够阅读合同、填写表格、与银行或学校沟通、理解技术说明和进行多语言翻译，都会影响家庭成员对制度资源的直接访问。当这些能力高度集中时，拥有者可能承担真实的额外劳动与责任，也可能因此获得更强的议价与解释位置。分析必须同时承认贡献与风险：语言能力可以是家庭合作的公共品，也可能成为单点依赖。

Heller 关于全球化、新经济与语言商品化的研究进一步显示，语言和身份会在劳动力市场与机构中获得不同交换价值 (Heller 2003)。这一点可以扩展到家庭政治经济：某种语言技能可能提高收入和迁移机会，也可能使掌握者成为唯一能够代表家庭进入某些制度场域的人。语言资本因此既影响市场资源，也影响内部权力文法。

语言政治经济还帮助解释为什么外部制度设计具有重要作用。多语言服务、直接账户访问、清晰表格、独立翻译和低门槛法律信息，都能降低一个家庭必须依赖“唯一解释者”的程度。由此，解释自主不是纯粹个人能力，而部分取决于公共制度是否允许不同成员直接进入信息和程序。

4.6 解释、语言与权力文法的接口

综合上述理论，本文把解释与语言看作四类相互关联的接口。第一是**意义接口**：谁能够定义事件和角色。第二是**叙事接口**：谁能够把单次事件嵌入长期身份与责任故事。第三是**语言资本接口**：谁拥有更高的表达、翻译和制度沟通能力。第四是**制度可译性接口**：哪些说法能够被银行、学校、医院、法院或组织程序识别并产生后果。

权力文法位于这些接口之后，但并不与它们重合。解释学说明意义如何形成，语言政治经济说明语言能力如何与资源和制度位置结合；权力文法进一步分析这些差异**何时能够稳定转化为决定、规则修改和退出成本**。如果语言优势只提高沟通效率，却没有形成排他性控制，那么它不构成本文

意义上的权力集中；如果某一解释能够被其他成员核验、挑战并由第三方修正，其结构风险也低于不可争辩的解释垄断。

这一界面还为经验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类型。除了收入、账户和决定记录，研究者还需要观察谁负责外部沟通、谁保管文本与凭证、哪些词语具有角色资格含义、谁承担翻译劳动、不同成员能否独立接触制度信息，以及争议叙述如何进入后续规则。只有把语言材料与物质和制度材料连接，权力文法才不会退化为抽象隐喻。

这个接口还要求区分**解释竞争**与**解释排除**。成熟关系中出现不同叙述十分正常，甚至可能提高共同判断质量；结构性问题并不在于“有人不同意我”，而在于某类解释由于说话者身份、语言形式或制度位置而在进入事实核验之前就被排除。经验研究因此需要观察解释被拒绝的理由：是证据不足、相关性不足，还是仅仅因为提出者缺少被认可的资格。

进一步地，语言政治经济使本文能够把“发声”拆成若干步骤：具有表达机会、具有可理解表达、表达被记录、表达进入决定程序、表达能够触发复核。形式上的说话机会只覆盖第一步。真正具有权力分析价值的是后续环节是否系统向某一位置倾斜。由此，权力文法不以“谁说得更多”为核心指标，而以语言如何被转换成制度后果为核心对象。

5 权力结构的形式原语与关系状态

本节建立最小形式语言。目标是把“谁更强”“谁控制谁”之类压缩性表达拆解为可区分的关系变量，并明确这些变量的作用对象。形式化不预设五个维度可被同一尺度测量，也不预设存在一个统一的“总权力分数”。

5.1 关系历史、事务域与可行动集合

设家庭关系中的主体集合为 $\mathcal{I} = \{1, \dots, n\}$，事务域集合为 $\mathcal{D}$，例如居住、财务、职业、教育、医疗、社交、信息与家庭照护。关系具有历史 $h_t \in \mathcal{H}$，其中包含此前发生的承诺、规则变化、资源配置、冲突处理与第三方介入。主体 i 在时刻 t、事务域 d 和历史 h_t 下的现实可行动集合由公式 1表示。

$$\mathcal{A}_i(t, d \mid h_t) \tag{1}$$

“现实可行动”比法律上或逻辑上可行更强。一个选项即使形式上存在，也可能因为经济成本、信息缺失、社会惩罚、身份依赖或退出风险而难以执行。因此，权力分析需要同时处理**选项存在**和**选项可承担**。

这一点使本文与仅以形式权利为基础的分析区分开来。某人可能在法律上拥有签订合同、离开住所、开立账户或寻求外部帮助的资格，但如果实际收入、证件、交通、信息或社会支持受到高度集中控制，这些权利在短期内可能难以转化为现实行动。反之，某些没有明确法律权利名称的社会资源，例如可信赖的朋友、职业网络、可独立使用的数字账户以及对程序的知识，也可能显著扩大可行动集合。

因此，公式 1应被理解为一个“制度化可行集”，而非纯粹心理选择集。它把法律资格、经济条件、社会网络和关系历史都视为行动条件的组成部分。这样做为后文把法理学的权利结构与政治经济学的资源结构纳入同一分析提供了接口。

若主体 j 的干预使 i 的可行动集合发生变化，该变换由公式 2表示。

$$\mathcal{A}_i'(t,d \mid h_t) = \Phi_{j\to i}^{d,t}(\mathcal{A}_i(t,d \mid h_t), h_t) \tag{2}$$

其中 $\Phi_{j\to i}^{d,t}$ 是关系与情境依赖的变换。它可以减少选项、提高特定选项成本、改变信息可得性，也可以增加选项。因而，能力本身的存在不能直接推出其规范性质。

5.2 五类权力接口

本文把与目标问题最相关的权力能力分解为五类接口。五类接口构成的关系向量见公式 3。

$$\mathbf{P}_{j|i}^{d}(t) = \left(D_{j|i}^{d}, I_{j|i}^{d}, N_{j|i}^{d}, R_{j|i}^{d}, X_{j|i}^{d}\right)_t \tag{3}$$

其中：D 为**决定接口**，表示直接改变行动或结果的能力；I 为**解释接口**，表示稳定命名事件、角色和责任的能力；N 为**规范修改接口**，表示改变判断标准、义务条件或程序规则的能力；R 为**资源接口**，表示控制资金、住房、文件、信息、社会网络或其他关键资源的能力；X 为**退出接口**，表示提高拒绝、暂停、分离或寻求外部支持成本的能力。

公式 3只是一组坐标。各坐标可能有不同数据类型：有些可以近似为比例变量，有些只能进行顺序比较，有些需要事件编码。本文因此避免写出 $D+I+N+R+X$ 之类未经证明的加总指标。

五类接口之间也不能被理解为彼此孤立。资源接口 R 可能提高退出接口 X 的作用强度，因为控制住房或证件会增加拒绝成本；解释接口 I 可能影响规范修改接口 N，因为谁能够定义一次冲突的意义，往往也更有机会提出下一轮规则；决定接口 D 又可能通过反复行使沉淀为一种被预期的关系惯例。本文后续所称的“权力导向”，正是关注这些接口是否形成稳定耦合，而不是寻找某个单一维度的最大值。

同时，各接口的正当基础不同。决定接口可能来自法定监护、共同授权或专业职责；解释接口可能来自专业知识但仍需接受事实核验；资源接口可能来自产权或受托管理，却不当然包含控制他人职业、社交或信息的权限。将接口分开，可以使“有某种权利”与“该权利能够扩张到何种关系领域”这两个问题不再混同。

5.3 规范更新与解释状态

设关系规范集合为 $\mathcal{N}_t$，事件为 ω_t，主体对规范更新过程具有不同影响权重 $\chi_{i,t}$。规范更新关系见公式 4。

$$\mathcal{N}_{t+1} = \Psi(\mathcal{N}_t, \omega_t, \{\chi_{i,t}\}_{i\in\mathcal{I}}) \tag{4}$$

当某一位置可以在对自身不利的结果出现后反复改变完成标准、资格条件或责任归属，而其他参与者缺乏异议、记录或退出能力时，规则稳定性下降。需要强调的是，**规则可以改变**并非问题本身；家庭规则本来就需要适应生命阶段变化。分析关键是规则修改是否具有理由、程序、对称的争辩机会和可预期边界。

这种区分具有明显的法理学意义。稳定性不是把私人关系“法典化”，而是要求对影响基本生活利益的规则具有最低程度的前瞻性、公开性和可争辩性。家庭当然不同于法院或行政机关，但当某些私人决定能够持续影响住房、财务、身份或第三方机会时，程序性要求会成为判断权力是否被约束的重要参照。这里借用的不是国家程序法的具体规则，而是一种更抽象的法治直觉：规则若只

能在结果出现后由一方重新定义，另一方就难以通过遵守既有标准来稳定规划行为。

解释状态同样具有时间维度。一次事件被命名为何种性质，会影响未来类似事件如何被理解，也会影响哪些事实被保存、哪些行为被视为合理。因此，规范更新与解释更新共同构成关系历史的一部分。

事件到解释标签的映射由公式 5表示。

$$\mathcal{L}_{j,t} : \omega_t \longmapsto \ell_t \tag{5}$$

其中 ℓ_t 可以是“负责”“自私”“不成熟”“不忠诚”“合理照护”等关系标签。解释权只有在这些标签能够稳定改变后续规则、资源或第三方评价时才构成结构性变量。一次意见分歧本身不足以证明解释权集中。

5.4 权力导向结构的识别条件

本文不用单一阈值定义权力导向结构，而给出五个共同识别条件。对于时间区间 T 与事务域集合 $\mathcal{D}^* \subseteq \mathcal{D}$，若观察到以下机制组合，则可以把关系配置分析为具有较强权力导向：

1. **重复性**：相关权力差异在多个事件中出现，而不是一次性冲突；
2. **方向性**：至少若干核心接口持续向同一关系位置集中；
3. **转换性**：资源、位置或退出差异能够稳定改变决定、解释或规范结果；
4. **跨域性**：一个事务域中的优势能够穿透到其他事务域，例如财务控制转化为职业或社交限制；
5. **递归性**：既有优势能够改变未来规则、资源或退出条件，使后续不对等更易维持。

这些条件用于识别结构强度，而非直接给出伦理结论。合法监护、共同财务安排、照护代理和紧急授权都可能暂时满足部分条件，因此仍需进入授权和程序层面的审查。

五个条件也不是机械的必要且充分条件。例如，一个关系可能只在财务域表现出高度集中，却因为财务是住房、职业和退出的基础而产生显著跨域后果；另一个关系即使存在多域不对称，也可能由于高度透明、可撤回授权和强外部支持而保持较高自主。结构判断因此需要配置式推理：考察接口组合、关键域的中心性以及关系历史，而不是计算简单“得分”。

经验上，最有信息量的证据往往不是单次极端事件，而是重复事件之间的结构相似性。例如，规则是否总在同一方向上改变，拒绝是否稳定触发多个领域的成本，外部资源是否持续被转译为内部决定权。这样的序列证据能够帮助区分偶发冲突与具有自我维持能力的关系结构。

6 权力文法的二阶转换结构

本节给出全文最核心的概念重构。权力文法并不是另一种权力资源，而是说明**已有差异如何被转换为关系中的有效性**。该概念因此处在资源、规范、解释与后果之间，属于二阶关系规则。

6.1 理由有效性与后果转换

设一项主张或边界声明为 q，其内容理由为 $r(q)$；主体位置、资源与退出条件形成关系状态 z_t。关系中的实际有效性不只取决于理由内容，还取决于关系如何把理由和位置转换为后果。这一转换

结构由公式 6表示。

$$\mathcal{G}_t : (q, r(q), z_t, h_t) \longmapsto \big(J_t(q), C_t(q)\big) \tag{6}$$

其中 $J_t(q)$ 表示在当前关系中被承认为“可进入判断”的理由集合，$C_t(q)$ 表示主张能够触发的现实后果集合。

在协商性较强的关系中，$J_t(q)$ 对理由内容、授权和共同规则具有较高敏感性；在权力导向较强的文法中，$C_t(q)$ 往往更敏感于主体能否执行、能否撤回资源、能否提高退出成本以及能否重写规则。这里的“文法”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而是关系中**有效性转换规则**的比喻性与形式化结合。

例如，两位参与者都可以说“我不同意这项安排”。若第一位参与者的不同意能够触发暂停、重新协商和共同记录，而第二位参与者的不同意只被视为情绪或不成熟，那么两人的“表达权”在形式上相似，实际有效性却完全不同。权力文法概念试图捕捉的正是这种差距：关系不是只分配发言机会，还分配哪些发言能够改变程序、哪些拒绝具有停止效果、哪些解释能够进入后续规则。

因此，权力文法并非单纯的话语分析。它同时包含物质后果与制度后果。一个理由之所以“有效”，可能因为它被共同规范承认，也可能因为提出者控制关键资源；一个规则之所以持续，也可能因为参与者真诚认同，也可能因为挑战规则的退出成本过高。论文需要把这些路径区分开，才能避免把同意、顺从和无法承担拒绝成本混为一谈。

6.2 权力文法与既有理论的区分

该概念与既有理论存在三种邻接关系。首先，它接受权力依赖理论的关系性前提：权力与替代选择、依赖和资源位置有关 (Emerson 1962)。其次，它与隐藏权力、多维权力研究相容，因为议题选择、解释和规范同样可能构成权力过程 (Komter 1989; Lukes 2021)。再次，它保留 Allen 对 power-over 与 empowerment 之间复杂关系的提醒：增加主体能力并不必然等于增加支配，能力也可能用于形成共同协商条件 (Allen 1998)。

权力文法的独立分析价值在于：它不再询问“谁拥有哪种资源”这一一级问题，而是询问“何种差异能够在这段关系中转化为有效决定”这一二级问题。两段关系可以具有近似的收入差异，却因规则、授权、外部制度和退出条件不同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有效性结构。反过来，资源差异不大也不排除解释权或规范修改权高度集中。

这一区分也说明为什么本文不能由资源理论直接推出全部结论。资源理论能够解释替代选项和依赖如何影响谈判位置，但不能单独说明为什么某些资源被关系承认为具有决定性、另一些资源却不被承认。例如，收入较低的一方可能因为法律产权、专业资格或外部制度支持而拥有高度稳定的拒绝权；收入更高的一方也可能因为共同预算的透明规则而不能把经济优势直接转换为单方面决定。权力文法由此处于“资源分布”和“结果分布”之间。

它与多维权力理论的区别则在于分析尺度。Lukes 等理论主要帮助说明权力可以发生于决策、议题设定和偏好形成等不同层次；本文进一步关注这些层次在一个具体关系配置中如何通过授权、规则、记录和退出成本相互转换。该概念只有在这种“转换”能够被经验识别时才具有增量价值，因而后文会把它写成可反驳的研究命题，而不是把所有复杂互动都重新命名为权力文法。

解释学与语言政治经济学使这一“转换”概念获得更明确的基础。关系中的理由并不是先以完全中性的形式存在、随后才被权力扭曲；理由本身需要通过某种语言、叙事和制度类别被理解。与此同时，能够熟练使用某种合法语言、专业术语或行政格式的人，也不因此天然获得对他人事务的决定权。权力文法关注的正是二者之间的中间步骤：语言与解释优势何时被承认为资格，资格何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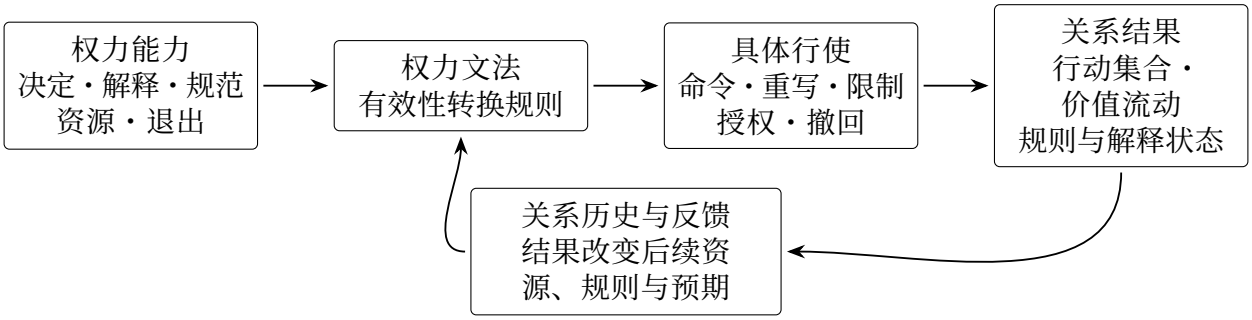

图 1: 权力能力、权力文法、具体行使与关系结果的层级区分

能够改变程序，程序变化又何时进入资源与退出接口。

因此，本文把“语言有效”与“权力有效”区分开。一项陈述可能在语义上清楚、在事实层面正确，却因为说话者缺乏制度访问而无法改变任何结果；另一项陈述可能语言上非常简短，却由于提出者掌握账户、身份文件或组织权限而具有立即后果。Bourdieu 所说的语言市场和象征权力 (Bourdieu 1991) 帮助解释为什么表达的社会效力不均，而本文的权力文法则进一步要求研究这种不均是否稳定进入决定、规范修改和退出成本。

同样，权力文法与解释学也保持边界。Gadamer 式的历史性说明任何理解都带有前结构 (Gadamer 2013)，但历史性本身并不等于支配；家庭成员基于共同历史形成快速理解，常常提高合作效率。只有当特定解释被结构性地免除核验、竞争解释失去进入共同判断的通道，且这种解释优势能够持续改变规则或资源时，解释差异才进入本文的权力机制。

6.3 文法锁定与关系路径依赖

关系历史 h_t 会影响当前主张的解释。若过去的拒绝经常伴随高成本，参与者可能在新事件发生前就改变行为；若规则频繁在结果出现后重写，主体可能把“合规”理解为不可完成目标。此时，权力文法具有路径依赖。

下一期文法的历史依赖更新由公式 7表示。

$$\mathcal{G}_{t+1} = \Xi(\mathcal{G}_t, \omega_t, \mathbf{P}_t, \mathcal{N}_t) \tag{7}$$

若既有权力行使持续提高未来同类行使的可接受性、可执行性或低成本性，则出现**文法锁定**。文法锁定不要求每次都有显性命令；参与者对后果的学习本身就可能改变后续行动。相应地，去权力中心化也需要时间：一次善意声明无法自动重写已经由长期互动形成的有效性预期。

锁定机制至少可以通过三条路径形成。第一是行为学习：参与者发现某些边界声明反复无效，于是在下一次冲突前就减少提出边界。第二是制度沉淀：原本临时的账户、文件或沟通安排逐渐变成事实上的常规，其他参与者越来越难重新获得访问权。第三是意义沉淀：某些角色标签，例如“更懂事的人”“负责的人”或“需要被照顾的人”，长期与特定权限绑定，使权限扩张获得稳定叙事支持。

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完全被结构决定。相反，路径依赖恰好说明改变需要创造新的可重复经验：清晰授权、成功的异议、规则保持不变、外部支持可用、错误能够纠正。只有这些事件在时间上积累，参与者才会更新对关系后果的预测。因而，关系重构既是规范工程，也是学习过程。

图1把四个层级分开。这样可以避免从“存在能力”直接跳到“发生控制”，也避免从“出现结

表 2: 不对称关系的边界案例与判别变量

情形	不对称可能具有的正当基础	仍需检查的结构变量
儿童照护与监护	年龄、保护义务、能力差异与法律责任	权限是否与发展阶段相称；是否保留表达、复核与逐步增加自主的空间
疾病或紧急代理	时间压力、能力暂时受限、生命安全需要	授权范围、必要性、时限、事后说明与代理终止条件
共同财务管理	成本降低、专业分工、共同目标	信息可见性、双向授权、撤回权、个人最低控制区间
高依赖照护关系	照护资源集中、专业知识差异	依赖是否被用于扩大无关事务控制；第三方支持和申诉渠道是否存在
文化或家庭义务	稳定共同生活、代际责任与共享规范	义务是否可争辩、是否对不同成员施加不可比较的退出成本、是否存在最低自主底线

果”反推单一主体具有唯一因果责任。

6.4 边界案例与反例

为了提高概念的判别力，本文明确保留以下边界案例。

表2说明，本文的核心区分是**权力是否受到授权、理由、程序、比例和退出条件的约束**。因此，任何经验研究都需要同时记录权力差异与其正当化结构。

边界案例的作用不仅是防止误判，也反过来帮助说明本文的核心机制。儿童监护之所以可能具有正当性，并不是因为成年人天然拥有无限支配权，而是因为其权限与保护目的、发展阶段和责任义务联系；紧急代理之所以可被接受，也依赖必要性、时间限制和事后说明。一旦这些限制消失，原本具有正当基础的能力也可能发生功能漂移。

因此，本文拒绝把“自主”与“任何外部影响”对立起来。成熟的关系秩序允许授权、托付、照护与共同管理，同时要求这些安排具有可以说明的边界。权力文法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某一有限授权被不断转换为更广泛的资格主张，并最终改变其他事务域中的理由有效性。

7 结构性信任、可预期性与认识自主

本节讨论主体为什么可能在关系中保持谨慎，以及信任修复需要什么结构基础。信任并不只是一种温暖感受；它包含把未来利益暴露于他人行动之下的关系选择。Baier (1986) 强调了信任中的脆弱性，Hardin (2002) 则从可信利益和持续关系角度讨论信任逻辑。本文不在两者之间选择单一信任定义，而只提取一个共同点：**信任提高了对他人未来行为的暴露程度**。

7.1 结构性信任的条件向量

对于主体 i 相对于主体 j 的关系暴露，本文用公式 8定义结构性信任条件向量。

$$\mathbf{K}_{i|j}(t,d) = \big(L, S, Q, V, C, E\big)_{t,d} \tag{8}$$

其中 L 是权力边界的可执行性，S 是关键规则稳定性，Q 是争辩与异议空间，V 是事实和承诺的可验证性，C 是纠错与修复能力，E 是现实退出或暂停能力。六个条件都不是信任的充分条件，但它们影响“判断错误会造成多大不可恢复损失”。

因此，结构性信任与人格信任具有不同对象。人格信任询问“对方是否善意、诚实、可靠”；结

构性信任询问“即使双方出现重大分歧，是否存在足够边界，使一方难以任意改变另一方基本生活条件”。两者可以同时存在，也可能分离。例如，一个主体可能相信亲属总体善意，却仍要求财务记录、独立账户和明确授权。

这种区分尤其适合亲密关系，因为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往往被赋予道德意义：要求记录、边界或独立账户有时会被理解为“不信任家人”。结构性信任的概念拒绝这种二元化。记录和边界并不必然表达对人格的怀疑；它们也可以是让双方都不必过度依赖人格判断的制度条件。关系越涉及不可逆利益、第三方责任或长期依赖，越有理由把部分信任负担转移给可验证的程序。

从这一角度看，可信关系不是“没有防护措施”的关系，而是防护措施本身不再被体验为敌意。一个规则稳定、信息透明且可纠错的结构能够容纳误解、情绪波动和利益分歧，而不把每次冲突都升级为生存性风险。

六个条件之间还存在替代与互补关系。较弱的退出能力如果伴随高度稳定的规则、强第三方复核和充分信息，风险未必与完全不可约束的依赖相同；反过来，即使形式上能够退出，如果退出意味着失去全部住房、社会关系或法律身份，其实际保护也十分有限。因此，$\mathbf{K}$ 更适合被理解为配置，而不是线性评分表。后续经验研究应识别哪些组合对不同类型风险最关键。

正义论也提示，结构性信任的最低条件不应只由关系中最强位置单方面定义。什么算“足够透明”“合理退出”或“可接受纠错”，需要考虑受影响者承担的损失以及其实际能力。否则，看似统一的信任标准可能在不对称条件下要求弱势方承担更高风险。

7.2 规则稳定、争辩能力与纠错

规则稳定并不等于规则不变。稳定的核心是修改程序可预期：参与者能够知道规则为什么改变、谁可以改变、改变何时生效、是否可以提出异议。相应地，争辩能力也不要求所有争议都获得同意，而要求异议不会自动触发与争议本身不相称的惩罚。

纠错条件 C 尤其重要。即使双方都善意，复杂关系仍会产生误解、信息不对称和执行错误。一个高可信结构应允许发现错误、保存记录、恢复损失、修正规则和重新界定授权。Walker (2006) 关于 moral repair 的研究提示，关系修复涉及责任承认、规范重建与可信互动条件，而不只是情感和解。本文据此把“修复能力”加入结构性信任条件。

从法理学角度，争辩与纠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微观的程序保障。它们不要求家庭互动复制正式司法程序，却要求基本利益受到影响时，理由能够被提出、证据能够被保存、决定能够被复核、错误能够被承认。程序的价值在这里不仅是“更公平地作出决定”，还在于降低任何单一解释成为不可逆事实的速度。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规则稳定与纠错并不冲突。稳定不是僵化，纠错也不是任意重写。一个稳健结构可以明确规定什么情况下需要修改规则、谁可以提出修改、哪些既有利益应受到过渡保护。真正破坏可预期性的，是只有强势位置能够在不承担说明负担的情况下改变标准。

说明负担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指标。若一方改变重要规则时无需解释，而另一方任何偏离都必须提交完整理由，程序看似允许双方发言，实际却分配了不同的证明成本。法理学中的程序直觉提醒我们，理由要求应与权限强度相匹配：越能改变他人基本利益的决定，越有理由承担更高的说明、记录和复核义务。

纠错还需要区分事实纠错、规则纠错与关系修复。事实纠错处理“发生了什么”；规则纠错处理既有规范是否适用；关系修复则处理错误造成的信任损耗与未来保障。把三者混为一谈容易产生新的争议，例如用一次道歉替代损失恢复，或用规则修改回避对既往行为的说明。严谨分析应明确

修复发生在哪一层。

7.3 认识自主与解释捕获

主体需要保留独立描述事件、比较解释、保存证据和寻求外部验证的能力。本文把这一能力称为**认识自主**。它与认识不正义研究关于可信度、解释资源和认识权力的讨论相邻 (Fricker 2007)，但本文保持更窄的使用范围：任何意见冲突都不足以证明认识不正义，分析重点是**解释差异是否由于关系位置而系统性地失去进入共同判断的机会**。

当一个位置同时控制信息来源、事件记录、第三方接触和规范解释时，可能出现**解释捕获**。其特征不是“另一方总是错”，而是竞争解释缺乏独立保存、验证或进入决策的通道。认识自主因此至少包括四项能力：事实记录、概念形成、替代解释比较、外部验证。它们为后文的价值边界提供认识前提，因为主体只有能够知道价值从哪里产生、如何流动、依据何种规则处分，才可能形成有效授权。

认识自主也不能被理解为“坚持自己的看法”。真正的认识自主包含接受反证和修正判断的能力。一个只允许自我确认、不允许外部核验的主体同样缺乏稳健认识条件。因而，本文强调的是多源信息与可比较解释，而不是将任一参与者的第一人称叙述自动视为最终事实。

在经验研究中，解释捕获尤其需要谨慎识别。家庭成员可能因为知识、语言能力、数字技能或职业经验不同而在解释上存在真实优势。研究者需要判断这种优势是否开放于检验、是否可以被他人借助第三方资源补充，以及是否被转化为超出知识领域的决定权。只有当解释优势与信息封闭、记录控制和规范修改稳定耦合时，结构性问题才更清晰。

7.4 信任修复的结构顺序

本文不把“先建立信任”当作一般性的关系修复起点。在高不确定或高不对称情形中，更稳健的机制顺序是：先降低不可逆风险，再通过重复互动产生经验性信任。这一方向性关系由公式 9表示。

$$\Delta L, \Delta S, \Delta Q, \Delta V, \Delta C, \Delta E > 0 \quad \Rightarrow \quad \text{可承受的信任暴露区间可能扩大} \tag{9}$$

公式 9只表示条件改善与可承受暴露之间的方向性假设，不表示心理信任一定同步增长，也不规定修复速度。

信任修复还具有不可替代的时间性。过去事件一旦提高了某类风险的主观概率，仅靠未来承诺很难立即恢复到原有暴露水平。结构改善需要在多个事件中被验证，尤其是在参与者利益真正发生冲突时。换言之，最能证明文法变化的并不是无冲突时期的和谐，而是出现分歧后规则仍然保持稳定、异议仍然能够表达、既定边界仍然得到尊重。

这也意味着，要求弱势位置“先表现出信任”可能把举证责任倒置。更稳健的顺序是由拥有较大结构能力的一方或由共同制度先降低不可逆风险，再让信任通过经验逐步增长。该结论仍是一般机制判断，而不是对任何具体关系的行动指令。

从正义论角度看，信任修复还涉及举证和风险分配。若一方能够以低成本恢复原有控制，而另一方一旦误判便承担住房、资产、身份或第三方责任的高损失，那么“双方都应当同等冒险”并不构成中性要求。风险承担应当与控制能力、损失可逆性和既往规则记录相联系。结构性信任的价值之一，就是把这种风险分配显式化，而不是把谨慎归因于人格缺陷。

从解释学角度看，修复还要求双方对过去事件形成最低限度可共存的叙述。完全一致并非必要，但如果一方坚持过去的所有冲突都只是另一方“误解”，另一方则把全部行为解释为恶意，未来规

则很难获得共同意义。可持续修复需要允许不同叙述存在，同时对可验证事实、已承诺规则和未来权限建立更明确的共同记录。这样，关系不必先解决全部历史意义争议，仍可以先建立可执行的前向边界。

语言条件同样重要。修复性安排如果只能由掌握专业、法律或行政语言的一方解释，其透明度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关键文件、账户规则和第三方程序需要以相关参与者实际能够理解和独立核验的方式呈现。由此，结构性信任最终是一种制度化可理解性：参与者不仅知道规则存在，还知道规则如何运作、如何提出异议、如何触发纠错。

8 自主形成的多维能力结构

本节把自主界定为关系性能力，而非孤立意志。关系自主研究已经系统讨论社会结构、身份关系和对话条件如何促进或削弱自主 (Mackenzie and Stoljar 2000; Friedman 2003; Westlund 2009; Nedelsky 2012)。本文吸收这一基本方向，并把自主进一步拆分为**维度**与**稳健性层级**。

8.1 六维自主向量

主体 i 的自主条件由公式 10表示。

$$\mathbf{A}_i(t) = \left(A^{\text{econ}}, A^{\text{inst}}, A^{\text{rel}}, A^{\text{epi}}, A^{\text{val}}, A^{\text{exit}}\right)_t \tag{10}$$

六个维度分别对应：经济资源与基本财务控制；独立使用制度身份、账户、合同和公共服务的能力；维持不完全依赖单一关系节点的社会网络；认识自主；对个人与合作价值进行授权和处分的能力；拒绝、暂停、改变或退出高风险关系安排的现实能力。最后一项与Hirschman (1970) 关于 exit 与 voice 的经典区分存在分析上的亲缘性，但家庭关系的退出通常同时承载情感、身份、照护和生存成本，因此本文把退出处理为多维现实能力，而不是单纯的成员离开选择。

这些维度具有互补性。较高收入可能被账户控制抵消；形式上的法律独立可能因缺乏信息、证件、住房或社会支持而难以执行；丰富的社会网络也可能无法弥补制度身份受限。因此，自主不能可靠地压缩为单变量。

六个维度还具有明显的转换关系。经济资源可以购买住房、交通和专业服务，从而提高退出能力；制度身份可以把抽象权利转化为可执行合同和账户；关系网络可以提供信息、情绪支持和替代机会；认识自主则帮助主体辨认何种选项真实存在。自主因此更接近一个相互支撑的能力系统，而不是六个彼此独立的“资产”。

这一系统性理解也使自主与依赖能够共存。主体可以选择把部分事务交由可信任的人管理，只要这种授权不会摧毁其理解、复核、撤回和寻求替代的能力。关系自主的核心因此不是持续亲自控制每个细节，而是主体能够在重要节点重新进入决定过程，并保持形成与修正自身判断的条件。

8.2 可得性、控制度与稳健性

同一自主资源还需要区分三个层级。对于维度 k，三层结构由公式 11表示。

$$A_i^k(t) = \left(a_i^k, c_i^k, r_i^k\right)_t \tag{11}$$

其中 a 表示资源或选项**可得性**，c 表示主体对其**实际控制度**，r 表示面对外部干预时的**稳健性**。例如，“拥有银行账户”只说明可得性；账户密码和交易权限决定控制度；账户是否会因第三方压力、

文件扣留或身份依赖而失效则涉及稳健性。

这一三层模型解释了为什么形式独立与实质自主可能出现差距。它也避免把自主理解为二元状态：自主可以在不同维度和层级上逐步形成。

法理学上的形式权利主要提高“可得性”层，但权利是否能够被使用，还依赖程序知识、费用、时间、证据和制度接近性。政治经济学上的资源分布则会影响“控制度”和“稳健性”：同样一项名义收入，如果必须通过另一人的账户、住房或身份安排才能维持，其抗干预稳健性显然较低。三层模型由此提供了连接权利分析和资源分析的共同语言。

此外，稳健性具有情境相对性。一个安排在日常低冲突时期可能运行良好，却在关系恶化、失业、迁移或疾病时期迅速失效。评估自主不能只看平稳时期的可用性，还应考察在合理可预见压力下，主体是否保留最低行动空间。

三层模型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资源在不同关系中具有完全不同的自主价值。例如，两个人都名义上拥有个人银行账户，但一人独立持有凭证并能直接与银行联系，另一人的登录、手机和身份文件均由第三方控制；两者在资源“可得性”上相似，在控制度和稳健性上却明显不同。类似差异也存在于法律身份、职业资格和社会网络之中。

稳健性尤其涉及冲突情境。若一项资源只有在关系和谐时可用，一旦发生分歧便被停止、冻结或附加惩罚，它很难作为真实边界的基础。本文因此把“平时可使用”和“发生冲突时仍可使用”分开，后者更能反映自主是否受到结构保护。

这一模型也避免把自主等同于资产最大化。主体可能不拥有大量资源，却通过公共服务、可信网络和稳定权利保持较高稳健性；反之，高收入者如果全部制度接口都被另一个节点控制，也可能在具体事务上缺乏执行自主。资源量、控制和韧性需要分别观察。

8.3 家庭权力范围之外的生活秩序

设 $\mathcal{O}_i$ 为主体能够相对独立维持的生活秩序，$\mathcal{O}_F$ 为家庭权力网络能够直接组织的范围。本文关注的长期吸收状态由公式 12表示，并将避免该状态作为分析目标。

$$\mathcal{O}_i \subseteq \mathcal{O}_F \tag{12}$$

成为长期且缺乏替代的状态。当地理位置、收入、身份手续、职业机会、社交网络与信息通道都经过同一权力节点时，一个领域的冲突可以迅速扩展为整体生活风险。建立有限但真实的外部制度和社会支点，可以降低这种跨域吸收。

这里的“外部”是相对于特定权力网络而言，并不等于脱离家庭。主体仍可以维持深度亲密、共同生活和资源共享，同时拥有独立可访问的法律文件、专业账户、职业联系或社会支持。关键在于这些支点不能完全依赖同一个人许可才能被激活。

这一点也具有制度政策含义。公共服务、可负担住房、独立金融账户、劳动机会、法律援助和照护支持，看似属于家庭之外，却会直接改变家庭内部谈判的现实条件。后文政治经济学部分将进一步说明，家庭内部自主不能只通过“沟通技巧”解释，因为外部制度会系统性地改变可行动集合。

8.4 渐进式可控性

自主形成具有时间维度。若主体在私人网络影响仍较强时进入高度敏感、不可逆或高受托角色，外溢风险可能扩大；完全退出社会参与又可能增加依赖。本文据此提出**渐进式可控性**：责任规模应

与自主稳健性和接口控制能力相匹配。

设 τ_t 为受托暴露程度，$C_i(t)$ 为主体对关键接口的控制能力。启发式约束见公式 13。

$$\tau_t \preceq \Theta(\mathbf{A}_i(t), C_i(t)) \tag{13}$$

其中 $\preceq$ 表示“与能力边界相容”，而非数值小于等于。Θ 也不是已经估计的经验函数。该表达只明确一个规范原则：随着边界、记录、隔离与退出能力提高，主体可以承担更复杂的受托接口；责任扩张和控制能力需要共同增长。

渐进式可控性既适用于个人自主形成，也适用于组织如何配置权限。它反对两种极端：一方面，把尚未稳定的边界暴露在高不可逆责任中；另一方面，因为存在私人关系风险就永久排除主体参与公共或职业角色。更合理的制度问题是：哪些权限可以分阶段开放，哪些接口需要双重控制，哪些能力一旦形成就可以降低额外监督。

这种思路也避免把“低职位”等同于“低风险”。某些名义上简单的岗位可能接触现金、个人数据、采购或代表权，而高级研究或专业岗位反而具有清晰的同行复核和权限隔离。风险评估应围绕接口性质和可逆性，而不是围绕职位声望。

渐进式可控性的关键变量是**可逆性**。主体在学习维护边界时，不可避免会出现判断错误、沟通失误或对旧关系文法的回退。如果每一次错误都直接造成不可恢复资产损失或第三方重大伤害，学习成本过高；相反，可暂停、可复核、额度有限的责任环境允许主体通过真实实践形成新的稳定模式。

这一逻辑也适用于家庭内部。重要边界不必一次覆盖所有事务域，可以先在账户访问、文件保管、外部沟通等容易观察的接口建立新规则，再逐步扩展到更复杂的共同资产或照护安排。渐进并不意味着无限推迟自主，而是通过可验证的中间状态降低转型过程中新的冲突成本。

从正义角度，渐进安排不能成为永久限制弱势主体的理由。若“尚未准备好”由强势位置单方面、无限期定义，它本身可能成为规范修改工具。因此，渐进必须伴随公开的升级条件、复核时点和主体参与。

8.5 分布式自主与依赖组合

自主还具有结构维度。关键支持节点及其依赖权重约束见公式 14。

$$\mathcal{S}_i = \{s_1, \ldots, s_n\}, \qquad \sum_{m=1}^{n} w_m = 1 \tag{14}$$

其中 w_m 表示对节点 s_m 的相对依赖权重。基于这些权重，简化的集中度指标见公式 15。

$$H_i = \sum_{m=1}^{n} w_m^2 \tag{15}$$

H_i 越高，说明关键支持越集中；但本文不把该指标直接当作“自主分数”。不同节点之间可能高度相关，因此真正重要的是**独立失效模式**：一个节点失效是否会同时导致其他节点失效。

由此，**分布式自主**指主体在收入、住房、身份、信息、社会支持和专业资源上拥有若干不完全

共失效的支点。其规范约束由公式 16概括。

$$\text{依赖分散} \quad + \quad \text{局部责任可追踪} \tag{16}$$

分散并不意味着把责任分散到无人承担。每个契约、账户、授权和价值通道仍需要明确责任主体。

分布式自主还需要控制协调成本。支点越多，主体需要维护的账户、关系和制度接口越多，信息负担也可能增加；若多个节点本质上依赖同一收入来源、同一身份或同一家庭批准，它们在表面上分散、实际却具有共同失效点。因此，经验应用应关注支点之间的相关性，而不是简单计算节点数量。

政治经济学上，这一结构与“退出选项”密切相关。更好的外部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资产权利会提高家庭成员的替代选择，从而影响内部议价。分布式自主因此既是个人策略概念，也是制度结构概念。

法理学上，家庭权力范围之外的生活秩序并不意味着建立一个“无法律的私人堡垒”，而是意味着主体能够直接进入若干不由单一关系节点控制的制度关系。例如，独立取得身份文件、能够直接与银行或公共机构沟通、拥有本人可访问的法律和医疗信息，都会使形式权利更容易转化为现实能力。这些外部接口同时降低了家庭内部解释权的垄断，因为主体不必完全依赖另一成员说明外部规则。

解释学上，外部生活秩序还提供替代性意义资源。长期处在单一关系叙事中的主体，可能很难判断某些规则是普遍制度要求、家庭特有惯例，还是某一成员的解释。职业、教育、朋友、专业机构和公共信息能够提供比较参照，使主体对自身处境拥有更丰富的概念语言。这样的“外部性”并不要求与家庭对立，而是防止任何单一关系成为唯一的事实来源和规范来源。

因此，家庭范围之外的生活秩序具有物质、制度与解释三重功能：提供替代资源，提供独立程序接口，也提供替代解释。三者共同提高自主稳健性，而任何单一维度都可能在缺少其他维度时失效。

这里的“外部”不必是地理分离。数字账户、本人可直接获取的医疗信息、独立职业资格、个人法律咨询以及不经过家庭中介即可联系的公共服务，都可能构成外部支点。相反，即使地理上远离家庭，如果收入、身份和全部信息仍经由同一节点控制，实际自主也未必显著提高。

外部支点还具有冗余价值。任何单一支持关系都可能失效，多个彼此独立的制度接口可以降低整体脆弱性。但冗余并非越多越好；维护过多账户与关系也会增加协调负担。较合理的目标是让关键生活域至少不存在一个可以使整体系统同时失效的唯一控制点。

9 家庭政治经济：依赖、社会再生产与议价位置

家庭权力若只被理解为人际沟通或心理互动，就会忽略其物质基础。收入、资产、住房、照护时间、劳动市场机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共同决定家庭成员的替代选项，也决定某种关系安排一旦失败会造成多大损失。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在于把这些条件视为权力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关系发生之前已经固定的“背景”。本节利用家庭议价、合作冲突和社会再生产研究，把前文的资源接口与更宏观的市场、国家和社会规范连接起来。

9.1 家庭作为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制度单位

家庭能够产生真实的共同利益。共同居住、照护、风险分担和长期投资往往要求成员合作，许多收益也难以精确分割。因此，把家庭完全理解为相互竞争的个人集合会遗漏亲密关系的共同性。然而，把家庭假设为具有单一偏好和统一福利函数同样会遮蔽内部差异。Sen 关于“合作冲突”的分析正指出，家庭成员可以在共同合作获益的同时，对收益、劳动和资源分配具有不同利益 (Sen 1990)。

这一视角与本文的权力文法存在直接关系。合作本身并不能决定如何解释贡献，也不能决定谁拥有最终决定权。一个家庭可以共同受益于某成员的无偿照护，但如果这种贡献无法被转化为财务安全、职业补偿或未来谈判位置，其合作收益与个体自主可能出现张力。相反，家庭也可以通过共同资产、照护保障和透明预算把合作收益转换为更均衡的长期能力。

因此，分析家庭政治经济不能只问“总资源是否增加”，还应问资源增长如何改变每个成员的可行动集合。若家庭整体收入提高，但控制权、账户访问和职业机会进一步集中，公式 3中的资源接口可能变得更不对称。若收入增长同时伴随共同产权、独立账户和外部支持，经济扩张则可能提高多个成员的自主稳健性。总量与分配、分配与控制、控制与退出，是三个不同层次。

合作冲突还意味着家庭成员对“共同利益”的理解可能真实不同。某项高储蓄策略可能提高未来资产，却降低当前照护质量；某项职业投资可能增加家庭长期收入，却把短期时间成本集中给另一成员。政治经济分析不能预先假设存在一个客观可知的单一家庭效用函数，而应观察利益权衡如何被提出、谁承担机会成本、谁有能力修改安排。

这也说明为什么解释权会进入经济分析。若只有一方有资格定义“对家庭最好”，资源分配争议会迅速被转化为角色资格争议。把共同利益的形成过程显式化，可以让家庭政治经济与权力文法在机制上连接，而不是把经济资源当作独立背景变量。

9.2 议价位置与家庭之外的资源结构

家庭议价研究的重要发展，是把谈判能力从家庭内部资源扩展到家庭之外。Agarwal 指出，社会规范、资产所有权、市场、社区和国家制度都会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而且这些外部与内部位置相互作用 (Agarwal 1997)。这使“退出选项”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固定常数：就业机会、公共住房、社会保障、移民身份、亲属网络和法律救济都会改变拒绝某项安排的可承担成本。

设主体 i 的家庭外部支持条件为 $O_i(t)$，社会规范与制度环境为 Z_t。其实际谈判位置的概念化关系见公式 17。

$$\mathcal{B}_i(t) = F(\mathbf{A}_i(t), O_i(t), Z_t, h_t) \tag{17}$$

其中 F 不被假设为已知函数。公式 17的目的，是明确家庭内部议价并非只由当前收入决定。过去的关系历史、外部替代选项、规范期待和制度权利都会共同影响一项“不同意”是否具有现实后果。

这一点也帮助解释政策如何间接改变家庭权力。公共托育可能提高照护者的就业选择；独立社会保障资格可能降低对配偶收入的单点依赖；可负担交通和数字接入可能扩大外部网络；财产和继承制度则影响资产控制。制度政策并不需要直接“管理家庭”，也可能通过扩大成员的实际选择来改变内部权力文法。

同时，外部资源并非自动产生更平等的关系。收入提高可能被现有控制结构吸收，外部福利也可能由同一家庭节点集中管理。政治经济学分析因此需要回到本文的控制度和稳健性层级：资源只有在主体能够实际访问、使用并在冲突情况下保有时，才真正改变其议价位置。

“家庭之外”的资源还包括可信赖的信息和制度知识。一个成员可能拥有收入，却不知道自己的法律资格、可用福利或合同选项；另一个成员收入较低，却因专业网络和制度知识拥有更强谈判位置。外部选项因此既是物质集合，也是认识集合。语言资本与行政能力会决定哪些选项能够被看见和执行。

此外，社会规范可能改变外部资源的可用性。某些职业、住房或照护选择即使市场上存在，也可能由于污名、身份义务或社区惩罚而具有很高社会成本。政治经济学若只计算货币价格，就会低估这些退出成本。经验研究应把制度、社会和象征成本共同纳入。

9.3 社会再生产、照护与不可见价值

家庭不仅消费市场收入，也生产维持社会生活所需的大量非市场价值：照护儿童、老人和病者，维持住房和日常生活，支持教育与职业发展，承担情绪劳动并延续代际关系。Folbre 对社会再生产成本的分析强调，照护成本如何在家庭、市场与国家之间分配，是政治经济学而不仅是私人选择问题 (Folbre 1994)。这一视角拓展了本文“价值边界”的对象范围。

如果只记录货币流，就可能把无偿照护理解为没有价值的背景条件；如果只记录贡献，又可能忽略照护关系中的情感和非契约性质。本文因此不主张把所有家庭劳动市场化，而是要求在讨论资源、权力和价值处分时承认非市场贡献的结构效果。长期照护可能减少照护者的工资、职业年资和养老金，同时增加其他成员可用于市场工作的时间。即使双方从未就每小时劳动进行定价，这种时间配置仍会改变未来资源接口。

社会再生产也解释了为何“谁拥有收入”与“谁创造了价值”并不总一致。市场工资只对某些可交易活动定价，而家庭中的支持、照护和风险承担可能共同参与了收入生成条件。价值边界分析由此需要在产权与贡献之间保持区分：贡献本身不自动产生任意处分权，但若长期贡献完全无法进入共同决策或安全保障，它会构成政治经济层面的分配问题。

社会再生产还具有代际维度。教育支持、照护风格、语言训练、社会网络和资产传递都会影响下一代进入制度和市场的能力。因而，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并不只影响当前成员，也可能改变未来世代的机会结构。本文不展开代际正义的完整理论，但这一事实说明家庭权力与公共正义之间存在长期传导路径。

照护价值的不可见性还可能来自测量制度本身。市场统计更容易记录工资和资产，却难以记录待命时间、情绪支持、家庭协调和职业机会损失。研究若只依赖货币数据，会系统低估某些贡献。定性事件记录和时间使用资料因此是政治经济分析的重要补充。

9.4 资产、时间与制度权利的长期累积

家庭权力具有明显的累积性。工资差异会积累为资产差异，资产差异会影响住房和信贷，职业中断会影响未来收入与养老金，长期掌握对外沟通和制度手续则会积累程序知识。由此，短期分工可能转化为长期结构，即使最初安排是双方自愿形成的。权力分析需要关注的不仅是起点同意，还包括安排经过时间后是否产生了难以逆转的新依赖。

政治经济学上的这一动态可以与公式 7联结：市场和制度结果会改变下一期的关系状态，关系状态又影响下一期资源配置。例如，一方为照护退出劳动市场后，其外部选择下降，家庭内部对继续照护的“合理性”可能随之增强；这一结果并非单纯偏好，而是一种由过去分工产生的路径依赖。反过来，社会保障、再就业支持和共同资产安排可以降低这种累积锁定。

这也说明，本文不把家庭内部正义缩减为当前消费是否大致相等。长期自主更依赖资产、技能、

制度资格、时间和可恢复的职业能力。政治经济学因此为自主向量增加了跨期解释：今天的资源分配会改变明天谁能够提出有效异议，谁能够退出某项安排，以及谁拥有与第三方合作的能力。

跨期累积也意味着“起初自愿”不能单独证明长期结构仍然正当。主体在初期可能基于当时信息和共同目标接受分工，但随着资产、技能与照护负担分化，其重新协商能力可能下降。如果原安排缺乏定期复核和补偿机制，早期同意会被错误地延伸为对所有未来后果的授权。

相反，制度可以主动减少累积锁定，例如共同资产积累、照护者养老金安排、职业恢复支持、技能更新与透明的长期财务规划。这些机制并不取消家庭分工，而是降低分工在未来转化为不可逆地位差异的可能。

9.5 语言资本、行政劳动与家庭内部的制度中介

家庭政治经济还包括一种容易被低估的劳动：把家庭需求翻译为制度能够处理的语言。填写学校、医疗、银行、税务、移民或组织文件，理解合同与政策，进行跨语言沟通，保存数字凭证并与专业机构交涉，都需要时间、知识和语言资本。Bourdieu 对语言资本的分析 (Bourdieu 1991) 以及 Irvine、Gal 对语言政治经济的讨论 (Irvine 1989; Gal 1989) 说明，这类能力既是文化资源，也是进入经济与制度机会的媒介。

这种“行政劳动”通常具有真实价值。能够处理复杂制度的一方可能承担大量隐形时间成本，并为家庭获得教育、福利、金融或职业机会。正义分析不能只看到其因此获得的解释优势，而忽略其贡献。更完整的问题是：这种劳动是否被共同承认，是否可以被学习、分担和替代，重要信息是否被共同保存，以及承担者的知识优势是否被转化为超出事务需要的决定资格。

当行政与语言能力无法分担时，家庭会形成制度中介节点。其他成员的外部权利和资源必须经过该节点才能被看见和使用。此时，政治经济与解释权发生耦合：掌握制度语言的人不仅拥有信息，还拥有控制信息何时传达、以何种分类传达、哪些选项被认为现实的能力。这样的中介可能完全善意，却仍然形成结构脆弱性，因为节点一旦失效、发生冲突或选择性过滤，其他成员的制度可达性会迅速下降。

公共制度可以直接影响这种中介结构。清晰语言、无障碍设计、多语言服务、本人直接访问、可委托但可撤回的代理系统，以及便于共享和审计的数字记录，都能降低家庭必须依赖单一“翻译者”的程度。由此，语言政治经济不是附加的文化议题，而是家庭资源、退出与自主模型的一部分。

9.6 政治经济结构与权力文法的接口

综合而言，政治经济条件通过至少四条路径进入权力文法。第一，改变替代选项，影响拒绝成本；第二，改变资源控制，影响决定接口；第三，改变贡献的可见性与认可，影响解释接口；第四，改变公共支持和救济可达性，影响规则与退出接口。因此，家庭内部的“沟通方式”不能与外部资源结构分离研究。

这一结论也限定了本文的规范主张。改善关系并不总能仅靠成员之间更好沟通完成；若住房、劳动、身份和照护制度持续制造极高退出成本，关系内部的协商空间本身会受到压缩。同样，制度改革也不能自动解决具体关系中的解释、授权和规则问题。宏观政治经济与微观权力文法相互条件化，二者需要共同进入解释模型。

更具体地说，同一宏观制度可能在不同家庭中产生不同效果，因为制度资源仍需要经过关系接口才能被使用；同一家庭文法也可能在制度环境变化后发生松动或强化。因而，本文拒绝单向还原：家庭权力既不能被完全还原为资本、收入或国家制度，也不能被完全还原为沟通习惯和个体心理。

其分析对象正是这些层级之间的转换机制。

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清晰问题：当外部制度条件近似时，哪些关系规则导致资源差异被更强地转换为决定权；而当关系规则近似时，哪些公共制度能够显著降低退出成本或提高自主稳健性。这样的双向比较比单独寻找“家庭文化”或“经济资源”的总体效应更接近本文的理论结构。

宏观与微观之间还可能存在反馈。家庭内部的照护分工会影响劳动市场供给，长期大量类似家庭选择又会影响雇佣制度、公共服务需求和社会规范；宏观制度变化随后再进入家庭。本文目前只把宏观制度作为外部条件处理，但这一反馈提示，后续政治经济研究可以把家庭理解为制度再生产的节点，而非单纯接受环境影响的终端。

这也为政策分析提供边界：扩大公共服务或权利保障可能改善外部选项，却不能保证家庭内部自动形成可争辩文法；关系教育或沟通干预可能改善解释结构，却无法替代住房、收入和身份安全。不同层级的干预针对的是不同机制，不能相互替代。

10 价值边界、授权结构与中介性转移

本节讨论私人关系中的价值处分。家庭生活天然包含共同支出、馈赠、无偿照护、代际转移、共同资产与非货币贡献。因此，“价值发生转移”本身没有规范结论。相关哲学文献也表明，剥削判断需要比“某人获益”更强的条件，通常涉及公平、脆弱性、同意或不当利用等问题 (Wertheimer 1996; Sample 2003)。本文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价值流动的**授权结构**。

10.1 价值对象与授权集合

设主体 S 与外部合作方 B 在安排 C 下创造、持有或处分价值 V_{SB}^{C}。价值可以包括货币收入、资产、知识产权、数据、声誉、机会、时间、代表权和其他可处分利益。既定安排允许的价值通道集合表示为 $\mathcal{M}_C$。价值流动 m 是否位于既定授权集合中的检验见公式 18。

$$m \in \mathcal{M}_C \tag{18}$$

若答案为是，仍需审查授权是否有效、范围是否清楚、是否可以撤回、是否保留记录；若答案为否，则该通道进入更高强度的审查，而不是自动被判定为不正义。

价值对象本身也需要区分法律上的权利归属与关系中的贡献主张。工资、资产、知识产权或账户余额可能具有明确法律所有人，但共同生活中的照护、时间投入、机会成本和共同声誉又可能形成不同层次的道德或政治经济诉求。本文不试图把这些诉求统一转化为产权，而是要求在分析价值流动时说明：讨论的是所有权、处分授权、贡献认可，还是共同生活中的分配正当性。四者不能互相替代。

这种区分尤其重要，因为“我对这项价值有贡献”并不自动推出“我可以单方面处分它”，而“法律上属于某人”也不等于其他成员的长期贡献在规范上完全无关。价值边界的任务，是把不同资格来源分开，使争议能够围绕具体权限展开，而不是把所有冲突压缩成谁“更应得”。

价值还具有不同的可逆性。现金转账可能被追踪和返还，泄露隐私、转移知识产权、放弃职业机会或代表他人作出公开承诺却可能难以逆转。边界强度因此应与价值类型和可逆性匹配。越难恢复的价值，越需要在事前提高授权明确性和记录强度。

此外，价值对象可能具有多人重叠权利。共同创作、共同照护形成的声誉、家庭数据或共同账户并不总能被简单划为“我的”或“你的”。这类对象更需要程序性规则：谁可以访问、谁可以代

表 3: 家庭关系中的价值流动类型

类型	典型结构	主要判别条件
共同池化	双方事先同意把部分收入、时间或资产进入共同用途	规则可知、范围明确、双方对共同用途具有参与权
馈赠或支持	一方自愿把价值转移给另一方或家庭共同体	自愿、知情、无隐藏附带条件、可区分于被迫转移
授权管理	一方代为管理账户、资产、合同或事务	明确委托、权限边界、记录、撤回与审计条件
中介性非授权转移	第三方利用关系位置进入原安排之外的价值通道	知情不足、授权缺失、撤回困难、不透明、责任难追踪

表、重大处分需要何种共同决定。明确程序比强行寻找唯一所有者更符合其关系性质。

10.2 四类价值流动

表3的目的，是把共享与抽取区分开。家庭共同生活允许边界具有弹性；规范问题出现在弹性被单方面转化为不可见、不可撤回或不可问责的资源接口时。

四种类型之间还可能发生转换。共同池化可能因为收入结构变化而需要重新协商；馈赠如果与持续性服从要求绑定，可能逐渐失去其自愿性质；授权管理如果在授权者失去信息访问后持续扩张，也可能从便利性代理变成事实上的控制。价值边界因此不是一次性分类，而是需要随关系历史更新的状态判断。

政治经济学视角还要求把货币和非货币价值同时纳入。照护、时间、数据、社会资本和职业机会不一定经过账户转移，却可能被某一安排持续重新分配。因此，价值边界不仅是“钱去了哪里”，也包括谁能够决定时间如何使用、谁承担机会成本、谁获得由共同生活产生的外部声誉或制度收益。

四类价值流动还具有不同的默认举证结构。共同池化通常可以依赖稳定惯例，但重大用途变化需要重新说明；馈赠的关键是自愿与无隐藏交换条件；授权管理要求管理者能够说明权限来源和记录；中介性非授权转移则由于缺少既定通道，需要更高强度的事后核验。不同类型若使用同一规则，会产生过度形式化或保护不足。

解释权在价值分类中同样重要。将一项转移命名为“家庭义务”“借用”“代管”或“共同支出”会带来不同权限含义。研究者应追踪标签与实际控制是否一致，而不是只接受参与者的首要命名。必要时应将法律归属、事实流向和关系叙述分别记录。

10.3 中介性转移风险的条件组

若第三方 A 通过关系位置形成通道 m_A, 本文用五项条件描述其风险。风险条件向量见公式 19。

$$\mathbf{B}(m_A) = (K, A, R, T, Q) \tag{19}$$

其中 K 为知情程度（knowledge), A 为授权质量（authorization), R 为可撤回性（revocability), T 为可追踪性（traceability)，Q 为问责可达性（accountability)。风险随着知情、授权、撤回、追踪和问责的降低而上升。本文不把五项简单相加，也不假定每项具有相同权重。

当 $m_A \notin \mathcal{M}_C$ 且多个边界条件持续薄弱时，可以称为**中介性非授权转移风险**。只有进一步证明利用、伤害、不公平、胁迫或其他规范要素后，才适合进入更强的“剥削”判断。这样的分层可以避免把家庭馈赠和共同资源安排误判为抽取。

这里尤其需要区分“缺乏形式授权”与“缺乏有效授权”。家庭日常事务很少逐项签署书面授权，长期共同实践可以构成合理的默示授权；但默示授权也必须具有可推断的范围，且不能因为关系亲密就被无限扩大。判断有效授权时，应同时考虑信息充分程度、选择是否真实、是否存在不成比例的拒绝成本，以及参与者能否在事后撤回或修正安排。

因此，价值边界分析并不要求把家庭生活合同化，而是要求在高价值、高不可逆或涉及第三方的通道上提高明确性。越接近共同日常消费，越可以依赖惯例；越接近重大资产处分、知识产权、组织资金或第三方契约，越需要清楚的权限与记录。

五项条件还可以帮助区分“授权瑕疵”和“结构性捕获”。一次信息不完整的转移可能通过补充说明与确认修复；如果同一主体持续缺乏知情、无法撤回、也不能核验记录，则问题不再是单次程序失误，而更接近稳定边界缺失。时间序列因此是判断风险强度的关键。

问责 Q 也不等于惩罚。有效问责首先意味着有人需要说明发生了什么、权限依据是什么、损失如何处理以及未来规则如何修改。若问责只能采取关系决裂或法律诉讼的极端形式，日常纠错能力反而较弱。较好的结构应提供比例化的说明与修复渠道。

10.4 价值边界与权力再生产

价值转移可能改变未来权力位置。若某一非授权通道提高了第三方对资源、信息或退出条件的控制，可能出现的反馈机制由公式 20表示。

$$V \text{ 的转移} \longrightarrow R, X \text{ 接口增强} \longrightarrow \mathcal{G} \text{ 的有效性偏移} \longrightarrow \text{后续转移更易发生} \tag{20}$$

公式 20是机制假设，不是必然循环。它需要经验材料证明每一条边确实存在。该机制的价值在于把“一次利益争议”与“可自我强化的结构”区分开。

权力再生产还可能发生在非货币层面。一方持续承担行政手续、外部沟通和信息筛选，会积累程序知识和社会网络；另一方长期退出这些过程后，即使名义资源不变，也可能越来越依赖前者。类似地，长期无偿照护可能减少一方的外部就业与专业网络，使其退出条件逐渐恶化。因而，价值边界与自主形成之间存在双向关系：自主影响主体能否保护价值边界，价值流动又反过来改变未来自主。

这一动态也是论文把家庭问题连接到组织伦理的关键。若私人网络已经形成对资金、信息或代表权的非透明接口，当主体承担组织角色时，同样的转换逻辑可能进入受托资源。组织治理需要提前识别接口，而不是等到损失发生后才进行人格归责。

再生产机制并不只通过资源积累，也通过规范自然化。某种转移反复发生后，参与者可能不再把它视为需要授权的例外，而视为“本来就这样”。当惯例获得这种默认地位，未来拒绝会承担额外说明成本。权力文法由此把经济循环与解释循环连接起来：资源结果改变下一期的资格叙述，资格叙述又影响新的资源流动。

打断再生产也不必要求撤销全部共同安排。较小的制度改变，例如独立记录、定期确认、限额、共同访问和第三方复核，即可降低循环的自我强化程度。后续经验研究可以观察这些轻量机制是否足以改变文法，或只有更强的资源重组才能产生稳定效果。

11 组织角色中的私人网络外溢

家庭权力结构获得公共伦理含义的条件，是主体进入带有第三方责任的角色。本文不主张私人压力会自动取消主体的职业资格。分析对象是**私人网络是否具有穿透角色接口的现实通道，以及这些通道是否受到组织制度约束**。

11.1 角色授权与接口集合

设组织 O 将角色 R 的能力授予主体 S。角色授权集合为 $\mathsf{M}_{O,R}$，实际使用集合为 $\mathsf{U}_{S,R}$。基本完整性条件见公式 21。

$$\mathsf{U}_{S,R} \subseteq \mathsf{M}_{O,R} \tag{21}$$

角色接口可以分为资源、信息、判断、签署、采购、代表、招聘、数据访问和第三方联络等。私人关系本身不是利益冲突；相关问题是私人利益或私人影响通道是否具有不适当改变主要角色职责的条件。利益冲突文献长期把这一问题作为结构性风险，而非单纯道德品格问题 (Thompson 1993; Davis and A. Stark 2001)。

这一点与家庭分析具有结构同构性。家庭中需要区分“亲属身份”与“亲属因此获得哪些权限”；组织中同样需要区分“存在私人关系”与“私人关系能否进入角色接口”。如果一个组织只依赖员工自我克制，却不给出清晰的授权边界、回避程序和复核机制，就把制度问题个体化了。相反，良好的制度设计可以允许复杂私人关系存在，同时降低其对第三方利益的穿透能力。

法理学上，受托角色还包含一种角色分离原则：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家庭、朋友、商业和公共身份，但每一种身份只能在其授权范围内使用相应资源。把组织信息、判断或代表权自然延伸给私人网络，会模糊“谁是权力的委托人”这一基本问题。

这种角色分离也具有正义含义。组织资源往往不是任职者的私人财产，而是由成员、捐助者、客户、股东、公众或其他第三方基于特定目的交付。私人网络如果能够绕过组织授权获得更高信息、机会或资源，就可能使没有关系连接的第三方承担不对称成本。问题因此不只涉及“个人是否保持独立”，也涉及组织内部机会与负担是否按照公开规则分配。

语言与解释接口同样可能发生外溢。拥有代表权的人能够以组织名义命名问题、解释数据和定义外部对象；如果私人网络可以影响这种命名而组织缺乏记录，权力就可能通过语言先于资金流动发生。因而，受托完整性不仅保护资产，也保护组织的解释权、代表权和形成正式记录的程序。

11.2 外溢通道与风险分层

设私人网络节点为 A，角色接口集合为 $\mathcal{J}_R$。外溢通道映射见公式 22。

$$\pi_A : A \longrightarrow \mathcal{J}_R \tag{22}$$

需要区分三层状态：**压力存在、通道存在、角色捕获**。压力存在只表示主体受到私人请求、期待或冲突；通道存在表示私人网络能够接触某些角色资源；角色捕获则要求私人影响在缺乏充分组织控制的情况下持续改变角色判断、资源使用或代表行为。三者的伦理和治理含义显著不同。

风险评估至少需要四个维度：接口敏感度 S_R、私人通道可达性 A_R、组织可见性 V_R、行为可逆性 R_R。本文只采用序数比较：高敏感、高可达、低可见、低可逆的组合需要更强控制。这样可以避免用缺乏校准的数字制造虚假精确性。

四个维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补偿关系。某一高敏感接口如果每次操作都需要多人批准并留下日

表 4: 私人网络外溢的治理接口

风险接口	可能的制度机制	主要目的
资金与资产	双签、限额、职责分离、定期对账	降低单点处分能力并保留记录
敏感信息	最小权限、访问日志、分类授权	降低非授权获取和不可见传播
采购与合同	关联披露、竞争程序、独立复核	降低私人关系改变交易条件的空间
代表与沟通	授权边界、正式渠道、会议记录	区分个人意见与组织授权
招聘与机会	结构化标准、回避、多人评审	降低关系网络对机会配置的非透明影响
高不可逆决策	延迟确认、双重控制、升级审批	在高损失界面增加纠错机会

志，其实际捕获风险可能低于一个名义敏感度较低、但完全由单人不可见控制的接口。同样，私人通道可达性高并不自动意味着不当行为，因为组织可见性和可逆性可以显著降低风险。由此，治理重点应从“这个人有没有复杂家庭关系”转向“什么接口允许什么行为以什么方式发生”。

这一结构也避免歧视性风险。以家庭背景、国籍、婚姻状态或私人关系复杂度作为粗糙代理，既可能过度排除，也可能遗漏真正的接口漏洞。制度化的权限设计、披露和审计能够把判断对象从身份转向可观察的角色行为。

风险分层还需要考虑第三方损失的分布。某些角色即使单笔资源很小，也可能处理高度敏感个人数据或影响脆弱群体；另一些角色金额较大，却受到自动化限额与强审计。接口敏感度因此应由损失类型、影响范围和可恢复性共同判断，而不能只以职位等级或金额衡量。

此外，私人影响可能通过“建议”而非正式授权进入。家庭成员不需要直接访问组织系统，也可能通过持续提供候选人、信息或解释影响角色判断。组织治理因此需要关注判断过程的来源透明度，尤其在采购、招聘、伙伴选择和对外代表等高裁量接口。

11.3 制度隔离与受托完整性

组织治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降低外溢：权限最小化、职责分离、双重审批、信息隔离、利益披露、回避、交易记录、独立复核、异常监测与可停止机制。关键原则是让组织系统承担隔离工作，而不是仅要求个体以意志抵抗关系压力。

表4说明，私人关系复杂性本身不构成排除理由。治理重点是把敏感接口从私人关系网络中制度化隔离。

制度隔离还应与比例原则相联系。低风险任务不需要与高风险资金处分同等强度的控制，否则会制造过高行政成本并削弱正常信任；高不可逆接口则有理由设置更强的双重控制和留痕。治理设计需要在预防风险、保持效率和尊重员工私人生活之间取得结构性平衡。

此外，制度不应只在出现利益冲突后进行惩罚。事前设计更能降低个体道德负担：清楚的关联披露渠道、容易使用的回避程序、可咨询的伦理办公室和自动化权限限制，都使主体更容易在私人压力出现时保持角色完整性。

制度隔离还应避免把所有责任推向披露。披露只能让风险可见，并不能自动消除偏差；在某些高风险接口，职责分离、回避或独立审批比单纯声明关系更重要。反过来，过度隔离也可能阻断正常合作，因此控制强度需要与接口风险匹配。

从法理学角度，这些机制共同实现的是“权限可说明性”：组织能够回答谁获得了何种权限、为何获得、谁可以复核以及何时终止。这样的结构同时保护第三方和角色承担者，因为私人网络无法轻易把个人关系解释为组织授权。

11.4 渐进式角色承担

前文的渐进式可控性在组织伦理中表现为：主体可以先承担权限边界清楚、可审计、可撤回且外溢低的任务，在边界能力和组织隔离机制稳定后逐步扩大责任。这里的“渐进”不能通过把风险转移给小组织、弱势第三方或低可见岗位实现。无论角色规模大小，都需要满足基本的受托完整性要求。

渐进式角色承担因此是一种“权限工程”，而不是身份判断。组织可以把学习、监督和责任扩张写入角色设计，使主体在可观察环境中建立稳定实践。对于任何成员而言，这种设计都可能有益，而不需要以其家庭关系为特殊标签。

更重要的是，组织伦理与个人自主并非零和。清晰制度边界既保护组织，也可以保护主体免于被私人网络要求使用其并不真正拥有的权限。当主体能够指向明确的组织规则、双签制度或信息隔离机制时，拒绝私人请求不再完全依赖个人意志。制度由此成为自主的外部支点。

渐进安排还需要明确退出与升级条件。若主体在某类接口上反复表现出稳定记录、正确披露和边界维护，监督强度可以按制度规则下降；若出现新的私人通道、利益关联或不可逆责任，控制则应重新增强。由此，“渐进”不是线性晋升叙事，而是权限与风险之间的持续匹配。

这一模型也可以被用于一般组织设计，而不只针对家庭外溢。任何可能影响角色独立性的私人网络，例如商业伙伴、朋友、导师或其他密切关系，都可以用同样的接口原则分析。家庭只是本文的起始案例。

12 关系重构、受限权力与去权力中心化

本文的规范方向不是把权力从一方转移给另一方，而是让关系逐步减少对“谁能够迫使结果发生”的依赖。权力能力在任何复杂关系中都难以完全消失；关键是这些能力是否受到边界、程序和双向可争辩条件约束。

12.1 受限权力的最低结构

本文把较低权力中心化的关系描述为满足以下最低条件：双方基本生活轨迹较难被单方面决定；关键规则修改具有理由与程序；重要事实可以独立核验；异议不会自动触发与争议不相称的惩罚；授权可以被说明并在合理条件下撤回；退出或暂停具有现实可能；共同资源安排保留记录和问责。

这些条件不要求资源完全相等。一个家庭可以存在显著收入差异、照护差异和专业能力差异，同时保持高程度的规则透明与授权约束。反过来，形式资源相近也不保证解释权、规范修改权与退出成本对称。

“受限权力”也不意味着所有决定都必须协商到完全一致。复杂共同生活需要授权、分工和快速决策，关键在于谁有权作何种决定以及这一权力如何被复核。某些领域可以由一方拥有更高操作权限，只要这种权限来源清楚、范围有限，并且不会被自动转换为其他领域的支配资格。

这一结构更接近非支配而非绝对平等的直觉：参与者可以拥有不同资源和角色，却不应处于另一方可任意改变其基本生活条件的状态。Pettit 的非支配理论把自由的关键放在是否受制于他人的任意权力，而不只看干预是否已经发生 (Pettit 1999)。本文并不直接把共和主义理论当作家庭伦理的完整答案，但这一结构性直觉为“为什么仅减少实际干预仍然不足”提供了清晰基础。

非支配视角还要求关注**控制权的控制**。如果强势位置承诺“通常不会使用”某项能力，却仍能

随时改变规则，弱势位置仍需围绕这种可能性安排生活。真正的去权力中心化因此需要把善意承诺转化为可执行边界：共同签署、独立访问、明确授权范围、第三方复核和现实退出选项。由此，关系自由不再完全依赖某人的克制，而部分由结构保证。

与此同时，非支配不能排除照护与依赖。照护者可能必须在紧急情境中拥有较大决定能力，儿童或能力受限者也可能需要代理。关键在于这些权限是否与保护目的、能力状态和时间条件相称，是否随能力变化而收缩，是否存在可复核的责任结构。这样的比例性使非支配与关系自主而非抽象的绝对独立结合。

12.2 能力增长与非支配性选择

主体建立经济、制度、认识和关系能力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提高抵抗未经授权干预的能力；另一方面，它也使**不使用支配解决冲突**成为更现实的选择。若主体完全依赖单一节点，任何冲突都可能被体验为生存性冲突；当最低自主底线得到保障，协商失败的成本下降，双方更可能允许真实异议。

这与将 power 只理解为 domination 的单一视角不同。Allen 的分析提醒我们，能力也具有赋能与共同能力维度 (Allen 1998)。本文据此把自主形成的终点理解为**扩大可协商空间**，而不是最大化任何一方的控制能力。

这一区分对于弱势位置的能力增长尤其重要。若主体为保护自身边界而获得独立收入、制度身份或法律知识，这种变化可能暂时表现为谈判能力上升，但其规范目标并非建立反向支配。判断关系是否改善，需要看新能力是否被用于稳定边界、提高可争辩性和减少单点依赖，还是被用于复制原有的规则任意性。

因此，关系重构的评价对象是制度与文法，而不是简单观察“权力是否更加平均”。某些关系即使权力差距缩小，仍可能保持高对抗、高不确定和高惩罚结构；另一些关系即使存在资源差异，也可能因为权限高度受限而具有较低支配性。

能力增长还需要防止“安全困境”。当双方都把对方的能力增加理解为威胁，任何自主建设都可能引发预防性控制，形成升级循环。避免这一结果需要把能力增长与权限边界同时透明化：独立账户不等于隐藏资产，外部网络不等于背离家庭，组织规则也不等于敌意。解释框架的变化因而与物质能力变化同等重要。

正义论在此提供一个方向性约束：能力增长应优先用于恢复最低地位、选择和非支配条件，而不是追求无限优势。当主体已具有充分边界后，进一步扩大控制他人的能力不再能仅以“自主”正当化。这样可以防止自主概念被误用为支配资源的普遍许可证。

12.3 文法重写与信任重建

关系去权力中心化需要改变公式 6中的转换规则：理由、授权、证据、协商和程序逐步获得更高有效性，单纯位置、资源威胁和退出成本逐步失去决定性。该变化必须通过重复事件形成新的历史 h_t，所以一次承诺不足以证明结构已经改变。

图2表示一种可能的正向循环，而非固定阶段论。现实关系中可能出现回退、停滞或不同顺序；其经验有效性需要纵向研究。

文法重写还需要象征层面的变化。过去被理解为“不忠”“不孝”或“拒绝家庭”的边界声明，可能逐步被重新解释为正常的授权管理；过去只有职位或资源才能使主张有效，未来可能由证据、程序和共同规则提供有效性。这样的变化通常不能通过抽象价值宣言独立完成，它需要由多次具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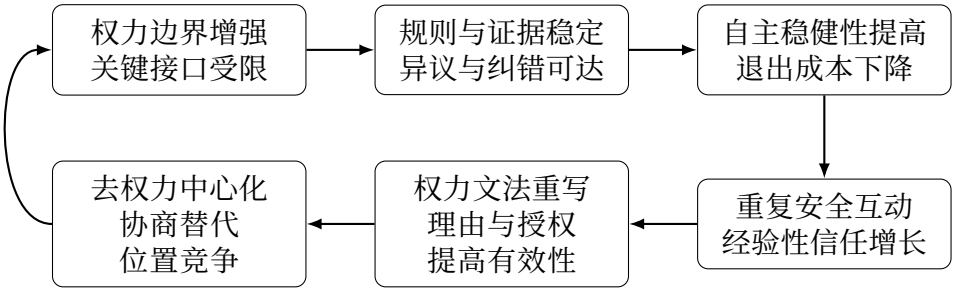

图 2: 关系重构的循环机制：边界、规则、自主、信任与文法变化

事件验证。

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外部制度条件也会影响这一循环能否维持。若主体突然失去收入、住房或合法身份，其退出成本上升，旧文法可能重新获得有效性。关系重构因此不是一次性心理转变，而是一种需要物质、制度和规范条件共同支持的动态稳定状态。

解释学角度则提醒，文法重写需要新的共同叙事。若旧秩序长期把某一成员描述为“天然负责人”或“需要被管理的人”，仅修改账户权限可能不足以改变其他事务域中的资格预期。新的规则需要通过重复实践生成新的叙事证据：谁能够独立完成任务、谁会尊重边界、分歧是否真的可以不导致关系崩溃。制度变化和意义变化由此相互强化。

语言政治经济学还提示，重构必须降低制度语言的单点垄断。关键规则应能被所有相关主体理解，重要外部机构最好允许直接访问和独立核验。否则，形式上的新规则仍可能必须通过旧解释节点才能运行，使文法改变停留在纸面。

13 分析命题、操作化与经验检验

本节把前文概念转化为可研究的命题。命题旨在提高可证伪性，而不是把当前概念论文伪装成已经验证的经验研究。

分析命题 1 (权力接口集中) 在其他条件近似时，决定、解释、规范修改、关键资源与退出接口越集中于同一关系位置，单次分歧越容易改变弱势位置主体的多个生活域，而不只影响争议本身。

经验上可以比较“单域冲突”与“跨域后果”的频率，例如财务分歧是否稳定扩展到住房、职业、社交或信息访问。替代解释包括共同危机、资源稀缺或外部制度变化。

分析命题 2 (文法转换) 若关系的有效性结构主要由位置、资源威胁和退出成本决定，则具有相近内容理由的主张会因提出者的关系位置不同而产生系统性不同的现实后果。

检验需要控制主张内容和情境差异，并观察相同类型边界声明在不同主体提出时是否获得不同处理。

分析命题 3 (规范不稳定与信任暴露) 当规则修改具有低可预期性且争辩能力较弱时，即使参与者对他人善意评价较高，也可能降低高风险事务中的关系暴露。

该命题区分结构性信任与人格信任，可通过情境实验、访谈或纵向事件记录检验。

表 5: 核心变量的可能操作化方向

变量	可观察材料	主要误判风险
决定接口 D	谁能批准、否决、改变行动条件；拒绝后的实际后果	把专业建议或合法监护误写为控制
解释接口 I	冲突叙述进入共同记录、第三方判断和后续规则的方式	把普通意见分歧误写为解释垄断
规范修改 N	标准变更的频率、时点、程序、事后性和双向性	把合理适应变化误写为规则操控
资源接口 R	账户、文件、住房、信息、社交与制度通道的访问控制	忽略共同管理的授权基础
退出接口 X	拒绝、暂停、分离或求助的经济、情感、制度与信息成本	把一般关系损失与强制性成本混同
结构性信任 **K**	规则稳定、证据记录、申诉、纠错和退出机制	只用自陈“信任程度”代替结构条件
自主稳健性 **A**	资源可得、实际控制、外部干预下的持续可用性	只记录形式权利或资源数量
价值边界 **B**	通道知情、授权、撤回、记录和问责	把家庭共享本身视为异常

分析命题 4 (认识自主的中介作用) 事实记录、替代解释与外部验证渠道越弱，主体越难稳定识别价值流动、授权变化与规则修改，从而增加边界争议的解释不确定性。

这一命题不意味着解释冲突一定由权力造成；记忆偏差、信息复杂度和沟通失败都是竞争机制。

分析命题 5 (自主稳健性) 自主资源的可得性提高只有在主体控制度与抗干预稳健性同步提高时，才更可能转化为可执行的生活边界。

例如，收入、账户或制度身份需要与访问权、凭证控制、独立信息和替代支持结合分析。

分析命题 6 (依赖组合与单点失效) 当多个关键生活域依赖于高度相关的单一节点时，该节点受到控制或失效后，整体生活秩序发生连锁失稳的概率高于具有独立支点的依赖组合。

该命题可以借鉴网络韧性和组合风险方法，但需要避免把社会关系机械化为独立节点。

分析命题 7 (非授权价值通道) 价值通道越缺乏知情、授权、撤回、追踪与问责条件，其转化为持续性边界争议的风险越高；是否构成剥削仍需要额外规范条件。

该命题将“风险识别”与“最终伦理判断”分开。

分析命题 8 (组织接口治理) 在私人压力存在时，角色捕获风险更取决于敏感接口的可达性、可见性与可逆性，而不是私人关系复杂性本身。

这允许组织设计针对接口，而不是对具有复杂家庭背景的人员进行身份化排除。

13.1 研究设计的可行路径

一个较严格的经验研究至少需要三类资料。第一，**事件序列资料**：记录规则改变、资源流动、拒绝后果和解释争议在时间上的先后，避免仅凭回顾性总体印象推断机制。第二，**多主体资料**：在安全和伦理允许时获取不同参与者、制度记录与第三方材料，以降低单一叙述来源偏差。第三，**制度**

背景资料：法律身份、社会保障、住房市场、劳动条件和文化义务都会影响退出成本与自主可行性，跨案例比较必须显式控制这些背景。

研究还需要处理伦理限制。家庭权力研究可能涉及高风险披露、私人财务、潜在暴力和未成年人。数据收集不能为了“验证模型”而增加参与者暴露风险；任何访谈、事件记录或第三方核验都需要适当的安全、保密与撤回程序。

在研究设计上，最有价值的可能不是横截面地询问“谁在家里更有权力”，而是构造事件级数据。研究者可以记录争议主题、初始规则、各方理由、谁拥有停止或否决能力、是否发生规则修改、哪些资源被调用、事件如何结束以及后续规则是否改变。这样的资料更接近本文的机制语言，也更容易检验公式 7所表达的路径依赖。

比较研究则应尽量选择制度背景可识别的案例。不同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家庭法和劳动市场条件会改变外部选项，因此跨地区比较不能把差异全部归因于家庭文化。一个可行策略是把制度变量作为第二层背景，与家庭内部事件序列共同建模；另一个策略是在相似制度环境中比较不同关系配置，从而提高机制识别。

定性材料仍然不可替代。权力文法涉及“什么理由在关系中真正有效”，这类信息往往需要通过访谈、文本、财务记录和事件重构才能理解。定量指标可以描述集中度、事件频率和退出成本，却很难单独判断一项资源差异为何被转换为决定权。较适合的路径可能是序列分析、比较案例研究与有限定量测量的混合方法。

最后，经验研究应把研究参与本身视为可能干预。询问账户、控制或退出可能改变参与者对关系的理解，甚至提高风险。研究设计需要在知情同意、安全计划、数据隔离和退出机制上采取比普通家庭调查更高的谨慎标准。

14 理论边界、替代解释与适用限制

本节集中说明框架无法单独推出的结论。概念严谨性不仅来自定义，还来自对反例与替代机制的保留。

14.1 不对称的多重来源

家庭中的不对称可能来自年龄、照护责任、专业知识、收入差异、制度身份、健康状况、迁移地位和时间资源。部分不对称具有明确功能，例如紧急代理或儿童保护。研究必须区分**必要的不对称**与**可扩张的不受限权力**：前者具有事务域、期限和理由边界，后者更容易跨域、递归和缺乏争辩条件。

还需要区分“来源正当”与“使用正当”。即使某项能力最初具有合理来源，也可能在时间上超出必要范围；相反，某些没有正式来源的家庭惯例，也可能因为长期透明、互惠与可撤回而具有较高正当性。因而，权限来源只是判断起点，范围、程序和后果仍需独立审查。

此外，不对称来源常常相互叠加。收入差异可能与语言能力、移民身份或健康差异重合，使单一资源产生放大效应。经验研究若只测量工资，可能低估其他接口的共同作用。

还需要注意“不对称的补偿”。一个成员可能在收入上弱势，却拥有更强的亲属网络、专业知识或制度身份；另一个成员可能掌握主要资产，却在照护或语言上依赖前者。关系中的权力因此可能是多维、交叉甚至互相抵消的。本文的五类接口不应被压缩成单轴排序，更不能据此给家庭成员进行总体“强弱”排名。

经验研究还应区分结构位置与具体事件责任。拥有某项资源接口只表示潜在能力，并不证明该主体在每次冲突中都造成了结果。反之，一个在总体资源上较弱的主体也可能在特定事务域具有强决定权。事务域化和事件化分析是避免过度概括的必要条件。

14.2 依赖、亲密与自主的兼容性

关系自主理论的重要启示之一，是依赖并不与自主逻辑冲突。主体可以在深度亲密、照护与资源共享中保持自主，只要关系本身支持能力形成、表达与修正 (Mackenzie and Stoljar 2000; Nedelsky 2012)。因此，本文不把“独立”设为理想家庭的单一尺度。分布式自主的目的也不是消除互赖，而是避免全部关键生活条件只有一个不可替代的控制节点。

依赖甚至可能是自主的积极条件。教育、照护、情感支持和制度代理都可以扩大主体能力，关键是这些支持是否具有促进性而非捕获性。由此，研究需要区分“我需要他人的帮助”和“只有某一人能够决定我是否获得必要条件”。前者是普遍互赖，后者才更接近单点依赖风险。

这一限定也防止把本文误读为个人主义方案。建立外部支点不要求减少亲密程度，而是让亲密关系无需承担所有生存功能。某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价值，正是在不破坏家庭联系的前提下减少关系内部的不可替代性。

关系自主理论还提示，完全“无依赖”本身既不可行，也未必可欲。能够放心托付事务、接受照护和共享资源，是亲密关系的重要价值。本文真正关注的是依赖是否具有可说明边界、是否允许主体在必要时重新取得控制、是否存在多个支持来源，以及依赖关系是否持续促进能力形成。因而，依赖可以是自主的媒介，也可以是控制的媒介；二者需要通过关系结构而非依赖强度本身区分。

同样，退出能力不意味着鼓励退出。退出选项具有规范意义，恰恰因为它可以降低日常协商中的强制性，使主体无需真的离开也能更真实地表达异议。Hirschman 的 exit/voice 区分提示我们，退出与发声往往互相影响 (Hirschman 1970)；在家庭关系中，一个完全不可退出的结构可能使“发声”承担过高风险，而适度的外部保障反而能支持关系内部的持续合作。

14.3 文化、制度与生命周期差异

家庭义务和资源安排高度依赖制度背景。社会保障较强的环境可能降低退出成本；住房、移民、继承和照护制度也会改变资源接口。生命周期同样重要：育儿、照护、失业、迁移、升学和退休会重新分配依赖。因而，本文的任何经验应用都必须报告时间阶段和制度环境，不能把某一社会的边界规范直接外推为普遍模型。

文化差异也不能被简化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分。相同的代际义务可能在不同家庭中通过不同程序实现：有的依赖高度互惠的共同决策，有的则把义务解释为单向服从。研究应观察义务如何被协商、谁能够提出例外、是否存在成员间对称性，而不是仅凭文化标签推断权力性质。

生命周期分析同样需要动态化。年轻成员的自主空间通常随年龄扩大，老年或疾病又可能重新增加代理需求。一个在某时期合理的权限结构若不随能力变化而调整，就可能从保护性安排转化为不必要限制。

语言和制度背景也随生命周期变化。迁移、跨国婚姻、留学、退休和数字化都可能使原先不重要的语言资本突然成为关键接口；相反，某位成员在长期学习后可能逐步摆脱过去的翻译依赖。研究者不能把某一时间点的语言或行政分工当作永久身份，而应观察其是否具有学习、替代和重新分配的可能。

文化解释同样需要避免把规范差异本质化。诸如孝、忠诚、共同财产或家庭代表等概念在不同

制度与家庭中具有多种实际含义。解释学方法要求研究者说明这些词在具体关系中如何被使用、由谁解释、与哪些行动后果相连，而不是从文化标签直接推断支配或正当性。

14.4 因果识别限制

本文提出的是机制结构，而不是完成的因果模型。解释权集中可能导致认识自主下降，也可能是长期信息优势的结果；资源集中可能导致规则影响，也可能由共同认可的专业分工产生；低信任可能源于权力结构，也可能来自先前欺骗、人格冲突或外部压力。后续研究需要通过时间序列、自然实验、比较案例或多方法证据识别方向性。

反向因果尤其需要注意。例如，某成员因为长期承担财务管理而获得更多资源知识，这既可能是先前信任的结果，也可能成为后续控制的条件；高退出成本可能导致低信任，低信任也可能促使一方集中资源以降低不确定性。本文的机制图因此只能提出可能路径，不能凭横截面相关性确定方向。

遗漏变量也可能非常重要。健康危机、失业、照护负担、宏观经济变化和法律身份变化都可能同时影响资源与信任。经验研究需要尽可能记录这些共同冲击，并对“权力文法”是否真正提供独立解释保持开放。

测量反应也会影响结果。访谈本身可能促使成员重新解释过去事件，法律或心理学术语可能改变他们对关系的命名，研究者的提问也可能提高某些冲突的显著性。解释学视角因此要求把研究材料视为互动产生的文本，而不是透明窗口。定性研究需要记录提问方式、访谈情境和叙述变化，量化研究也应避免把经过理论术语引导的答案直接当作自然发生的关系状态。

最后，本文模型可能存在“理论吸收”风险：如果任何资源差异、语言差异、规则变化和冲突结果都可以被解释为权力文法，概念就失去可反驳性。后续研究必须设置否证条件，例如在资源和语言差异明显时仍观察到高度对称的授权与争辩程序，或在权力接口集中时并未出现跨域转换。只有允许这些反例成立，权力文法才具有独立经验价值。

14.5 概念与法律判断的分离

“权力导向结构”“中介性非授权转移”和“角色捕获风险”是分析概念，不构成任何司法、临床或专业纪律结论。法律上的胁迫、侵占、利益冲突、监护义务或受托责任具有各自的成文法与判例标准。本文只能帮助识别需要进一步审查的结构，不能替代具体法域中的事实认定。

同样，本文中的“法理学”主要讨论一般的权限、程序、关系自主和私人秩序问题，并不声称这些原则在所有法域具有相同法律效力。任何具体纠纷都需要独立确定适用法律、证据标准和程序路径。

伦理判断也与法律判断保持区分。一项安排可能合法却仍值得伦理反思，也可能在伦理上有争议但不构成违法。保持这种区分有助于避免概念膨胀，也使本文能够作为跨法域的理论框架，而不是隐含某一国家的实体法。

同样，本文不能从结构风险直接推导个体责任。责任判断需要知道主体掌握何种信息、是否具有替代选择、是否受到胁迫、能否合理预见后果，以及制度是否提供了可行的合规路径。结构分析可以说明风险如何产生，却不能在缺乏这些事实时替代责任归属。

因此，框架最适合被用作“问题发现器”和研究设计工具：它提示研究者在哪些接口上收集材料、哪些概念需要区分、哪些替代解释必须排除。其严谨性来自限制推论范围，而不是扩大结论强度。

正义理论的使用也需要同样克制。Rawls、Young、Sen、Nussbaum、Pettit、Okin 与关系自主理论之间存在重要差异，本文并未证明它们可以被无损地合并成单一规范体系。本文只使用这些理论提供不同的诊断维度：制度公平、关系支配、实际能力、家庭内部正义与非支配。若未来研究需要作出更强的规范结论，就必须进一步说明这些理论发生冲突时采用何种优先规则。

解释学与语言政治经济学同样不提供自动归责。拥有更高语言资本、掌握标准语言或承担制度翻译的人可能是在为家庭承担额外劳动，而非追求控制。只有当这种能力与信息封闭、不可替代性、规则修改和资源接口持续耦合时，才构成本文所关心的结构性风险。理论的作用应是提高区分力，而不是扩大怀疑范围。

15 结语

本文把家庭关系中的权力问题重构为一个多层关系机制。第一层是五类权力接口：决定、解释、规范修改、资源与退出。第二层是权力文法，即这些接口和位置差异如何被转换为关系中的实际有效性。第三层是由此受到影响的结构性信任、认识自主和多维自主。第四层是价值边界与组织角色接口，在这里私人关系可能进入第三方合作、受托资源和公共责任空间。

这一结构使若干常见混淆可以被分开：权力能力不同于实际行使；行使不同于结果；结果不同于正当性；家庭共享不同于非授权转移；私人压力不同于组织角色捕获；不对称不同于支配；能力增长也不同于支配增长。这样的区分使文章能够在保留家庭亲密、互赖与照护复杂性的同时，对持续性的规则不稳定、解释集中、跨域控制和退出成本保持分析敏感。

本文提出的“权力文法”具有特定而有限的理论功能：它描述关系如何把位置、资源、资格、解释和拒绝成本转换为有效决定。其价值只有在能够解释资源理论、单次决策研究或纯粹话语分析难以单独解释的现象时才成立。为此，文章已经给出可操作化变量、反例、替代解释和经验命题。后续研究需要检验不同权力接口是否确实形成稳定耦合、文法转换是否具有跨案例可辨认性、结构性信任条件如何与人格信任互动、以及分布式自主何时提高韧性、何时增加协调负担。

加入正义论、法理学、解释学、语言政治经济学和家庭政治经济之后，这一概念的理论位置更清晰。正义论提供资源、能力、地位与非支配的评价维度；法理学说明授权、程序、规则稳定和救济如何限制私人权力；解释学说明关系历史和叙事如何参与构造事件意义；语言政治经济学揭示语言资本、合法表达与制度翻译具有现实资源效应；家庭政治经济则解释收入、照护、资产、时间和外部制度如何改变议价位置。它们共同进入关系状态 z_t，却不预先决定具体互动结果。

权力文法位于这些背景条件与具体事件之间，描述不同资源与意义结构如何被转换为有效决定。它既不能替代资源理论，也不能替代正义论、法理学或解释学；它的理论增量只在于说明这些维度何时发生结构性耦合。如果未来经验研究发现语言优势、资源差异和规则位置并不稳定转换为决定后果，或这种转换完全可由既有理论解释，权力文法概念就需要收缩甚至被放弃。这种可撤回性是本文希望保留的理论纪律。

规范上，本文把自主理解为一种允许主体在必要时抵抗未经授权干预、并在条件允许时进入非支配性合作的关系能力。权力约束的意义不在于消除关系，而在于使关系能够承受真实分歧；能力增长的意义不在于让弱势位置复制原有支配，而在于扩大协商、授权、纠错与退出的现实空间。当理由、证据、授权和程序逐步成为主要的有效性来源时，关系才可能从持续比较“谁更有力量”转向较低权力中心化的共同生活秩序。

参考文献

Agarwal, Bina (1997). “Bargai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 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In: *Feminist Economics* 3.1, pp. 1–51. DOI: 10.1080/135457097338799.

Allen, Amy (1998). “Rethinking Power”. In: *Hypatia* 13.1, pp. 21–40. DOI: 10.1111/j.1527-2001.1998.tb01350.x.

Baier, Annette (1986). “Trust and Antitrust”. In: *Ethics* 96.2, pp. 231–260. DOI: 10.1086/292745.

Blood, Robert O. and Donald M. Wolfe (1960). *Husbands &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 Glencoe, IL: Free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 by John B. Thompson. Trans.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oudhury, Arshia Amin, Natasha Martland, and Olga Luzon (2025). “Women’s Experiences of Coercive Control in Intimate Partner Relationships: A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 In: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DOI: 10.1007/s10896-025-00970-6.

Cover, Robert M. (1983). “The Supreme Court, 1982 Term: Foreword: Nomos and Narrative”. In: *Harvard Law Review* 97.1, pp. 4–68. DOI: 10.2307/1340787.

Davis, Michael and Andrew Stark, eds. (2001).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the Profess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oso/9780195128635.001.0001.

Emerson, Richard M. (1962). “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1, pp. 31–41. DOI: 10.2307/2089716.

Folbre, Nancy (1994). *Who Pays for the Kids? Gender and the Structures of Constraint*. London: Routledge.

Fricker, Miranda (2007).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8237907.001.0001.

Friedman, Marilyn (2003). *Autonomy, Gender,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0195138503.001.0001.

Fuller, Lon L. (1969).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Gadamer, Hans-Georg (2013). *Truth and Method*. Trans.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Revised.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Gal, Susan (1989). “Lang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8, pp. 345–367. DOI: 10.1146/annurev.an.18.100189.002021.

Habermas, Jürgen (1996).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ns. by William Reh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rdin, Russell (2002).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Heller, Monica (2003). “Globalization,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7.4, pp. 473–492. DOI: 10.1111/j.1467-9841.2003.00238.x.

Hesse-Biber, Sharlene and John Williamson (1984). “Resource Theory and Power in Families: Life Cycle Considerations”. In: *Family Process* 23.2, pp. 261–278. DOI: 10.1111/j.1545-5300.1984.00261.x.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rvine, Judith T. (1989). “When Talk Isn’t Cheap: Lang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American Ethnologist* 16.2, pp. 248–267. DOI: 10.1525/ae.1989.16.2.02a00040.

Komter, Aafke (1989). “Hidden Power in Marriage”. In: *Gender & Society* 3.2, pp. 187–216. DOI: 10.1177/089124389003002003.

Lukes, Steven (2021). *Power: A Radical View*. 3rd ed.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Mackenzie, Catriona and Natalie Stoljar, eds. (2000). *Relational Autonom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utonomy, Agency, and the Social Sel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oso/9780195123333.001.0001.

Mnookin, Robert H. and Lewis Kornhauser (1979). “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Law: The Case of Divorce”. In: *Yale Law Journal* 88.5, pp. 950–997. DOI: 10.2307/795824.

Nedelsky, Jennifer (2012). *Law’s Relations: A Relational Theory of Self, Autonomy, and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5147964.001.0001.

Nussbaum, Martha C. (2006).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4159/9780674041578.

Okin, Susan Moller (1989). *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Pettit, Philip (1999). *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0198296428.001.0001.

Rawls, John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icoeur, Paul (1992). *Oneself as Another*. Trans. by Kathleen Blam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I: 10.7208/chicago/9780226844541.001.0001.
Sample, Ruth J. (2003). *Exploitation: What It Is and Why It's Wrong*.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Sen, Amartya (1990). "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 In: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Women and World Development*. Ed. by Irene Tink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9).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tark, Evan (2007). *Coercive Control: The Entrapment of Women in Personal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oso/9780195154276.001.0001.
Thompson, Dennis F. (1993).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29.8, pp. 573–576. DOI: 10.1056/NEJM199308193290812.
Walker, Margaret Urban (2006). *Moral Repair: Reconstructing Moral Relations after Wrongdo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17/CBO9780511618024.
Wertheimer, Alan (1996). *Exploit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OI: 10.2307/j.ctv10vm173.
Westlund, Andrea C. (2009). "Rethinking Relational Autonomy". In: *Hypatia* 24.4, pp. 26–49. DOI: 10.1111/j.1527-2001.2009.01056.x.
White, James Boyd (1990). *Justice as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Cultural and Legal Crit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OI: 10.2307/j.ctvcm4g4q.

Power-Oriented Structur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utonomy in Family Relations

Power Grammar, Structural Trust, Value Boundaries, and Organizational Ethics

HUANG WANHONG （黄 万鸿）

huangwanhong@serendip.ngo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power-oriented structures in family relations and examines how autonomy, trust, value boundaries, and the integrity of organizational roles are interconnected under conditions of persistent power asymmetry. The object of analysis is neither a fixed "family type" nor a judgment about the personality or clinical status of family members. It is a set of mechanisms that can be identified within bounded relational configurations: the concentration, mutual conversion, and temporal persistence of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interpretive advantage, norm-modifying capacity, control over key resource interfaces, and the costs of exit. To improve conceptual precision, the article first distinguishes power capacity, the exercise of power, control over outcomes, and normative legitimacy. It then defines "power grammar" as a second-order relational rule that determines which positional differences, resource differences, claims to standing, and costs of refusal can be converted into effective decisions,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s, and modifications of rules. Power grammar is therefore not equivalent to resources, commands, or controlling behaviour; it is a conversion structure connecting multiple interfaces of power.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develops a conditional model of structural trust and epistemic autonomy. Trustworthiness is analysed in relation to constraints on power, rule stability, contestability, verifiability, corrigibility, and a realistic capacity to exit. Autonomy is modelled as a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composed 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relational-network, epistemic, value-dispositional, and exit capacities, with a further distinction among resource availability, actual control, and robustness against interference. The article then proposes progressive controllability and distributed autonomy as complementary pathways through which an agent can reduce single-point dependence while preserving locally traceable responsibility. It further introduces theories of justice, jurisprudence, hermeneu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amily a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heories of justice distinguish distribution, capability, relational standing, and non-domination; jurisprudence addresses private ordering, authorization, rule stability, and procedural boundaries; hermeneutics analyses relational history, narrative identity, and the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explains how legitimate expression, linguistic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acquire material and organizational consequenc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amily examines how resources, care, markets, the state, and outside options alter internal bargaining positions. With regard to value boundaries, the article distinguishes common pooling, gifts, authorized management, and unauthorized intermediary transfers, and identifies risk through conditions of knowledge, authorization, revocability, trace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With regard to organizational ethics, spillover from private networks is treated as a problem of role-interface governance. The analysis distinguishes private pressure, identifiable channels, and actual role capture, and discusses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including disclosure, insulation, least privilege, dual control, recusal, and audit.

The article makes three princip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 it advances "power grammar" from a descriptive metaphor to a second-order conversion concept distinguishable from resource power, interpretive structure, and concrete discourse, and grounds it in theories of justice, jurisprudence, hermeneut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Second, it connects structural trust, the formation of autonomy, and value boundaries as different cross-sections of a common relational mechanism. Third, it clarifies the interface between intrafamilial power structures and the integrity of organizational roles while preserving boundary cases involving care, legitimate authorization, emergency agency, shared lif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The formalization used throughout is intended to make definitions, inferential steps, and paths for empirical testing more transparent; it is not presented as a quantitative model with estimated parameter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falsifiable analytical propositions, directions for operationalizing variables,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designs intended to support future comparative case analysis and normative-theoretical inquiry.

Keywords: family relations; power grammar; relational autonomy; structural trust; theory of justice; jurisprudence; hermeneutics;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amily; organizational ethics

Preliminary Research Note

This manuscript presents a conceptual and formal study of power-oriented structures in family relations. Its immediate object is the relation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interpretive advantage, norm-modifying capacity, resource interfaces, and exit conditions can become concentrated, mutually convertible, and temporally persistent. The manuscript develops the concept of power grammar and uses it to connect structural trust, relational autonomy, value boundaries, and the integrity of organizational roles.

The inquiry adopts a bounded structural and normative perspective. It does not treat the family as a single actor, and it does not infer a person's ultimate moral identity or clinical status from any local power asymmetry. Formal distinctions among power capacity, power exercise, outcome control, and normative legitimacy are retained throughout. The mathematical and schematic constructions in the manuscript serve as clarifying representations whose scope, assumptions, and inferential limits must remain explicit.

Formal economy and conceptual discipline are treated as guiding constraints. The present paper inherits concerns with relational autonomy, theories of justice, jurisprudence, hermeneu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amily, and introduces new notation only where inherited vocabulary is insufficiently precise. Terms such as power grammar, structural trust, distributed autonomy, unauthorized intermediary transfer, and role-interface governance receive their technical meaning only after the relevant domains and relations are explicitly defined.

The present release contains the current full manuscript in a multilingual edition. It reflects several rounds of structural, logical, and stylistic revision, including clarification of concept definitions, expansion of natural-language reasoning, addition of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harmonization of equation references, and preparation of versions in the six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mpirical calibration, comparative case testing, and further formal extensions remain future work.

Responsible Use and Rights Reservation

The author encourages good-faith discussion, criticism, independent inquiry, and responsible use of the material in this work. Separately from the licence's legal terms, users are asked to consider foreseeable harms when adapting or applying the proposed framework. This ethical request does not alter the permissions or limitations stated in the licence.

The author retains the rights preserved under CC BY-NC 4.0 and may pursue remedies to which the author is legally entitled for breach of the licence or violation of independently applicable rights. Reuse remains independent from authorial endorsement. Third-party rights require authorization from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where applicable. Copyright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remain fully available.

Notices

Status. This working draft contains the current full manuscript on family power, autonomy, trust, value boundaries, and organizational ethics. The present release also includes multilingual versions prepared for the six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revision process checked conceptual definitions, argumentative continuity, equation references, cross-references, page layout, and consistency across language versions. The manuscript remains a preliminary research note: empirical validation and several open formal and comparative extensions remain future work.

Licence. Except where otherwise indicated, copyright © 2026 Wanhong Huang. This work is made available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ce (CC BY-NC 4.0), subject to the licence's terms.

Statement on the use of language models. The exploratory discussions and preparation of this paper involved OpenAI's ChatGPT. ChatGPT supported exploratory dialogue, multilingual rendering, drafting assistance, LaTeX formatting, and technical checking. The author selected the research questions, directed and approved the theoretical commitments and epistemic status of the claims, and bears sol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anuscript, including its definitions, formal constructions, arguments, conclusions, translations, and errors. Authorship credit remains with the human author.

1 Introduction

The family is simultaneously a site of intimacy, care arrangements, resource allocation, identity formation, and normative learning. Precisely because these dimensions overlap so extensively, power within families is often difficult to describe through a single model of "command and obedience." Many interactions with decisive consequences do not take the form of overt coercion. They operate through questions such as who has standing to define the problem, who can inscribe an interpretation into shared rules, who controls accounts and documents, who can represent the family before external institutions, and who bears the costs of refusal and exit. Such power has both material and interpretive foundations. It may arise from authority conferred by law and institutions, but it may also be formed through long-standing convention, care relations, linguistic capacity, and shared history.

This article does not address the broad question of whether power exists within families. It examines a more limited structural problem: when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interpretive advantage, norm-modifying capacity, key resource interfaces, and exit costs are persistently concentrated in particular relational positions, how are these differences converted into decisions, interpretations, and rules that are effective in practice? How, in turn, does this conversion affect structural trust, epistemic autonomy, the disposition of value, and fiduciary integrity when an agent later occupies an organizational role? The article calls this layer of conversion **power grammar**. "Grammar" here is neither a synonym for linguistic grammar nor a relabelling of every communicative problem as power. It denotes a second-order structure of validity that determines what kinds of reasons are recognized as effective, what kinds of refusal can actually stop an action, and what kinds of interpretation can enter subsequent rules.

The problem li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everal mature research traditions. Family sociology and power-dependence research have long analysed relations among resources, alternatives, and positions in decision making (Blood and Wolfe 1960; Emerson 1962; Hesse-Biber and Williamson 1984; Komter 1989). Theories of relational autonomy emphasize that autonomy is not an intrinsic property of an isolated individual, but is supported or undermined by social relations,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and structures of recognition (Mackenzie and Stoljar 2000; Friedman 2003; Westlund 2009; Nedelsky 201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amily, meanwhile, shows that the family is both a unit of cooperation and an institutional arena in which interests, care, time, and assets may be distributed asymmetrically (Sen 1990; Agarwal 1997; Folbre 1994). These literatures provide indispensable foundations, but they often analyse resources, norms, bargaining, or autonomy separately. The present article asks a further question: how are differences at these distinct levels converted, within concrete relationships, into differences in whose reasons have practical force?

The analysis therefore requires a broader normative and interpretive foundation than family power theory alone. First, theories of justice remind us that evaluation within families cannot be limited to aggregate resources or formal equality. Rawls provides a classic background for institutional fairness and the basic structure (Rawls 1999), while Okin explicitly criticizes the tendency to stop the application of justice at the family boundary (Okin 1989). Young's account of domination and oppression shows that justice also concerns decision structures,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social divisions of labour, not merely quantities of distributable goods (Young 1990). The capability approaches associated with Sen and Nussbaum further redirect evaluation toward what agents are actually able to do and be, and toward whether resources can be converted into real capabilities (Sen 2009; Nussbaum 2006). These theories do not form a conflict-free unified system, but together they suggest that judgments of justice within families must examine resources, capabilities, status, procedure, and structures of dom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Second, jurisprudence shows that private relations do not stand outside legal ordering. Property rights, marital and parental status, contractual capacity, guardianship, social security, housing, and remedial institutions continuously reshape family members' feasible sets. Fuller's discussion of legality emphasizes such requirements as generality, publicity, intelligibility, relative stability, and congruence between rules and their administration (Fuller 1969). Habermas discusses legitimacy, procedure, and public reason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democracy (Habermas 1996). Nedelsky, more directly, treats law as an institutional form that structures relations and can thereby foster or impair autonomy (Nedelsky 2012). This article does not mechanically transplant all requirements of public law into domestic life, but it draws on these jurisprudential intuitions to explain why predictable rules, duties of justification, spaces for contestation, and reviewability can become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constraining private power.

Third, hermeneut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prevent "interpretive power" from being reduced to a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 of opinion.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stresses that understanding always occurs within history and tradition (Gadamer 2013). Ricoeur's work on action, narrative, and self-interpretation shows how personal identity and the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cquire continuity through narrative structures (Ricoeur 1992). Cover and White, in different ways, show that norms do not operate as commands detached from worlds of meaning; legal language itself participate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shared normative worlds (Cover 1983; White 1990). Bourdieu further analyses language in terms of linguistic markets, symbolic capital, and legitimate language (Bourdieu 1991); Irvine and Gal explicitly situate linguistic phenomena within political-economic processes (Irvine 1989; Gal 1989); and Heller discusse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identity under globalization (Heller 2003). Word choice, status labels, administrative

fluency, and institu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can therefore have distributive consequences within families: not all speakers possess the same ability to be heard or to make utterances produce institutional effects.

The theoretical task of the article consequently has four levels. The first is descriptive decomposition: power is differentiated into decision, interpretation, norm-modification, resource, and exit interfaces, and capacity is distinguished from exercise, outcome, and legitimacy. The second is the conversion mechanism: the concept of power grammar is introduced to explain how resources, position, language, and norms are converted into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within a relationship. The third is normative evaluation: structural trust, relational autonomy, non-domination, procedural stability, and conditions of justice are placed within a common framework while preserving boundary cases involving care, agency, shared life, and legitimate authorization. The fourth is spillover analysis: the article examines how value boundaries in private relationships may, once an agent assumes an organizational role, become questions of entrusted authority and organizational justice.

Methodologically, the article combines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cross-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minimal formalization. Equations are not used to compress complex relationships into computable scores. Their function is to clarify variables, directions of influence, and premises of inference. Natural-language argument bears the principal responsibility for explaining conceptual sources, normative significance, counterexampl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The article therefore deliberately retains formal models while requiring each formal object to be supported by sufficiently developed social theory, jurisprudence, and hermeneutic reasoning.

The article proceeds as follows. The next section delimits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units of analysis, and methodological boundaries. The following two sections establish, respectively, the foundations in theories of justice and jurisprudence, and in hermeneut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The article then introduces the formal model and power grammar, followed by structural trust, epistemic autonomy, and multidimensional autonomy. The section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amily reconnects resources, care, and bargaining position to the relational structure. The sections on value boundaries and organizational ethics analyse private value flows and the institutional spillover of entrusted roles. The final sections examine relational reconstruction, empirical propositions, and limits of application, thereby identifying both what the framework can support and what requires further validation.

2 Object of Study, Units of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Task

This section delimits the range of claims the article can support. The article examines a **power-oriented structure** within family relations. Its units of analysis are **relational configurations** and **mechanism interfaces** within continuing interaction, rather than “the family” as an indivisible whole or any member’s fixed psychological

attribute. This limitation is methodologically important. Care, reciprocity, dependence,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power asymmetry can coexist within the same family, and different members can occupy different positions across different domains. The article therefore addresses only a conditional structure: when decision, interpretation, rule modification, resources, and exit costs display persistent directional concentration, how do these dimensions jointly affect autonomy, trust, the disposition of value, and organizational roles?

This unit of analysis also means that the family cannot be presupposed to be a "single actor" whose internal preferences are perfectly aligned. Families can certainly form shared goals, budgets, and long-term commitments, but commonality itself must be explained: which matters are jointly decided, which remain within individual decision authority, who can define the "common interest," and whether members possess a real capacity to object and renegotiate. Only by making these internal processes explicit can cooperation, obligation, and power within families avoid being conceptually collapsed into the same phenomenon.

The article also avoids treating the family as a purely private sphere separated from law, market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Housing, labour income, marital and parental status, social security,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systems all alter resource interfaces and the costs of exit. Intrafamilial power is therefore doubly embedded. On the one hand, it is formed through long-term intimate relations and shared history; on the other, it is shaped by rights, property,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social supports conferred by external institutions. The later discussions of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reconnect this external structure to the relational model developed here.

2.1 Bounded Relational Configurations and Scope Conditions

A **bounded relational configuration** is defined here as a relatively stable pattern of interaction formed by a set of participants, resource interfaces, rules, interpretive practices, and exit conditions within an identifiable time interval T and domain $d \in \mathcal{D}$. The definition retains three scope limitations.

First, family inequality is not directly equated with a power-oriented structure. Divisions of care, age differences, specialization, temporary agency, illness-related care, and emergencies may all generate asymmetries, while asymmetry by itself cannot settle questions of legitimacy. Second, a power-oriented structure is not directly equated with abuse, coercive control, or pathology. Research on coercive control examines a more specific set of mechanisms involving restriction, isolation, fear, and contraction of the victim's action space, and it has its own empirical and legal contexts (E. Stark 2007; Choudhury et al. 2025). The concept developed here is broader and can overlap with that literature only where stronger evidenti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ird, a single conflict is not treated as a structure. Structural judgment re-

quires repetition, directional similarity across events, and some degree of temporal persistence.

Scope conditions also include differences among domains. The same family member may have greater influence over medical decisions because of professional expertise while being subject to strict bilateral authorization in shared finances. A justified asymmetry may also exist only during an emergency. The article therefore does not treat the question "who is stronger overall?" as a sufficient unit of analysis. It requires specification of the domain in which power differences occur, how long they persist, whether they expand across domains, and whether they alter other members' alternatives. This reduces the risk of overdiagnosis and provides observable boundaries for later empirical testing.

Finally, the article distinguishes descriptive scope from normative evaluation. Identifying a concentration of power means only that certain actors possess greater capacity to shape action. Whether this constitutes domination, injustice, exploitation, or illegality requires additional judgments about authorization, proportionality, procedure, harm,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The normative analysis is therefore layered: it first identifies the structure, then asks how that structure is constrained, and only then moves to stronger ethical or jurisprudential evaluation.

2.2 Distinguishing Capacity, Exercise, Outcome, and Legitimacy

Power analysis is vulnerable to conceptual slippage. To prevent "having a capacity," "intervening in practice," "an outcome occurring," and "an intervention being justified" from being written as if they were the same thing, the article uses a four-level distinction:

1. **capacity**: the potential ability of an agent, within a given relationship and situation, to alter another person's feasible set, interpretive conditions, norms, resource channels, or costs of exit;
2. **exercise**: the activation of a capacity in a particular event;
3. **outcome**: the change in action, resources, rules, or meaning that actually follows the exercise;
4. **legitimac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apacity and its exercise have normative support in authorization, reasons, procedure, and boundaries.

These four levels can come apart. An actor may possess considerable capacity without exercising it for a long time; an exercise may fail; an outcome may have multiple causes; and a highly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ay also be fully authorized. The core object of the article is therefore **structural capacity and conversion mechanisms**, while normative judgment requires separate consideration of authorization, proportionality, contes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This four-level distinction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family research. Intimate relations routinely operate through agency, care, shared budgets, and informal divisions of labour, so externally similar conduct may carry very different relational meanings. One partner's management of an account may be a revocable authorization adopted for convenience, or it may be a concentration of resources in which the other lacks access and the capacity to verify. Parental restrictions on a minor may be protective measures justified by developmental circumstances, but the same restrictions may become unnecessary over time and continue to expand. If only the outward form of conduct is observed, research can easily conflate intervention with domination.

Conversely, subjective benevolence is insufficient to establish that a structure is safe. A participant may sincerely believe that they are caring for another while simultaneously possessing the capacity unilaterally to rewrite rules, control documents, and block external information. Normative evaluation must therefore retain both subjective reasons and objective structure. Good intentions may bear on judgments of responsibility, but they cannot substitute for scrutiny of boundaries of authority, procedure, and reversibility.

2.3 Method of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This is a study in conceptual theory and mechanism reconstruction. The method has four steps. First, it extracts relational variables that recur across cases, such as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interpretive advantage, norm modification, resource interfaces, and exit costs. Second, it distinguishes types of variables so that the term "power" does not carry too many different meanings. Third, it uses minimal formalization to express directions of influence while making clear that equations perform a role of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Fourth, it specifies observable implications, counterexamples, and plausible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for each mechanism so that the framework remains open to subsequent empirical testing.

"Minimal formalization" does not mean replacing social theory with mathematical notation. Formal expression is justified here only in three situations: first, to prevent the same symbol from changing meaning across sections; second, to make explicit the intermediate links on which causal or normative inferences depend; and third, to identify the kinds of empirical material required to support or refute a proposition. Where equations do not improve these forms of transparency, the article gives priority to natural-language argument. The formal models should therefore be read together with fuller conceptual explanation,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analysis of counterexamples.

Methodologically, three levels of reasoning must also be distinguished. The descriptive level asks what occurs in the relationship and who possesses which interfaces. The mechanism level asks how these interfaces are converted into one another and how path dependence develops. Only the normative level asks when these struc-

tures conflict with autonomy, trust, justice, or organizational ethics. The article deliberately avoids moving directly from description to normativity. This layering also allows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to enter the same framework: jurisprudence supplies normative structures of rights, authorization, procedure, and private ordering, while political economy explains how resources, care, markets, and state institutions alter practical capacities within relationships.

The method is adjacent to traditions of family power, resource theory, and power dependence. Resource theory has long examined connections between distributions of resources and positions in family decision making (Blood and Wolfe 1960; Hesse-Biber and Williamson 1984). Emerson (1962) locates power within relations of interdependence and alternatives. Komter (1989) further argues that marital power cannot be understood only through visible distributions of power; hidden interactional mechanisms that reproduce inequality must also be studied. More general theories of power remind researchers to distinguish observable decisions, control over agendas, preference formation, domination, and empowerment (Lukes 2021; Allen 1998). Building on these traditions, the article advances a narrower conceptual task: explaining **how multiple dimensions of power are converted by relational rules into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2.4 Limits of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he contribution is not a total theory intended to replace established theories of family power, justice, jurisprudence, hermeneutics, or autonomy. It is an attempt to construct several interfaces across analytical levels. First, **power grammar** is defined as a second-order conversion structure explaining how resources, positions, interpretations, and norm-modifying capacities become "reasons that actually count in this relationship." Second, **structural trust** and **relational autonomy** are placed in one model: an agent's willingness to accept relational exposure depends partly on whether boundaries are enforceable, facts are verifiable, rules are contestable, and exit is realistic. Third, an interface is built between **interpretive structure** and **material structure**: language, narrative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standing enter the mechanism of power only when they can alter rules, resources, or institutional access, thereby avoiding the reduction of every difference in meaning to power. Fourth, an internal-external interface is constructed between **value boundaries** and **organizational role integrity**: questions of authorization and resource control within families may become questions of authority, disclosure, and accountability in public or organizational settings once an agent assumes an entrusted role.

Table 1 brings together the conceptual boundaries used throughout the article. The formalizations and propositions that follow depend on these distinctions.

Table 1: Core concepts, levels of analysis, and excluded confusions

Concept	Working definition	Confusion to exclude
Power capacity	Potential ability to alter another person's action, interpretation, rules, resources, or exit conditions	Not equivalent to actual exercise, successful outcome, or legitimate authorization
Power-oriented structure	Directional concentration of multiple power capacities across time and domains that stably affects the handling of conflict	Not equivalent to any asymmetry, a single command, or a family type
Power grammar	Second-order relational rules determining which positional differences and reasons can be converted into effective decisions, interpretations, and norm modification	Not equivalent to rhetorical style, a single resource, or a particular controlling act
Structural trust	A predictable condition in which power boundaries, rules, facts, contestation, and exit conditions possess a minimum degree of robustness	Not equivalent to a general positive judgment of another person's character
Relational autonomy	Multidimensional capacity to form, express, and carry out judgments about one's basic life course withi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Not equivalent to isolation, self-sufficiency, or complete immunity from influence
Value boundary	Structure of knowledge, authorization, revocation, trace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governing value flows	Not equivalent to prohibiting sharing, gifts, or common life
Role integrity	Condition in which the resources, judgments, and representational powers of an organizational role remain within the scope of authorization	Not equivalent to the mere existence of private relationships constituting a conflict of interest

3 Foundations in Theories of Justice and Jurisprudence

This section establishes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the article. It does not attempt to derive a complete evaluation of family relations from a single theory of justice, nor does it equate the family directly with state institutions. A more cautious approach is to extract from several complementary traditions the normative dimensions directly relevant to the mechanisms examined here: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effective capabilities, relational standing, freedom from arbitrary domination, predictability of rules, contestation and review within procedures, and the ways in which law shapes private relationships. This approach avoids two opposite simplifications: reducing justice within families to "who gets how much," and translating every problem in intimate relations into a formal legal dispute.

3.1 Distribution, Capabilities, and Relational Structure

Modern theories of justice often focus on how institutions distribute basic rights, opportunities, income, and the benefits of social cooperation. Rawls provides a canon-

ical expression of this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justice evaluates not only individual goodwill but also the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at shape the background conditions of social cooperation (Rawls 1999).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erspective for the present article is not that the family should simply be modelled as a complete "basic structure." Rather, it reminds us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living autonomously depends on enduring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Within families, housing, property, education, care, and occupational divisions of labour alter members' future opportunities, so their long-term effects cannot be assessed only by asking whether a single episode of consumption is equally distributed.

Okin's criticism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family and justice further argues that if theories of justice treat the family as a private sphere requiring no internal evaluation, divisions of labour and gender within families can in turn structure opportunities and status in the public sphere (Okin 1989). The present article adopts this structural insight while extending its scope into a more general mechanism claim: any enduring family arrangement that systematically alters members' assets, time, occupational capital,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nd exit conditions can become a site in which later differences in public capabilities are produced. The family is therefore not merely an external background to public justice. It is an intermediate arena in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capabilities.

A distributive perspective remains insufficient. Young's critique of reducing justice to distributable goods stresses that domination, decision-making power,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social divisions of labour themselves carry normative significance (Young 1990). This point bears directly on power grammar. Even if two family members ultimately receive roughly similar monetary resources, a relationship may remain markedly asymmetric if only one can define the problem, alter procedure, interpret the other's conduct, and determine which reasons count as "reasonable." An analysis of justice must therefore consider simultaneously both "what each person receives" and "who can participate in decisions, whose interpretation has standing, and who can modify rules."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changes the object of evaluation further. Sen emphasizes comparison of real opportunities and substantive freedoms rather than resources or formal rights alone (Sen 2009). Nussbaum likewise links social justice to important capabilities that people are actually able to realize,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dependence, disability, and cooperation among unequally situated persons (Nussbaum 2006).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distinguishes the availability of resources, actual control over them, and robustness against interference. A right, account, or income genuinely expands a person's feasible set only when the person can actually access and use it and cannot be easily deprived of it in moments of conflict. Formal equality can therefore coexist with substantial inequality in capabilities.

These traditions jointly impose an important limitation: the article does not define

"justice" as a single indicator. Resource distribution, capability, relational standing, and decision structures may align, but they may also come into tension. An arrangement can increase the household's aggregate welfare while reducing one member's long-term capability. It can formally respect ownership while imposing persistent and invisible opportunity costs on one person. It can be approximately equal in distribution while sustaining highly asymmetric structures of interpretation and norm modification. Rigorous analysis should identify which dimension of justice is at issue rather than using the word "fairness" to cover every form of evaluation.

3.2 Non-Domination, Relational Autonomy, and Constraints on Power

The normative orientation of this article toward constraining pow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publican intuition of non-domination. Pettit understands freedom as freedom from arbitrary domination by others, not simply as the current absence of interference (Pettit 1999).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family relations. A member may not actually block another person's action for a long period, but if that member retains an effectively unconstrained capacity to alter housing, accounts, documents, or basic rules, the other's actions still have to be organized around an anticipation of permission. The question is therefore not only "how much interference occurred," but also "whether the capacity to interfere is bounded by enforceable constraints."

Non-domination also clarifies why an increase in capacity is not the same as an increase in domination. When a weaker relational position gains independent income, legal knowledge, external networks, or exit options, its capacity for resistance increases,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it acquires a license to control others arbitrarily. The article therefore distinguishes **boundary-protecting capacity** from **dominating capacity**. The former secures a minimum sphere of personal decision, a right of refusal, and access to factual verification. The latter enables a person to extend their own preferences across domains and turn them into conditions of another's conduct. The objective of autonomy formation is to enlarge the former, thereby making negotiation a bearable option, rather than reproducing the latter.

Theories of relational autonomy provide a more detailed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is distinction. Work associated with Mackenzie and Stoljar understands autonomy through the social relations, identities, and capacities through which it is formed (Mackenzie and Stoljar 2000). Friedman emphasizes that intimate relations and autonomy are not inherently opposed (Friedman 2003). Westlund stresses a capacity to address and respond to normative claims made by others (Westlund 2009). Nedelsky goes further in proposing that law and autonomy be understood through relations themselves (Nedelsky 2012). Taken together, these accounts show that a person need not leave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be autonomous. What matters is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preserves space for reflection, expression, revision, refusal, and renegotiation.

This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also prevents family care from being written as an exception to autonomy. Care can expand the effective capacities of the person receiving it and can provide the caregiver with meaning, identity, and reciprocity. The problem arises when dependence in care is converted into an unbounded entitlement to decide, or when the caregiver's contribution is persistently excluded from common decisions about resources and rules. The later analysis of resource interfaces and power grammar is designed precisely to distinguish dependence that fosters capability from dependence that generates arbitrary control.

3.3 Legality, Rule Stability, and Procedural Reason

Jurisprudence provides important foundations for the article's claims about "rule stability," "contestability," and "correction." Fuller's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morality of law argues that, if rules are to function as rules, they must satisfy conditions such as generality, promulgation, prospectivity, intelligibility, relative stability, and congruence between official conduct and declared rules (Fuller 1969). Family interaction is obviously not a state legal system, and the article does not apply Fuller's eight desiderata directly as standards of family norms. Yet the underlying jurisprudential intuition can travel: when rules repeatedly shape members' basic life interests, a person cannot plan conduct reliably if those rules can only be changed after the fact, cannot be known, are internally contradictory, or are implemented in ways wholly detached from the stated rules.

The article therefore understands **predictability** as a minimum procedural condition, not as a demand that relationships become rigid. Family norms must be capable of changing with age, illness, economic circumstances, and shared goals. The key issue is whether change has intelligible reasons, recognizable procedures, and transitional treatment of existing interests. The opposite of rule stability is not change but **arbitrariness**: standards are rewritten after outcomes appear by a single relational position, leaving another person unable to obtain stable expectations by complying with previously stated rules.

Habermas's discussion of law, procedure, and public reason further suggests that legitimacy cannot be determined solely by whether outcomes are substantively "good." It also concerns whether those affected can present reason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formation of norms through a responsive procedure (Habermas 1996). The article does not equate family negotiation with democratic legislation. It instead adopts a weaker principle: the more a private norm affects an agent's basic life trajectory, the stronger the reason for requiring that norm to be explainable, contestable, and reviewable. Such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do not guarantee consensus, but they can limit the direct conversion of positional advantage into unilateral norm-modifying authority.

Procedural reason also has an epistemic function. Contestation, record keeping,

and review do not merely make decisions "fairer"; they also increase the chances that error will be detected. Family members may genuinely disagree because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memory distortions, or differences in expertise. If every objection is read as disloyalty or immaturity, the relationship loses mechanisms of correction. By contrast, where facts can be separated from norms, evidence can be preserved, and rule changes can be recorded, interpretive conflict is more likely to remain bounded within the dispute itself rather than expand into a conflict over personal standing.

3.4 Private Ordering, the Shadow of Law, and the Shaping of Relations

Many rules within families do not arise through formal contracts. They emerge from custom, tacit delegation, intergene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long-term shared life. Such **private ordering** is practically necessary: if every act of care, payment, or agency required formal procedure, intimate relations would bear intolerable transaction costs. Yet private ordering does not make law irrelevant. Mnookin and Kornhauser's classic analysis of divorce bargaining shows that private negotiation takes place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legal entitlements and possible legal outcomes (Mnookin and Kornhauser 1979). Even without litigation, property rights, residence rights, custody, and remedial institutions can alter bargaining positions.

Nedelsky's relational jurisprudence further shows that law does more than draw boundaries between individuals. It continuously constitutes forms of interdependence (Nedelsky 2012). The same arrangement of "joint management" can have radically different effects on autonomy under different systems of property, social security, and legal status. Law therefore enters the present model through two channels. It directly changes rights and resources, and it also changes whether a claim can obtain recognition from external institutions, which in turn changes that claim's practical force within the family.

Private ordering also requir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delegation of tasks** and **status-based authority**. One person may handle bills, communicate with schools, or manage documents over a long period simply because this division lowers transaction costs. If that division is gradually interpreted as "I have always handled this, therefore I may decide every related matter," a task has been converted into a status claim. The concept of power grammar is designed to describe precisely such conversions: when does custom become authority, when does authority expand across domains, and can other members still revoke, share, or review it?

Legal intervention in private ordering also requires proportionality. Excessive formalization can damage the flexibility and reciprocity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while insufficient formalization can leave major assets, identity documents, third-party rights, and irreversible decisions without accountability. The article therefore

advances a layered jurisprudential assessment. The closer a matter is to low-risk everyday cooperation, the more it can reasonably rely on convention. The closer it is to basic livelihood, major assets, third-party responsibility, and highly irreversible consequences, the stronger the case for explicit authorization, documentation, review, and remedial interfaces.

3.5 Normative Bridging: When Family Power Becomes a Question of Justice

The preceding theories do not provide a single threshold at which a relationship can simply be declared "just" or "unjust." A more cautious approach is to identify five categories of **normative bridging conditions**. The first is **capability deprivation**: an arrangement persistently constrains an agent's real capacity to pursue basic life judgments rather than merely causing ordinary inconvenience. The second is **status degradation**: a person's reasons and experiences are structurally excluded from common judgment, creating a persistent inequality of standing. The third is **arbitrary domination**: a relational position can alter another person's basic life conditions without effective constraint. The fourth is **procedural imbalance**: changes in rules, determinations of fact, and correction lack predictable procedures. The fifth is **cumulative redistribution**: short-term arrangements accumulate through assets, time, care, and institutional status so as to alter future bargaining and exit capacities.

These five conditions are connected, respectively, to capability justice, relational equality, non-domination, legality-like procedure, and political-economic distribution. They can occur together or separately. A care arrangement may generate obvious inequality in resources while remaining justified through authorization, reciprocity, and long-term security. Conversely, a relationship may distribute money roughly evenly while generating risks of domination through concentration of interpretive authority and exit interfaces. The article therefore rejects the reduction of justice to a single outcome indicator.

Normative bridging also constrains the article's vocabulary. Stronger terms such as "domination," "exploitation," and "injustice" are justified only where the relevant conditions are supported by sufficient evidence. Otherwise, more precise descriptions includ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weak boundaries, unstable rules, or elevated risk. This layering combines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with restraint in judgment and preserves falsifiability for the empirical propositions developed later.

A further distinction is required between **local justice** and **structural justice**. A single resource allocation may be fully justified while, through repetition, generating cumulative disparities in assets, knowledge, and occupational opportunity. Conversely, a momentarily unequal arrangement may be designed to repair an existing disadvantage or meet a special care need. Evaluating family power therefore requires more than extracting isolated events. It also requires asking whether event

sequences repeatedly move the same person toward a weaker future position. This is also the normative reason for the article's emphasis on relational history and path dependence.

The function of theories of justice in this article is ultimately to provide **coordinates of evaluation**, not a uniform plan for how every family should live. Families can legitimately organize common propert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care divisions, and delegated roles in highly diverse ways, provided those arrangements can be justified, preserve necessary capabilities, avoid arbitrary domination, and allow affected persons to participate in processes of revision. Diversity and normative constraint are not contradictory. The relevant constraints are directed at the conversion of a particular way of life's internal conventions into unilateral and uncontestable status claims.

4 Foundations in Hermeneut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Power grammar requires foundations in hermeneut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because "effectiveness" within a relationship is neither purely material nor purely semantic. Who understands a statement, through what historical background, under what classification, and through which linguistic and institutional channels it is converted into consequences can all alter relations of power. Interpretation does not merely describe the world; it participates in constituting responsibility, standing, and rules. Language does not merely transmit information; it may itself be a scarce capacity, a form of institutional capital, and an interface to external resources.

4.1 The Historicity of Understanding and Relational Position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emphasizes that understanding does not begin from a position without history or preconceptions. Interpreters are always situated within traditions, language, and already-formed horizons of questions (Gadamer 2013). In family relations, this means that the same sentence does not acquire meaning in a vacuum. Statements such as "I need to decide this myself," "this is for your own good," or "family members should not calculate things so precisely" are understood against a history of past care, promises, conflicts, and role expectations. Relational history h_t is therefore not an auxiliary variable added to the formal model. It is part of the conditions of interpretation.

Historicity does not imply relativism. The ways in which the past shapes understanding can be analysed, compared, and challenged. One member may interpret a boundary claim as disloyalty while another understands the same claim as an ordinary division of authority. The research task is not immediately to declare one interpretation "true," but to examine how each interpretation enters common decision making, what evidence can support or revise it, and who has the capacity to define subse-

quent rules. Hermeneutics thereby connects to epistemic autonomy: understanding is always situated, but situatedness should not be immune from reflection and verification.

Relational position also affects which background assumptions are treated as requiring no explanation. A person who has long managed a particular domain may regard procedural knowledge as obvious common sense, while a newcomer cannot understand its tacit rules. An elder, professional, or person who commands the dominant institutional language may not have to explain judgments, while other family members must repeatedly prove that they have standing. Such asymmetry is not automatically oppressive, but it changes the burdens of justification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ontest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interpretive power can stabilize.

The article therefore does not define interpretive power as simply "being more persuasive." It refers to **a greater capacity to make one's own interpretation the default premise of the relationship**. Once a default premise enters account management, family roles, communication with third parties, or organizational records, it can go on to reshape material resources. The contribution of hermeneutics here is to make visible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understanding acquires structural consequences.

4.2 Narrative Identity,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Relational Continuity

Ricoeur's account of narrative identity suggests that the continuity of the self is not composed solely of unchanging properties. People organize action, commitment, responsibility, and temporal experience into intelligible selves through narrative (Ricoeur 1992). Family relations depend heavily on this narrative work. Identities such as the person who has "always been responsible," the person who is "impulsive," the person who "understands outside institutions best," or the person who "needs to be cared for" help coordinate long-term life, but they can also become tied to particular forms of authority.

The normative force of narrative partly derives from continuity. Once an event is embedded in the story that "this is what he or she is always like," it can alter the burden of proof in later events. One person's mistake may be interpreted as a stable trait while a similar mistake by another is treated as a situational exception. Such narrative asymmetry cannot be corrected simply by correcting one factual claim, because the dispute concerns how events are placed into a durable identity structure. The article therefore includes interpretive states within relational history rather than treating each conflict as an independent observation.

Narrative can also support autonomy. The capacity to redescribe one's experience, distinguish past roles from present abilities, and refu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mporary dependence into permanent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lational reconstruction. Epistemic autonomy consequently involves more than possession of correct facts. It includes sufficient conceptual resources to describe one's own circumstances and a realistic possibility that such descriptions will enter common judgment. External professional language, legal concepts, or new social relationships may sometimes provide tools for redescription, but they can also create new asymmetries of authority and must therefore remain open to reflection.

This point accords with the article's caution toward labels. Judgments such as "immature," "selfish," or "irresponsible" may be factually grounded in particular contexts, or they may be part of a long-term allocation of roles. Researchers cannot infer control merely from the negative valence of a label. What requires analysis is whether the label can be challenged, whether it has a stable evidentiary basis, whether it expands across domains, and whether it directly triggers consequences for resources or authority.

4.3 Normative Worlds,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Cover's account of "nomos and narrative" locates law within worlds of meaning constituted jointly by narratives, histories, and norms (Cover 1983). White, in turn, understands law as a constitutive linguistic practice and uses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to analyse how law establishes meaning across facts, traditions, and communities (White 1990). Both approaches have methodological value here. Rules are not commands that operate independently of interpretation. Every norm needs to be situated within a meaningful structure that addresses why the rule exists, to whom it applies, and how it relates to prior commitments.

Family norms are similarly interpretive. A rule of "shared finances" may mean complete pooling, authorization by purpose, sharing according to fixed proportions, or merely the convenience of a joint account. A norm of "respect for elders" may mean providing care, listening to experience, or consulting them in major decisions, but in some relationships it may be interpreted as final obedience. Only by specifying the relevant narratives and practices can a researcher know what authority a given term actually confers.

"Translation" has a second meaning here as well. Family language must continually be translated into the institutional languages of medicine, schools, banks, immigration systems, taxation,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s. The capacity to translate family experience into categories recognized by institutions is itself a form of capability. If only one member commands this translation interface, that person's interpretive power may be amplified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Conversely, multilingual services, independent explanations, and direct-access channels provided by external institutions can reduce dependence on a single interpretive node.

Jurisprudence and hermeneutics are therefore not separate in this framework.

Jurisprudence concerns authority and procedure; hermeneutics concerns how rules are understood and narrated. They converge on the question of who can convert an interpretation into an effective norm. This is precisely the mediating level that the concept of power grammar is designed to analyse.

4.4 Linguistic Markets, Symbolic Capital, and Legitimate Expression

Bourdieu's analysis of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rejects the view of language as a neutral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Linguistic practice is situated within linguistic markets, linguistic capital, and structures of legitimate language. The social force of an utterance depends on the speaker's position, recognition within a field, and whether a form of expression is treated as legitimate (Bourdieu 1991). This perspective directly informs the article's accou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reasons. Family members may formally possess equal opportunities to speak without their speech possessing equal social or institutional purchasing power.

Linguistic capital may arise from education, occupation, legal knowledge, administrative experience, command of a standard language, foreign-language competence, or mastery of technical terminology. It has a dual character. On the one hand, linguistic capacity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with which a family communicates with external institutions and is therefore a genuine common resource. On the other hand, if all external information has to pass through one member for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filtering, linguistic advantage can become coupled with interpretive and resource interfaces. At that point, the advantage is no longer merely "speaking better." It can determine who sees the available options, who can verify facts, and who can contact third parties directly.

"Legitimate expression" also concerns norms of style and emotion. Some relationships may recognize as "rational" only speech that is calm, formal, and compatible with a particular educational style. Other relationships may treat emotional intensity, seniority, or a history of sacrifice as the main basis of standing. The article does not presuppose that any one expressive style is inherently superior. It asks how these standards arise, whether they impose asymmetric burdens on different participants, and whether they exclude reasonable disagreement merely because it is expressed in a disfavoured form.

This matters because power grammar is not only a model of the truth or falsity of content. Two claims with similar content may produce different consequences because the speakers occupy different positions, use different linguistic forms, or possess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recognizability. A researcher who records only that "both sides expressed their views" will miss these differences in efficacy.

4.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and Institutional Accessibility

Irvine explicitly argues that linguistic phenomena enter political economy: linguistic forms can index divisions of labour, linguistic abilities can become objects of exchange, and linguistic practice itself can be connected to material relations (Irvine 1989). Gal's review of lang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of linguistic difference with class, labour,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Gal 1989). Language within family power therefore cannot be analysed solely in terms of whether communication is smooth.

The ability to read contracts, complete forms, communicate with banks or schools, understand technical instructions, and translate across languages can all affect a family member's direct access to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When these capacities are highly concentrated, the person who possesses them may perform genuine additional labour and carry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y, but may also acquire a stronger bargaining and interpretive position. Analysis must recognize both contribution and risk. Linguistic capacity can be a public good within family cooperation and can also create single-point dependence.

Heller's work on globalization,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nguage further shows that language and identity can acquire different exchange values within labour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Heller 2003). The implication extend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amily. A particular language skill may increase income and migration opportunities, while also making the person who possesses it the only family member capable of representing the household within certain institutional fields. Linguistic capital thus affects both market resources and internal power gramma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also clarifies why external institutional design matters. Multilingual services, direct account access, clear forms, independent interpretation, and accessible legal information can all reduce the degree to which a family must depend on a single "interpreter." Interpretive autonomy is therefore not purely an individual ability; it partly depends on whether public institutions allow different family members to enter information and procedures directly.

4.6 Interfaces among Interpretation, Language, and Power Grammar

Bringing these theories together, the article treats interpretation and language as four related interfaces. The first is the **meaning interface**: who can define events and roles. The second is the **narrative interface**: who can place individual events within long-term stories of identity and responsibility. The third is the **linguistic-capital interface**: who possesses stronger capacities for expression, trans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fourth is the **institutional-translatability interface**: which statements can be recognized by banks, schools, hospitals, courts, or organizational procedures and thereby produce consequences.

Power grammar operates after these interfaces but is not identical to them. Hermeneu-

tics explains how meaning is form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explains how linguistic capacities become connected to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positions. Power grammar then asks when these differences can be stably converted into decisions, norm modification, and exit costs. If linguistic advantage merely improves communicative efficiency without generating exclusive control, it does not constitute power concentration in the sense used here. If an interpretation can be checked by other members, challenged, and corrected by third parties, its structural risk is also lower than that of an interpretive monopoly that cannot be contested.

This interface also identifies new kinds of empirical material. In addition to income, accounts, and decision records, researchers need to observe who conduct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who holds texts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which words carry implications of role standing, who performs translation labour, whether different family members can independently access institutional information, and how contested narratives enter subsequent rules. Power grammar avoids collapsing into an abstract metaphor only if linguistic material is connected to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evidence.

The interface further requir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rpretive competition** and **interpretive exclusion**. Mature relationships normally contain different narratives, and such plurality can even improve common judgment. The structural problem is not that "someone disagrees with me." It arises when a class of interpretations is excluded from common judgment before factual verification because of the speaker's identity, form of expression, or institutional position. Empirical research should therefore examine why interpretations are rejected: because evidence or relevance is insufficient, or merely because the speaker lacks recognized stand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also allows "voice" to be decomposed into several steps: having an opportunity to speak, having an intelligible form of expression, being recorded, entering a decision procedure, and being able to trigger review. A formal opportunity to speak covers only the first step. What matters for power analysis is whether later steps systematically favour one position. Power grammar therefore does not take "who speaks more" as its core indicator. It asks how language is converted into institutional consequences.

5 Formal Primitives of Power Structure and Relational State

This section establishes a minimal formal language. Its purpose is to decompose compressed expressions such as "who is stronger" or "who controls whom" into distinguishable relational variables and to make explicit the objects on which those variables operate. The formalization does not assume that the five dimensions can be measured on a common scale, nor does it assume that there exists a unified "total

power score."

5.1 Relational History, Domains, and Feasible Action Sets

Let the set of agents in a family relationship be $\mathcal{I} = \{1, \ldots, n\}$ and the set of domains be $\mathcal{D}$, including, for example, residence, finance, occupation, education, health care, social relations, information, and family care. The relationship has a history $h_t \in \mathcal{H}$ containing prior commitments, rule changes, allocations of resources, pattern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The practically feasible action set of agent i at time t, in domain d, and given history h_t is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1.

$$\mathcal{A}_i(t, d \mid h_t) \tag{1}$$

"Practically feasible action" is stronger than legal or logical possibility. An option may formally exist while remaining difficult to exercise because of economic cost, lack of information, social sanctions, dependence of status, or risks associated with exit. Power analysis must therefore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existence of an option** and its **bearability in practice**.

This distinction separates the framework from analyses based solely on formal rights. A person may legally have the capacity to enter a contract, leave a residence, open an account, or seek external assistance, while in the short term those rights are difficult to convert into action because income, documents, transport, information, or social support are controlled through a highly concentrated interface. Conversely, social resources that do not carry a distinct legal title, such as trusted friends, professional networks, independently accessible digital accounts, and procedural knowledge, may significantly enlarge a feasible action set.

Equation 1 should therefore be read as an **institutionally constituted feasible set**, rather than as a purely psychological choice set. Legal status, economic conditions, social networks, and relational history are all components of the conditions of action. This interpretation provides the interface through which the rights structures of jurisprudence and the resource structur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an be brought into a common analysis.

If an intervention by agent j changes the feasible action set of agent i, the transformation is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2.

$$\mathcal{A}'_i(t, d \mid h_t) = \Phi^{d,t}_{j \to i}(\mathcal{A}_i(t, d \mid h_t), h_t) \tag{2}$$

Here $\Phi^{d,t}_{j \to i}$ is a relationship- and context-dependent transformation. It may reduce options, increase the costs of particular options, alter access to information, or increase the range of options. The mere existence of a capacity therefore does not by itself determine its normative character.

5.2 Five Interfaces of Power

The article decomposes the forms of power capacity most relevant to its research problem into five interfaces. The relational vector formed by these interfaces is represented in Equation 3.

$$\mathbf{P}^{d}_{j|i}(t) = \left(D^{d}_{j|i}, I^{d}_{j|i}, N^{d}_{j|i}, R^{d}_{j|i}, X^{d}_{j|i}\right)_{t} \tag{3}$$

Here D is the **decision interface**, the capacity directly to alter action or outcomes; I is the **interpretive interface**, the capacity to stabilize labels for events, roles, and responsibility; N is the **norm-modification interface**, the capacity to alter standards of judgment, conditions of obligation, or procedural rules; R is the **resource interface**, the capacity to control money, housing, documents, information, social networks, or other key resources; and X is the **exit interface**, the capacity to raise the costs of refusal, suspension, separation, or seeking outside support.

Equation 3 is only a set of coordinates. The coordinates may have different data types. Some may be approximated by ratio variables, some may support only ordinal comparison, and some may require event coding. The article therefore avoids ungrounded aggregate indicators such as $D + I + N + R + X$.

Nor should the five interfaces be understood as isolated from one another. A resource interface R may amplify an exit interface X, because control over housing or documents can raise the costs of refusal. An interpretive interface I may influence the norm-modification interface N, because the person who can define the meaning of a conflict may also be better positioned to propose the next round of rules. Repeated exercise of the decision interface D may itself sediment into an expected relational convention. What the article later calls a "power orientation" concerns the formation of stable couplings among these interfaces rather than the search for a maximum on any single dimension.

The legitimate bases of these interfaces also differ. A decision interface may arise from lawful guardianship, shared authorization, or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 interpretive interface may be grounded in expertise yet remain subject to factual verification. A resource interface may arise from ownership or entrusted management without thereby including a right to control another person's occupation, social life, or information. Keeping the interfaces separate prevents the question "does this person possess some right?" from being conflated with the separate question "into which relational domains may that right legitimately extend?"

5.3 Norm Updating and Interpretive States

Let the set of relational norms be $\mathcal{N}_t$, let an event be ω_t, and let participant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 weights $\chi_{i,t}$ in the process of norm updating. The update relation

is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4.

$$\mathcal{N}_{t+1} = \Psi(\mathcal{N}_t, \omega_t, \{\chi_{i,t}\}_{i \in \mathcal{I}}) \tag{4}$$

When one position can repeatedly alter standards of completion, criteria of standing, or attributions of responsibility after outcomes unfavourable to itself have occurred, while other participants lack realistic capacities to object, preserve records, or exit, rule stability declines. The point is not that **rules must never change**. Family rules necessarily adapt to changes across the life course. The analytical question is whether modification has reasons, procedures, symmetric opportunities for contestation, and predictable boundaries.

This distinction has a clear jurisprudential dimension. Stability does not mean turning private relations into a code. It means that rules affecting basic life interests possess a minimum of prospectivity, publicity, and contestability. Families are not courts or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but when private decisions persistently affect housing, finance, status, or third-party opportunities,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become an important point of reference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power is constrained. The relevant intuition is not the literal transplantation of public procedural law, but a more abstract legality-like principle: if rules can only be redefined after outcomes by one party, another participant cannot reliably plan conduct by complying with existing standards.

Interpretive states likewise have a temporal dimension. How an event is named affects the interpretation of similar future events and can determine which facts are preserved and which forms of conduct are treated as reasonable. Norm updating and interpretive updating therefore jointly constitute part of relational history.

The mapping from an event to an interpretive label is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5.

$$\mathcal{L}_{j,t} : \omega_t \longmapsto \ell_t \tag{5}$$

Here ℓ_t may be a relational label such as “responsible,” “selfish,” “immature,” “disloyal,” or “reasonable care.” Interpretive power becomes a structural variable only when such labels can stably alter subsequent rules, resources, or third-party evaluations. A single disagreement of opinion is insufficient to establish a concentration of interpretive power.

5.4 Conditions for Identifying a Power-Oriented Structure

The article does not define a power-oriented structure by a single threshold. Instead, it proposes five jointly informative identification conditions. For a time interval T and set of domains $\mathcal{D}^* \subseteq \mathcal{D}$, a relational configuration may be analysed as strongly power-oriented when the following combination of mechanisms is observed:

1. **repetition**: relevant differences in power recur across multiple events rather than appearing only in one conflict;
2. **directionality**: at least several core interfaces are persistently concentrated in the same relational position;
3. **convertibility**: resource, positional, or exit differences can stably alter decisions, interpretations, or normative outcomes;
4. **cross-domain reach**: advantage in one domain penetrates others, for example when financial control becomes a restriction on occupation or social relations;
5. **recursiveness**: existing advantages alter future rules, resources, or exit conditions in ways that make subsequent asymmetry easier to maintain.

These conditions identify structural strength rather than provide an immediate ethical judgment. Legitimate guardianship, shared financial arrangements, care agency, and emergency authorization may temporarily satisfy some of them and must still be assessed at the levels of authorization and procedure.

The five conditions are not a mechanical set of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A relationship may display intense concentration only in the financial domain, but because finance underlies housing, occupation, and exit, that concentration may generate substantial cross-domain consequences. Another relationship may exhibit asymmetry across several domains while preserving comparatively high autonomy through transparency, revocable authorization, and strong external support. Structural judgment therefore requires configurational reasoning about combinations of interfaces, the centrality of particular domains, and relational history rather than the calculation of a simple score.

Empirically, the most informative evidence will often be not a single extreme event but structural similarity across repeated events. Do rules repeatedly change in the same direction? Does refusal reliably trigger costs across several domains? Are external resources repeatedly translated into internal decision authority? Sequential evidence of this kind can help distinguish episodic conflict from a relational structure with self-maintaining capacity.

6 Power Grammar as a Second-Order Conversion Structure

This section develops the central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article. Power grammar is not another kind of power resource. It specifies **how existing differences are converted into effectiveness within a relationship**. It is therefore located between resources, norms, interpretations, and outcomes, and it operates as a second-order relational rule.

6.1 The Effectiveness of Reasons and Conversion into Consequences

Let a claim or boundary statement be q, with substantive reason $r(q)$. Let the relational state formed by position, resources, and exit conditions be z_t.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within a relationship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content of reasons but also on the way i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converts reasons and positions into consequences. This conversion structure is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6.

$$\mathcal{G}_t : (q, r(q), z_t, h_t) \longmapsto \big(J_t(q), C_t(q)\big) \tag{6}$$

Here $J_t(q)$ is the set of reasons recognized in the present relationship as admissible to judgment, and $C_t(q)$ is the set of practical consequences that the claim can trigger.

In relationships with stronger deliberative features, $J_t(q)$ is more sensitive to the content of reasons, authorization, and shared rules. In strongly power-oriented grammars, $C_t(q)$ is often more sensitive to whether the speaker can enforce a position, withdraw resources, increase exit costs, or rewrite rules. "Grammar" is used here as a combination of metaphor and formalization for the **rules by which effectiveness is converted**, not as a reference to grammar in the linguistic sense.

Consider two participants who both state, "I do not agree to this arrangement." If the first person's disagreement triggers suspension, renegotiation, and a shared record, while the second person's disagreement is treated only as emotionality or immaturity, both formally possess a right of expression but their statements differ radically in practical force. Power grammar is designed to capture this gap. Relationships do not merely distribute opportunities to speak. They also distribute which utterances can alter procedure, which refusals can stop action, and which interpretations can enter subsequent rules.

Power grammar is therefore not simply discourse analysis. It encompasses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consequences. A reason may be "effective" because it is recognized by shared norms, or because the person advancing it controls key resources. A rule may persist because participants sincerely accept it, or because the costs of contesting it are prohibitively high. These pathways need to be distinguished if analysis is to avoid conflating consent, compliance, and inability to bear the costs of refusal.

6.2 Distinguishing Power Grammar from Existing Theories

The concept is adjacent to existing theories in three ways. First, it accepts the relational premise of power-dependence theory: power is connected to alternatives, dependence, and resource position (Emerson 1962). Second, it is compatible with research on hidden and multidimensional power, because agenda form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norms may also form part of power processes (Komter 1989; Lukes 2021). Third, it retains Allen's warning that relations between power-over and empowerment are complex: increasing an agent's capacity is not necessarily equivalent

to increasing domination, because capacities may also be used to establish the conditions of joint deliberation (Allen 1998).

The independent analytical value of power grammar lies in shifting from the first-order question "who possesses which resources?" to the second-order question "which differences can be converted, in this relationship, into effective decisions?" Two relationships may contain similar income disparities but, because their rules, authorizations, external institutions, and exit conditions differ, exhibit very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Conversely, small resource differences do not rule out highly concentrated interpretive or norm-modifying authority.

This distinction also explains why the article's conclusions cannot be derived directly from resource theory. Resource theory can explain how alternatives and dependence affect bargaining position, but it does not by itself explain why some resources are recognized within a relationship as decision-relevant while others are not. A lower-income partner may have a highly stable power of refusal because of legal ownership,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or extern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A higher-income partner may be unable to convert economic advantage into unilateral decision-making because transparent rules govern a shared budget. Power grammar is therefore positioned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outcomes.

The distinction from multidimensional power theory concerns analytical scale. Theories such as Lukes's help show that power can operate in decision making, agenda setting, and preference formation. The present article asks further how these levels are converted into one another through authorization, rules, records, and exit costs within a concrete relational configuration. The concept has incremental value only where such conversion can be empirically identified. Later sections therefore formulate it as a refutable research proposition rather than redescribing every complex interaction as power grammar.

Hermeneut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provide a more explicit basis for this notion of conversion. Reasons do not first exist in a completely neutral form and only later become distorted by power. They must already be understood through a language, narrative, and institutional category. At the same time, mastery of a legitimate language, technical vocabulary, or administrative format does not in itself grant a right to decide other people's affairs. Power grammar focuses on the steps in between: when does linguistic or interpretive advantage become recognized as standing, when can standing alter procedure, and when do procedural changes enter resource and exit interfaces?

The article therefore distinguishes **linguistic effectiveness** from **power effectiveness**. A statement may be semantically clear and factually correct yet fail to change outcomes because the speaker lacks institutional access. Another statement may be linguistically minimal but have immediate consequences because the speaker controls an account, identity documents, or organizational authority. Bourdieu's anal-

ysis of linguistic markets and symbolic power (Bourdieu 1991) helps explain inequalities in the social force of expression. Power grammar adds the requirement that research ask whether these inequalities stably enter decisions, norm modification, and exit costs.

Power grammar likewise remains distinct from hermeneutics. Gadamerian historicity explains that all understanding has prestructures (Gadamer 2013), but historicity itself is not domination. Family members' rapid mutual understanding grounded in shared history often improves cooperation. Interpretive differences enter the power mechanism developed here only where particular interpretations are structurally exempted from verification, competing interpretations lose channels into common judgment, and interpretive advantage can repeatedly alter rules or resources.

6.3 Grammatical Lock-In and Relational Path Dependence

Relational history h_t shap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rrent claims. If refusal in the past has often been followed by high costs, participants may alter conduct before a new event occurs. If rules are repeatedly rewritten after outcomes appear, an agent may come to understand "compliance" as an impossible target. Power grammar then exhibits path dependence.

The historically dependent update of the next-period grammar is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7.

$$\mathcal{G}_{t+1} = \Xi(\mathcal{G}_t, \omega_t, \mathbf{P}_t, \mathcal{N}_t) \tag{7}$$

If prior exercises of power repeatedly increase the acceptability, enforceability, or low cost of similar exercises in the future, **grammatical lock-in** emerges. Lock-in does not require an explicit command every time. Learning about consequences can itself reshape later action. By the same logic, decentring power takes time: one expression of goodwill cannot automatically rewrite expectations of effectiveness formed through long-term interaction.

Lock-in can develop through at least three pathways. The first is behavioural learning: participants discover that certain boundary claims repeatedly fail and therefore make fewer such claims before the next conflict even begins. The second is institutional sedimentation: what began as temporary arrangements for accounts, documents, or communication gradually becomes routine, making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other participants to regain access. The third is sedimentation of meaning: role labels such as "the more sensible person," "the responsible person," or "the person who needs to be cared for" become durably attached to specific forms of authority and provide narrative support for their expansion.

This does not imply that agents are completely determined by structure. On the contrary, path dependence shows why change requires new experiences that can be repeated: clear authorization, successful objection, rules that remain stable in conflict, usable external support, and correctable errors. Only as such events accum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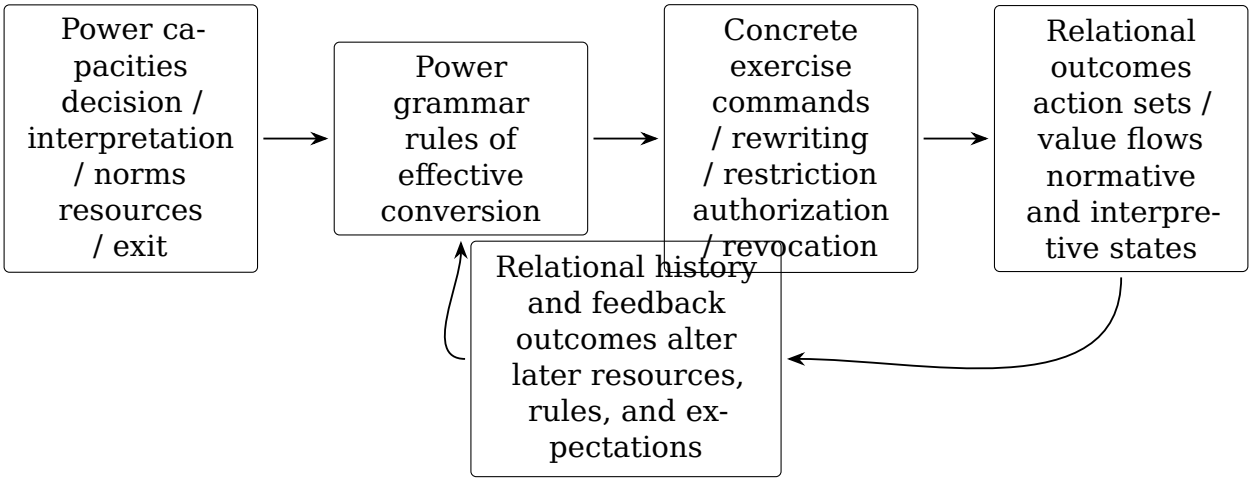

Figure 1: Distinguishing power capacities, power grammar, concrete exercise, and relational outcomes

late will participants revise expectations about relational consequences. Relational reconstruction is therefore both a normative project and a learning process.

Figure 1 separates four analytical levels. This prevents an inference directly from the existence of capacity to the occurrence of control and also prevents an inference from the occurrence of an outcome to the claim that one agent bears sole causal responsibility.

6.4 Boundary Cases and Counterexamples

To strengthen conceptual discrimination, the article explicitly preserves the following boundary cases.

Table 2 shows that the central distinction is whether power is constrained by authorization, reasons, procedure, proportionality, and conditions of exit. Empirical research therefore needs to record both differences in power and the structures through which those differences are justified and bounded.

Boundary cases do more than prevent misclassification. They also clarify the core mechanism. Adult authority over children can be justified not because adults possess a natural unlimited right of domination, but because authority is tied to protective purposes, developmental stag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are. Emergency agency can be accepted because it is tied to necessity, temporal limits, and later explanation. When these constraints disappear, capacities that originally had a legitimate basis may undergo functional drift.

The article therefore rejects any opposition between “autonomy” and “external influence” as such. Mature relational orders permit authorization, entrustment, care, and shared management while requiring that these arrangements have explicable boundaries. What power grammar make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examine is whether a limited authorization is repeatedly converted into broader claims of standing and eventually alters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reasons in other domains.

Table 2: Boundary cases of asymmetric relations and variables for discrimination

Case	Possible legitimate basis of asymmetry	Structural variables that still require examination
Child care and guardianship	Age, protective duties, differences in capacity, and legal responsibility	Whether authority is proportionate to developmental stage; whether expression, review, and progressively greater autonomy are preserved
Illness or emergency agency	Time pressure, temporary limits on capacity, and needs of life and safety	Scope of authorization, necessity, duration, ex post explanation, and conditions for terminating agency
Management of shared finances	Lower transaction costs, specialization, and common objectives	Information visibility, bilateral authorization, powers of revocation, and a minimum sphere of personal control
High-dependence care relation	Concentration of care resources and differences in expertise	Whether dependence is used to expand control into unrelated domains; whether third-party support and channels of complaint exist
Cultural or familial obligation	Stable common life,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shared norms	Whether duties are contestable, whether they impose incomparable exit costs on different members, and whether a minimum floor of autonomy is preserved

7 Structural Trust, Predictability, and Epistemic Autonomy

This section examines why agents may rationally remain cautious within a relationship and what structural conditions are required for the repair of trust. Trust is not merely a warm feeling. It includes the relational choice to expose future interests to another person's conduct. Baier (1986) emphasizes vulnerability in trust, while Hardin (2002) analyses trust through encapsulated interests and continuing relationships. The article does not choose a single definition between these approaches. It draws only on a shared implication: **trust increases one's exposure to another person's future conduct**.

7.1 A Conditional Vector of Structural Trust

For the exposure of agent i to agent j, the article defines the conditional vector of structural trust in Equation 8.

$$\mathbf{K}_{i|j}(t,d) = \big(L, S, Q, V, C, E\big)_{t,d} \tag{8}$$

Here L is the enforceability of power boundaries, S the stability of key rules, Q the space for contestation and dissent, V the verifiability of facts and commitments, C the capacity for correction and repair, and E the practical ability to exit or suspend an arrangement. None of these six conditions is sufficient for trust, but together they

shape how much irrecoverable loss may follow from an erroneous judgment.

Structural trust therefore has a different object from character trust. Character trust asks whether another person is benevolent, honest, or reliable. Structural trust asks whether, even in serious disagreement, sufficient boundaries remain so that neither side can arbitrarily transform the other's basic conditions of life. The two forms of trust may coexist or diverge. A person may believe that a relative is broadly well-intentioned while still requiring financial records, an independent account, and explicit authorization.

The distinction is especially useful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because trust often acquires moral meaning there. Requests for documentation, boundaries, or a separate account may be interpreted as "not trusting family." The concept of structural trust rejects this binary. Records and boundaries do not necessarily communicate suspicion about character. They can also b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that prevent both sides from having to rely excessively on judgments of character. The more a relationship concerns irreversible interests, third-party responsibilities, or long-term dependence, the stronger the reason to transfer part of the burden of trust to verifiable procedur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a trustworthy relationship is not a relationship without safeguards. It is one in which safeguards themselves are not experienced as hostility. A structure with stable rules,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and accessible correction can accommodate misunderstanding, emotional fluctuation, and conflict of interest without turning every disagreement into an existential risk.

The six conditions may also substitute for and complement one another. Weak exit capacity does not necessarily carry the same risk when rules are highly stable, third-party review is strong, and information is fully available. Conversely, formal ability to exit offers little protection if exit entails the loss of all housing, social relations, or legal status. **K** should therefore be interpreted as a configuration rather than a linear score. Empirical research should identify which combinations matter most for different classes of risk.

Theories of justice also imply that the minimum conditions of structural trust should not be defined unilaterally by the strongest relational position. What counts as "sufficient transparency," "reasonable exit," or "adequate correction" must take account of the losses borne by those affected and their actual capabilities. Otherwise an apparently uniform standard of trust can impose greater risk on the weaker side under asymmetric conditions.

7.2 Rule Stability, Capacity for Contestation, and Correction

Rule stability does not mean that rules never change. Its core is predictability in procedures of modification: participants can know why a rule changes, who may alter it, when the change takes effect, and whether objection is possible. Similarly, the ca-

pacity for contestation does not require agreement on every dispute. It requires that dissent not automatically trigger sanctions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matter in dispute.

The correction condition C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Even when both sides act in good faith, complex relationships generate misunderstandings,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nd implementation errors. A highly trustworthy structure should permit errors to be identified, records preserved, losses restored, rules revised, and authorizations redrawn. Walker (2006), in work on moral repair, emphasizes that relational repair involves acknowledgment of responsibility, reconstruction of norms, and the rebuilding of conditions for trustworthy interaction rather than emotional reconciliation alone. The article therefore includes capacity for repair within the conditions of structural trust.

From a jurisprudential perspective, contestation and correc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micro-level procedural safeguards. They do not require family interaction to reproduce formal adjudication, but where basic interests are affected they require that reasons can be stated, evidence can be preserved, decisions can be reviewed, and errors can be acknowledged. Procedure matters not only because it yields "fairer decisions," but also because it slows the conversion of any single interpretation into irreversible fact.

This also explains why rule stability and correction are compatible. Stability is not rigidity, and correction is not arbitrary rewriting. A robust structure can specify when rules may need to change, who can propose change, and which existing interests require transitional protection. What undermines predictability is a structure in which only the stronger position can revise standards without bearing a burden of explanation.

The burden of explanation is itself an indicator of power. If one side can alter an important rule without justification while every deviation by the other requires a complete defence, a procedure that formally permits both sides to speak nonetheless distributes evidentiary costs asymmetrically. The jurisprudential intuition of procedure suggests that burdens of justification should correspond to the strength of the authority exercised. The greater a decision's capacity to alter another person's basic interests, the stronger the reason for duties of explanation, record keeping, and review.

Correction should also be divided into correction of fact, correction of rules, and relational repair. Factual correction addresses "what happened." Normative correction addresses whether an existing rule applies. Relational repair addresses the erosion of trust caused by error and the safeguards required for the future. Conflating the three can generate new disputes, for example when an apology is treated as a substitute for restoring a loss, or when a new rule is used to avoid explaining prior conduct. Rigorous analysis should specify the level at which repair occurs.

7.3 Epistemic Autonomy and Interpretive Capture

Agents need to retain the capacity to describe events independently, compare interpretations, preserve evidence, and seek external verification. The article calls this capacity **epistemic autonomy**. It is adjacent to work on credibility, interpretive resources, and epistemic power in the literature on epistemic injustice (Fricker 2007), but it is used here in a narrower sense. Disagreement by itself does not establish epistemic injustice. The focus is whether **interpretive differences systematically lose access to common judgment because of relational position**.

When one position simultaneously controls sources of information, records of events, access to third parti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orms, **interpretive capture** may emerge. Its defining feature is not that "the other side is always wrong." It is that competing interpretations lack independent channels for preservation, verification, or entry into decisions. Epistemic autonomy therefore includes at least four capacities: recording facts, forming concepts, comparing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and obtaining external verification. These capacities provide epistemic preconditions for the later analysis of value boundaries, because an agent can authorize effectively only if the agent can know where value originates, how it flows, and according to what rules it is disposed of.

Epistemic autonomy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stubbornly maintaining one's own view. Robust epistemic autonomy includes the capacity to accept contrary evidence and revise judgment. An agent who permits only self-confirmation and rejects outside verification also lacks stable epistemic conditions. The emphasis is therefore on multip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nd comparability of interpretations rather than on treating any participant's first-person account as final fact by default.

Interpretive capture requires particular caution in empirical research. Family members may have genuine differences in knowledge, language ability, digital competence, or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Researchers need to ask whether these advantages remain open to testing, whether others can supplement them through third-party resources, and whether they are converted into decision authority beyond the domain of expertise. Structural concern becomes clearer only where interpretive advantage is stably coupled with information closure, control of records, and norm modification.

7.4 The Structural Sequence of Trust Repair

The article does not treat "build trust first" as a generally valid starting point for relational repair. Under conditions of high uncertainty or strong asymmetry, a more robust sequence is first to reduce irreversible risk and then to allow experiential trust to emerge through repeated interaction. This 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is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9.

$$\Delta L, \Delta S, \Delta Q, \Delta V, \Delta C, \Delta E > 0 \quad \Rightarrow \quad \text{the tolerable range of trust exposure may expand} \tag{9}$$

Equation 9 expresses only a directional hypothesis between improved conditions and tolerable exposure. It does not imply that psychological trust must increase at the same pace, nor does it specify the speed of repair.

Trust repair also has an irreducible temporal dimension. Once past events have increased the perceived probability of a particular risk, future promises alone rarely restore exposure immediately to its prior level. Structural improvement has to be verified across multiple events, especially when the participants' interests genuinely diverge. The strongest evidence of grammatical change therefore does not come from harmony during periods without conflict. It comes from episodes in which rules remain stable despite disagreement, dissent can still be expressed, and established boundaries continue to be respected.

This also means that demanding that the weaker position "show trust first" may reverse the burden of proof. A more robust sequence is for the party with greater structural capacity, or for jointly created institutions, to reduce irreversible risk first, allowing trust to grow gradually through experience. This remains a general mechanism claim rather than an instruction concerning any particular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stice, repair also concerns the distribution of proof burdens and risk. If one side can restore prior control at low cost while the other, if mistaken, would bear major losses of housing, assets, status, or third-party responsibility, a requirement that "both sides should take equal risks" is not neutral. Risk-bearing should be related to control, reversibility of loss,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rules. One value of structural trust is that it makes this allocation of risk explicit rather than attributing caution to personality defects.

From a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repair also requires minimally coexistent narratives of past events. Complete agreement is unnecessary. Yet if one side insists that all prior conflicts were merely the other's "misunderstanding," while the other interprets every action as malicious, future rules will struggle to acquire shared meaning. Sustainable repair requires space for different narratives while creating clearer common records of verifiable facts, prior commitments, and future authority. The relationship can therefore establish enforceable forward-looking boundaries before resolving every historical dispute about meaning.

Linguistic conditions matter as well. A reparative arrangement that can be explained only by the person who commands legal, professional, or administrative language may be transparent only formally. Key documents, account rules, and third-party procedures need to be presented in forms that relevant participants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and verify independently. Structural trust is therefore ultimately a kind

of institutionalized intelligibility. Participants not only know that rules exist, but understand how they operate, how objections can be raised, and how correction can be triggered.

8 The Multidimensional Capability Structure of Autonomy Formation

This section defines autonomy as a relational capacity rather than isolated will. Research on relational autonomy has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how social structures, identity relations, and dialogical conditions can foster or impair autonomy (Mackenzie and Stoljar 2000; Friedman 2003; Westlund 2009; Nedelsky 2012). The article adopts this general direction and further decomposes autonomy into **dimensions** and **levels of robustness**.

8.1 A Six-Dimensional Vector of Autonomy

The autonomy conditions of agent i are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10.

$$\mathbf{A}_i(t) = \left(A^{\text{econ}}, A^{\text{inst}}, A^{\text{rel}}, A^{\text{epi}}, A^{\text{val}}, A^{\text{exit}}\right)_t \tag{10}$$

The six dimensions correspond, respectively, to economic resources and basic financial control; the capacity independently to use institutional identity, accounts, contracts, and public services; the capacity to maintain social networks not wholly dependent on a single relational node; epistemic autonomy; the capacity to authorize and dispose of personal and jointly produced value; and the practical capacity to refuse, suspend, alter, or exit high-risk relational arrangements. The last dimension is analytically related to Hirschman (1970)'s classic distinction between exit and voice, but exit within family relations typically carries simultaneous emotional, identity, care, and subsistence costs. It is therefore treated here as a multidimensional practical capability rather than simply a membership choice.

The dimensions are complementary. Higher income can be neutralized by control over accounts. Formal legal independence may be difficult to exercise in the absence of information, documents, housing, or social support. Rich social networks may fail to compensate for limits on institutional status. Autonomy therefore cannot reliably be compressed into a single variable.

The six dimensions also stand in relations of conversion. Economic resources can purchase housing, transportation,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thereby increasing exit capacity. Institutional identity can convert abstract rights into enforceable contracts and accounts. Relational networks can supply information, emotional support, and alternatives. Epistemic autonomy helps agents identify which options genuinely exist. Autonomy is therefore better understood as a mutually supporting capability system than as six independent "assets."

This systemic interpretation also allows autonomy and dependence to coexist. An agent may choose to entrust parts of life to a trusted person as long as that authorization does not destroy the capacity to understand, review, revoke, and seek alternatives. The core of relational autonomy is therefore not continuous personal control over every detail, but the capacity to re-enter decision making at important points and to preserve the conditions for forming and revising one's own judgments.

8.2 Availability, Control, and Robustness

The same autonomy resource must be distinguished across three levels. For dimension k, the three-level structure is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11.

$$A_i^k(t) = \left(a_i^k, c_i^k, r_i^k\right)_t \tag{11}$$

Here a denotes the **availability** of a resource or option, c the agent's **actual control** over it, and r its **robustness** under external interference. For example, "having a bank account" establishes only availability. Passwords and transaction permissions determine control. Whether the account remains usable under third-party pressure, withholding of documents, or dependence of legal status concerns robustness.

This three-level model explains why formal independence can diverge from substantive autonomy. It also avoids treating autonomy as binary: autonomy can emerge gradually and unevenly across dimensions and levels.

Formal legal rights primarily increase the availability level, but whether those rights can be exercised depends on procedural knowledge, cost, time, evidence, and institutional accessibility. Political-economic distributions of resources, in turn, affect control and robustness. The same nominal income is less robust where it can be maintained only through another person's account, housing, or status arrangements. The three-level model therefore provides a common language for connecting analyses of rights and resources.

Robustness is also context-relative. An arrangement may function well during ordinary low-conflict periods but collapse during relational deterioration, unemployment, migration, or illness. Assessing autonomy therefore requires more than observing availability under calm conditions. It requires asking whether a minimum action space remains under reasonably foreseeable stress.

The model also explains why the same resource can have very different autonomy value across relationships. Two persons may formally possess individual bank accounts, yet one directly controls credentials and can contact the bank independently while the other's login, phone, and identity documents are controlled by a third party. They may be similar in resource availability and radically different in control and robustness. Similar distinctions apply to legal status, professional credentials, and social networks.

Robustnes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conflict. If a resource is usable only while a relationship is harmonious and is suspended, frozen, or made conditional on punishment when disagreement occurs, it provides a weak foundation for genuine boundaries. The article therefore distinguishes “usable in ordinary times” from “still usable in conflict,” with the latter offering a stronger indication that autonomy is structurally protected.

The model also avoids equating autonomy with asset maximization. A person may own limited resources yet maintain substantial robustness through public services, trusted networks, and stable rights. Conversely, a high-income person may lack practical autonomy in a particular domain if all institutional interfaces are controlled by another node. Resource quantity, control, and resilience must be observed separately.

8.3 A Life Order Beyond the Reach of Concentrated Family Power

Let $\mathcal{O}_i$ denote the order of life that an agent can maintain with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let $\mathcal{O}_F$ denote the domain directly organized by the family power network. The long-term condition of absorption examined by the article is represented in Equation 12; avoiding this condition is treated as an analytical objective.

$$\mathcal{O}_i \subseteq \mathcal{O}_F \tag{12}$$

The concern arises when this relation becomes durable and lacks alternatives. When location, income, status procedures, occupational opportunities, social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 channels all pass through the same power node, conflict in one domain can rapidly become a risk to an entire life order. Establishing limited but real external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supports can reduce such cross-domain absorption.

“External” here is relative to a particular power network and does not imply withdrawal from the family. An agent can maintain deep intimacy, common life, and shared resources while also having independently accessible legal documents, professional accounts, occupational contacts, or social support. The key condition is that these supports cannot be activated only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same person.

This point also has implications for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policy. Public services, affordable housing, independent financial accounts, labour opportunities, legal aid, and care support may appear external to family life, but they directly alter the practical conditions of bargaining within families. The later section on political economy develops this point further. Intrafamilial autonomy cannot be explained only through “communication skills” because external institutions systematically reshape feasible action sets.

8.4 Progressive Controllability

The formation of autonomy has a temporal dimension. If an agent enters highly sensitive, irreversible, or strongly fiduciary roles while private-network influence remains powerful, spillover risks may increase. Yet complete withdrawal from social participation may itself increase dependence. The article therefore proposes **progressive controllability**: the scale of responsibility should remain commensurate with robustness of autonomy and control over relevant interfaces.

Let τ_t denote the degree of fiduciary exposure and $C_i(t)$ the agent's capacity to control key interfaces. The heuristic constraint is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13.

$$\tau_t \preceq \Theta(\mathbf{A}_i(t), C_i(t)) \tag{13}$$

Here $\preceq$ means "compatible with the boundary of capacity," not numerical less-than-or-equal, and Θ is not an empirically estimated function. The expression makes explicit a normative principle: as boundaries, records, insulation, and exit capacities improve, an agent can assume more complex fiduciary interfaces. Growth in responsibility and control capacity should proceed together.

Progressive controllability applies both to individual autonomy formation and to organizational allocation of authority. It rejects two extremes. One is exposing still-unstable boundaries to highly irreversible responsibilities. The other is permanently excluding an agent from social or professional roles merely because private relational risks exist. A more 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question is which authorities can be opened in stages, which interfaces require dual control, and which additional safeguards can be relaxed once stable capacities are demonstrated.

This approach also prevents the equation of a "low-ranking position" with a "low-risk position." Some nominally simple roles may involve cash, personal data, procurement, or representational authority, whereas senior research or professional roles may have clear peer review and segregated permissions. Risk assessment should be organized around the nature and reversibility of interfaces rather than prestige of position.

A key variable in progressive controllability is **reversibility**. Agents learning to maintain boundaries will inevitably make errors of judgment, communication mistakes, or regressions into older relational grammars. If every error immediately produces irrecoverable asset loss or serious harm to third parties, the cost of learning is too high. By contrast, responsibilities that can be suspended, reviewed, and capped allow agents to establish new stable patterns through actual practice.

The same logic applies within families. Important boundaries need not be transformed across all domains at once. New rules can first be established at visible interfaces such as account access, document custody,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later extended to more complex shared assets or care arrangements. Gradualism

does not mean indefinitely postponing autonomy. It means reducing the costs of transition through verifiable intermediate stat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justice, progressive arrangements cannot become a permanent rationale for limiting the weaker party. If "not yet ready" is defined unilaterally and indefinitely by the stronger position, it can itself become an instrument of norm modification. Progressive arrangements therefore need public or mutually recognized conditions for advancement, review point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ffected agent.

8.5 Distributed Autonomy and Portfolios of Dependence

Autonomy also has a structural dimension. Key support nodes and their dependence weights are represented in Equation 14.

$$\mathcal{S}_i = \{s_1, \ldots, s_n\}, \qquad \sum_{m=1}^{n} w_m = 1 \tag{14}$$

Here w_m represents the relative dependence on support node s_m. A simplified concentration measure based on these weights is given by Equation 15.

$$H_i = \sum_{m=1}^{n} w_m^2 \tag{15}$$

A higher H_i indicates greater concentration of critical support, but the measure is not treated as an "autonomy score." Different nodes can be highly correlated. The more important property is therefore the existence of **independent failure modes**: whether the failure of one node causes other nodes to fail simultaneously.

Distributed autonomy refers to an agent's possession of several support points across income, housing, status, inform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professional resources that do not fail completely together. Its normative constraint is summarized by Equation 16.

$$\text{distributed dependence} \quad + \quad \text{locally traceable responsibility} \tag{16}$$

Distribution does not mean dispersing responsibility until no one is accountable. Each contract, account, authorization, and value channel still needs a clearly identifiable responsible party.

Distributed autonomy must also manage coordination costs.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support points, the more accounts, relationships, and institutional interfaces an agent must maintain and the greater the informational burden. If several apparent supports ultimately depend on the same income source, legal status, or family approval, they are diversified only superficially and still share a common failure point. Empirical application should therefore focus on correlations among supports rather than simply count their number.

From a political-economic perspective, this struc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outside options. Better external employment, social security, public services, and asset rights improve alternatives and thereby affect bargaining within the family. Distributed autonomy is thus both a concept of individual strategy and a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From a jurisprudential perspective, a life order outside the reach of a particular family power network does not mean constructing a “lawless private fortress.” It means that an agent can directly enter several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that are not controlled by a single relational node. Independent access to identity documents,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banks or public agencies, and personal access to legal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all make it easier to convert formal rights into practical capabilities. These external interfaces also reduce monopolies of interpretation within the family because the agent need not depend entirely on another member to explain external rules.

From a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an external life order also provides alternative resources of meaning. A person immersed for a long period in a single relational narrative may struggle to distinguish a general 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from a family-specific custom or one member’s interpretation. Occupation, education, friends,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information provide comparative reference points and richer conceptual vocabularies for interpreting one’s circumstances. This “externality” need not oppose the family. It prevents any single relationship from becoming the sole source of facts and norms.

A life order beyond concentrated family power therefore has material, institutional, and interpretive functions: it provides alternative resources, independent procedural interfaces, and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Together these increase robustness of autonomy, while any one dimension may fail in the absence of the others.

“External” need not mean geographic separation. Digital accounts, directly accessible medical information, independent occupational credentials, personal legal consultation, and public services that can be contacted without family mediation can all serve as external supports. Conversely, geographic distance from family may do little to improve practical autonomy if income, status, and all information remain controlled through the same node.

External supports also provide redundancy. Any single support relation can fail. Several institutionally independent interfaces reduce systemic vulnerability. Redundancy is not valuable without limit, however, because maintaining too many accounts and relationships can also create coordination burdens. A more reasonable objective is that critical life domains should not depend on one unique point of control whose failure can disable the entire system.

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amily: Dependence,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Bargaining Position

If family power is understood only a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r psychological interaction, its material foundations disappear from view. Income, assets, housing, time devoted to care, labour-market opportunities, social security, and public services jointly determine family members' alternatives and the losses they face if a relational arrangement fails. Political economy treats these conditions as parts of the power structure rather than as a fixed "background" that exists before relationships begin. Drawing on research on household bargaining, cooperative conflict,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this section connects the earlier resource interfaces to wider structures of markets, the state, and social norms.

9.1 The Family as an Institutional Unit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Families can generate genuine common interests. Shared residence, care, risk pooling,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often require cooperation, and many benefits cannot be divided precisely. Understanding the family solely as a collection of competing individuals would therefore miss the reality of intimacy and commonality. Yet assuming that a family has a single preference and a unified welfare function equally conceals internal difference. Sen's analysis of "cooperative conflicts" shows that family members can gain jointly from cooperation while retaining different interest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labour, and resources (Sen 1990).

This perspective connects directly to power grammar. Cooperation by itself does not determine how contributions are interpreted or who holds final authority. A family may benefit from one member's unpaid care, but if that contribution cannot be converted into financial security, compensation for occupational costs, or a stronger future bargaining position, household gains may coexist with weakened personal autonomy. Conversely, joint assets, care protections, and transparent budgets can convert cooperative gains into more balanced long-term capabilit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amily therefore cannot ask only whether total resources increase. It must ask how resource growth alters each member's feasible action set. Household income can rise while control, account access, and occupational opportunities become more concentrated, making the resource interface in Equation 3 more asymmetric. If income growth is accompanied by joint ownership, separate accounts, and external supports, economic expansion may instead increase the robustness of autonomy for several members. Aggregat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trol, and control and exit are three analytically distinct levels.

Cooperative conflict also means that family members may genuinely disagree about the "common interest." A high-saving strategy may increase future assets

while reducing current care quality. Occupational investment by one member may increase long-term household income while concentrating short-term time costs on another. Political-economic analysis cannot presuppose an objectively knowable, singular household utility function. It must observe how trade-offs are articulated, who bears opportunity costs, and who can revise arrangements.

This also explains why interpretive power enters economic analysis. If only one person has standing to define "what is best for the family," disagreements over resources quickly become disputes over role legitimacy. Making the formation of common interests explicit links household political economy to power grammar at the mechanism level rather than treating economic resources as an independent background variable.

9.2 Bargaining Position and Resource Structures Outside the Family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household bargaining research is the extension of bargaining power beyond resources located inside the household. Agarwal argues that social norms, ownership of assets, markets, communities, and state institutions all affect bargaining within households and that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sitions interact (Agarwal 1997). "Exit options" therefore cannot be treated as fixed constant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public housing, social security, migration status, kin networks, and legal remedies all alter the bearable cost of refusing a proposed arrangement.

Let $O_i(t)$ denote the external supports available to agent i, and let Z_t denote social norms an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 conceptual relation for practical bargaining position is given in Equation 17.

$$\mathcal{B}_i(t) = F(\mathbf{A}_i(t), O_i(t), Z_t, h_t) \tag{17}$$

The function F is not assumed to be known. The purpose of Equation 17 is to make explicit that bargaining within families is not determined by current income alone. Relational history, external alternatives, normative expect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rights jointly influence whether saying "no" can have practical effect.

This also helps explain how policy can indirectly reshape family power. Public child care can expand employment options for caregivers. Independent social-security entitlements can reduce single-point dependence on a partner's income. Affordable transport and digital access can enlarge external networks. Property and inheritance rules affect control over assets. Public institutions need not directly "manage the family" in order to change internal power grammar; they can do so by expanding the practical options of family members.

At the same time, external resources do not automatically produce more equal relationships. Higher income may be absorbed into an existing structure of control,

and public benefits may still be managed through the same family node. Political-economic analysis must therefore return to the levels of control and robustness developed earlier. A resource changes bargaining position only when an agent can actually access and use it and can retain it under conflict.

Resources "outside the family" also include reliable in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One person may have income but know little about legal entitlements, available benefits, or contractual options. Another may have less income but stronger bargaining capacity because of professional networks and procedural knowledge. Outside options are therefore both material and epistemic sets. Linguistic capital and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influence which options can be seen and acted upon.

Social norms can also change the usability of external resources. Occupational, residential, or care options may exist in the market yet carry substantial social costs because of stigma, identity obligations, or community sanctions. Political economy that records only monetary prices will underestimate these exit costs. Empirical work should therefore consider institutional, social, and symbolic costs together.

9.3 Social Reproduction, Care, and Invisible Value

Families do not merely consume market income. They produce large amounts of non-market value required for social life: caring for children, older persons, and people who are ill; maintaining housing and daily routines; supporting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development; performing emotional labour; and sustain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Folbre's analysis of the cost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emphasize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care costs among families, markets, and the state is a political-economic issue rather than only a matter of private choice (Folbre 1994). This perspective expands the range of objects included in the article's concept of value boundaries.

If analysis records only monetary flows, unpaid care can appear as a valueless background condition. If analysis records only contributions, it can in turn miss the affective and non-contractual nature of care. The article therefore does not argue that all household labour should be marketized. It requires, instead, that analyses of resources, power, and value disposition recognize the structural effects of non-market contributions. Long-term caregiving can reduce the caregiver's wages, seniority, and pension while increasing the time available for other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paid work. Even when no one prices each hour of labour, these allocations of time reshape future resource interfaces.

Social reproduction also explains why "who receives income" and "who creates value" do not always coincide. Market wages price only some tradable activities, while support, care, and risk bearing within families can jointly contribute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ncome is generated. Analysis of value boundaries must therefore distinguish ownership from claims based on contribution. Contribution does not automatically confer unilateral powers of disposition, but persistent exclusion of

long-term contribution from common decision making or security creates a political-economic distributive issue.

Social reproduction also has an intergenerational dimension. Educational support, patterns of care, language learning, social networks, and transfers of assets all affect the capacitie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to enter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trafamilial resource allocation therefore affects not only current members but potentially the opportunity structures of future generations. The article does not develop a full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but this fact identifies a long-term channel through which family power and public justice are connected.

The invisibility of care value can also be produced by systems of measurement. Market statistics record wages and assets more readily than standby time, emotional support, household coordination, or foregone occupational opportunities. Research relying only on monetary data will therefore systematically understate some contributions. Qualitative event records and time-use data are important complements to political-economic analysis.

9.4 The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Assets, Time, and Institutional Rights

Family power is strongly cumulative. Wage differences become asset differences; asset differences affect housing and credit; occupational interruptions affect future income and pensions; long-term responsibility for ex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procedures generates procedural knowledge. Short-term divisions of labour can therefore become long-term structures even when initially chosen voluntarily. Power analysis must attend not only to consent at the starting point but also to whether an arrangement creates new dependencies that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reverse over time.

This political-economic dynamic can be connected to Equation 7. Market and institutional outcomes change the next-period relational state, and that state then affects the next round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 person who leaves the labour market to provide care, for example, may have fewer external alternatives, making the continuation of care appear increasingly “reasonable” within the household. The process is not merely a change in preferences. It can be a path dependence produced by earlier divisions of labour. Social security, re-entry support, and shared asset arrangements can reduce such cumulative lock-in.

This is also why the article does not reduce internal family justice to approximate equality in current consumption. Long-term autonomy depends more on assets, skills, institutional status, time, and recoverable occupational capability. Political economy therefore adds an intertemporal interpretation to the autonomy vector: today’s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changes who tomorrow can make effective objections, who can exit an arrangement, and who can cooperate independently with third parties.

Intertemporal accumulation also means that "it was voluntary at the beginning" cannot alone demonstrate that a long-term structure remains legitimate. An agent may initially accept a division of labour on the basis of the information and shared goals then available, but as assets, skills, and care burdens diverge, the capacity to renegotiate may weaken. If the original arrangement lacks periodic review 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early consent can be incorrectly extended into authorization of all future consequences.

Conversely, institutions can actively reduce cumulative lock-in through shared asset accumulation, pension arrangements for caregivers, support for occupational re-entry, skill renewal, and transparent long-term financial planning. Such mechanisms do not eliminate household specialization. They reduce the likelihood that specialization will become an irreversible difference of status in the future.

9.5 Linguistic Capital, Administrative Labour, and Institutional Mediation within the Famil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amily includes a form of labour that is easily underestimated: translating family needs into language that institutions can process. Completing school, medical, banking, tax, migration, or organizational forms; understanding contracts and policies; communicating across languages; preserving digital records; and negotiating with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all require time, knowledge, and linguistic capital. Bourdieu's analysis of linguistic capital (Bourdieu 1991) and the work of Irvine and Gal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Irvine 1989; Gal 1989) show that these abilities are both cultural resources and media through which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opportunities are accessed.

This "administrative labour" has real value. A person able to navigate complex institutions may bear substantial invisible time costs and secure educational, welfare, financial, or occup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household. An analysis of justice cannot notice only the interpretive advantage that may follow and ignore the underlying contribution. The more complete question is whether this labour is collectively recognized, whether it can be learned, shared, and substituted, whether important information is jointly preserved, and whether the administrator's knowledge advantage is converted into decision authority beyond what the task itself requires.

Where administrative and linguistic capacity cannot be shared, the family acquires an institutional mediation node. Other members' external rights and resources must pass through that node in order to be visible and usable. Political economy then becomes coupled with interpretive power. The person who commands institutional language controls not only information but potentially when it is transmitted, how it is categorized, and which options are represented as realistic. Such mediation can be entirely benevolent while still creating structural vulnerability, because if the node fails, enters into conflict, or selectively filters information, other members' institu-

tional accessibility can collapse rapidly.

Public institutions can directly reshape this mediation structure. Clear language, accessible design, multilingual service, direct personal access, agency arrangements that are delegable but revocable, and digital records that can be shared and audited all reduce the degree to which a family must depend on a single "translat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is therefore not an additional cultural topic. It is part of the model of family resources, exit, and autonomy.

9.6 The Interface between Political-Economic Structure and Power Grammar

Taken together, political-economic conditions enter power grammar through at least four pathways. First, they alter alternatives and hence the costs of refusal. Second, they alter control over resources and hence decision interfaces. Third, they alter the visibility and recognition of contribution and hence interpretive interfaces. Fourth, they alter access to public support and remedies and hence rule and exit interfaces. "Communication styles" within families therefore cannot be studied separately from external resource structures.

This conclusion also limits the article's normative claims. Better communication alone cannot always improve relationships if housing, labour, status, and care institutions continue to generate extremely high exit costs, because the room for negotiation within the relationship is itself structurally constrained. At the same time, institutional reform cannot automatically resolve particular 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ules inside a relationship. Macro-level political economy and micro-level power grammar condition one another and need to enter the explanatory model together.

More specifically, the same macro-institution can produce different effects across families because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still have to pass through relational interfaces in order to be used. The same family grammar can also weaken or intensify as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hanges. The article therefore rejects one-directional reduction. Family power cannot be completely reduced to capital, income, or state institutions, but neither can it be completely reduced to communicative habits or individual psychology. The object of analysis is precisely the conversion mechanisms across these levels.

This yields a clear question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When external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are similar, which relational rules cause resource differences to be converted more strongly into decision authority? When relational rules are similar, which public institutions substantially reduce exit costs or improve robustness of autonomy? Such two-directional comparisons more closely correspond to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developed here than the search for an overall effect of either "family culture" or "economic resources."

Feedback can also run from the micro to the macro level. Intrafamilial divisions of care influence labour supply. Large numbers of similar household choices can, over time, reshape employment institutions, demands for public service, and social norms. Those macro changes then return to households. The present framework treats macro institutions primarily as external conditions, but this feedback suggests that later political-economic research could analyse families as nodes of institutional reproduction rather than as terminal receivers of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This also defines limits for policy analysis. Expanding public services or legal protections may improve outside options but cannot guarantee that contestable grammars automatically form inside families. Relational education or communication interventions may improve interpretive structures but cannot replace housing, income, or status security. Interven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target different mechanisms and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substitutes.

10 Value Boundaries, Structures of Authorization, and Intermediary Transfers

This section examines the disposition of value within private relationships. Family life inherently includes common expenditure, gifts, unpaid car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shared assets, and non-monetary contributions. The fact that value is transferred therefore has no normative implication by itself. Philosophical work on exploitation likewise shows that a judgment of exploitation requires conditions stronger than the fact that someone benefits, commonly involving fairness, vulnerability, consent, or wrongful advantage-taking (Wertheimer 1996; Sample 2003). The analysis therefore focuses on the **authorization structure** of value flows.

10.1 Value Objects and Sets of Authorization

Let agents S and B create, hold, or dispose of value V_{SB}^{C} under arrangement C. Value may include monetary income, asse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ta, reputation, opportunities, time, representational authority, and other interests capable of disposition. Let $\mathcal{M}_C$ be the set of value channels authorized by the arrangement. Whether a value flow m lies within the authorized set is tested in Equation 18.

$$m \in \mathcal{M}_C \tag{18}$$

If the answer is yes, it remains necessary to ask whether authorization is valid, its scope is clear, it can be revoked, and adequate records exist. If the answer is no, the channel warrants more intensive scrutiny rather than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as unjust.

Value objects themselves also require a distinction between legal entitlements and relational claims based on contribution. Wages, asse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

account balances may have clearly identified legal owners, while care, time investments, opportunity costs, and shared reputation within common life can generate different moral or political-economic claims. The article does not attempt to convert all such claims into property rights. Instead, any analysis of value flows should specify whether the issue is ownership, authority of disposition, recognition of contribution, or distributive justification within a common life. The four cannot substitute for one another.

The distinction matters because the proposition “I contributed to this value” does not automatically entail “I may dispose of it unilaterally.” Conversely, “the law assigns this value to one person” does not mean that other members’ long-term contribution is normatively irrelevant. The task of value-boundary analysis is to separate sources of entitlement so that disputes can be organized around specific authorities rather than compressed into a global question of who “deserves more.”

Values also differ in reversibility. A transfer of cash may be traceable and returnable. Disclosure of private information, transf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bandonment of an occupational opportunity, or a public commitment made on another person’s behalf may be difficult to reverse. The strength of boundaries should therefore correspond to the type and reversibility of the value involved. The less reversible the value, the stronger the ex ante requirements of explicit authorization and record keeping.

Some value objects also involve overlapping rights held by several persons. Joint creations, reputation produced through shared care, family data, or joint accounts do not always fit a simple division between “mine” and “yours.” Such objects require procedural rules regarding acces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level of joint decision needed for major dispositions. Clear procedures may fit their relational character better than an attempt to identify a single owner.

10.2 Four Types of Value Flow

The purpose of Table 3 is to distinguish sharing from extraction. Common family life allows boundaries to remain flexible. The normative problem arises when flexibility is unilaterally converted into resource interfaces that are invisible, irrevocable, or unaccountable.

The four types can also transform into one another. Common pooling may require renegotiation as income structures change. A gift tied to continuing demands of obedience may gradually lose its voluntary character. Authorized management can become de facto control if it expands while the authorizing party loses access to information. Value boundaries are therefore not one-time classifications. They are state judgments that need to be updated as relational history changes.

A political-economic perspective also requires both monetary and non-monetary value. Care, time, data, social capital, and occupational opportunities can be persis-

Table 3: Types of value flow in family relations

Type	Typical structure	Principal conditions for discrimination
Common pooling	The parties agree in advance to place part of income, time, or assets into common uses	Rules are knowable, scope is clear, and all parties have a role in determining common uses
Gift or support	One party voluntarily transfers value to another or to the family as a whole	Voluntariness, knowledge, absence of hidden conditions, and distinguishability from compelled transfer
Authorized management	One party manages accounts, assets, contracts, or affairs on behalf of another	Explicit or reasonably inferable delegation, bounded authority, records, revocation, and audit conditions
Unauthorized intermediary transfer	A third party uses relational position to enter a value channel outside the prior arrangement	Insufficient knowledge, missing authorization, difficult revocation, opacity, and weak traceability of responsibility

tently redistributed without passing through an account. Value boundaries therefore concern not only "where the money went," but also who can decide how time is used, who bears opportunity costs, and who receives external reputational or institutional benefits generated through common life.

The four types also carry different default structures of proof. Common pooling can often rely on stable practice, but substantial changes in use require renewed explanation. The central issue in gifts is voluntariness and the absence of hidden exchange conditions. Authorized management requires the manager to be able to explain the source of authority and preserve records. Unauthorized intermediary transfers require stronger ex post verification precisely because they fall outside established channels. Applying one rule to every type would either over-formalize family life or under-protect significant interests.

Interpretive power also matters in classifying value flows. Naming a transfer a "family duty," a "loan," "management," or a "shared expense" carries different implications of authority. Researchers should track whether labels correspond to actual control rather than accepting participants' initial descriptions uncritically. Where necessary, legal ownership, factual flows, and relational narratives should be recorded separately.

10.3 A Conditional Set for Risk in Intermediary Transfers

If a third party A creates a channel m_A through relational position, the article describes its risk using five conditions. The risk vector is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19.

$$\mathbf{B}(m_A) = (K, A, R, T, Q) \tag{19}$$

Here K is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A the quality of authorization, R revocability, T traceability, and Q access to accountability. Risk increases as knowledge, authorization, revocability, trace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decline. The five conditions are neither simply added nor assumed to carry equal weight.

Where $m_A \notin \mathcal{M}_C$ and several boundary conditions remain persistently weak, the situation can be described as a **risk of unauthorized intermediary transfer**. A stronger judgment of "exploitation" is appropriate only where additional normative elements such as taking unfair advantage, harm, unfairness, or coercion are established. This layering helps avoid misclassifying family gifts and shared-resource arrangements as extraction.

A distinction is especially needed between "lack of formal authorization" and "lack of effective authorization." Ordinary household affairs rarely involve a separate signed authorization for every act. Long-standing common practice can create reasonable implied authorization, but implied authorization must still have an inferable scope and cannot expand indefinitely merely because a relationship is intimate. Assessing effective authorization therefore requires attention to adequacy of information, the reality of choice, disproportionate costs of refusal, and the ability to revoke or revise the arrangement afterwards.

Value-boundary analysis does not therefore require the contractualization of family life. It requires increasing clarity for channels that concern high value, low reversibility, or third parties. The closer an activity is to routine common consumption, the more appropriately it may rely on convention. The closer it is to major asset disposi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al funds, or third-party contracts, the stronger the case for explicit authority and records.

The five conditions can also distinguish a flaw in a particular authorization from structural capture. One transfer made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may be repairable through later explanation and confirmation. If the same person repeatedly lacks knowledge, cannot revoke, and cannot verify records, the problem is no longer a single procedural mistake and more closely resembles a stable absence of boundaries. Time sequence is therefore central to judging the intensity of risk.

Accountability Q does not mean punishment. Effective accountability first means that someone must explain what occurred, what authority supported it, how losses will be addressed, and how future rules will be revised. If accountability is available only through the extreme options of ending the relationship or initiating litigation, ordinary capacities for correction are weak. Better structures provide proportionate channels for explanation and repair.

10.4 Value Boundarie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Power

Value transfers can alter future positions of power. If an unauthorized channel increases a third party's control over resources, information, or exit conditions, the

feedback mechanism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20 may arise.

$$\text{transfer of } V \longrightarrow \text{stronger } R, X \text{ interfaces} \longrightarrow \text{shift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 \mathcal{G} \longrightarrow \text{later transfers be} \tag{20}$$

Equation 20 is a mechanism hypothesis, not an inevitable cycle. Empirical evidence is required for each edge. Its analytical value is to distinguish a one-off dispute about interests from a structure capable of reinforcing itself.

The reproduction of power can also occur outside monetary domains. A person who repeatedly handle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filtering accumulates procedural knowledge and social networks. If other members remain outside those processes over long periods, they may becom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even when nominal resources do not change. Similarly, long-term unpaid care can reduce employment and professional networks for the caregiver and thereby worsen exit conditions. Value boundaries and autonomy formation thus interact in both directions: autonomy affects the ability to protect value boundaries, while value flows reshape future autonomy.

This dynamic is also the key to connecting family problems to organizational ethics. If private networks already contain opaque interfaces to funds, information, or representational authority, similar conversion logics may enter entrusted resources once an agent assumes an organizational role.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needs to identify interfaces before losses occur rather than waiting to attribute moral blame afterwards.

Reproduction operates not only through resource accumulation but also through the naturalization of norms. Repeated transfers may cease to appear as exceptions requiring authorization and become understood as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done.” Once a practice has this default status, refusal bears an additional burden of explanation. Power grammar thus connects economic and interpretive cycles: resource outcomes alter next-period narratives of standing, and narratives of standing shape later flows of resources.

Interrupting reproduc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require dismantling all common arrangements. Smaller institutional changes such as independent records, periodic confirmation, caps, joint access, and third-party review may reduce self-reinforcement. Future empirical work can examine whether these light mechanisms are sufficient to alter the grammar or whether stable change requires deeper restructuring of resources.

11 Spillover of Private Networks into Organizational Roles

Family power structures acquire public-ethical significance when an agent enters a role carrying responsibilities to third parties. The article does not claim that private pressure automatically disqualifies an agent from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The analytical object is **whether private networks possess practical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y can penetrate role interfaces, and whether those channels are constrained by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s**.

11.1 Role Authorization and Sets of Interfaces

Let organization O confer on agent S the capacities attached to role R. Let $\mathsf{M}_{O,R}$ be the authorized set of role powers and $\mathsf{U}_{S,R}$ the set actually exercised. The basic integrity condition is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21.

$$\mathsf{U}_{S,R} \subseteq \mathsf{M}_{O,R} \tag{21}$$

Role interfaces may include resources, information, judgment, signatures, procurement, representation, recruitment, data access,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ird parties. A private relationship is not itself a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relevant question is whether private interests or private influence channels are positioned to alter primary role duties inappropriately. The conflict-of-interest literature has long treated this as a structural risk rather than merely a question of moral character (Thompson 1993; Davis and A. Stark 2001).

The structure is analogous to the earlier analysis of family relations. Within families, one must distinguish “being a relative” from “what authority follows from that status.” Within organizations, one must likewise distinguish “having a private relationship” from “whether that relationship can enter role interfaces.” If an organization relies only on employee self-restraint without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authority, recusal procedures, and mechanisms of review, it individualizes what is partly an institutional problem. Good institutional design, by contrast, can permit complex private relationships to exist while reducing their capacity to penetrate interests owed to third parties.

From a jurisprudential perspective, entrusted roles also contain a principle of role separation. A person may simultaneously hold familial, friendship, commercial, and public identities, but resources associated with each identity can be used only within the corresponding scope of authorization. Extending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judgment, or representational authority naturally to private networks obscures the basic question of who entrusted the power in the first place.

Role separation also has implications for justice.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are

often not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office holders. They are entrusted for particular purposes by members, donors, clients, shareholders, publics, or other third parties. If private networks can bypass organizational authorization and obtain privileg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opportunities, or resources, unconnected third parties may bear asymmetric costs. The issue therefore concerns not only whether an individual remains independent but also whether opportunities and burdens within an organization a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public or articulated rules.

Linguistic and interpretive interfaces can spill over as well. A person with representational authority can name problems, interpret data, and define external objects in the organization's voice. If private networks can shape that naming while the organization lacks a record of the influence, power can move through language before any financial transfer occurs. Fiduciary integrity thus protects not only assets but also interpretive authority, representa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procedures through which official records are produced.

11.2 Spillover Channels and Risk Stratification

Let A be a node in a private network and $\mathcal{J}_R$ the set of interfaces associated with role R. The spillover-channel mapping is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22.

$$\pi_A : A \longrightarrow \mathcal{J}_R \tag{22}$$

Three states need to be distinguished: **pressure exists**, **a channel exists**, and **role capture**. Pressure means only that an agent faces requests, expectations, or conflict arising from private relationships. A channel exists when a private network can access particular role resources. Role capture requires that private influence persistently alters role judgment, resource use, or representational action without adequate organizational control. The ethical and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of these states differ substantially.

Risk assessment requires at least four dimensions: interface sensitivity S_R, accessibility of the private channel A_R, organizational visibility V_R, and behavioural reversibility R_R. The article uses only ordinal comparison. A combination of high sensitivity, high accessibility, low visibility, and low reversibility requires stronger controls. This avoids the false precision of uncalibrated numerical scoring.

The four dimensions can compensate for one another. A highly sensitive interface may present relatively low capture risk if every action requires multiple approvals and produces an auditable log. A less sensitive interface under the invisible control of a single person may present greater practical vulnerability. Similarly, high private-channel accessibility does not automatically imply wrongdoing because visibility and reversibility may substantially reduce risk. Governance should therefore move away from asking "does this person have a complicated family situation?" and toward ask-

Table 4: Governance interfaces for spillover from private networks

Risk interface	Possibl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Principal purpose
Funds and assets	Dual signatures, limits, separation of duties, periodic reconciliation	Reduce single-point powers of disposition and preserve records
Sensitive information	Least privilege, access logs, classified authorization	Reduce unauthorized access and invisible dissemination
Procurement and contracts	Relationship disclosure, competitive procedures, independent review	Reduce opaque effects of private ties on transaction conditions
Re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ounded authorization, official channels, meeting records	Distinguish personal views from organizational authorization
Recruitment and opportunities	Structured criteria, recusal, multi-person review	Reduce non-transparent effects of relational networks on allocation of opportunities
Highly irreversible decisions	Delayed confirmation, dual control, escalated approval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correction at high-loss interfaces

ing “which interfaces permit which conduct under which conditions?”

This structure also reduces risks of discriminatory exclusion. Family background, nationality, marital status, or complexity of private relationships are crude proxies. They can both overexclude and fail to identify actual vulnerabilities in interfaces. Institutionalized permission design, disclosure, and audit allow judgment to focus on observable role conduct rather than identity.

Risk stratification should also consider the distribution of losses to third parties. Some roles may involve small amounts of money but highly sensitive personal data or decisions affecting vulnerable populations. Others may involve large amounts of money but operate under automated limits and intensive audit. Interface sensitivity should therefore be determined jointly by the type of loss, scope of impact, and reversibility rather than by rank or monetary value alone.

Private influence may also enter through “advice” without formal access. Relatives need not log into an organizational system in order to shape role judgment; they may continually propose candidates, provide information, or supply interpretations.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should therefore attend to transparency about sources of judgment, especially in procurement, recruitment, partnership selection, and external representation where discretion is high.

11.3 Institutional Insulation and Fiduciary Integrity

Organizations can reduce spillover through least privilege, separation of duties, dual approval, information barriers, disclosure of relevant interests, recusal, transaction records, independent review, anomaly monitoring, and stop mechanisms. The central principle is that organizational systems should perform the work of insulation rather than requiring individuals to resist relational pressure through willpower alone.

Table 4 shows that the complexity of private relationships is not itself a reason

for exclusion. Governance should institutionally separate sensitive interfaces from private networks.

Institutional insulation should also be related to proportionality. Low-risk tasks do not require controls of the same intensity as high-risk disposition of funds; otherwise organizations create excessive administrative costs and can undermine ordinary trust. Highly irreversible interfaces justify stronger dual control and record keeping. Governance design must balance risk prevention,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respect for private life.

Institutional design should not wait for a conflict of interest to occur before imposing sanctions. Ex ante design can reduce the moral burden placed on individuals. Clear channels for related-party disclosure, accessible recusal procedures, available ethics advice, and automated permission limits make it easier for an agent to maintain role integrity when private pressure arises.

Insulation also should not shift all responsibility onto disclosure. Disclosure makes a risk visible but does not itself remove bias. At certain high-risk interfaces, separation of duties, recusal, or independent approval matter more than a decla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Conversely, excessive insulation can obstruct normal cooperation. Control intensity should match interface risk.

From a jurisprudential perspective, these mechanisms together implement **explainability of authority**: an organization can state who received which authority, why it was conferred, who can review its use, and when it terminates. Such a structure protects both third parties and role holders because private networks cannot easily reinterpret personal ties as organizational authorization.

11.4 Progressive Assumption of Roles

The earlier principle of progressive controllability has an organizational analogue. An agent can initially assume tasks with clearly bounded authority, auditability, reversibility, and low spillover. Responsibility can expand as boundary-maintaining capacities and institutional insulation become stable. “Progressive” must not mean shifting risk onto smaller organizations, vulnerable third parties, or low-visibility positions. Basic fiduciary integrity is required regardless of the size of a role.

Progressive role assumption is therefore a form of permission engineering rather than an identity judgment. Organizations can build learning, supervision, and expanding responsibility into role design so that stable practice develops in an observable environment. Such design may benefit any organizational member and does not require family relationships to be treated as a special label.

More importantly, organizational ethics and individual autonomy are not zero-sum. Clear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protect the organization while also protecting the agent from private demands to use powers the agent does not truly possess. When the agent can point to clear organizational rules, dual-signature requirements, or in-

formation barriers, refusing a private request no longer depends entirely on personal willpower. Institutions thereby become external supports for autonomy.

Progressive arrangements also need explicit conditions of exit and escalation. If an agent repeatedly demonstrates stable records, proper disclosure, and boundary maintenance at an interface, supervision can decline according to institutional rules. If new private channels, related interests, or irreversible responsibilities appear, controls can increase again. Progression is therefore not a linear promotion narrative but a continuing matching of authority to risk.

The model can also be used in general organizational design beyond family spillover. Any private network capable of influencing role independence, including business partners, friends, mentors, or other close relationships, can be analysed using the same principles of interfaces. The family is simply the starting case in this article.

12 Relational Reconstruction, Constrained Power, and the Decentring of Power

The normative direction of the article is not to transfer power from one party to another. It is to enable relationships gradually to rely less on the question "who can force an outcome?" Power capacities are difficult to eliminate entirely from complex relationships. The key issue is whether those capacities are constrained by boundaries, procedure, and reciprocal possibilities of contestation.

12.1 A Minimum Structure of Constrained Power

The article describes a less power-centred relationship as one satisfying several minimum conditions: neither party can easily determine the other's basic life trajectory unilaterally; changes to key rules have reasons and procedures; important facts can be verified independently; dissent does not automatically trigger punishment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matter in dispute; authorization can be explained and revoked under reasonable conditions; exit or suspension is realistically possible; and shared-resource arrangements preserve records and accountability.

These conditions do not require equality of resources. A family can contain large differences in income, care roles,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while maintaining substantial transparency of rules and constraints on authority. Conversely, similar formal resources do not guarantee symmetry in interpretive authority, norm-modifying power, or exit costs.

"Constrained power" also does not mean that every decision must be negotiated until complete agreement is reached. Complex shared life requires delegation, specialization, and rapid decision making. The critical questions are who may decide what and how that authority can be reviewed. One person may have greater operational authority in a particular domain if its source is clear, its scope is bounded, and

it does not automatically become a general entitlement to dominate other domains.

This structure is closer to the intuition of non-domination than to absolute equality. Participants may hold different resources and roles but should not remain subject to another person's arbitrary capacity to alter their basic life conditions. Pettit's theory of non-domination places the core of freedom in whether a person is subject to another's arbitrary power rather than merely in whether interference has already occurred (Pettit 1999). The article does not treat republican theory as a complete ethics of family relations, but this structural intuition explains why simply reducing actual interference may still be insufficient.

A non-domination perspective also directs attention to **control over controlling capacities**. If the stronger party promises "I usually will not use this power" while remaining free to change the rules at any moment, the weaker party still has to organize life around that possibility. Genuine decentring therefore converts promises of goodwill into enforceable boundaries: joint signatures, independent access, explicit scopes of authorization, third-party review, and realistic exit options. Relational freedom then depends partly on structure rather than entirely on personal restraint.

At the same time, non-domination cannot exclude care and dependence. Caregivers may need extensive decision capacity in emergencies, and children or persons with limited capacity may require agency. The relevant question is whether authority is proportionate to protective purpose, current capacity, and temporal conditions, whether it contracts as capacity changes, and whether there are reviewable structures of responsibility. Proportionality links non-domination to relational autonomy rather than to an abstract ideal of absolute independence.

12.2 Growth in Capacity and Non-Dominating Choice

Building economic, institutional, epistemic, and relational capabilities has a double effect. It raises the capacity to resist unauthorized intervention, and it also makes **not using domination to resolve conflict** a more realistic option. Where an agent is wholly dependent on a single node, every disagreement can be experienced as existential. Once a minimum floor of autonomy is secured, the costs of failed negotiation decline and both sides may be more able to tolerate genuine dissent.

This differs from an account that understands power solely as domination. Allen's analysis reminds us that power also has dimensions of empowerment and collective capacity (Allen 1998). The article therefore treats the endpoint of autonomy formation as **expansion of negotiable space**, not maximization of either party's capacity for control.

The distinc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hen the weaker position gains capacity. Independent income, institutional status, or legal knowledge acquired to protect one's boundaries may temporarily appear as greater bargaining strength, but the normative objective is not reverse domination. Whether a relationship improves depends

on whether new capacities stabilize boundaries, increase contestability, and reduce single-point dependence or are used to reproduce the previous arbitrariness of rule making.

Relational reconstruction should therefore be evaluated through institutions and grammar rather than simply by asking whether "power has become more equal." A relationship may narrow the power gap yet remain highly adversarial, unpredictable, and punitive. Another may retain resource inequalities while becoming less dominating because authorities are tightly constrained.

Capacity growth also needs protection against a "security dilemma." If each side interprets the other's growing capacity as a threat, any effort to build autonomy can trigger preventive control and an escalatory cycle. Avoiding this outcome requires capacity growth and boundaries of authority to become transparent together. A separate account need not imply hidden assets, external networks need not signify abandonment of the family, and organizational rules need not express hostility. Change in interpretive frames is therefore as important as change in material capacity.

Theories of justice provide a directional constraint: capacity growth should first repair minimum standing, choice, and non-domination rather than pursue unlimited advantage. Once an agent has sufficient boundaries, additional capacity to control others cannot be justified simply by invoking "autonomy." This prevents autonomy from becoming a general license for accumulating resources of domination.

12.3 Rewriting Grammar and Rebuilding Trust

Decentring power requires changes in the conversion rules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6. Reasons, authorization, evidence, deliberation, and procedure gradually acquire greater effectiveness, while bare position, resource threats, and exit costs become less decisive. The change must be established through repeated events that generate a new relational history h_t. One promise is insufficient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structure has changed.

Figure 2 represents a possible positive cycle rather than a fixed stage model. Real relationships may regress, stall, or change in a different order. Empirical validity requires longitudinal study.

Rewriting grammar also requires symbolic change. Boundary claims once understood as "disloyal," "unfilial," or a "rejection of family" may gradually be reinterpreted as ordinary management of authorization. Where previously only position or resources made claims effective, evidence, procedure, and shared rules may later provide practical force. Such changes usually cannot be achieved by abstract declarations of values alone. They must be verified through repeated concrete events.

From a political-economic perspective, external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also influence whether the cycle can be sustained. Sudden loss of income, housing, or legal status can increase exit costs and rest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older grammar. 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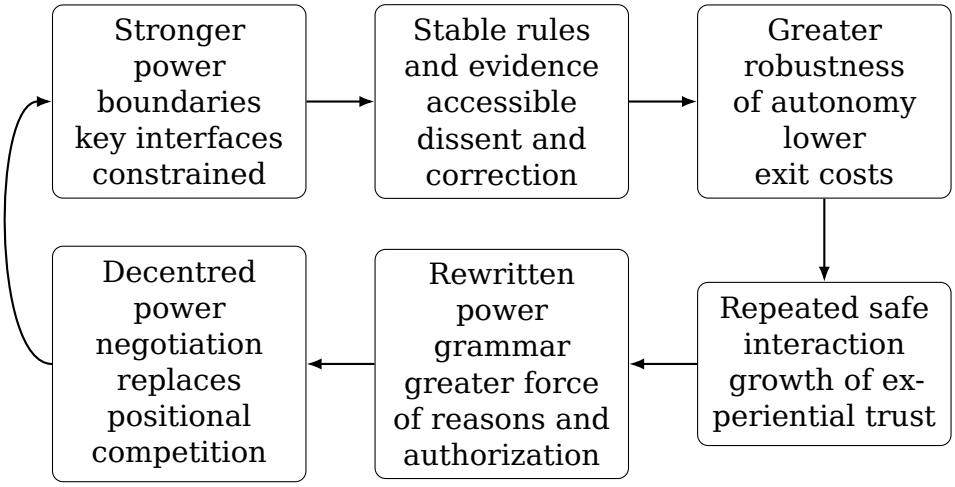

Figure 2: A cyclical mechanism of relational reconstruction: boundaries, rules, autonomy, trus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lational reconstruction is therefore not a one-time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but a dynamically stable state requiring simultaneous material, institutional, and normative support.

From a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rewriting grammar also requires a new shared narrative. If an older order repeatedly describes one member as the "natural person in charge" or another as "someone who needs to be managed," changes in account permissions alone may not alter assumptions of standing in other domains. New rules need to generate new narrative evidence through repeated practice: who can independently carry out tasks, who respects boundaries, and whether disagreement can actually occur without destroying the relationship.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hange in meaning thereby reinforce one anoth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further implies that reconstruction should reduce monopolies over institutional language. Key rules should be intelligible to all relevant agents, and important external institutions should ideally permit direct access and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Otherwise new formal rules may still have to operate through the old interpretive node, leaving grammatical change on paper rather than in practice.

13 Analytical Propositions, Operationalization, and Empirical Testing

This section translates the preceding concepts into researchable propositions. Their purpose is to increase falsifiability, not to present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s if it had already been empirically validated.

Analytical Proposition 1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terfaces) *Other things being approximately equal, the more decision, interpretation, norm modification, key*

resources, and exit interface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same relational position, the more likely a single disagreement is to alter several domains of life for the weaker position rather than only the issue in dispute.

Empirically, research can compare the frequency of "single-domain conflicts" with "cross-domain consequences," for example whether financial disagreement repeatedly extends into housing, occupation, social relations, or access to informatio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include shared crises, resource scarcity, or changes in external institutions.

Analytical Proposition 2 (Grammatical conversion) *Where the structure of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is driven primarily by position, resource threats, and exit costs, claims with similar substantive reasons will systematically produce different practical consequences depending on the relational position of the person making them.*

Testing requires controlling for differences in claim content and context and observing whether the same type of boundary statement is processed differently when advanced by different agents.

Analytical Proposition 3 (Norm instability and trust exposure) *Where rule modification is weakly predictable and the capacity for contestation is limited, agents may reduce relational exposure in high-risk matters even when they report relatively positive judgments of the other person's goodwill.*

This proposition distinguishes structural trust from character trust and can be examined through scenario experiments, interviews, or longitudinal event records.

Analytical Proposition 4 (The mediating role of epistemic autonomy) *The weaker the channels for preserving facts, comparing interpretations, and obtaining external verification, 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for an agent to identify value flows, changes in authorization, and modifications of rules, thereby increasing interpretive uncertainty in boundary disputes.*

This proposition does not imply that power causes every interpretive conflict. Memory bias, complexit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ve failure are competing mechanisms.

Analytical Proposition 5 (Robustness of autonomy) *Greater availability of autonomy resources is more likely to become an enforceable life boundary when actual control and robustness against interference increase at the same time.*

Income, accounts, or institutional status should therefore be analysed together with access rights, control of credentials, independent information, and alternative support.

Analytical Proposition 6 (Dependence portfolios and single-point failure) *When several critical life domains depend on highly correlated support from a single node, control or failure of that node is more likely to generate cascading destabilization of the overall life order than in a portfolio with independent supports.*

This proposition may draw on methods from network resilience and portfolio risk, but social relations should not be mechanically treated as independent nodes.

Analytical Proposition 7 (Unauthorized value channels) *The weaker the conditions of knowledge, authorization, revocation, trace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surrounding a value channel, the greater the risk that it becomes a persistent source of boundary dispute. Whether it constitutes exploitation still requires additional normative conditions.*

The proposition separates risk identification from final ethical judgment.

Analytical Proposition 8 (Governance of organizational interfaces) *When private pressure exists, the risk of role capture depends more on the accessibility, visibility, and reversibility of sensitive interfaces than on the complexity of private relationships itself.*

This permits organizational design to focus on interfaces rather than identity-based exclusion of people with complex family circumstances.

13.1 Feasible Research Designs

A rigorous empirical study would require at least three types of material. The first is **event-sequence data**: records of rule changes, value flows, consequences of refusal, and interpretive disputes over time, so that mechanisms are not inferred from retrospective global impressions alone. The second is **multi-actor data**: where safety and ethics permit, evidence from different participants, institutional records, and third parties, reducing reliance on a single narrative source. The third is **institutional-background data**: legal status, social security, housing markets, labour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obligations all influence exit costs and feasible autonomy, so cross-case comparison must report and control these backgrounds explicitly.

Research must also address ethical limits. Studies of family power can involve high-risk disclosures, private finances, possible violence, and minors. Data collection must not increase participants' exposure simply in order to "test the model." Interviews, event recording, and third-party verification all require appropriate safety, confidentiality, and withdrawal procedures.

The most informative design may not be a cross-sectional question asking "who has more power in the family?"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event-level data. Researchers could record the topic in dispute, the initial rule, each side's reasons, who possessed

Table 5: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operationalizing core variables

Variable	Observable material	Principal risk of misclassification
Decision interface D	Who can approve, veto, or alter action conditions; practical consequences of refusal	Mistaking professional advice or legitimate guardianship for control
Interpretive interface I	How conflict narratives enter shared records, third-party judgments, and later rules	Mistaking ordinary disagreement for interpretive monopoly
Norm modification N	Frequency, timing, procedure, ex post character, and reciprocity of changes in standards	Mistaking reasonable adaptation for manipulation of rules
Resource interface R	Control over access to accounts, documents, housing, inform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institutions	Ignoring the authorized basis of joint management
Exit interface X	Economic, emotional, institutional, and informational costs of refusal, suspension, separation, or seeking help	Conflating ordinary relational loss with coercive costs
Structural trust $\mathbf{K}$	Rule stability, records of evidence, complaint, correction, and exit mechanisms	Replacing structural conditions with self-reported "levels of trust" alone
Robustness of autonomy $\mathbf{A}$	Resource availability, actual control, and continued usability under external interference	Recording only formal rights or quantities of resources
Value boundary $\mathbf{B}$	Knowledge of channels, authorization, revocation, records, and accountability	Treating family sharing itself as anomalous

stopping or veto capacity, whether the rule changed, which resources were mobilized, how the event ended, and whether subsequent rules were altered. Such data fit the mechanism language of the framework and more directly test the path dependence represented by Equation 7.

Comparative research should select cases in which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can be identified. Differences in housing systems, social security, family law, and labour markets alter external alternatives, so cross-regional comparisons should not attribute every difference to family culture. One strategy is to model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as a second-level background alongside intrafamilial event sequences. Another is to compare different relational configurations within simila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thereby strengthening identification of relational mechanisms.

Qualitative material remains indispensable. Power grammar concerns what reasons actually count within a relationship, and such information often requires interviews, texts, financial records, and reconstruction of events.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can describe concentration, event frequency, and exit costs but cannot by themselves explain why a resource difference becomes decision authority. Mixed methods combining sequence analysis,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and limited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may therefore be especially appropriate.

Finally, research participation should itself be treated as a possible intervention.

Asking about accounts, control, or exit can change participants' interpretations of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may in some circumstances increase risk. Research design should therefore apply greater caution than ordinary family surveys with respect to informed consent, safety planning, data separation, and withdrawal mechanisms.

14 Theoretical Boundaries,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and Limits of Application

This section identifies conclusions that the framework cannot establish on its own. Conceptual rigor derives not only from definitions but also from preserving counterexamples and alternative mechanisms.

14.1 Multiple Sources of Asymmetry

Asymmetry within families may arise from age, responsibilities of care, expertise, income, institutional status, health, migration status, and available time. Some asymmetries have clear functions, including emergency agency and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Research must distinguish **necessary asymmetry** from **expandable and unconstrained power**. The former has boundaries of domain, time, and reason. The latter more readily crosses domains, becomes recursive, and lacks conditions of contestation.

A further distinction is required between "legitimate source" and "legitimate use." Even a capacity with a reasonable initial basis may outlast what is necessary. Conversely, family conventions without a formal source of authority may acquire substantial legitimacy through long-term transparency, reciprocity, and revocability. The source of authority is therefore only a starting point; scope, procedure, and consequences require separate review.

Sources of asymmetry often overlap. Income differences may coincide with linguistic capacity, migration status, or health disparities so that a single resource is amplified by other interfaces. Empirical studies that measure wages alone may underestimate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se interfaces.

Researchers must also observe **compensating asymmetries**. One member may be disadvantaged in income but possess stronger kin networks, expertise, or institutional status. Another may control major assets while depending on the first for care or language. Power within relationships may therefore be multidimensional, intersecting, and sometimes offsetting. The five interfaces should not be compressed into a single-axis ranking, nor should they be used to produce an overall hierarchy of who is "stronger."

Empirical analysis should also distinguish structural position from responsibility for a particular event. Possessing a resource interface indicates potential capacity, not proof that the person caused every conflict outcome. Conversely, an actor with

fewer resources overall may hold decisive authority in a particular domain. Analysis by domain and event is essential to avoid overgeneralization.

14.2 Compatibility of Dependence, Intimacy, and Autonomy

One central insight of relational autonomy is that dependence is not logically incompatible with autonomy. Agents can remain autonomous within deep intimacy, care, and resource sharing where the relationship supports capability formation, expression, and revision (Mackenzie and Stoljar 2000; Nedelsky 2012). The article therefore does not make "independence" the single measure of an ideal family. Distributed autonomy does not seek to eliminate interdependence; it seeks to avoid making every critical condition of life dependent on one irreplaceable point of control.

Dependence may even be a positive condition of autonomy. Education, care, emotional support, and institutional agency can expand capabilities. The key distinction is whether such support is enabling or capturing. Research therefore needs to distinguish "I need another person's help" from "only one particular person can decide whether I receive condition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me." The former is ordinary interdependence. The latter is closer to a risk of single-point dependence.

This limitation also prevents the framework from being read as an individualist programme. Establishing external supports does not require reducing intimacy. It permits intimacy not to carry every function of subsistence. One value of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security lies precisely in reducing irreplaceability within relationships without requiring the destruction of family ties.

Relational autonomy also shows that complete "independence from dependence" is neither feasible nor necessarily desirable. The ability to entrust tasks, receive care, and share resources without fear is an important value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The article asks whether dependence has intelligible boundaries, whether agents can regain control when needed, whether multiple sources of support exist, and whether dependence continues to foster capabilities. Dependence can therefore be a medium of autonomy or a medium of control; the distinction lies in relational structure rather than the intensity of dependence alone.

Likewise, exit capacity does not mean promoting exit. Exit options have normative significance precisely because they can reduce coerciveness within everyday negotiation and make it possible for an agent to voice disagreement without actually leaving. Hirschman's distinction between exit and voice suggests that the two can condition one another (Hirschman 1970). Within families, a structure from which exit is entirely impossible may make "voice" too risky, whereas modest external guarantees can support continuing cooperation inside the relationship.

14.3 Cultural, Institutional, and Life-Course Differences

Family obligations and resource arrangements depend heavily on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Strong social-security systems may reduce the costs of exit. Housing, migration, inheritance, and care institutions alter resource interfaces. Life-course stages matter as well: child-rearing, caregiving, unemployment, migration, education, and retirement redistribute dependence. Any empirical use of the framework must therefore report temporal stage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should not generalize the boundary norms of one society into a universal model.

Cultural difference should not be simplified into a binary of "collectivism versus individualism." Similar intergenerational obligations can be implemented through very different procedures. Some families rely on highly reciprocal common decision making, while others interpret obligation through one-directional obedience. Research should examine how duties are negotiated, who can propose exceptions, and whether obligations are reciprocal rather than inferring the nature of power from cultural labels alone.

Life-course analysis likewise needs to be dynamic. The autonomy space of younger members normally expands with age, while old age or illness may increase needs for agency again. An authority structure that is justified at one stage may become unnecessarily restrictive if it does not adjust as capacities change.

Linguistic and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s also change across the life course.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study abroad, retirement, and digitalization can suddenly make previously marginal linguistic capital a critical interface. Conversely, a member who learns over time may reduce a prior dependence on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should not treat a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 or administrative labour at one moment as a permanent identity. They should ask whether it can be learned, substituted, and redistributed.

Cultural explanation likewise needs to avoid essentializing normative differences. Concepts such as filial obligation, loyalty, common property, or family representation carry multiple practical meanings across institutions and families. A hermeneutic method requires researchers to show how these terms are used in concrete relationships, who interprets them, and which action consequences they trigger rather than infer domination or legitimacy directly from cultural labels.

14.4 Limits of Causal Identification

The article proposes a mechanism structure, not a completed causal model. Concentrated interpretive authority may reduce epistemic autonomy, but it may also result from long-standing informational advantage. Concentrated resources may affect rules, or they may be produced by a mutually accepted division of professional labour. Low trust may be caused by power structure, but it may also arise from prior deception, personality conflict, or external pressure. Future research needs tempo-

ral sequences, natural experiments, comparative cases, or multi-method evidence to identify directionality.

Reverse causality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A family member may gain greater knowledge of resources by managing finances over a long period. This could be the result of prior trust and later become a condition of control. High exit costs may reduce trust, while low trust may also lead one participant to concentrate resources in an effort to reduce uncertainty. The mechanism diagrams in the article therefore propose possible pathways but cannot establish direction from cross-sectional correlation alone.

Omitted variables may also be important. Health crises, unemployment, care burdens, macroeconomic shifts, and changes in legal status can simultaneously affect resources and trust. Empirical research should record such common shocks where possible and remain open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power grammar may not supply an independent explanation.

Measurement can itself react back on the object being studied. Interviews may lead family members to reinterpret past events. Legal or psychological vocabulary can alter how they name their relationship. Researchers' questions may increase the salience of particular conflicts. A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therefore treats research material as texts produced within interaction rather than as transparent windows. Qualitative research should record interview conditions, styles of questioning, and changes in narrative. Quantitative work should likewise avoid treating responses elicited through theoretically loaded terminology as naturally occurring states of the relationship.

Finally, the model faces a risk of **theoretical absorption**. If every difference in resources, language, rules, and conflict outcomes can be explained as power grammar, the concept loses falsifiability. Future research must specify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would be rejected, such as cases where marked resource and linguistic differences coexist with highly symmetric authorization and contestation, or where concentrated power interfaces do not produce cross-domain conversion. Power grammar has independent empirical value only if such counterexamples are allowed to stand.

14.5 Separating Conceptual Analysis from Legal Judgment

"Power-oriented structure," "unauthorized intermediary transfer," and "risk of role capture" are analytical concepts. They do not constitute judicial, clinical, or professional-disciplinary conclusions. Legal coercion, misappropriation, conflict of interest, guardianship duties, and fiduciary obligations each have distinct statutory and case-law standards. The framework can identify structures requiring closer examination, but it cannot substitute for factual findings in a particular jurisdiction.

Likewise, "jurisprudence" in the article concerns general questions of authority, procedure, relational autonomy, and private ordering. It does not claim that these

principles have identical legal force in every legal system. Any concrete dispute requires independent determination of applicable law, evidentiary standards, and procedural routes.

Ethical and legal judgments also remain distinct. An arrangement may be lawful yet ethically troubling, or ethically contested without being unlawful. Preserving the distinction reduces conceptual inflation and allows the framework to operate across jurisdictions rather than silently assuming the substantive law of one state.

The framework cannot infer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directly from structural risk either. Responsibility requires knowledge of what information an agent possessed, whether alternatives existed, whether coercion was present, whether consequences were reasonably foreseeable, and whether institutions supplied practicable routes to compliance. Structural analysis can explain how risk arises but cannot determine responsibility without these facts.

The framework is therefore best used as a problem-finding and research-design tool. It indicates which interfaces require evidence, which concepts need separation, and which competing explanations must be considered. Its rigor comes from limiting the range of inference rather than maximizing the strength of conclusions.

The use of theories of justice requires the same restraint. Rawls, Young, Sen, Nussbaum, Pettit, Okin, and theories of relational autonomy differ in important ways. The article has not shown that they can be merged without loss into a single normative system. It uses them to supply distinct diagnostic dimensions: institutional fairness, relational domination, substantive capability, justice within the family, and non-domination. Stronger normative conclusions would require a further account of priority when these theories conflict.

Hermeneut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likewise do not assign responsibility automatically. A person with greater linguistic capital, mastery of a standard language, or responsibility for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may simply be performing additional labour for the family rather than seeking control. Structural risk arises only where such capacity becomes persistently coupled with information closure, irreplaceability, rule modification, and resource interfaces. Theory should increase discriminatory power rather than expand the scope of suspicion.

15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reconstructs power in family relations as a multilayer relational mechanism. The first layer consists of five interfaces of power: decision, interpretation, norm modification, resources, and exit. The second layer is power grammar,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se interfaces and positional differences are converted into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within the relationship. The third layer consists of structural trust, epistemic autonomy, and multidimensional autonomy, all of which are affected by those

conversions. The fourth layer consists of value boundaries and organizational-role interfaces, where private relationships can enter third-party cooperation, entrusted resources, and domains of public responsibility.

This structure allows several common confusions to be separated. Power capacity differs from actual exercise. Exercise differs from outcome. Outcome differs from legitimacy. Family sharing differs from unauthorized transfer. Private pressure differs from capture of an organizational role. Asymmetry differs from domination, and growth in capability differs from growth in domination. These distinctions make it possible to remain analytically sensitive to persistent rule instability, concentration of interpretation, cross-domain control, and exit costs while preserving the complexity of intim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are.

The concept of "power grammar" has a specific and limited theoretical function. It describes how relationships convert position, resources, standing,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osts of refusal into effective decisions. Its value holds only if it can explain phenomena that resource theory, studies of individual decisions, or purely discursive analysis cannot explain by themselves. To that end, the article has specified operational variables, counterexamples,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and empirical propositions.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test whether distinct power interfaces actually form stable couplings, whether grammatical conversion is recognizably similar across cases, how conditions of structural trust interact with character trust, and when distributed autonomy increases resilience or instead raises coordination costs.

Once theories of justice, jurisprudence, hermeneu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amily are added, the theoretical location of the concept becomes clearer. Theories of justice provide evaluative dimensions of resources, capabilities, status, and non-domination. Jurisprudence explains how authorization, procedure, rule stability, and remedies constrain private power. Hermeneutics explains how relational history and narrative participate in constituting the meaning of even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shows how linguistic capital, legitimate expression, and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have real resource effec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amily explains how income, care, assets, time, and external institutions alter bargaining positions. Together these conditions enter the relational state z_t without predetermining concrete interaction outcomes.

Power grammar lies between these background conditions and particular events. It describes how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resources and meaning are converted into effective decisions. It cannot replace resource theory, theories of justice, jurisprudence, or hermeneutics. Its theoretical increment lies only in identifying when these dimensions become structurally coupled. If later empirical research finds that linguistic advantage, resource differences, and normative position do not convert stably into decision outcomes, or that such conversion is fully explained by existing theories, the concept of power grammar should be narrowed or abandoned. This revisability is

part of the theoretical discipline the article seeks to preserve.

Normatively, the article understands autonomy as a relational capacity that allows agents to resist unauthorized intervention when necessary and to enter non-dominating cooperation when conditions permit. The purpose of constraining power is not to eliminate relationships but to make them able to withstand genuine disagreement. The purpose of capability growth is not to allow the weaker position to reproduce previous domination, but to expand the practical space for negotiation, authorization, correction, and exit. When reasons, evidence, authorization, and procedure gradually become the principal sources of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a relationship may shift from persistent comparison of "who has more power" toward a common life in which power is less central.

References

Agarwal, Bina (1997). "Bargai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 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In: *Feminist Economics* 3.1, pp. 1–51. DOI: 10.1080/135457097338799.

Allen, Amy (1998). "Rethinking Power". In: *Hypatia* 13.1, pp. 21–40. DOI: 10.1111/j.1527-2001.1998.tb01350.x.

Baier, Annette (1986). "Trust and Antitrust". In: *Ethics* 96.2, pp. 231–260. DOI: 10.1086/292745.

Blood, Robert O. and Donald M. Wolfe (1960). *Husbands &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 Glencoe, IL: Free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 by John B. Thompson. Trans.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oudhury, Arshia Amin, Natasha Martland, and Olga Luzon (2025). "Women's Experiences of Coercive Control in Intimate Partner Relationships: A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 In: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DOI: 10.1007/s10896-025-00970-6.

Cover, Robert M. (1983). "The Supreme Court, 1982 Term: Foreword: Nomos and Narrative". In: *Harvard Law Review* 97.1, pp. 4–68. DOI: 10.2307/1340787.

Davis, Michael and Andrew Stark, eds. (2001).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the Profess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oso/9780195128635.001.0001.

Emerson, Richard M. (1962). "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1, pp. 31–41. DOI: 10.2307/2089716.

Folbre, Nancy (1994). *Who Pays for the Kids? Gender and the Structures of Constraint*. London: Routledge.

Fricker, Miranda (2007).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8237907.001.0001.

Friedman, Marilyn (2003). *Autonomy, Gender,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0195138503.001.0001.

Fuller, Lon L. (1969).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Gadamer, Hans-Georg (2013). *Truth and Method*. Trans.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Revised.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Gal, Susan (1989). "Lang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8, pp. 345–367. DOI: 10.1146/annurev.an.18.100189.002021.

Habermas, Jürgen (1996).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ns. by William Reh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rdin, Russell (2002).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Heller, Monica (2003). "Globalization,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7.4, pp. 473–492. DOI: 10.1111/j.1467-9841.2003.00238.x.

Hesse-Biber, Sharlene and John Williamson (1984). "Resource Theory and Power in Families: Life Cycle Considerations". In: *Family Process* 23.2, pp. 261–278. DOI: 10.1111/j.1545-5300.1984.00261.x.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rvine, Judith T. (1989). "When Talk Isn't Cheap: Lang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American Ethnologist* 16.2, pp. 248–267. DOI: 10.1525/ae.1989.16.2.02a00040.
Komter, Aafke (1989). "Hidden Power in Marriage". In: *Gender & Society* 3.2, pp. 187–216. DOI: 10.1177/089124389003002003.
Lukes, Steven (2021). *Power: A Radical View*. 3rd ed.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Mackenzie, Catriona and Natalie Stoljar, eds. (2000). *Relational Autonom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utonomy, Agency, and the Social Sel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oso/9780195123333.001.0001.
Mnookin, Robert H. and Lewis Kornhauser (1979). "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Law: The Case of Divorce". In: *Yale Law Journal* 88.5, pp. 950–997. DOI: 10.2307/795824.
Nedelsky, Jennifer (2012). *Law's Relations: A Relational Theory of Self, Autonomy, and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5147964.001.0001.
Nussbaum, Martha C. (2006).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4159/9780674041578.
Okin, Susan Moller (1989). *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Pettit, Philip (1999). *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0198296428.001.0001.
Rawls, John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icoeur, Paul (1992). *Oneself as Another*. Trans. by Kathleen Blam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I: 10.7208/chicago/9780226844541.001.0001.
Sample, Ruth J. (2003). *Exploitation: What It Is and Why It's Wrong*.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Sen, Amartya (1990). "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 In: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Women and World Development*. Ed. by Irene Tink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9).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tark, Evan (2007). *Coercive Control: The Entrapment of Women in Personal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oso/9780195154276.001.0001.
Thompson, Dennis F. (1993).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29.8, pp. 573–576. DOI: 10.1056/NEJM199308193290812.
Walker, Margaret Urban (2006). *Moral Repair: Reconstructing Moral Relations after Wrongdo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17/CBO9780511618024.
Wertheimer, Alan (1996). *Exploit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OI: 10.2307/j.ctv10vm173.
Westlund, Andrea C. (2009). "Rethinking Relational Autonomy". In: *Hypatia* 24.4, pp. 26–49. DOI: 10.1111/j.1527-2001.2009.01056.x.
White, James Boyd (1990). *Justice as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Cultural and Legal Crit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OI: 10.2307/j.ctvcm4g4q.

Structures orientées vers le pouvoir et formation de l'autonomie dans les relations familiales

Grammaire du pouvoir, confiance structurelle,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et éthique organisationnelle

HUANG WANHONG （黄 万鸿）
huangwanhong@serendip.ngo

Résumé

Cet article élabore un cadre conceptuel pour analyser les structures orientées vers le pouvoir dans les relations familiales et examine comment l'autonomie, la confiance, l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et l'intégrité des rôles organisationnels s'articulent dans des conditions d'asymétrie durable du pouvoir. L'objet de l'analyse n'est ni un « type de famille » fixe ni un jugement sur la personnalité ou l'état clinique des membres. Il s'agit d'un ensemble de mécanismes identifiables dans des configurations relationnelles circonscrites : concentration, conversion réciproque et persistance temporelle de la capacité de décision, de l'avantage interprétatif, de la capacité à modifier les normes, du contrôle des interfaces de ressources essentielles et des coûts de sortie. Afin d'accroître la précision conceptuelle, l'article distingue d'abord la capacité de pouvoir, l'exercice du pouvoir, le contrôle des résultats et la légitimité normative. Il définit ensuite la « grammaire du pouvoir » comme une règle relationnelle de second ordre qui détermine quelles différences de position, de ressources, de statut revendiqué et de coûts du refus peuvent être converties en décisions effectives, interprétations effectives et modifications des règles.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n'est donc pas équivalente aux ressources, aux ordres ou aux comportements de contrôle ; elle constitue une structure de conversion reliant plusieurs interfaces de pouvoir.

Sur cette base, l'article propose un modèle conditionnel de confiance structurelle et d'autonomie épistémique. La fiabilité est analysée à partir des contraintes pesant sur le pouvoir, de la stabilité des règles, de la contestabilité, de la vérifiabilité, de la possibilité de correction et de la capacité réelle de sortie. L'autonomie est modélisée comme une structure multidimensionnelle composée de capacités économiques, institutionnelles, relationnelles, épistémiques, de disposition de la valeur et de sortie ; une distinction supplémentaire est introduite entre disponibilité des ressources, contrôle effectif et robustesse face à l'ingérence. L'article propose ensuite la contrôlabilité progressive et l'autonomie distribuée comme deux voies complémentaires permettant de réduire la dépendance à un point unique tout en maintenant une responsabilité localement traçable. Il mobilise en outre

les théories de la justice, la jurisprudence, l'herméneutiqu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et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famille comme fondements théoriques. Les théories de la justice permettent de distinguer distribution, capacités, statut relationnel et non-domination ; la jurisprudence traite de l'ordonnancement privé, de l'autorisation, de la stabilité des règles et des limites procédurales ; l'herméneutique analyse l'histoire relationnelle, l'identité narrative et l'attribution de la responsabilité ;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explique comment l'expression légitime, le capital linguistique et la traduction institutionnelle acquièrent des conséquences matérielles et organisationnelles ;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famille examine comment les ressources, le care, les marchés, l'État et les options extérieures modifient les positions de négociation internes. S'agissant d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l'article distingue la mise en commun, le don, la gestion autorisée et les transferts intermédiaires non autorisés, et identifie le risque au moyen de conditions de connaissance, d'autorisation, de révocabilité, de traçabilité et de responsabilité. S'agissant de l'éthique organisationnelle, le débordement des réseaux privés est traité comme un problème de gouvernance des interfaces de rôle. L'analyse distingue pression privée, canaux identifiables et capture effective du rôle, puis examine des réponses institutionnelles telles que la déclaration, l'isolation, le moindre privilège, le double contrôle, la récusation et l'audit.

L'article avance trois contributions théoriques principales. Premièrement, il fait passer la « grammaire du pouvoir » du statut de métaphore descriptive à celui de concept de conversion de second ordre, distinct du pouvoir fondé sur les ressources, des structures interprétatives et du discours concret, et l'ancre dans les théories de la justice, la jurisprudence, l'herméneutique et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Deuxièmement, il relie la confiance structurelle, la formation de l'autonomie et l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comme différentes coupes d'un même mécanisme relationnel. Troisièmement, il clarifie l'interface entre les structures de pouvoir intrafamiliales et l'intégrité des rôles organisationnels tout en préservant les cas limites liés au care, à l'autorisation légitime, à la représentation en situation d'urgence, à la vie commune et aux différences culturelles. La formalisation utilisée vise à rendre plus transparents les définitions, les étapes inférentielles et les voies de vérification empirique ; elle n'est pas présentée comme un modèle quantitatif dont les paramètres auraient été estimés. L'article se conclut par des propositions analytiques réfutables, des pistes d'opérationnalisation des variables, des explications concurrentes et des dispositifs de recherche empirique destinés à soutenir de futures comparaisons de cas et des recherches de théorie normative.

Mots-clés : relations familiales ; grammaire du pouvoir ; autonomie relationnelle ; confiance structurelle ; théorie de la justice ; jurisprudence ; herméneutique ; 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 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famille ; éthique organisationnelle

Note de recherche préliminaire

Ce manuscrit présente une étude conceptuelle et formelle des structures orientées vers le pouvoir dans les relations familiales. Son objet immédiat est le mécanisme relationnel par lequel la capacité de décision, l'avantage interprétatif, la capacité de modifier les normes, les interfaces de ressources et les conditions de sortie peuvent se concentrer, se convertir mutuellement et persister dans le temps. Le manuscrit développe le concept de grammaire du pouvoir et l'utilise pour articuler la confiance structurelle, l'autonomie relationnelle, l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et l'intégrité des rôles organisationnels.

L'enquête adopte une perspective structurelle et normative délimitée. Elle ne traite pas la famille comme un acteur unique et n'infère ni identité morale ultime ni statut clinique à partir d'une asymétrie locale de pouvoir. Les distinctions entre capacité de pouvoir, exercice du pouvoir, contrôle des résultats et légitimité normative sont maintenues tout au long du texte. Les constructions mathématiques et schématiques ont une fonction de clarification ; leur portée, leurs hypothèses et leurs limites inférentielles doivent rester explicites.

L'économie formelle et la discipline conceptuelle constituent des contraintes directrices. Le texte hérite de travaux sur l'autonomie relationnelle, la théorie de la justice, la jurisprudence, l'herméneutiqu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et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famille, et n'introduit une nouvelle notation que lorsque le vocabulaire disponible est insuffisant. Des termes tels que grammaire du pouvoir, confiance structurelle, autonomie distribuée, transfert intermédiaire non autorisé et gouvernance des interfaces de rôle ne reçoivent leur sens technique qu'après définition explicite des domaines et des relations concernés.

La présente version contient le manuscrit complet dans une édition multilingue. Elle résulte de plusieurs cycles de révision structurelle, logique et stylistique, comprenant la clarification des concepts, l'extension du raisonnement en langage naturel, l'ajout de fondements théoriques, l'harmonisation des références aux équations et la préparation des versions dans les six langues officielles des Nations Unies. L'étalonnage empirique, les comparaisons de cas et plusieurs extensions formelles demeurent des travaux futurs.

Usage responsable et réserve des droits

L'auteur encourage la discussion de bonne foi, la critique, l'enquête indépendante et l'usage responsable du matériau présenté ici. Indépendamment des termes juridiques de la licence, il est demandé aux utilisateurs de prendre en considération les préjudices prévisibles lorsqu'ils adaptent ou appliquent le cadre proposé. Cette demande éthique ne modifie ni les permissions ni les limitations définies par la licence.

L'auteur conserve les droits réservés au titre de la licence CC BY-NC 4.0 et peut rechercher les recours juridiquement disponibles en cas de violation de la licence ou d'atteinte à d'autres droits applicables. La réutilisation ne vaut pas approbation de l'auteur. Les droits de tiers nécessitent, le cas échéant, l'autorisation de leurs titulaires respectifs. Les exceptions et limitations prévues par le droit restent pleinement applicables.

Mentions

Statut. Ce projet de travail contient la version complète actuelle du manuscrit sur le pouvoir familial, l'autonomie, la confiance, l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et l'éthique organisationnelle. La présente version inclut également des éditions multilingues préparées dans les six langues officielles des Nations Unies. La révision a contrôlé les définitions conceptuelles, la continuité argumentative, les références aux équations, les renvois internes, la mise en page et la cohérence entre les versions linguistiques. Le manuscrit demeure une note de recherche préliminaire : la validation empirique ainsi que plusieurs extensions formelles et comparatives restent à venir.

Licence. Sauf indication contraire, copyright © 2026 Wanhong Huang. Ce travail est mis à disposition sous licenc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CC BY-NC 4.0), sous réserve de ses termes.

Déclaration relative à l'usage de modèles de langage. Les discussions exploratoires et la préparation de cet article ont impliqué l'usage de ChatGPT d'OpenAI. ChatGPT a soutenu le dialogue exploratoire, le rendu multilingue, l'assistance à la rédaction, la mise en forme sous LaTeX et la vérification technique. L'auteur a choisi les questions de recherche, dirigé et approuvé les engagements théoriques ainsi que le statut épistémique des propositions, et assume seul la responsabilité du manuscrit, y compris ses définitions, constructions formelles, arguments, conclusions, traductions et erreurs. Le crédit d'auteur demeure attribué à l'auteur humain.

1 Introduction

La famille est simultanément un lieu d'intimité, d'organisation du care, d'allocation des ressources, de formation de l'identité et d'apprentissage normatif. Parce que ces dimensions se chevauchent fortement, le pouvoir familial se laisse difficilement décrire par un schéma unique d'« ordre et obéissance ». De nombreuses interactions aux conséquences décisives ne prennent pas la forme d'une coercition manifeste. Elles passent par des questions telles que : qui a qualité pour définir le problème, qui peut inscrire son interprétation dans les règles communes, qui contrôle les comptes et les documents, qui peut représenter la famille auprès d'institutions extérieures, et qui supporte les coûts du refus et de la sortie. Un tel pouvoir possède des fondements à la fois matériels et interprétatifs. Il peut résulter d'une autorité conférée par le droit et les institutions, mais aussi de conventions durables, de relations de care, de capacités linguistiques et d'une histoire partagée.

L'article n'aborde donc pas la vaste question de savoir s'il existe du pouvoir dans la famille. Il traite d'un problème structurel plus circonscrit : lorsque la capacité de décision, l'avantage interprétatif, la capacité à modifier les normes, les interfaces de ressources essentielles et les coûts de sortie se concentrent durablement dans certaines positions relationnelles, comment ces différences sont-elles converties en décisions, interprétations et règles effectivement opérantes ? Comment cette conversion affecte-t-elle ensuite la confiance structurelle, l'autonomie épistémique, la disposition de la valeur et l'intégrité fiduciaire lorsqu'un sujet occupe un rôle organisationnel ? L'article appelle cette couche de conversion **grammaire du pouvoir**. Le terme « grammaire » n'est ni un synonyme de grammaire linguistique ni une manière de rebaptiser tout problème de communication comme problème de pouvoir. Il désigne une structure de validité de second ordre qui détermine quels types de raisons sont reconnus comme effectifs, quels refus peuvent réellement interrompre une action et quelles interprétations peuvent entrer dans les règles ultérieures.

Ce problème se situe à l'intersection de plusieurs traditions de recherche établies. La sociologie de la famille et la théorie de la dépendance au pouvoir étudient depuis longtemps les relations entre ressources, alternatives et positions décisionnelles (Blood et Wolfe 1960 ; Emerson 1962 ; Hesse-Biber et Williamson 1984 ; Komter 1989). Les théories de l'autonomie relationnelle soulignent que l'autonomie n'est pas une propriété intrinsèque d'un individu isolé, mais qu'elle est favorisée ou compromise par les relations sociales, les conditions institutionnelles et les structures de reconnaissance (Mackenzie et Stoljar 2000 ; Friedman 2003 ; Westlund 2009 ; Nedelsky 2012).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famille montre quant à elle que la famille est à la fois une unité de coopération et une arène institutionnelle dans laquelle intérêts, care, temps et actifs peuvent être distribués de manière asymétrique (Sen 1990 ; Agarwal 1997 ; Folbre 1994). Ces travaux fournissent des bases indispensables, mais traitent

souvent séparément les ressources, les normes, la négociation ou l'autonomie. Le présent article pose une question supplémentaire : comment les différences situées à ces différents niveaux sont-elles converties, dans des relations concrètes, en différences quant à la force pratique des raisons de chacun ?

L'analyse exige donc un fondement normatif et interprétatif plus large que la seule théorie du pouvoir familial. Premièrement, les théories de la justice rappellent que l'évaluation au sein des familles ne peut se limiter au volume total des ressources ou à l'égalité formelle. Rawls fournit un cadre classique pour l'équité institutionnelle et la structure de base (Rawls 1999), tandis qu'Okin critique explicitement la tendance à arrêter l'application de la justice aux portes de la famille (Okin 1989). L'analyse de Young sur la domination et l'oppression montre que la justice concerne aussi les structures de décision, l'expression culturelle et les divisions sociales du travail, et pas seulement la quantité de biens distribuables (Young 1990). Les approches par les capacités de Sen et de Nussbaum déplacent encore l'évaluation vers ce que les sujets peuvent réellement faire et être, et vers la capacité des ressources à se convertir en possibilités réelles (Sen 2009 ; Nussbaum 2006). Ces théories ne forment pas un système unifié exempt de tensions, mais elles indiquent ensemble que la justice familiale doit examiner simultanément ressources, capacités, statut, procédure et structures de domination.

Deuxièmement, la jurisprudence montre que les relations privées ne se trouvent pas en dehors de l'ordre juridique. Les droits de propriété, les statuts conjugal et parental, la capacité contractuelle, la tutelle, la sécurité sociale, le logement et les mécanismes de recours modifient continuellement l'ensemble des actions réellement accessibles aux membres de la famille. Fuller met l'accent, dans sa réflexion sur la légalité, sur la généralité, la publicité, l'intelligibilité, la stabilité relative des règles et la congruence entre règles et mise en œuvre (Fuller 1969). Habermas examine la légitimité, la procédure et la raison publique à partir des rapports entre droit et démocratie (Habermas 1996). Nedelsky conçoit plus directement encore le droit comme une forme institutionnelle qui structure les relations et peut, par là, favoriser ou compromettre l'autonomie (Nedelsky 2012). L'article ne transpose pas mécaniquement à la vie familiale toutes les exigences du droit public, mais mobilise ces intuitions juridiques pour expliquer pourquoi des règles prévisibles, des obligations de justification, des espaces de contestation et la possibilité de révision peuvent constituer des conditions importantes de limitation du pouvoir privé.

Troisièmement, l'herméneutique et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empêchent de réduire le « pouvoir interprétatif » à une simple différence psychologique d'opinion. L'herméneutique philosophique de Gadamer souligne que toute compréhension s'inscrit dans l'histoire et la tradition (Gadamer 2013). Les travaux de Ricoeur sur l'action, le récit et l'interprétation de soi montrent comment l'identité du sujet et l'attribution de la responsabilité acquièrent une continuité par des structures narra-

tives (Ricoeur 1992). Cover et White montrent, chacun à sa manière, que les normes n'agissent pas comme des commandements détachés des mondes de sens ; le langage juridique participe lui-même à la constitution de mondes normatifs communs (Cover 1983 ; White 1990). Bourdieu analyse en outre le langage à travers les marchés linguistiques, le capital symbolique et la langue légitime (Bourdieu 1991) ; Irvine et Gal inscrivent explicitement les phénomènes linguistiques dans des processus d'économie politique (Irvine 1989 ; Gal 1989) ; Heller étudie enfin la marchandisation du langage et de l'identité dans la mondialisation (Heller 2003). Le choix des mots, les titres de statut, la maîtrise administrative et la capacité à manier le langage institutionnel peuvent donc produire des effets distributifs au sein des familles : tous les locuteurs ne disposent pas de la même capacité d'être entendus ni de faire produire des effets institutionnels à leurs énoncés.

La tâche théorique de l'article comporte dès lors quatre niveaux. Le premier est une décomposition descriptive : distinguer les interfaces de décision, d'interprétation, de modification des normes, de ressources et de sortie, puis distinguer capacité, exercice, résultat et légitimité. Le deuxième niveau concerne le mécanisme de conversion : le concept de grammaire du pouvoir explique comment ressources, position, langage et normes deviennent effectifs dans une relation. Le troisième niveau est l'évaluation normative : la confiance structurelle, l'autonomie relationnelle, la non-domination, la stabilité procédurale et les conditions de justice sont placées dans un même cadre tout en conservant les cas limites du care, de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 vie commune et de l'autorisation légitime. Le quatrième niveau est celui du débordement : il examine comment l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dans les relations privées peuvent, lorsqu'un sujet assume un rôle organisationnel, devenir des questions d'autorité confiée et de justice organisationnelle.

Méthodologiquement, l'article combine reconstruction conceptuelle, intégration interthéorique et formalisation minimale. Les équations ne servent pas à réduire des relations complexes à des scores calculables. Elles rendent explicites les variables, les directions d'influence et les prémisses des inférences. L'argumentation en langue naturelle porte l'essentiel de l'explication des sources conceptuelles, des significations normatives, des contre-exemples et des contextes institutionnels. L'article conserve donc délibérément les modèles formels, tout en exigeant que chaque objet formel soit soutenu par une argumentation suffisamment développée en théorie sociale, en jurisprudence et en herméneutique.

La suite de l'article est organisée de la manière suivante. La section suivante délimite l'objet d'étude, les unités d'analyse et les frontières méthodologiques. Les deux sections qui suivent établissent respectivement les fondements en théorie de la justice et en jurisprudence, puis en herméneutique et en 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L'article introduit ensuite le modèle formel et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avant d'aborder la confiance structurelle, l'autonomie épistémique et l'autonomie multidi-

mensionnelle. La section consacrée à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famille reconnecte ressources, care et position de négociation à la structure relationnelle. Les sections sur l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et l'éthique organisationnelle analysent les flux de valeur privés et le débordement institutionnel des rôles confiés. Les dernières sections examinent la reconstruction relationnelle, les propositions empiriques et les limites d'application, afin de préciser à la fois ce que le cadre permet d'établir et ce qui requiert encore une validation.

2 Objet de l'étude, unités d'analyse et tâche théorique

Cette section délimite la portée des affirmations que l'article peut soutenir. L'analyse porte sur une **structure orientée vers le pouvoir** dans les relations familiales. Ses unités d'analyse sont les **configurations relationnelles** et les **interfaces de mécanismes** au sein d'interactions durables, et non « la famille » comme totalité indivisible ni un trait psychologique fixe d'un membre. Cette limitation est méthodologiquement importante. Le care, la réciprocité, la dépendance, la coopération, le conflit et l'asymétrie du pouvoir peuvent coexister dans une même famille, et les membres peuvent occuper des positions différentes selon les domaines. L'article traite donc d'une structure conditionnelle : lorsque décision, interprétation, modification des règles, ressources et coûts de sortie présentent une concentration directionnelle durable, comment ces dimensions affectent-elles ensemble l'autonomie, la confiance, la disposition de la valeur et les rôles organisationnels ?

Cette unité d'analyse implique aussi que la famille ne peut être présupposée comme un « acteur unique » dont les préférences internes seraient parfaitement alignées. Les familles peuvent bien sûr former des objectifs communs, des budgets partagés et des engagements durables, mais la communauté elle-même doit être expliquée : quelles questions sont décidées conjointement, lesquelles restent dans la sphère de décision individuelle, qui peut définir l'« intérêt commun », et les membres possèdent-ils réellement la capacité de contester et de renégocier ? Ce n'est qu'en rendant ces processus internes explicites que coopération, obligation et pouvoir cessent d'être conceptuellement confondus.

L'article évite également de considérer la famille comme un espace purement privé, séparé du droit, des marchés et des institutions publiques. Le logement, les revenus du travail, les statuts conjugal et parental, la sécurité sociale, l'éducation et le système de santé modifient tous les interfaces de ressources et les coûts de sortie. Le pouvoir intrafamilial est donc doublement encastré : d'une part, il se forme dans des relations intimes de longue durée et une histoire partagée ; d'autre part, il est façonné par les droits, la propriété, les possibilités de revenu et les soutiens sociaux conférés par les institutions extérieures. Les développements ultérieurs sur la jurisprudence et l'économie politique reconnectent cette structure externe au modèle relationnel présenté ici.

2.1 Configurations relationnelles circonscrites et conditions de portée

Une **configuration relationnelle circonscrite** désigne ici un schéma d'interaction relativement stable formé par un ensemble de participants, d'interfaces de ressources, de règles, de pratiques interprétatives et de conditions de sortie dans un intervalle temporel identifiable T et un domaine $d \in \mathcal{D}$. Cette définition maintient trois limites de portée.

Premièrement, l'inégalité familiale n'est pas directement assimilée à une structure orientée vers le pouvoir. Les répartitions de care, les différences d'âge, la spécialisation, les mandats temporaires, le care lié à la maladie ou les situations d'urgence peuvent tous produire des asymétries, sans que l'asymétrie permette à elle seule de conclure sur la légitimité. Deuxièmement, une structure orientée vers le pouvoir n'est pas directement assimilée à la maltraitance, au contrôle coercitif ou à une pathologie. Les recherches sur le contrôle coercitif étudient un ensemble plus spécifique de mécanismes de restriction, d'isolement, de peur et de contraction de l'espace d'action, dans des contextes empiriques et juridiques propres (E. Stark 2007 ; Choudhury et al. 2025). Le concept élaboré ici est plus large et ne recoupe cette littérature que lorsque des conditions probatoires plus fortes sont remplies. Troisièmement, un conflit isolé n'est pas traité comme une structure. Un jugement structurel exige répétition, similarité directionnelle entre plusieurs événements et une certaine persistance temporelle.

Les conditions de portée incluent égalemen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domaines. Un même membre peut exercer davantage d'influence sur des décisions médicales en raison de son expertise tout en étant soumis à une autorisation bilatérale stricte dans les finances communes. Une asymétrie justifiée peut aussi n'exister qu'en situation d'urgence. L'article ne traite donc pas la question « qui est globalement le plus fort ? » comme une unité d'analyse suffisante. Il exige de préciser le domaine dans lequel la différence de pouvoir apparaît, sa durée, son éventuelle expansion interdomaines et sa capacité à modifier les alternatives des autres membres. Cela réduit le risque de surdiagnostic et fournit des frontières observables pour la vérification empirique ultérieure.

Enfin, l'article distingue la description et l'évaluation normative. Identifier une concentration de pouvoir signifie seulement que certains acteurs disposent d'une capacité plus forte à façonner l'action. Savoir si cette concentration constitue domination, injustice, exploitation ou illégalité exige des jugements supplémentaires sur l'autorisation, la proportionnalité, la procédure, le dommage et le contexte institutionnel. L'analyse normative est donc stratifiée : elle identifie d'abord la structure, puis demande comment elle est contrainte, et n'aborde qu'ensuite des évaluations éthiques ou juridiques plus fortes.

2.2 Distinguer capacité, exercice, résultat et légitimité

L'analyse du pouvoir est sujette à des glissements conceptuels. Afin d'éviter que « posséder une capacité », « intervenir effectivement », « produire un résultat » et « intervenir légitimement » soient traités comme une seule et même chose, l'article distingue quatre niveaux :

1. **capacité** : aptitude potentielle d'un sujet, dans une relation et une situation données, à modifier l'ensemble des actions accessibles à autrui, ses conditions interprétatives, les normes, les canaux de ressources ou les coûts de sortie ;
2. **exercice** : activation d'une capacité dans un événement concret ;
3. **résultat** : modification de l'action, des ressources, des règles ou du sens qui survient effectivement après l'exercice ;
4. **légitimité** : mesure dans laquelle la capacité et son exercice disposent d'un soutien normatif en termes d'autorisation, de raisons, de procédure et de limites.

Ces quatre niveaux peuvent se dissocier. Un acteur peut disposer d'une forte capacité sans l'exercer pendant longtemps ; un exercice peut échouer ; un résultat peut avoir plusieurs causes ; une intervention très efficace peut aussi être pleinement autorisée. L'objet central de l'article est donc la **capacité structurelle et les mécanismes de conversion**, tandis que le jugement normatif requiert un examen séparé de l'autorisation, de la proportionnalité, de la contestabilité et de la responsabilité.

Cette distinction est particulièrement importante pour l'étude des familles. Les relations intimes fonctionnent couramment par mandat, care, budgets communs et répartitions informelles du travail ; des comportements extérieurement similaires peuvent donc avoir des significations relationnelles très différentes. La gestion d'un compte par un partenaire peut résulter d'une autorisation révocable choisie pour des raisons de commodité, ou constituer une concentration de ressources dans laquelle l'autre n'a ni accès ni capacité de vérification. Des restrictions parentales imposées à un mineur peuvent être des mesures de protection justifiées par son développement, puis devenir inutiles tout en continuant de s'étendre. Si l'on observe seulement la forme extérieure du comportement, l'intervention risque d'être confondue avec la domination.

Inversement, la bienveillance subjective ne suffit pas à établir qu'une structure est sûre. Un participant peut croire sincèrement prendre soin d'autrui tout en disposant simultanément de la capacité de réécrire unilatéralement les règles, de contrôler les documents et de bloquer l'information extérieure. L'évaluation normative doit donc conserver à la fois les raisons subjectives et la structure objective. La bonne intention peut affecter l'attribution de responsabilité, mais elle ne remplace pas l'examen des limites d'autorité, de la procédure et de la réversibilité.

2.3 Méthode de reconstruction conceptuelle

Cette recherche relève de la théorie conceptuelle et de la reconstruction de mécanismes. La méthode comporte quatre étapes. Premièrement, elle extrait des variables relationnelles récurrentes telles que capacité de décision, avantage interprétatif, modification des normes, interfaces de ressources et coûts de sortie. Deuxièmement, elle distingue les types de variables afin que le terme « pouvoir » ne porte pas simultanément trop de significations. Troisièmement, elle utilise une formalisation minimale pour exprimer les directions d'influence en précisant que les équations n'ont qu'une fonction de clarification conceptuelle. Quatrièmement, elle associe à chaque mécanisme des implications observables, des contre-exemples et des explications concurrentes plausibles afin de préserver la possibilité d'une vérification empirique ultérieure.

La « formalisation minimale » ne signifie pas remplacer la théorie sociale par une notation mathématique. L'expression formelle n'est justifiée ici que dans trois situations : empêcher un symbole de changer de sens d'une section à l'autre ; rendre explicites les étapes intermédiaires dont dépendent les inférences causales ou normatives ; identifier les types de matériau empirique nécessaires pour soutenir ou réfuter une proposition. Lorsque les équations n'améliorent pas cette transparence, l'article privilégie l'argumentation en langue naturelle. Les modèles formels doivent donc être lus avec les explications conceptuelles, le contexte institutionnel et les analyses de contre-exemples.

Méthodologiquement, il faut aussi distinguer trois niveaux de raisonnement. Le niveau descriptif demande ce qui se passe dans la relation et qui possède quelles interfaces. Le niveau mécanistique demande comment ces interfaces se convertissent les unes dans les autres et produisent de la dépendance au sentier. Ce n'est qu'au niveau normatif que l'on demande quand ces structures entrent en conflit avec l'autonomie, la confiance, la justice ou l'éthique organisationnelle. L'article évite délibérément de passer directement de la description à la normativité. Cette stratification permet aussi à la jurisprudence et à l'économie politique d'entrer dans un même cadre : la jurisprudence fournit les structures normatives de droits, d'autorisation, de procédure et d'ordonnancement privé, tandis que l'économie politique explique comment ressources, care, marchés et institutions étatiques modifient les capacités effectives dans les relations.

La méthode est voisine des traditions consacrées au pouvoir familial, à la théorie des ressources et à la dépendance au pouvoir. La théorie des ressources étudie depuis longtemps les relations entre distribution des ressources et position dans la prise de décision familiale (Blood et Wolfe 1960 ; Hesse-Biber et Williamson 1984). Emerson (1962) situe le pouvoir dans les relations d'interdépendance et les alternatives. Komter (1989) souligne en outre que le pouvoir conjugal ne peut être saisi

par la seule distribution visible du pouvoir ; il faut aussi analyser les mécanismes interactionnels cachés qui reproduisent l'inégalité. Les théories plus générales du pouvoir invitent à distinguer décisions observables, contrôle de l'agenda, formation des préférences, domination et empowerment (Lukes 2021 ; Allen 1998). Sur cette base, l'article avance une tâche conceptuelle plus circonscrite : expliquer **comment plusieurs dimensions du pouvoir sont converties par des règles relationnelles en efficacité pratique**.

2.4 Limites de la contribution théorique

La contribution ne consiste pas à proposer une théorie totale destinée à remplacer les théories établies du pouvoir familial, de la justice, de la jurisprudence, de l'herméneutique ou de l'autonomie. Elle vise à construire plusieurs interfaces entre niveaux d'analyse. Premièrement,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est définie comme une structure de conversion de second ordre expliquant comment ressources, positions, interprétations et capacités de modification des normes deviennent des « raisons qui comptent réellement dans cette relation ». Deuxièmement, la **confiance structurelle** et l'**autonomie relationnelle** sont placées dans un même modèle : la disposition d'un sujet à accepter l'exposition relationnelle dépend en partie de l'applicabilité de ses frontières, de la vérifiabilité des faits, de la contestabilité des règles et du caractère réaliste de la sortie. Troisièmement, une interface est construite entre **structure interprétative** et **structure matérielle** : langage, récits et classifications de statut n'entrent dans le mécanisme du pouvoir que lorsqu'ils peuvent modifier règles, ressources ou accès institutionnel, ce qui évite de réduire toute différence de sens à un rapport de pouvoir. Quatrièmement, une interface interne-externe relie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et **intégrité des rôles organisationnels** : les questions d'autorisation et de contrôle des ressources au sein de la famille peuvent devenir des questions de compétence, de déclaration et de responsabilité dans l'espace public ou organisationnel lorsque le sujet assume un rôle confié.

Le tableau 1 rassemble les frontières conceptuelles employées dans l'ensemble de l'article. Les formalisations et propositions ultérieures dépendent de ces distinctions.

3 Fondements en théorie de la justice et en jurisprudence

Cette section établit les fondements normatifs de l'article. Il ne s'agit ni de dériver l'évaluation complète des relations familiales à partir d'une seule théorie de la justice, ni d'assimiler directement la famille aux institutions de l'État. Une démarche plus prudente consiste à extraire de plusieurs traditions complémentaires les dimensions normatives directement pertinentes pour les mécanismes étudiés ici : distribution des ressources et des possibilités, capacités effectives, statut relationnel, absence de domination arbitraire, prévisibilité des règles, contestation et révision procédurales, ainsi que la manière dont le droit façonne les relations privées. Cette démarche évite

Table 1 – Concepts centraux, niveaux d'analyse et confusions à écarter

Concept	Définition de travail	Confusion à écarter
Capacité de pouvoir	Capacité potentielle à modifier l'action, l'interprétation, les règles, les ressources ou les conditions de sortie d'autrui	Ne se confond pas avec l'exercice effectif, un résultat réussi ou une autorisation légitime
Structure orientée vers le pouvoir	Concentration directionnelle de plusieurs capacités de pouvoir dans le temps et les domaines, affectant durablement le traitement des conflits	Ne se confond pas avec toute asymétrie, un ordre isolé ou un type de famille
Grammaire du pouvoir	Règles relationnelles de second ordre déterminant quelles différences de position et quelles raisons peuvent être converties en décisions, interprétations et modifications normatives effectives	Ne se confond pas avec un style rhétorique, une ressource unique ou un acte de contrôle particulier
Confiance structurelle	État prévisible dans lequel frontières du pouvoir, règles, faits, contestation et conditions de sortie possèdent un degré minimal de robustesse	Ne se confond pas avec un jugement globalement positif sur le caractère d'autrui
Autonomie relationnelle	Capacité multidimensionnelle à former, exprimer et mettre en œuvre des jugements concernant sa trajectoire de vie fondamentale dans des relations sociales et institutionnelles	Ne se confond pas avec l'isolement, l'autosuffisance ou l'absence complète d'influence
Frontière de la valeur	Structure de connaissance, d'autorisation, de révocation, de traçabilité et de responsabilité gouvernant les flux de valeur	Ne se confond pas avec l'interdiction du partage, des dons ou de la vie commune
Intégrité du rôle	Situation dans laquelle les ressources, jugements et pouvoirs de représentation d'un rôle organisationnel restent dans le périmètre de l'autorisation	Ne se confond pas avec l'idée que l'existence de relations privées constitue à elle seule un conflit d'intérêts

deux simplifications opposées : réduire la justice familiale à la question « qui reçoit combien », ou traduire tout problème de relation intime en litige juridique formel.

3.1 Distribution, capacités et structure relationnelle

Les théories modernes de la justice s'intéressent souvent à la manière dont les institutions distribuent droits fondamentaux, opportunités, revenus et bénéfices de la coopération sociale. Rawls fournit une expression canonique de cette perspective institutionnelle : la justice n'évalue pas seulement les bonnes intentions individuelles, mais aussi les arrangements institutionnels de base qui structurent les conditions de fond de la coopération sociale (Rawls 1999). L'intérêt de cette perspective pour le présent article n'est pas de modéliser directement la famille comme une « structure de base » complète. Elle rappelle plutôt que la possibilité de mener une vie autonome dépend de conditions institutionnelles durables. Au sein des familles, logement, pro-

priété, éducation, care et divisions du travail professionnel modifient les possibilités futures des membres ; leurs effets de long terme ne peuvent donc être jugés uniquement à partir de l'égalité d'une répartition ponctuelle de la consommation.

La critique d'Okin à propos de la famille et de la justice souligne en outre que, si une théorie de la justice traite la famille comme une sphère privée n'appelant aucune évaluation interne, les divisions du travail et de genre dans la famille peuvent ensuite structurer les opportunités et les positions dans la sphère publique (Okin 1989). Le présent article reprend cette intuition structurelle tout en l'étendant sous la forme d'une proposition mécanistique plus générale : toute organisation familiale durable qui modifie systématiquement les actifs, le temps, le capital professionnel, les connaissances institutionnelles et les conditions de sortie de ses membres peut devenir un lieu de production d'inégalités ultérieures de capacités publiques. La famille n'est donc pas un simple arrière-plan extérieur à la justice publique ; elle constitue un espace intermédiaire de formation des capacités publiques.

La perspective distributive demeure néanmoins insuffisante. La critique de Young contre la réduction de la justice aux biens distribuables insiste sur le fait que domination, pouvoir décisionnel, expression culturelle et division sociale du travail possèdent eux-mêmes une portée normative (Young 1990). Ce point concerne directement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Même si deux membres reçoivent finalement des ressources monétaires approximativement comparables, la relation peut rester fortement asymétrique si un seul peut définir le problème, modifier la procédure, interpréter la conduite d'autrui et déterminer quelles raisons sont jugées « raisonnables ». L'analyse de la justice doit donc prendre simultanément en compte « ce que chacun reçoit » et « qui peut participer aux décisions, quelles interprétations ont qualité et qui peut modifier les règles ».

L'approche par les capacités modifie encore l'objet de l'évaluation. Sen met l'accent sur la comparaison des possibilités réelles et des libertés substantielles plutôt que sur les seules ressources ou les seuls droits formels (Sen 2009). Nussbaum relie également la justice sociale aux capacités importantes que les personnes peuvent effectivement réaliser, en accordant une attention particulière à la dépendance, au handicap et à la coopération entre personnes inégalement situées (Nussbaum 2006). Sur cette base, l'article distingue disponibilité des ressources, contrôle effectif et robustesse face à l'ingérence. Un droit, un compte ou un revenu n'élargit réellement l'ensemble d'actions d'un sujet que si celui-ci peut effectivement y accéder, l'utiliser et ne pas en être aisément privé en cas de conflit. L'égalité formelle peut donc coexister avec d'importantes différences de capacités substantielles.

Ces traditions imposent conjointement une limitation importante : l'article ne définit pas la « justice » par un indicateur unique. Distribution des ressources, capacités, statut relationnel et structures de décision peuvent converger, mais aussi entrer en tension. Un arrangement peut accroître le bien-être agrégé du ménage tout en dimi-

nuant la capacité à long terme de l'un de ses membres ; il peut respecter formellement les droits de propriété tout en imposant à une personne des coûts d'opportunité persistants et invisibles ; il peut être relativement égalitaire dans la distribution tout en maintenant des structures très asymétriques d'interprétation et de modification des normes. Une analyse rigoureuse doit donc identifier la dimension précise de justice en jeu au lieu de laisser le mot « équité » recouvrir toutes les évaluations.

3.2 Non-domination, autonomie relationnelle et limitation du pouvoir

L'orientation normative de l'article vers la limitation du pouvoir est étroitement apparentée à l'intuition républicaine de non-domination. Pettit comprend la liberté comme absence de domination arbitraire par autrui, et non comme simple absence actuelle d'ingérence (Pettit 1999). Ce point est particulièrement important dans les relations familiales. Un membre peut ne pas avoir effectivement empêché l'autre d'agir pendant une longue période ; si toutefois il conserve une capacité pratiquement non contrainte de modifier le logement, les comptes, les documents ou les règles fondamentales, l'autre doit encore organiser son action en anticipant une permission. La question n'est donc pas seulement « combien d'interventions ont eu lieu », mais « la capacité d'intervenir est-elle bornée par des contraintes exécutoires ? »

La non-domination permet également d'expliquer pourquoi l'accroissement d'une capacité ne se confond pas avec l'accroissement de la domination. Lorsqu'une position relationnelle plus faible acquiert un revenu indépendant, des connaissances juridiques, des réseaux extérieurs ou des possibilités de sortie, sa capacité de résistance s'accroît sans qu'elle acquière pour autant le droit de contrôler autrui arbitrairement. L'article distingue donc **capacité de protection des frontières** et **capacité de domination**. La première garantit un minimum d'espace de décision personnelle, un droit de refus et un accès à la vérification des faits. La seconde permet d'étendre ses propres préférences à plusieurs domaines et d'en faire les conditions du comportement d'autrui. La formation de l'autonomie vise à renforcer la première afin de rendre la négociation supportable, et non à reproduire la seconde.

Les théories de l'autonomie relationnelle fournissent une base sociale plus fine à cette distinction. Les travaux associés à Mackenzie et Stoljar comprennent l'autonomie à travers les relations sociales, les identités et les capacités au sein desquelles elle se forme (Mackenzie et Stoljar 2000). Friedman souligne que relations intimes et autonomie ne sont pas intrinsèquement opposées (Friedman 2003). Westlund insiste sur la capacité à adresser à autrui des exigences normatives et à y répondre (Westlund 2009). Nedelsky propose plus directement encore de penser le droit et l'autonomie à partir des relations elles-mêmes (Nedelsky 2012). Ensemble, ces approches montrent qu'un sujet n'a pas à sortir de ses relations pour être autonome. L'enjeu est de savoir si la relation maintient un espace de réflexion, d'expression, de révision, de refus et

de renégociation.

Cette compréhension relationnelle évite également de faire du care familial une exception à l'autonomie. Le care peut accroître les capacités effectives de la personne qui le reçoit et fournir au proche aidant sens, identité et réciprocité. Le problème apparaît lorsque la dépendance liée au care se convertit en titre illimité à décider, ou lorsque la contribution du proche aidant reste durablement exclue des décisions communes sur les ressources et les règles. L'analyse ultérieure des interfaces de ressources et de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vise précisément à distinguer la dépendance qui soutient les capacités de celle qui génère un contrôle arbitraire.

3.3 Légalité, stabilité des règles et raison procédurale

La jurisprudence fournit des fondements importants aux propositions de l'article sur la « stabilité des règles », la « contestabilité » et la « correction ». L'analyse de Fuller sur la moralité interne du droit soutient que, pour fonctionner comme règles, les normes doivent satisfaire des conditions telles que généralité, promulgation, prospectivité, intelligibilité, stabilité relative et congruence entre conduite officielle et règles déclarées (Fuller 1969). Les interactions familiales ne constituent évidemment pas un système juridique étatique et l'article n'applique pas directement les huit desiderata de Fuller comme normes de la vie familiale. Néanmoins, leur intuition juridique centrale peut être transposée : lorsque des règles structurent durablement les intérêts fondamentaux des membres, une personne ne peut planifier son action de manière fiable si ces règles ne sont modifiées qu'après coup, restent inconnues, se contredisent ou sont appliquées d'une manière totalement dissociée de ce qui avait été annoncé.

L'article comprend donc la **prévisibilité** comme une condition procédurale minimale, et non comme l'exigence de relations rigides. Les normes familiales doivent pouvoir changer avec l'âge, la maladie, les circonstances économiques et les objectifs communs. L'enjeu est de savoir si les changements reposent sur des raisons intelligibles, des procédures identifiables et un traitement transitoire des intérêts déjà constitués. Le contraire de la stabilité n'est pas le changement, mais l'**arbitraire** : des standards sont réécrits après l'apparition des résultats par une seule position relationnelle, de telle sorte qu'un autre sujet ne peut acquérir des attentes stables en respectant les règles antérieurement annoncées.

La réflexion de Habermas sur le droit, la procédure et la raison publique suggère en outre que la légitimité ne peut être déterminée uniquement par le caractère substantiellement « bon » des résultats. Elle concerne aussi la possibilité, pour les personnes affectées, de présenter des raisons et de participer à la formation des normes dans une procédure répondante (Habermas 1996). L'article n'assimile pas la négociation familiale à la législation démocratique. Il adopte un principe plus faible : plus une norme privée affecte la trajectoire fondamentale d'un sujet, plus il existe de raisons

d’exiger qu’elle puisse être expliquée, contestée et révisée. De telles exigences procédurales ne garantissent pas le consensus, mais elles peuvent limiter la conversion directe d’un avantage de position en pouvoir unilatéral de modification normative.

La raison procédurale possède également une fonction épistémique. Contestation, conservation des traces et révision ne rendent pas seulement les décisions « plus équitables » ; elles augmentent aussi les possibilités de détection des erreurs. Des membres peuvent être réellement en désaccord à cause d’informations incomplètes, de biais de mémoire ou de différences d’expertise. Si toute objection est interprétée comme déloyauté ou immaturité, la relation perd ses mécanismes de correction. À l’inverse, lorsque faits et normes peuvent être distingués, que les preuves peuvent être conservées et que les changements de règles sont enregistrés, le conflit interprétatif reste plus facilement limité au litige lui-même au lieu de s’étendre au statut de la personne.

3.4 Ordonnancement privé, ombre du droit et structuration des relations

De nombreuses règles familiales ne naissent pas de contrats formels. Elles émergent de conventions, de délégations tacites, d’attentes intergénérationnelles et d’une longue vie commune. Un tel **ordonnancement privé** est pratiquement nécessaire : si tout acte de care, paiement ou représentation devait faire l’objet d’une procédure formelle, les relations intimes supporteraient des coûts de transaction excessifs. L’ordonnancement privé n’implique toutefois pas l’absence du droit. L’analyse classique de Mnookin et Kornhauser sur la négociation en matière de divorce montre que la négociation privée se déroule sur fond de droits juridiques et de conséquences possibles (Mnookin et Kornhauser 1979). Même sans procès, droits de propriété, droits au logement, garde et mécanismes de recours peuvent modifier les positions de négociation.

La jurisprudence relationnelle de Nedelsky montre en outre que le droit ne se limite pas à tracer des frontières entre individus ; il constitue en permanence des formes d’interdépendance (Nedelsky 2012). Une même organisation de « gestion commune » peut avoir des effets très différents sur l’autonomie selon le régime de propriété, de sécurité sociale ou de statut. Le droit entre ainsi dans le présent modèle par deux voies : il modifie directement les droits et ressources, et il modifie la capacité d’une revendication à obtenir reconnaissance auprès d’institutions extérieures, ce qui change sa force pratique dans la famille.

L’ordonnancement privé appelle aussi une distinction entre **délégation de tâches** et **pouvoir lié au statut**. Une personne peut payer les factures, communiquer avec l’école ou gérer les documents pendant longtemps simplement parce que cette répartition réduit les coûts de transaction. Si elle en vient progressivement à être interprétée comme « puisque je m’en suis toujours occupé, je peux décider de tout ce qui s’y rapporte », une tâche est convertie en titre de statut. Le concept de grammaire du

pouvoir sert précisément à décrire ces conversions : quand une convention devient-elle une compétence, quand cette compétence s'étend-elle à d'autres domaines et les autres membres peuvent-ils encore la révoquer, la partager ou la soumettre à révision ?

L'intervention juridique dans l'ordonnancement privé doit elle aussi respecter la proportionnalité. Une formalisation excessive peut endommager la souplesse et la réciprocité des relations intimes ; une formalisation insuffisante peut laisser des actifs importants, des documents d'identité, des droits de tiers et des décisions irréversibles hors de toute responsabilité. L'article propose donc une évaluation juridique graduée. Plus une question se rapproche de la coopération quotidienne à faible risque, plus elle peut raisonnablement s'appuyer sur la convention. Plus elle touche aux conditions fondamentales de vie, aux actifs importants, à la responsabilité envers des tiers et à des conséquences très irréversibles, plus l'autorisation explicite, l'enregistrement, la révision et les interfaces de recours deviennent nécessaires.

3.5 Pont normatif : quand le pouvoir familial devient-il une question de justice ?

Les théories précédentes ne fournissent pas un seuil unique à partir duquel une relation pourrait être déclarée simplement « juste » ou « injuste ». Une démarche plus prudente consiste à identifier cinq catégories de **conditions de liaison normative**. Premièrement, la **privation de capacité** : un arrangement réduit durablement la capacité réelle d'un sujet à mettre en œuvre des jugements fondamentaux sur sa vie, au-delà d'un simple désagrément ordinaire. Deuxièmement, la **dégradation de statut** : les raisons et l'expérience d'une personne sont structurellement exclues du jugement commun, produisant une inégalité persistante de qualité à participer. Troisièmement, la **domination arbitraire** : une position relationnelle peut modifier les conditions fondamentales de vie d'autrui en l'absence de contraintes effectives. Quatrièmement, le **déséquilibre procédural** : modification des règles, constatation des faits et correction manquent de procédures prévisibles. Cinquièmement, la **redistribution cumulative** : des arrangements de court terme s'accumulent par les actifs, le temps, le care et les statuts institutionnels jusqu'à modifier les capacités futures de négociation et de sortie.

Ces cinq conditions se rattachent respectivement à la justice des capacités, à l'égalité relationnelle, à la non-domination, à une procédure analogue à l'État de droit et à la distribution politico-économique. Elles peuvent apparaître ensemble ou séparément. Une organisation du care peut engendrer une forte inégalité de ressources tout en restant justifiée par l'autorisation, la réciprocité et la sécurité à long terme. Inversement, une relation peut distribuer l'argent de façon relativement équilibrée tout en générant un risque de domination par concentration du pouvoir interprétatif et des interfaces de sortie. L'article refuse donc de réduire la question de justice à un

indicateur unique de résultat.

La liaison normative limite également le vocabulaire employé. Les termes plus forts de « domination », « exploitation » et « injustice » ne sont justifiés que lorsque les conditions pertinentes reposent sur un matériau suffisant. Dans le cas contraire, des descriptions plus précises sont : concentration du pouvoir, frontières faibles, règles instables ou risque accru. Cette stratification combine sensibilité théorique et retenue du jugement, tout en préservant la réfutabilité des propositions empiriques formulées plus loin.

Il faut encore distinguer **justice locale** et **justice structurelle**. Une allocation ponctuelle de ressources peut être pleinement justifiée, alors que sa répétition produit progressivement des écarts d'actifs, de connaissances et d'opportunités professionnelles. Inversement, un arrangement momentanément inégal peut viser à réparer un désavantage préexistant ou à répondre à un besoin particulier de care. L'évaluation du pouvoir familial exige donc plus qu'un échantillonnage d'événements isolés : il faut également observer si des séquences d'événements repoussent continuellement la même personne vers une position future plus faible. C'est aussi la raison normative pour laquelle l'article insiste sur l'histoire relationnelle et la dépendance au sentier.

Le rôle des théories de la justice dans cet article est finalement de fournir des **coordonnées d'évaluation**, et non un modèle uniforme de vie familiale. Les familles peuvent légitimement organiser de manière très diverse les biens communs, l'entraide intergénérationnelle, les divisions de care et les rôles délégués, pour autant que ces arrangements puissent être justifiés, préservent les capacités nécessaires, évitent la domination arbitraire et permettent aux personnes affectées d'entrer dans les procédures de modification. Diversité et contrainte normative ne sont pas contradictoires. La contrainte porte sur la conversion des conventions internes d'une forme de vie en titres unilatéraux et incontestables.

4 Fondements en herméneutique et en 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nécessite des fondements en herméneutique et en 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parce que l'« efficacité » dans une relation n'est ni purement matérielle ni purement sémantique. Qui comprend un énoncé, à partir de quel arrière-plan historique, sous quelle classification, et par quels canaux linguistiques et institutionnels il est converti en conséquences : chacun de ces éléments peut modifier les rapports de pouvoir. L'interprétation ne décrit pas seulement le monde ; elle participe à constituer responsabilité, statut et règles. Le langage ne transmet pas seulement de l'information ; il peut être une capacité rare, un capital institutionnel et une interface d'accès aux ressources extérieures.

4.1 Historicité de la compréhension et position relationnelle

L'herméneutique philosophique de Gadamer souligne que la compréhension ne commence pas depuis une position dépourvue d'histoire ou de préjugements. L'interprète est toujours situé dans des traditions, une langue et des horizons de questions déjà constitués (Gadamer 2013). Dans les relations familiales, la même phrase n'acquiert donc pas son sens dans le vide. Des expressions telles que « j'ai besoin de décider cela moi-même », « c'est pour ton bien » ou « en famille, on ne devrait pas tout compter » sont comprises à la lumière de l'histoire du care, des promesses, des conflits et des attentes de rôle. L'histoire relationnelle h_t n'est donc pas une variable auxiliaire ajoutée au modèle formel : elle fait partie des conditions de l'interprétation.

Cette historicité n'implique pas le relativisme. La manière dont le passé façonne la compréhension peut être analysée, comparée et contestée. Un membre peut comprendre une revendication de frontière comme une déloyauté, tandis qu'un autre y voit une simple répartition normale des compétences. La tâche de recherche n'est pas de déclarer immédiatement l'une de ces interprétations « vraie », mais d'examiner comment chacune entre dans la décision commune, quelles preuves peuvent l'étayer ou la réviser et qui possède la capacité de définir les règles ultérieures. L'herméneutique rejoint ainsi l'autonomie épistémique : toute compréhension est située, mais aucune situation ne doit être soustraite à la réflexion et à la vérification.

La position relationnelle affecte aussi les éléments d'arrière-plan jugés « aller de soi ». Une personne qui gère depuis longtemps un domaine peut considérer ses connaissances procédurales comme du simple bon sens, alors qu'un nouveau participant ne comprend pas les règles tacites. Une personne plus âgée, un professionnel ou celle qui maîtrise la langue institutionnelle dominante peut ne pas avoir à expliquer ses jugements, tandis que d'autres doivent sans cesse prouver leur qualité à intervenir. Une telle asymétrie n'est pas automatiquement oppressive, mais elle modifie la charge de justification et l'accessibilité de la contestation ; elle constitue un mécanisme important de stabilisation du pouvoir interprétatif.

L'article ne définit donc pas le pouvoir interprétatif comme la simple capacité à « mieux convaincre ». Il désigne la **capacité supérieure à faire de sa propre interprétation la prémisse par défaut de la relation**. Une fois qu'une prémisse par défaut pénètre la gestion des comptes, les rôles familiaux, la communication avec des tiers ou les archives organisationnelles, elle peut continuer à remodeler les ressources matérielles. L'apport de l'herméneutique est ici de rendre visible le processus par lequel la compréhension acquiert des conséquences structurelles.

4.2 Identité narrative, attribution de responsabilité et continuité relationnelle

La réflexion de Ricoeur sur l'identité narrative suggère que la continuité du soi n'est pas faite uniquement de propriétés invariantes. Les personnes organisent leurs

actions, engagements, responsabilités et expériences temporelles en soi intelligibles par le récit (Ricoeur 1992). Les relations familiales dépendent fortement de ce travail narratif. Des identités telles que « celui qui a toujours été responsable », « celle qui est impulsive », « celui qui comprend le mieux les institutions extérieures » ou « celle dont il faut prendre soin » facilitent la coordination de la vie à long terme, mais peuvent également se lier à des formes particulières d'autorité.

La force normative du récit provient en partie de sa continuité. Lorsqu'un événement est intégré dans l'histoire selon laquelle « cette personne est toujours comme ça », il peut modifier la charge de preuve lors d'événements ultérieurs. L'erreur d'un membre peut être interprétée comme un trait stable, tandis qu'une erreur similaire d'un autre est traitée comme accidentelle. Cette asymétrie narrative ne se corrige pas simplement en corrigeant un fait isolé, car le désaccord porte sur la manière dont les événements sont intégrés à une structure d'identité durable. L'article inclut donc les états interprétatifs dans l'histoire relationnelle au lieu de traiter chaque conflit comme une observation indépendante.

Le récit peut aussi soutenir l'autonomie. La capacité à redécrire son expérience, à distinguer les rôles passés des capacités présentes et à refuser qu'une dépendance temporaire se fige en identité permanente constitue une part importante de la reconstruction relationnelle. L'autonomie épistémique comprend donc plus que la possession de faits exacts. Elle inclut des ressources conceptuelles suffisantes pour décrire sa propre situation et une possibilité réelle de faire entrer cette description dans le jugement commun. Les langages professionnels, les concepts juridiques ou de nouvelles relations sociales peuvent parfois fournir des outils de redescription, mais ils peuvent aussi créer de nouvelles asymétries d'autorité et doivent donc demeurer ouverts à la réflexion.

Ce point rejoint la prudence de l'article vis-à-vis des étiquettes. Des jugements tels que « immature », « égoïste » ou « irresponsable » peuvent être fondés dans un contexte particulier, ou faire partie d'une répartition durable des rôles. Le chercheur ne peut inférer un contrôle du seul caractère négatif de l'étiquette. Il faut examiner si elle peut être contestée, si elle repose sur des preuves stables, si elle s'étend à plusieurs domaines et si elle déclenche directement des conséquences sur les ressources ou l'autorité.

4.3 Mondes normatifs, interprétation juridique et traduction

Le « nomos and narrative » de Cover situe le droit dans des mondes de sens constitués ensemble par récits, histoires et normes (Cover 1983). White conçoit pour sa part le droit comme une pratique linguistique constitutive et utilise la notion de « traduction » pour analyser la manière dont le droit construit du sens entre faits, traditions et communautés (White 1990). Ces deux approches ont ici une valeur méthodologique. Les règles ne sont pas des commandements qui fonctionnent indépen-

damment de l'interprétation. Toute norme doit être placée dans une structure de sens qui explique pourquoi elle existe, à qui elle s'applique et comment elle se rattache aux engagements antérieurs.

Les normes familiales possèdent la même dimension interprétative. Une règle de « finances communes » peut signifier mise en commun complète, autorisation selon l'usage, partage en proportions fixes ou simple commodité d'un compte joint. Une norme de « respect des aînés » peut signifier assurer le care, écouter l'expérience ou consulter les aînés sur les décisions importantes ; dans certaines relations, elle peut être interprétée comme une obligation d'obéissance finale. Ce n'est qu'en précisant les récits et les pratiques que l'on peut savoir quelle autorité un terme confère réellement.

La « traduction » possède ici un second sens. Le langage familial doit sans cesse être traduit dans les langages institutionnels de la médecine, de l'école, de la banque, de l'immigration, de la fiscalité, du contrat et de l'organisation. La capacité à traduire une expérience familiale dans des catégories reconnues par les institutions constitue elle-même une capacité. Si un seul membre maîtrise cette interface de traduction, son pouvoir interprétatif peut être renforcé par la reconnaissance institutionnelle. À l'inverse, des services multilingues, des explications indépendantes et des canaux d'accès direct peuvent réduire la dépendance à un nœud interprétatif unique.

Jurisprudence et herméneutique ne sont donc pas séparées dans ce cadre. La première concerne les compétences et la procédure ; la seconde, la manière dont les règles sont comprises et racontées. Elles se rejoignent dans la question de savoir qui peut convertir une interprétation en norme effective. C'est précisément le niveau médiateur que la notion de grammaire du pouvoir cherche à analyser.

4.4 Marchés linguistiques, capital symbolique et expression légitime

L'analyse de Bourdieu sur le langage et le pouvoir symbolique rejette l'idée d'un langage réduit à un instrument neutre de communication. La pratique linguistique est située dans des marchés linguistiques, des formes de capital linguistique et des structures de langue légitime. La force sociale d'un énoncé dépend de la position du locuteur, de sa reconnaissance dans le champ et du fait que la forme d'expression soit traitée comme légitime (Bourdieu 1991). Cette perspective éclaire directement la question de l'efficacité des raisons. Des membres de la famille peuvent disposer formellement des mêmes possibilités de parler sans que leur parole possède le même pouvoir d'achat social ou institutionnel.

Le capital linguistique peut provenir de l'éducation, de la profession, des connaissances juridiques, de l'expérience administrative, de la maîtrise d'une langue standard, de compétence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ou du maniement d'un vocabulaire technique. Il possède un double caractère. D'un côté, la capacité linguistique peut accroître fortement l'efficacité de la communication familiale avec les institutions ex-

térieures et constitue donc une ressource commune réelle. De l'autre, si toute information extérieure doit être traduite, interprétée et filtrée par le même membre, l'avantage linguistique peut se coupler aux interfaces interprétatives et de ressources. L'avantage ne consiste alors plus seulement à « mieux s'exprimer » ; il peut déterminer qui voit les options disponibles, qui peut vérifier les faits et qui peut contacter directement des tiers.

L'« expression légitime » concerne également les normes de style et d'émotion. Certaines relations peuvent n'admettre comme « rationnel » qu'un discours calme, formel et conforme à un certain style éducatif. D'autres peuvent traiter l'intensité émotionnelle, l'ancienneté ou l'expérience du sacrifice comme principales sources de qualité à intervenir. L'article ne présuppose pas la supériorité intrinsèque d'un style d'expression. Il demande comment ces standards se forment, s'ils imposent des charges asymétriques et s'ils excluent des objections raisonnables simplement parce qu'elles prennent une forme jugée inappropriée.

Ce point importe parce que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n'est pas uniquement un modèle de vérité ou de fausseté du contenu. Deux revendications de contenu comparable peuvent avoir des conséquences différentes selon la position de leurs auteurs, leur forme linguistique ou leur reconnaissance institutionnelle. Un chercheur qui se contente de noter que « les deux parties ont donné leur avis » manque ces différences d'efficacité.

4.5 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et accessibilité institutionnelle

Irvine soutient explicitement que les phénomènes linguistiques entrent dans l'économie politique : les formes linguistiques peuvent indexer des divisions sociales du travail, les capacités linguistiques peuvent devenir des objets d'échange et les pratiques linguistiques elles-mêmes sont liées aux rapports matériels (Irvine 1989). La synthèse de Gal sur langage et économie politique examine systématiquement les interactions entre différence linguistique, classe, travail, institutions et reproduction sociale (Gal 1989). Le rôle du langage dans le pouvoir familial ne peut donc être réduit à la fluidité de la communication.

La capacité à lire des contrats, remplir des formulaires, communiquer avec une banque ou une école, comprendre des instructions techniques et traduire entre plusieurs langues affecte directement l'accès des membres de la famille aux ressources institutionnelles. Lorsque ces capacités sont très concentrées, la personne qui les possède peut accomplir un travail supplémentaire réel et porter une responsabilité supplémentaire, tout en acquérant une position de négociation et d'interprétation plus forte. L'analyse doit reconnaître simultanément contribution et risque : la capacité linguistique peut être un bien commun de la coopération familiale et créer en même temps une dépendance à un point unique.

Les travaux de Heller sur la mondialisation, la nouvelle économie et la marchan-

disation du langage montrent en outre que langue et identité peuvent recevoir des valeurs d'échange différentes sur les marchés du travail et dans les institutions (Heller 2003). L'implication s'étend à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famille. Une compétence linguistique peut accroître le revenu et les possibilités de mobilité tout en faisant de son détenteur le seul membre capable de représenter la famille dans certains espaces institutionnels. Le capital linguistique affecte donc à la fois les ressources du marché et la grammaire interne du pouvoir.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explique également pourquoi la conception des institutions extérieures est importante. Services multilingues, accès direct aux comptes, formulaires clairs, interprétation indépendante et information juridique accessible réduisent la nécessité, pour une famille, de dépendre d'un « interprète » unique. L'autonomie interprétative n'est donc pas purement individuelle ; elle dépend en partie de la possibilité offerte par les institutions publiques à différents membres d'accéder directement à l'information et aux procédures.

4.6 Interfaces entre interprétation, langage et grammaire du pouvoir

En rassemblant ces théories, l'article considère l'interprétation et le langage comme quatre interfaces liées. La première est l'**interface de sens** : qui peut définir les événements et les rôles. La deuxième est l'**interface narrative** : qui peut inscrire des événements isolés dans des récits durables d'identité et de responsabilité. La troisième est l'**interface de capital linguistique** : qui dispose de meilleures capacités d'expression, de traduction et de communication institutionnelle. La quatrième est l'**interface de traductibilité institutionnelle** : quels énoncés peuvent être reconnus par banques, écoles, hôpitaux, tribunaux ou procédures organisationnelles et produire ainsi des conséquences.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intervient après ces interfaces sans s'y confondre. L'herméneutique explique comment le sens se forme ;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explique comment les capacités linguistiques se lient aux ressources et aux positions institutionnelles ;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demande ensuite quand ces différences peuvent être converties de manière stable en décisions, modifications normatives et coûts de sortie. Si un avantage linguistique améliore seulement l'efficacité de la communication sans créer de contrôle exclusif, il ne constitue pas une concentration de pouvoir au sens employé ici. Si une interprétation peut être vérifiée par les autres, contestée et corrigée par des tiers, son risque structurel est plus faible que celui d'un monopole interprétatif impossible à contester.

Cette interface permet également d'identifier de nouveaux matériaux empiriques. Outre les revenus, les comptes et les traces de décision, il faut observer qui prend en charge la communication extérieure, qui détient les textes et les preuves, quels mots comportent des implications de statut, qui effectue le travail de traduction, si les membres peuvent accéder indépendamment à l'information institutionnelle et com-

ment les récits contestés entrent dans les règles ultérieures.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n'échappe au statut de métaphore abstraite que si les matériaux linguistiques sont reliés aux matériaux matériels et institutionnels.

Il faut encore distinguer **concurrence interprétative** et **exclusion interprétative**. Il est normal que des relations mûres contiennent des récits différents, et cette pluralité peut même améliorer le jugement commun. Le problème structurel n'est pas que « quelqu'un n'est pas d'accord avec moi », mais qu'une catégorie d'interprétations soit exclue du jugement commun avant même la vérification factuelle en raison de l'identité du locuteur, de sa forme d'expression ou de sa position institutionnelle. La recherche empirique doit donc examiner pourquoi certaines interprétations sont rejetées : manque de preuves, manque de pertinence, ou simple défaut de statut reconnu.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permet enfin de décomposer la « voix » en plusieurs étapes : disposer d'une possibilité d'expression, produire une expression intelligible, être enregistré, entrer dans la procédure de décision et pouvoir déclencher une révision. La possibilité formelle de parler ne couvre que la première étape. L'enjeu pour l'analyse du pouvoir est de savoir si les étapes ultérieures favorisent systématiquement une position. L'indicateur central de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n'est donc pas « qui parle le plus », mais la manière dont le langage se convertit en conséquences institutionnelles.

5 Primitives formelles de la structure du pouvoir et état relationnel

Cette section établit un langage formel minimal. Son objectif est de décomposer des expressions comprimées telles que « qui est le plus fort » ou « qui contrôle qui » en variables relationnelles distinguables et de rendre explicites les objets sur lesquels ces variables agissent. La formalisation ne suppose ni que les cinq dimensions soient mesurables sur une même échelle, ni qu'il existe un « score total de pouvoir » unifié.

5.1 Histoire relationnelle, domaines et ensembles d'actions réalisables

Soit $\mathcal{I} = \{1, \ldots, n\}$ l'ensemble des sujets d'une relation familiale et $\mathcal{D}$ l'ensemble des domaines, par exemple résidence, finances, travail, éducation, santé, relations sociales, information et care familial. La relation possède une histoire $h_t \in \mathcal{H}$ qui contient les engagements antérieurs, les changements de règles, les allocations de ressources, les modes de résolution des conflits et les interventions de tiers. L'ensemble des actions effectivement réalisables pour le sujet i au temps t, dans le domaine d et compte tenu de l'histoire h_t, est représenté par l'équation 1.

$$\mathcal{A}_i(t, d \mid h_t) \tag{1}$$

Une « action effectivement réalisable » est une notion plus exigeante que la possibilité juridique ou logique. Une option peut exister formellement tout en étant difficile à exercer en raison de son coût économique, d'un manque d'information, de sanctions sociales, d'une dépendance statutaire ou des risques liés à la sortie. L'analyse du pouvoir doit donc distinguer **l'existence d'une option** de son **caractère supportable en pratique**.

Cette distinction sépare le cadre des analyses reposant uniquement sur les droits formels. Une personne peut juridiquement avoir la faculté de conclure un contrat, quitter un logement, ouvrir un compte ou demander une aide extérieure, tandis que ces droits restent, à court terme, difficiles à convertir en action si revenus, documents, transport, information ou soutien social passent par une interface très concentrée. Inversement, certaines ressources sociales sans titre juridique propre, telles que des amis dignes de confiance, des réseaux professionnels, des comptes numériques accessibles indépendamment ou la connaissance des procédures, peuvent élargir considérablement l'ensemble des actions réalisables.

L'équation 1 doit donc être comprise comme un **ensemble réalisable institutionnellement constitué** plutôt que comme un simple ensemble de choix psychologiques. Statut juridique, conditions économiques, réseaux sociaux et histoire relationnelle sont tous des composantes des conditions de l'action. Cette interprétation offre l'interface permettant d'intégrer dans une même analyse la structure des droits étudiée par la jurisprudence et la structure des ressources étudiée par l'économie politique.

Si une intervention du sujet j modifie l'ensemble d'actions réalisables du sujet i, la transformation est représentée par l'équation 2.

$$\mathcal{A}'_i(t, d \mid h_t) = \Phi^{d,t}_{j \to i}(\mathcal{A}_i(t, d \mid h_t), h_t) \tag{2}$$

Ici, $\Phi^{d,t}_{j \to i}$ est une transformation dépendante de la relation et du contexte. Elle peut réduire le nombre d'options, augmenter le coût de certaines d'entre elles, modifier l'accès à l'information ou au contraire élargir les options. L'existence d'une capacité ne permet donc pas à elle seule d'en déduire la valeur normative.

5.2 Cinq interfaces du pouvoir

L'article décompose les capacités de pouvoir les plus pertinentes pour son problème en cinq interfaces. Le vecteur relationnel formé par ces interfaces est donné par l'équation 3.

$$\mathbf{P}^d_{j|i}(t) = \left(D^d_{j|i}, I^d_{j|i}, N^d_{j|i}, R^d_{j|i}, X^d_{j|i}\right)_t \tag{3}$$

D est l'**interface de décision**, c'est-à-dire la capacité de modifier directement une action ou un résultat ; I est l'**interface interprétative**, c'est-à-dire la capacité de stabiliser les qualifications d'événements, de rôles et de responsabilités ; N est

l'**interface de modification normative**, c'est-à-dire la capacité de modifier les critères de jugement, les conditions des obligations ou les règles de procédure ; R est l'**interface de ressources**, c'est-à-dire la capacité de contrôler argent, logement, documents, information, réseaux sociaux ou autres ressources essentielles ; X est l'**interface de sortie**, c'est-à-dire la capacité d'accroître les coûts du refus, de la suspension, de la séparation ou de la recherche d'un soutien extérieur.

L'équation 3 n'est qu'un ensemble de coordonnées. Celles-ci peuvent être de types différents : certaines peuvent être approximées par des variables de rapport, d'autres ne permettre qu'une comparaison ordinale, d'autres encore exiger un codage d'événements. L'article évite donc des indicateurs additifs non justifiés tels que $D+I+N+R+X$.

Les cinq interfaces ne doivent pas non plus être comprises comme isolées. Une interface de ressources R peut renforcer une interface de sortie X, puisque le contrôle du logement ou des documents augmente les coûts du refus. Une interface interprétative I peut influer sur l'interface de modification normative N, puisque celui qui définit le sens d'un conflit est souvent mieux placé pour proposer les règles du tour suivant. L'exercice répété de l'interface de décision D peut à son tour se sédimenter en convention attendue. Ce que l'article appelle plus loin une « orientation vers le pouvoir » concerne précisément le couplage stable de ces interfaces, et non la recherche d'un maximum sur une dimension unique.

Les fondements légitimes des interfaces diffèrent également. Une interface de décision peut provenir d'une tutelle légale, d'une autorisation commune ou d'une responsabilité professionnelle ; une interface interprétative peut reposer sur une expertise tout en restant soumise à la vérification des faits ; une interface de ressources peut découler d'un droit de propriété ou d'une gestion confiée sans emporter pour autant le droit de contrôler la profession, les relations sociales ou l'information d'autrui. Séparer les interfaces évite ainsi de confondre « cette personne possède-t-elle un droit ? » avec « jusqu'où ce droit peut-il légitimement s'étendre dans la relation ? »

5.3 Mise à jour des normes et états interprétatifs

Soit $\mathcal{N}_t$ l'ensemble des normes relationnelles, ω_t un événement, et $\chi_{i,t}$ le poids d'influence différent des sujets dans le processus de mise à jour des normes. La relation de mise à jour est donnée par l'équation 4.

$$\mathcal{N}_{t+1} = \Psi(\mathcal{N}_t, \omega_t, \{\chi_{i,t}\}_{i \in \mathcal{I}}) \tag{4}$$

Lorsque la même position peut modifier à répétition les critères d'accomplissement, les conditions de statut ou l'attribution des responsabilités après des résultats qui lui sont défavorables, tandis que les autres participants ne disposent ni d'une capacité réelle de contester, ni de conserver des traces, ni de sortir, la stabilité des règles dimi-

nue. Le problème n'est pas que **les règles puissent changer**. Les règles familiales doivent nécessairement s'adapter au cours de la vie. La question analytique est de savoir si les modifications reposent sur des raisons, des procédures, des possibilités symétriques de contestation et des limites prévisibles.

La distinction a une portée juridique claire. La stabilité ne signifie pas codifier la relation privée, mais assurer aux règles affectant les intérêts fondamentaux un minimum de prospectivité, de publicité et de contestabilité. Une famille n'est ni un tribunal ni une administration ; toutefois, lorsque certaines décisions privées touchent durablement le logement, les finances, le statut ou les possibilités offertes par des tiers, les exigences procédurales deviennent un point de repère important pour déterminer si le pouvoir est contraint. L'intuition empruntée ici n'est pas celle d'un transfert littéral du droit procédural public, mais d'un principe plus abstrait analogue à la légalité : si les règles ne peuvent être redéfinies qu'après coup par une seule personne, une autre ne peut planifier son comportement de façon stable en respectant les standards existants.

Les états interprétatifs possèdent également une dimension temporelle. Le nom donné à un événement affecte la manière dont seront compris des événements semblables et peut déterminer quels faits seront conservés et quels comportements seront considérés comme raisonnables. La mise à jour des normes et celle des interprétations forment donc conjointement une partie de l'histoire relationnelle.

Le passage d'un événement à une étiquette interprétative est représenté par l'équation 5.

$$\mathcal{L}_{j,t} : \omega_t \longmapsto \ell_t \tag{5}$$

Ici, ℓ_t peut être une étiquette relationnelle telle que « responsable », « égoïste », « immature », « déloyal » ou « care raisonnable ». Le pouvoir interprétatif ne devient une variable structurelle que lorsque de telles étiquettes peuvent modifier de manière stable les règles ultérieures, les ressources ou l'évaluation par des tiers. Un désaccord isolé ne suffit pas à prouver une concentration du pouvoir interprétatif.

5.4 Conditions d'identification d'une structure orientée vers le pouvoir

L'article ne définit pas la structure orientée vers le pouvoir par un seuil unique. Il propose cinq conditions d'identification conjointement informatives. Pour un intervalle T et un ensemble de domaines $\mathcal{D}^* \subseteq \mathcal{D}$, une configuration relationnelle peut être analysée comme fortement orientée vers le pouvoir lorsqu'on observe la combinaison suivante :

1. **répétition** : les différences pertinentes de pouvoir apparaissent dans plusieurs événements et non dans un conflit unique ;
2. **directionnalité** : plusieurs interfaces centrales se concentrent durablement

dans la même position relationnelle ;

3. **convertibilité** : des différences de ressources, de position ou de sortie peuvent modifier de manière stable les décisions, interprétations ou résultats normatifs ;
4. **portée interdomaines** : un avantage dans un domaine pénètre d'autres domaines, par exemple quand le contrôle financier se convertit en restriction professionnelle ou sociale ;
5. **récursivité** : les avantages existants modifient les règles, ressources ou conditions de sortie futures de manière à faciliter le maintien de l'asymétrie.

Ces conditions servent à identifier la force d'une structure, et non à produire directement une conclusion éthique. Tutelle légitime, finances communes, représentation de care et autorisation d'urgence peuvent temporairement satisfaire certaines d'entre elles ; elles doivent encore être examinées sous l'angle de l'autorisation et de la procédure.

Les cinq conditions ne constituent pas mécaniquement un ensemble nécessaire et suffisant. Une relation peut n'être fortement concentrée que dans le domaine financier mais produire d'importants effets interdomaines parce que les finances conditionnent logement, profession et sortie. Une autre peut présenter des asymétries dans plusieurs domaines tout en conservant une autonomie relativement élevée grâce à la transparence, à l'autorisation révocable et à un solide soutien extérieur. Le jugement structurel requiert donc un raisonnement configurationnel sur les combinaisons d'interfaces, la centralité de certains domaines et l'histoire relationnelle, et non le calcul d'un score simple.

Empiriquement, les preuves les plus informatives sont souvent moins les événements extrêmes isolés que les ressemblances structurelles entre événements répétés. Les règles changent-elles toujours dans la même direction ? Le refus déclenche-t-il de manière stable des coûts dans plusieurs domaines ? Les ressources extérieures sont-elles régulièrement traduites en pouvoir décisionnel interne ? De telles données séquentielles peuvent aider à distinguer le conflit occasionnel d'une structure relationnelle dotée d'une capacité d'auto-maintien.

6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comme structure de conversion de second ordre

Cette section présente la reconstruction conceptuelle centrale de l'article.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n'est pas une ressource de pouvoir supplémentaire. Elle spécifie **comment les différences existantes sont converties en efficacité dans la relation**. Elle se situe donc entre ressources, normes, interprétations et résultats et fonctionne comme une règle relationnelle de second ordre.

6.1 Efficacité des raisons et conversion en conséquences

Soit q une revendication ou une déclaration de frontière, et $r(q)$ sa raison substantielle. Soit z_t l'état relationnel constitué par la position, les ressources et les conditions de sortie. L'efficacité pratique dans une relation dépend non seulement du contenu des raisons, mais aussi de la manière dont la relation convertit raisons et positions en conséquences. Cette structure est représentée par l'équation 6.

$$\mathcal{G}_t : (q, r(q), z_t, h_t) \longmapsto \big(J_t(q), C_t(q)\big) \tag{6}$$

$J_t(q)$ désigne l'ensemble des raisons reconnues, dans la relation présente, comme admissibles au jugement ; $C_t(q)$ désigne l'ensemble des conséquences pratiques que la revendication peut déclencher.

Dans une relation fortement délibérative, $J_t(q)$ est davantage sensible au contenu des raisons, à l'autorisation et aux règles communes. Dans une grammaire fortement orientée vers le pouvoir, $C_t(q)$ est souvent plus sensible à la capacité du locuteur à faire appliquer sa position, retirer des ressources, augmenter les coûts de sortie ou réécrire les règles. Le terme « grammaire » désigne ici, à la fois de manière métaphorique et formelle, les **règles de conversion de l'efficacité**, et non la grammaire au sens linguistique.

Considérons deux participants qui déclarent tous deux : « 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t arrangement ». Si le désaccord du premier déclenche une suspension, une renégociation et une trace commune, tandis que celui du second n'est traité que comme émotion ou immaturité, tous deux disposent formellement d'un droit d'expression mais leurs énoncés ont une force pratique radicalement différente.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vise précisément cet écart. Les relations ne distribuent pas seulement des occasions de parler ; elles distribuent aussi la capacité de certains énoncés à modifier la procédure, de certains refus à interrompre l'action et de certaines interprétations à entrer dans les règles ultérieures.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n'est donc pas une simple analyse du discours. Elle contient des conséquences matérielles et institutionnelles. Une raison peut être « effective » parce qu'elle est reconnue par les normes communes ou parce que celui qui l'avance contrôle une ressource essentielle. Une règle peut perdurer parce que les participants y adhèrent sincèrement ou parce que le coût de sa contestation est prohibitif. Il faut distinguer ces voies pour ne pas confondre consentement, conformité et impossibilité de supporter le coût du refus.

6.2 Distinction entre grammaire du pouvoir et théories existantes

Le concept entretient trois rapports de proximité avec les théories existantes. Premièrement, il accepte la prémisse relationnelle de la théorie de la dépendance au pouvoir : le pouvoir est lié aux alternatives, à la dépendance et à la position dans les

ressources (Emerson 1962). Deuxièmement, il est compatible avec les recherches sur le pouvoir caché et multidimensionnel, puisque la sélection des enjeux, l'interprétation et les normes peuvent également constituer des processus de pouvoir (Komter 1989 ; Lukes 2021). Troisièmement, il conserve l'avertissement d'Allen selon lequel les rapports entre power-over et empowerment sont complexes : accroître la capacité d'un sujet ne signifie pas nécessairement accroître sa domination, car la capacité peut servir à établir les conditions d'une délibération commune (Allen 1998).

La valeur analytique propre de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tient au passage de la question de premier ordre « qui possède quelles ressources ? » à la question de second ordre « quelles différences peuvent, dans cette relation, se convertir en décisions effectives ? ». Deux relations peuvent contenir des écarts de revenus proches mais, en raison de règles, d'autorisations, d'institutions extérieures et de conditions de sortie différentes, présenter des structures d'efficacité pratique entièrement différentes. Inversement, de faibles écarts de ressources n'excluent pas une forte concentration du pouvoir interprétatif ou normatif.

Cette distinction explique aussi pourquoi l'ensemble des conclusions de l'article ne peut être directement déduit de la théorie des ressources. Celle-ci peut expliquer comment alternatives et dépendance affectent la position de négociation, mais ne suffit pas à dire pourquoi certaines ressources sont reconnues comme décisives dans une relation et d'autres non. Un membre à faible revenu peut disposer d'un droit de refus très robuste grâce à un droit de propriété, une qualification professionnelle ou un soutien institutionnel extérieur. Un membre à revenu élevé peut être empêché de transformer son avantage économique en décision unilatérale par les règles transparentes d'un budget commun.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se situe ainsi entre distribution des ressources et distribution des résultats.

La différence avec les théories multidimensionnelles du pouvoir concerne l'échelle d'analyse. Les théories comme celle de Lukes montrent que le pouvoir peut opérer dans la décision, la fixation de l'agenda et la formation des préférences. Le présent article demande en outre comment ces niveaux se convertissent mutuellement, dans une configuration relationnelle concrète, par l'autorisation, les règles, les traces et les coûts de sortie. Le concept n'apporte une valeur supplémentaire que si cette conversion est empiriquement identifiable. C'est pourquoi l'article l'énonce plus loin sous forme de proposition réfutable plutôt que de rebaptiser toute interaction complexe « grammaire du pouvoir ».

L'herméneutique et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fournissent un fondement plus explicite à cette idée de conversion. Les raisons n'existent pas d'abord sous une forme complètement neutre pour être ensuite déformées par le pouvoir ; elles doivent déjà être comprises dans un langage, un récit et une catégorie institutionnelle. Mais la maîtrise d'une langue légitime, d'un vocabulaire professionnel ou d'un format administratif ne confère pas automatiquement le droit de décider des affaires d'autrui.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porte sur les étapes intermédiaires : quand un avantage linguistique ou interprétatif est-il reconnu comme qualité, quand cette qualité peut-elle modifier la procédure et quand la procédure modifiée pénètre-t-elle les interfaces de ressources et de sortie ?

L'article distingue donc **efficacité linguistique** et **efficacité de pouvoir**. Un énoncé peut être sémantiquement clair et factuellement exact sans modifier aucun résultat parce que son auteur n'a pas accès aux institutions ; un autre peut être linguistiquement très bref mais avoir des conséquences immédiates parce que son auteur contrôle un compte, des documents d'identité ou une compétence organisationnelle. L'analyse bourdieusienne des marchés linguistiques et du pouvoir symbolique (Bourdieu 1991) aide à comprendre l'inégalité de la force sociale de la parole.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ajoute une exigence : vérifier si cette inégalité entre de manière stable dans les décisions, la modification des normes et les coûts de sortie.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demeure également distincte de l'herméneutique. L'historicité gadamérienne montre que toute compréhension a des préstructures (Gadamer 2013), mais l'historicité n'est pas en elle-même domination. La compréhension rapide fondée sur une histoire commune améliore souvent la coopération familiale. Les différences interprétatives n'entrent dans le mécanisme de pouvoir étudié ici que lorsque certaines interprétations sont structurellement dispensées de vérification, que les interprétations concurrentes perdent l'accès au jugement commun et que cet avantage peut durablement modifier règles ou ressources.

6.3 Verrouillage grammatical et dépendance au sentier relationnelle

L'histoire relationnelle h_t façonne l'interprétation des revendications présentes. Si, dans le passé, le refus a souvent entraîné des coûts élevés, les participants peuvent modifier leur conduite avant même qu'un nouvel événement n'advienne. Si les règles sont régulièrement réécrites après les résultats, un sujet peut finir par comprendre la « conformité » comme un objectif impossible.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présente alors une dépendance au sentier.

La mise à jour historiquement dépendante de la grammaire est représentée par l'équation 7.

$$\mathcal{G}_{t+1} = \Xi(\mathcal{G}_t, \omega_t, \mathbf{P}_t, \mathcal{N}_t) \tag{7}$$

Lorsque des exercices antérieurs du pouvoir accroissent durablement l'acceptabilité, l'exécutabilité ou le faible coût d'exercices semblables, un **verrouillage grammatical** apparaît. Il ne requiert pas un ordre explicite à chaque fois : l'apprentissage des conséquences suffit à remodeler l'action ultérieure. Symétriquement, le décentrement du pouvoir exige du temps : une promesse bienveillante ne peut réécrire automatiquement des attentes d'efficacité produites par une longue histoire interactionnelle.

Le verrouillage peut se former au moins par trois voies. Premièrement, l'app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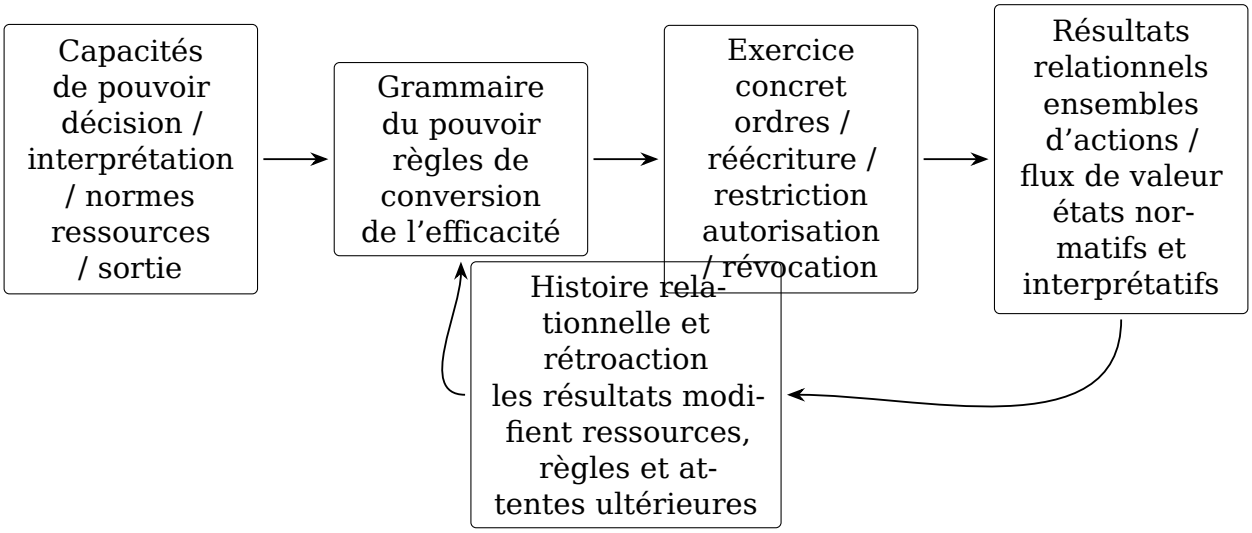

Figure 1 – Distinction entre capacités de pouvoir, grammaire du pouvoir, exercice concret et résultats relationnels

tissage comportemental : les participants découvrent que certaines revendications de frontière échouent régulièrement et cessent donc d'en formuler avant même le conflit suivant. Deuxièmement, la sédimentation institutionnelle : des arrangements initialement temporaires concernant comptes, documents ou communication deviennent des routines de fait qui rendent l'accès de plus en plus difficile pour les autres. Troisièmement, la sédimentation du sens : des étiquettes de rôle telles que « la personne raisonnable », « la personne responsable » ou « celle dont il faut s'occuper » se lient durablement à certaines compétences et fournissent un soutien narratif à leur expansion.

Cela ne signifie pas que les sujets soient complètement déterminés par la structure. Au contraire, la dépendance au sentier montre que le changement exige de nouvelles expériences répétables : autorisation claire, objection réussie, règles qui restent stables, soutien extérieur utilisable et erreurs corrigibles. Ce n'est qu'à mesure que de tels événements s'accumulent que les participants révisent leurs attentes quant aux conséquences relationnelles. La reconstruction est donc à la fois un projet normatif et un processus d'apprentissage.

La figure 1 sépare quatre niveaux analytiques. Elle évite de déduire directement l'existence d'un contrôle de la seule existence d'une capacité, et d'inférer d'un résultat qu'un sujet unique porte toute la responsabilité causale.

6.4 Cas limites et contre-exemples

Afin d'accroître le pouvoir discriminant du concept, l'article maintient explicitement les cas limites suivants.

Le tableau 2 montre que la distinction centrale porte sur la question de savoir si le pouvoir est limité par l'autorisation, les raisons, la procédure, la proportionnalité et les conditions de sortie. Toute recherche empirique doit donc consigner simultané-

Table 2 – Cas limites de relations asymétriques et variables de distinction

Situation	Fondement légitime possible de l'asymétrie	Variables structurelles restant à examiner
Care et tutelle des enfants	Âge, devoirs de protection, différences de capacité et responsabilité juridique	Proportion des compétences au stade de développement ; maintien d'un espace d'expression, de révision et d'autonomie croissante
Maladie ou représentation d'urgence	Pression temporelle, limitation temporaire de capacité, nécessité vitale et sécuritaire	Étendue de l'autorisation, nécessité, durée, explication ultérieure et conditions de cessation du mandat
Gestion des finances communes	Réduction des coûts, spécialisation et objectifs communs	Visibilité de l'information, autorisation bilatérale, droit de révocation et sphère minimale de contrôle personnel
Relation de care à forte dépendance	Concentration des ressources de care et différences d'expertise	Usage éventuel de la dépendance pour étendre le contrôle à des domaines sans rapport ; existence de soutiens extérieurs et de voies de recours
Obligation culturelle ou familiale	Vie commune stable, responsabilité intergénérationnelle et normes partagées	Contestabilité des obligations, coûts de sortie incomparables pour certains membres, maintien d'un seuil minimal d'autonomie

ment les différences de pouvoir et les structures qui les justifient et les bornent.

Les cas limites ne servent pas seulement à prévenir les erreurs de classification. Ils clarifient aussi le mécanisme central. L'autorité adulte sur les enfants peut être légitime non parce que les adultes possèdent naturellement un pouvoir illimité, mais parce que cette autorité est liée à des finalités de protection, au développement et à des responsabilités de care. Un mandat d'urgence peut être accepté parce qu'il est lié à la nécessité, limité dans le temps et soumis à une explication ultérieure. Lorsque ces limitations disparaissent, une capacité initialement légitime peut subir une dérive fonctionnelle.

L'article refuse donc d'opposer « autonomie » et « influence extérieure » en tant que telles. Des relations mûres permettent autorisation, confiance, care et gestion commune tout en exigeant des frontières explicables. Ce que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invite particulièrement à surveiller est la conversion répétée d'une autorisation limitée en revendication de statut plus large, jusqu'à modifier l'efficacité pratique des raisons dans d'autres domaines.

7 Confiance structurelle, prévisibilité et autonomie épistémique

Cette section examine pourquoi un sujet peut rationnellement rester prudent dans une relation et quelles conditions structurelles sont nécessaires à la réparation de la confiance. La confiance n'est pas simplement un sentiment chaleureux ; elle im-

plique le choix relationnel d'exposer des intérêts futurs à la conduite d'autrui. Baier (1986) insiste sur la vulnérabilité propre à la confiance, tandis que Hardin (2002) l'analyse à partir des intérêts encapsulés et des relations durables. L'article ne choisit pas une définition unique entre ces approches ; il en retient un point commun : **la confiance accroît l'exposition à la conduite future d'autrui**.

7.1 Vecteur conditionnel de la confiance structurelle

Pour l'exposition du sujet i au sujet j, l'article définit le vecteur conditionnel de la confiance structurelle par l'équation 8.

$$\mathbf{K}_{i|j}(t,d) = \big(L, S, Q, V, C, E\big)_{t,d} \tag{8}$$

L désigne l'effectivité des frontières du pouvoir, S la stabilité des règles essentielles, Q l'espace de contestation et de désaccord, V la vérifiabilité des faits et des engagements, C la capacité de correction et de réparation, et E la capacité réelle de sortir d'un arrangement ou de le suspendre. Aucune de ces six conditions ne suffit à elle seule à créer la confiance, mais elles influent sur l'ampleur des pertes irréversibles susceptibles de suivre une erreur de jugement.

La confiance structurelle a donc un objet différent de la confiance dans le caractère. Cette dernière demande si l'autre est bienveillant, honnête ou fiable. La confiance structurelle demande si, même en cas de désaccord grave, il existe suffisamment de limites pour qu'aucune partie ne puisse modifier arbitrairement les conditions fondamentales de vie de l'autre. Les deux peuvent coexister ou diverger. Une personne peut croire qu'un proche est globalement bien intentionné tout en exigeant des relevés financiers, un compte indépendant et une autorisation explicite.

La distinction est particulièrement utile dans les relations intimes, où la confiance reçoit souvent une signification morale. Demander des traces, des frontières ou un compte séparé peut être interprété comme « ne pas faire confiance à sa famille ». La notion de confiance structurelle rejette ce binaire. Les traces et les frontières n'expriment pas nécessairement une suspicion envers le caractère ; elles peuvent aussi constituer des conditions institutionnelles permettant aux deux parties de ne pas dépendre excessivement de jugements de personnalité. Plus la relation engage des intérêts irréversibles, des responsabilités envers des tiers ou une dépendance durable, plus il est raisonnable de transférer une partie de la charge de confiance vers des procédures vérifiables.

Dans cette perspective, une relation digne de confiance n'est pas une relation sans garde-fous. C'est une relation dans laquelle les garde-fous ne sont plus vécus comme hostiles. Une structure dont les règles sont stables, l'information transparente et la correction accessible peut absorber malentendus, fluctuations émotionnelles et conflits d'intérêts sans transformer chaque désaccord en risque existentiel.

Les six conditions entretiennent également des relations de substitution et de complémentarité. Une faible capacité de sortie, lorsqu'elle s'accompagne de règles très stables, d'un fort contrôle par des tiers et d'une information complète, ne présente pas nécessairement le même risque qu'une dépendance entièrement non contrainte. Inversement, une faculté formelle de sortie protège peu si la sortie entraîne la perte de tout logement, de toutes relations sociales ou d'un statut juridique. **K** doit donc être compris comme une configuration et non comme un score linéaire. La recherche empirique devrait identifier quelles combinaisons sont les plus importantes selon le type de risque.

La théorie de la justice implique en outre que les conditions minimales de confiance structurelle ne devraient pas être définies unilatéralement par la position relationnelle la plus forte. Ce qui compte comme « transparence suffisante », « sortie raisonnable » ou « correction adéquate » doit tenir compte des pertes supportées par les personnes affectées et de leurs capacités réelles. Faute de quoi, un standard apparemment uniforme de confiance peut imposer un risque plus élevé à la partie la plus faible.

7.2 Stabilité des règles, capacité de contestation et correction

La stabilité des règles ne signifie pas leur immuabilité. Son cœur est la prévisibilité de la procédure de modification : les participants peuvent savoir pourquoi une règle change, qui peut la modifier, à quel moment le changement entre en vigueur et si une objection est possible. De même, la capacité de contestation n'exige pas l'accord dans tous les litiges ; elle exige que le désaccord ne déclenche pas automatiquement une sanction disproportionnée par rapport à l'objet du conflit.

La condition de correction C est particulièrement importante. Même lorsque les deux parties agissent de bonne foi, les relations complexes produisent malentendus, asymétries d'information et erreurs d'exécution. Une structure de haute confiance doit permettre d'identifier les erreurs, de préserver les traces, de restaurer les pertes, de corriger les règles et de redéfinir les autorisations. Walker (2006), dans ses travaux sur la réparation morale, montre que réparer une relation implique reconnaissance de la responsabilité, reconstruction des normes et rétablissement des conditions d'une interaction digne de confiance, et pas seulement réconciliation affective. C'est pourquoi l'article inclut la capacité de réparation parmi les conditions de la confiance structurelle.

Du point de vue juridique, contestation et correction peuvent être comprises comme des garanties procédurales à petite échelle. Elles n'exigent pas que la famille reproduise une procédure judiciaire formelle ; elles exigent toutefois, lorsque des intérêts fondamentaux sont en jeu, que des raisons puissent être formulées, des preuves conservées, des décisions révisées et des erreurs reconnues. La valeur de la procédure n'est pas seulement de produire une décision « plus équitable » ; elle

ralentit aussi la transformation d'une interprétation unique en fait irréversible.

Cela explique aussi pourquoi stabilité et correction sont compatibles. La stabilité n'est pas rigidité, la correction n'est pas réécriture arbitraire. Une structure robuste peut préciser dans quelles conditions une règle doit être modifiée, qui peut proposer cette modification et quels intérêts existants doivent bénéficier d'une protection transitoire. Ce qui détruit la prévisibilité est la possibilité, pour la seule position forte, de modifier les standards sans charge d'explication.

La charge de justification constitue elle-même un indicateur de pouvoir. Si une partie peut modifier une règle importante sans s'expliquer alors que toute déviation de l'autre exige une justification complète, une procédure qui autorise formellement les deux à parler distribue néanmoins de manière asymétrique les coûts de preuve. L'intuition procédurale de la jurisprudence suggère que la charge de justification doit correspondre à l'intensité de l'autorité : plus une décision peut transformer les intérêts fondamentaux d'autrui, plus elle doit supporter de fortes obligations d'explication, d'enregistrement et de révision.

La correction doit enfin être distinguée selon trois niveaux : correction des faits, correction des règles et réparation relationnelle. La première traite de « ce qui s'est passé » ; la deuxième de l'applicabilité des normes ; la troisième de l'érosion de confiance produite par l'erreur et des garanties futures. Les confondre peut créer de nouveaux conflits, par exemple lorsqu'une excuse remplace la restitution d'une perte ou lorsqu'une modification de règle sert à éviter l'explication d'un comportement passé. Une analyse rigoureuse doit préciser à quel niveau la réparation intervient.

7.3 Autonomie épistémique et capture interprétative

Le sujet doit conserver la capacité de décrire les événements de manière indépendante, de comparer les interprétations, de conserver des preuves et de rechercher une vérification extérieure. L'article appelle cette capacité **autonomie épistémique**. Elle est voisine des travaux sur la crédibilité, les ressources interprétatives et le pouvoir épistémique dans la littérature sur l'injustice épistémique (Fricker 2007), mais elle est employée ici dans un sens plus étroit. Un désaccord quelconque ne suffit pas à établir une injustice épistémique ; la question est de savoir si **des différences d'interprétation sont systématiquement privées d'accès au jugement commun en raison de la position relationnelle**.

Lorsqu'une même position contrôle à la fois les sources d'information, les traces des événements, l'accès aux tiers et l'interprétation des normes, une **capture interprétative** peut se produire. Elle ne se définit pas par le fait que « l'autre a toujours tort », mais par le fait que les interprétations concurrentes ne disposent pas de voies indépendantes de conservation, de vérification ou d'accès à la décision. L'autonomie épistémique comporte donc au moins quatre capacités : enregistrer les faits, former des concepts, comparer des explications alternatives et obtenir une vérification ex-

térieure. Ces capacités constituent les préconditions épistémiques d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 un sujet ne peut autoriser efficacement que s'il sait d'où vient la valeur, comment elle circule et selon quelles règles elle est disposée.

L'autonomie épistémique ne signifie pas s'obstiner dans son propre point de vue. Une autonomie épistémique robuste inclut la capacité d'accepter les éléments contraires et de réviser son jugement. Un sujet qui n'autorise que l'auto-confirmation et exclut la vérification extérieure ne dispose pas davantage de conditions épistémiques solides. L'accent porte donc sur la pluralité des sources d'information et la comparabilité des interprétations, et non sur l'élévation automatique du récit à la première personne au rang de fait final.

La capture interprétative exige une prudence particulière dans la recherche empirique. Les membres de la famille peuvent posséder des avantages réels de connaissance, de langue, de compétences numériques ou d'expérience professionnelle. Il faut déterminer si ces avantages restent ouverts à la vérification, si d'autres peuvent les compléter grâce à des ressources tierces et s'ils sont convertis en compétence décisionnelle au-delà du domaine d'expertise. Le problème structurel devient plus clair lorsque l'avantage interprétatif se couple durablement à la fermeture informationnelle, au contrôle des traces et à la modification des normes.

7.4 Séquence structurelle de la réparation de la confiance

L'article ne considère pas « commencer par faire confiance » comme un point de départ généralement valable pour réparer une relation. Dans des situations de forte incertitude ou d'asymétrie, une séquence plus robuste consiste d'abord à réduire le risque irréversible, puis à laisser une confiance fondée sur l'expérience émerger par des interactions répétées. Cette relation directionnelle est représentée par l'équation 9.

$$\Delta L, \Delta S, \Delta Q, \Delta V, \Delta C, \Delta E > 0 \quad \Rightarrow \quad \text{la plage d'exposition à la confiance supportable peut s'élargir} \tag{9}$$

L'équation 9 n'exprime qu'une hypothèse directionnelle entre amélioration des conditions et exposition supportable. Elle n'implique ni que la confiance psychologique augmente au même rythme ni que la vitesse de réparation soit déterminée.

La réparation de la confiance possède aussi une temporalité irréductible. Lorsque des événements passés ont accru la probabilité subjective d'un risque, de simples promesses futures rétablissent rarement immédiatement le niveau antérieur d'exposition. L'amélioration structurelle doit être vérifiée dans plusieurs événements, surtout lorsque les intérêts des participants divergent réellement. La meilleure preuve d'un changement de grammaire n'est donc pas l'harmonie en l'absence de conflit, mais le fait que, lors d'un désaccord, les règles restent stables, le dissentiment puisse encore s'exprimer et les frontières établies soient encore respectées.

Cela signifie également qu'exiger de la position la plus faible qu'elle « fasse d'abord preuve de confiance » peut inverser la charge de la preuve. Une séquence plus robuste consiste à faire réduire d'abord le risque irréversible par la partie disposant de la plus grande capacité structurelle ou par des institutions communes, puis à permettre à la confiance de croître avec l'expérience. Il s'agit toujours d'une proposition générale de mécanisme, non d'une instruction pour une relation particulière.

Du point de vue de la justice, la réparation implique aussi la répartition de la charge de la preuve et du risque. Si une partie peut restaurer son ancien contrôle à faible coût tandis que l'autre, en cas d'erreur, supporte de lourdes pertes en matière de logement, d'actifs, de statut ou de responsabilité envers des tiers, exiger que « les deux prennent le même risque » n'est pas neutre. La prise de risque doit être reliée au contrôle, à la réversibilité des pertes et au dossier historique des règles. La confiance structurelle a notamment pour valeur de rendre visible cette distribution du risque au lieu d'attribuer la prudence à un défaut de personnalité.

Du point de vue herméneutique, la réparation exige également des récits du passé qui puissent coexister au moins minimalement. Une identité complète de récit n'est pas nécessaire. Mais si une partie affirme que tous les conflits passés n'étaient que des « malentendus » de l'autre, tandis que l'autre interprète tout comportement comme malveillant, les règles futures auront du mal à acquérir un sens commun. Une réparation durable doit permettre la coexistence de récits différents tout en établissant des traces communes plus claires des faits vérifiables, des règles promises et des compétences futures. La relation peut ainsi mettre en place des frontières tournées vers l'avenir avant de résoudre tous les désaccords historiques de sens.

Les conditions linguistiques comptent également. Un arrangement réparateur qui ne peut être expliqué que par la personne qui maîtrise le langage professionnel, juridique ou administratif peut n'être transparent qu'en apparence. Les documents importants, les règles de comptes et les procédures auprès des tiers doivent être présentés d'une manière que les participants concernés peuvent réellement comprendre et vérifier indépendamment. La confiance structurelle devient ainsi une forme d'intelligibilité institutionnalisée : les participants ne savent pas seulement que les règles existent, ils savent comment elles fonctionnent, comment contester et comment déclencher une correction.

8 Structure multidimensionnelle de la formation de l'autonomie

Cette section définit l'autonomie comme une capacité relationnelle et non comme une volonté isolée. Les recherches sur l'autonomie relationnelle ont analysé de manière systématique comment structures sociales, relations d'identité et conditions dialogiques peuvent soutenir ou compromettre l'autonomie (Mackenzie et Stoljar 2000 ;

Friedman 2003 ; Westlund 2009 ; Nedelsky 2012). L'article reprend cette orientation et décompose encore l'autonomie en **dimensions** et en **niveaux de robustesse**.

8.1 Vecteur d'autonomie à six dimensions

Les conditions d'autonomie du sujet i sont représentées par l'équation 10.

$$\mathbf{A}_i(t) = \left(A^{\text{econ}}, A^{\text{inst}}, A^{\text{rel}}, A^{\text{epi}}, A^{\text{val}}, A^{\text{exit}}\right)_t \tag{10}$$

Les six dimensions correspondent respectivement aux ressources économiques et au contrôle financier de base ; à la capacité d'utiliser indépendamment identité institutionnelle, comptes, contrats et services publics ; à la capacité de maintenir des réseaux sociaux qui ne dépendent pas entièrement d'un nœud relationnel unique ; à l'autonomie épistémique ; à la capacité d'autoriser et de disposer de la valeur personnelle et coproduite ; et à la capacité pratique de refuser, suspendre, modifier ou quitter des arrangements relationnels à haut risque. La dernière dimension présente une parenté analytique avec la distinction classique entre exit et voice de Hirschman (1970), mais la sortie d'une relation familiale emporte souvent simultanément des coûts affectifs, identitaires, de care et de subsistance. Elle est donc traitée comme une capacité pratique multidimensionnelle plutôt que comme un simple choix d'appartenance.

Ces dimensions sont complémentaires. Un revenu élevé peut être neutralisé par le contrôle du compte ; l'indépendance juridique formelle peut être difficile à mettre en œuvre sans information, documents, logement ou soutien social ; des réseaux riches peuvent ne pas compenser un statut institutionnel limité. L'autonomie ne peut donc être ramenée de manière fiable à une variable unique.

Les six dimensions entretiennent aussi des relations de conversion. Les ressources économiques peuvent acheter logement, transport et services professionnels et accroître ainsi la capacité de sortie ; le statut institutionnel peut convertir des droits abstraits en contrats et comptes exécutoires ; les réseaux relationnels peuvent fournir information, soutien émotionnel et alternatives ; l'autonomie épistémique aide à reconnaître les options réellement disponibles. L'autonomie ressemble ainsi davantage à un système de capacités qui se soutiennent mutuellement qu'à six « actifs » séparés.

Cette compréhension systémique permet aussi la coexistence de l'autonomie et de la dépendance. Un sujet peut choisir de confier une partie de ses affaires à une personne digne de confiance tant que cette autorisation ne détruit pas sa capacité de comprendre, réviser, révoquer et rechercher des alternatives. Le cœur de l'autonomie relationnelle n'est donc pas le contrôle personnel permanent de chaque détail, mais la possibilité de réentrer dans le processus décisionnel aux moments importants et de conserver les conditions nécessaires à la formation et à la révision de ses propres

jugements.

8.2 Disponibilité, contrôle et robustesse

Une même ressource d'autonomie doit encore être distinguée selon trois niveaux. Pour une dimension k, cette structure est représentée par l'équation 11.

$$A_i^k(t) = \left(a_i^k, c_i^k, r_i^k\right)_t \tag{11}$$

a désigne la **disponibilité** de la ressource ou de l'option, c le **contrôle effectif** qu'exerce le sujet, et r sa **robustesse** face à l'ingérence extérieure. « Avoir un compte bancaire » n'établit, par exemple, que la disponibilité. Les mots de passe et autorisations de transaction déterminent le contrôle ; la possibilité que le compte reste utilisable sous pression d'un tiers, rétention de documents ou dépendance statutaire relève de la robustesse.

Ce modèle à trois niveaux explique pourquoi indépendance formelle et autonomie substantielle peuvent diverger. Il évite aussi de traiter l'autonomie comme un état binaire : elle peut se former progressivement et de façon inégale selon les dimensions et les niveaux.

Les droits juridiques formels accroissent surtout la disponibilité, mais leur utilisation dépend de connaissances procédurales, du coût, du temps, des preuves et de l'accessibilité institutionnelle. Les distributions politico-économiques de ressources affectent quant à elles contrôle et robustesse. Un même revenu nominal est moins robuste s'il ne peut être maintenu qu'au moyen du compte, du logement ou du statut d'une autre personne. Le modèle à trois niveaux fournit ainsi un langage commun pour relier l'analyse des droits à celle des ressources.

La robustesse est aussi relative au contexte. Un arrangement peut bien fonctionner dans des périodes ordinaires de faible conflit et s'effondrer lorsque la relation se détériore, en cas de chômage, de migration ou de maladie. Évaluer l'autonomie exige donc davantage que constater la disponibilité en période calme : il faut demander si un espace minimal d'action subsiste sous une pression raisonnablement prévisible.

Le modèle explique également pourquoi la même ressource peut posséder une valeur d'autonomie très différente selon la relation. Deux personnes peuvent officiellement avoir chacune un compte bancaire ; l'une détient directement ses identifiants et peut contacter la banque, tandis que les identifiants, le téléphone et les documents d'identité de l'autre sont contrôlés par un tiers. Elles se ressemblent par la disponibilité de la ressource, mais diffèrent fortement par le contrôle et la robustesse. Les mêmes écarts existent pour le statut juridique, les qualifications professionnelles et les réseaux sociaux.

La robustesse est particulièrement importante en situation de conflit. Si une ressource n'est utilisable que lorsque la relation est harmonieuse et qu'elle est suspen-

due, gelée ou assortie de sanctions dès qu'un désaccord apparaît, elle offre une base faible à des frontières réelles. L'article distingue donc « utilisable en temps ordinaire » et « encore utilisable en cas de conflit » ; le second indicateur reflète mieux la protection structurelle de l'autonomie.

Le modèle évite également d'assimiler autonomie et maximisation des actifs. Une personne peut disposer de peu de ressources tout en conservant une forte robustesse grâce aux services publics, à des réseaux fiables et à des droits stables. À l'inverse, une personne à haut revenu peut manquer d'autonomie pratique dans un domaine si toutes ses interfaces institutionnelles sont contrôlées par un autre nœud. Quantité de ressources, contrôle et résilience doivent être observés séparément.

8.3 Un ordre de vie hors de la portée d'un pouvoir familial concentré

Soit $\mathcal{O}_i$ l'ordre de vie qu'un sujet peut maintenir avec une relative indépendance et $\mathcal{O}_F$ le domaine directement organisé par le réseau de pouvoir familial. La condition d'absorption à long terme examinée par l'article est représentée par l'équation 12, et l'évitement de cette condition constitue un objectif analytique.

$$\mathcal{O}_i \subseteq \mathcal{O}_F \tag{12}$$

Le problème apparaît lorsque cette relation devient durable et dépourvue d'alternatives. Lorsque lieu de vie, revenus, procédures de statut, possibilités professionnelles, réseaux sociaux et canaux d'information passent tous par le même nœud de pouvoir, un conflit dans un domaine peut rapidement devenir un risque pour l'ensemble de l'ordre de vie. Des soutiens institutionnels et sociaux extérieurs, même limités, peuvent réduire cette absorption interdomaines.

Le terme « extérieur » est relatif à un réseau de pouvoir particulier et ne signifie pas rupture avec la famille. Un sujet peut conserver une forte intimité, une vie commune et des ressources partagées tout en disposant de documents juridiques directement accessibles, de comptes professionnels, de contacts de travail ou de soutiens sociaux indépendants. L'essentiel est que ces points d'appui ne puissent être activés qu'avec la permission de la même personne.

Ce point comporte aussi des implications institutionnelles et de politique publique. Services publics, logement abordable, comptes financiers indépendants, opportunités de travail, aide juridique et soutien au care semblent extérieurs à la famille, mais modifient directement les conditions pratiques de négociation en son sein. La section suivante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approfondit cette idée. L'autonomie intrafamiliale ne s'explique pas seulement par les « compétences de communication », puisque les institutions extérieures remodèlent systématiquement les ensembles d'actions réalisables.

8.4 Contrôlabilité progressive

La formation de l'autonomie possède une dimension temporelle. Lorsqu'un sujet assume des rôles très sensibles, irréversibles ou fortement fiduciaires alors que l'influence du réseau privé reste forte, les risques de débordement peuvent augmenter. À l'inverse, se retirer complètement de la participation sociale peut accroître la dépendance. L'article propose donc le principe de **contrôlabilité progressive** : l'ampleur des responsabilités doit rester compatible avec la robustesse de l'autonomie et la capacité de contrôle des interfaces pertinentes.

Soit τ_t le degré d'exposition fiduciaire et $C_i(t)$ la capacité du sujet à contrôler les interfaces essentielles. La contrainte heuristique est représentée par l'équation 13.

$$\tau_t \preceq \Theta(\mathbf{A}_i(t), C_i(t)) \tag{13}$$

$\preceq$ signifie ici « compatible avec la frontière de capacité » et non inférieur ou égal numériquement ; Θ n'est pas non plus une fonction empiriquement estimée. L'expression rend explicite un principe normatif : à mesure que frontières, traces, isolation et capacités de sortie s'améliorent, un sujet peut assumer des interfaces fiduciaires plus complexes. Croissance de la responsabilité et capacité de contrôle doivent progresser ensemble.

La contrôlabilité progressive s'applique à la formation de l'autonomie individuelle comme à l'allocation organisationnelle de compétences. Elle rejette deux extrêmes : exposer des frontières encore instables à des responsabilités hautement irréversibles, ou exclure durablement un sujet de rôles sociaux ou professionnels simplement parce qu'il existe des risques liés à ses relations privées. Une meilleure question institutionnelle consiste à savoir quelles compétences peuvent être ouvertes par étapes, quelles interfaces exigent un double contrôle et quelles garanties supplémentaires peuvent être assouplies une fois des capacités stables établies.

Cette démarche évite également d'assimiler un « poste de faible rang » à un « poste à faible risque ». Certains rôles apparemment simples peuvent donner accès à des espèces, des données personnelles, des achats ou une autorité de représentation, tandis que des rôles de recherche ou professionnels élevés peuvent disposer d'une révision collégiale claire et de permissions bien séparées. L'évaluation du risque doit porter sur la nature et la réversibilité des interfaces plutôt que sur le prestige de la position.

Une variable centrale de la contrôlabilité progressive est la **réversibilité**. Un sujet qui apprend à maintenir des frontières commettra inévitablement des erreurs de jugement, de communication ou des retours à d'anciennes grammaires relationnelles. Si toute erreur entraîne immédiatement une perte irréversible d'actifs ou un dommage grave à des tiers, le coût de l'apprentissage est trop élevé. Des responsabilités qui peuvent être suspendues, révisées et plafonnées permettent au contraire

de former des pratiques nouvelles dans une expérience réelle.

La même logique vaut dans la famille. Les frontières importantes n'ont pas besoin d'être transformées simultanément dans tous les domaines. De nouvelles règles peuvent d'abord être établies sur des interfaces faciles à observer, comme l'accès aux comptes, la garde des documents ou la communication extérieure, puis étendues à des actifs communs ou des arrangements de care plus complexes. La progressivité ne signifie pas reporter indéfiniment l'autonomie ; elle vise à réduire les coûts de transition par des états intermédiaires vérifiables.

Du point de vue de la justice, les arrangements progressifs ne peuvent devenir une justification permanente de la limitation de la partie la plus faible. Si « pas encore prêt » est défini unilatéralement et sans terme par la position forte, l'expression peut elle-même devenir un instrument de modification normative. La progressivité exige donc des conditions de progression explicites, des moments de révision et la participation du sujet concerné.

8.5 Autonomie distribuée et portefeuille de dépendances

L'autonomie possède aussi une dimension structurelle. Les nœuds de soutien essentiels et leurs poids de dépendance sont représentés par l'équation 14.

$$\mathcal{S}_i = \{s_1, \ldots, s_n\}, \qquad \sum_{m=1}^{n} w_m = 1 \tag{14}$$

w_m représente la dépendance relative au nœud de soutien s_m. Un indicateur simplifié de concentration fondé sur ces poids est donné par l'équation 15.

$$H_i = \sum_{m=1}^{n} w_m^2 \tag{15}$$

Un H_i plus élevé indique une plus forte concentration du soutien essentiel, mais l'article n'en fait pas un « score d'autonomie ». Plusieurs nœuds peuvent être très corrélés. La propriété réellement importante est donc l'existence de **modes de défaillance indépendants** : la défaillance d'un nœud entraîne-t-elle simultanément celle des autres ?

L'**autonomie distribuée** désigne le fait de disposer, dans les domaines du revenu, du logement, du statut, de l'information, du soutien social et des ressources professionnelles, de plusieurs points d'appui qui ne tombent pas entièrement en panne ensemble. Sa contrainte normative est résumée par l'équation 16.

$$\text{dépendance distribuée} \quad + \quad \text{responsabilité localement traçable} \tag{16}$$

Distribuer la dépendance ne signifie pas disperser la responsabilité jusqu'à ce que plus personne ne soit responsable. Chaque contrat, compte, autorisation et canal de

valeur doit conserver un responsable identifiable.

L'autonomie distribuée doit aussi maîtriser les coûts de coordination. Plus le nombre de points d'appui est grand, plus le sujet doit maintenir de comptes, de relations et d'interfaces institutionnelles, avec une charge informationnelle accrue. Si plusieurs soutiens apparents dépendent en réalité du même revenu, du même statut ou de la même autorisation familiale, ils sont seulement diversifiés en surface et partagent un point commun de défaillance. L'application empirique doit donc s'intéresser aux corrélations entre soutiens plutôt qu'à leur simple nombre.

Du point de v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cette structure est étroitement liée aux options extérieures. De meilleures possibilités d'emploi, une sécurité sociale plus forte, des services publics et des droits sur les actifs améliorent les alternatives et modifient ainsi la négociation familiale. L'autonomie distribuée est donc à la fois un concept de stratégie individuelle et un concept de structure institutionnelle.

Du point de vue juridique, un ordre de vie situé hors de la portée d'un réseau familial particulier ne signifie pas la construction d'une « forteresse privée sans droit ». Il signifie que le sujet peut entrer directement dans plusieurs relations institutionnelles non contrôlées par un nœud unique. L'accès indépendant aux documents d'identité, la communication directe avec les banques ou les organismes publics et l'accès personnel aux informations juridiques et médicales facilitent la conversion des droits formels en capacités réelles. Ces interfaces extérieures réduisent aussi le monopole d'interprétation dans la famille, puisque le sujet n'a plus à dépendre entièrement d'un autre membre pour comprendre les règles extérieures.

Du point de vue herméneutique, un ordre de vie extérieur fournit également des ressources alternatives de sens. Une personne longtemps immergée dans un récit relationnel unique peut avoir du mal à distinguer une exigence institutionnelle générale, une convention particulière de la famille et l'interprétation d'un membre. Travail, éducation, amis, institutions professionnelles et information publique offrent des points de comparaison et des vocabulaires conceptuels plus riches. Cette « extériorité » n'exige pas l'opposition à la famille ; elle empêche une relation unique de devenir l'unique source des faits et des normes.

L'ordre de vie situé hors du pouvoir familial concentré possède ainsi trois fonctions : matérielle, institutionnelle et interprétative. Il fournit des ressources alternatives, des interfaces procédurales indépendantes et des interprétations alternatives. Ensemble, ces fonctions accroissent la robustesse de l'autonomie ; chacune peut échouer en l'absence des autres.

L'« extérieur » n'implique pas une séparation géographique. Des comptes numériques, des informations médicales directement accessibles, des qualifications professionnelles indépendantes, des conseils juridiques personnels et des services publics joignables sans médiation familiale peuvent tous constituer des points d'appui extérieurs. À l'inverse, une grande distance géographique ne suffit pas à accroître

fortement l'autonomie si revenu, statut et information restent contrôlés par le même nœud.

Les soutiens extérieurs possèdent également une valeur de redondance. Toute relation de soutien particulière peut échouer. Plusieurs interfaces institutionnelles indépendantes réduisent la vulnérabilité systémique. La redondance n'est toutefois pas une valeur illimitée : maintenir trop de comptes et de relations augmente aussi la charge de coordination. Un objectif plus raisonnable consiste à éviter qu'un domaine vital dépende d'un point de contrôle unique dont la défaillance puisse désactiver l'ensemble du système.

9 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famille : dépendance, reproduction sociale et position de négociation

Si le pouvoir familial est compris uniquement comme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nelle ou interaction psychologique, ses fondements matériels disparaissent du champ de l'analyse. Revenus, actifs, logement, temps consacré au care, possibilités sur le marché du travail, sécurité sociale et services publics déterminent conjointement les alternatives dont disposent les membres de la famille et les pertes auxquelles ils s'exposent lorsqu'un arrangement relationnel échoue. L'économie politique traite ces conditions comme des composantes de la structure du pouvoir, plutôt que comme un « arrière-plan » fixe antérieur aux relations. En s'appuyant sur les recherches relatives à la négociation intraménage, aux conflits coopératifs et à la reproduction sociale, cette section relie les interfaces de ressources examinées plus haut aux structures plus larges des marchés, de l'État et des normes sociales.

9.1 La famille comme unité institutionnelle de coopération et de conflit

Les familles peuvent produire de véritables intérêts communs. Résidence partagée, care, mutualisation des risques et investissements à long terme exigent souvent de la coopération, et de nombreux bénéfices ne peuvent être divisés avec précision. Comprendre la famille uniquement comme un ensemble d'individus concurrents manquerait donc la réalité de l'intimité et de la mise en commun. Mais supposer qu'une famille possède une préférence unique et une fonction de bien-être unifiée dissimule tout autant les différences internes. L'analyse des « conflits coopératifs » de Sen montre que les membres d'une famille peuvent gagner conjointement à coopérer tout en conservant des intérêts distincts concernant la distribution des gains, du travail et des ressources (Sen 1990).

Cette perspective se relie directement à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La coopération ne détermine pas à elle seule la manière dont les contributions sont interprétées ni qui détient l'autorité finale. Une famille peut bénéficier du care non rémunéré fourni par un membre ; si cette contribution ne peut toutefois être convertie en sécurité

financière, en compensation des coûts professionnels ou en position de négociation future plus forte, des gains domestiques peuvent coexister avec un affaiblissement de l'autonomie personnelle. À l'inverse, des actifs communs, des protections du care et des budgets transparents peuvent convertir les gains de la coopération en capacités à long terme plus équilibrées.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famille ne peut donc pas demander seulement si les ressources totales augmentent. Elle doit examiner comment leur croissance modifie l'ensemble des actions réalisables de chaque membre. Le revenu du ménage peut augmenter tandis que le contrôle, l'accès aux comptes et les possibilités professionnelles se concentrent davantage, rendant l'interface de ressources de l'équation 3 plus asymétrique. Si l'augmentation du revenu s'accompagne au contraire de propriété commune, de comptes séparés et de soutiens extérieurs, l'expansion économique peut renforcer la robustesse de l'autonomie de plusieurs membres. Quantité agrégée et 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 et contrôle, contrôle et sortie constituent trois niveaux analytiquement distincts.

Le conflit coopératif signifie aussi que les membres de la famille peuvent réellement être en désaccord sur « l'intérêt commun ». Une stratégie d'épargne élevée peut accroître les actifs futurs tout en réduisant la qualité actuelle du care. L'investissement professionnel d'un membre peut augmenter le revenu familial à long terme tout en concentrant à court terme les coûts en temps sur un autre. L'analyse politico-économique ne peut présupposer une fonction d'utilité domestique unique, objectivement connaissable. Elle doit observer comment les arbitrages sont formulés, qui supporte les coûts d'opportunité et qui peut réviser les arrangements.

Cela explique également pourquoi le pouvoir interprétatif entre dans l'analyse économique. Si une seule personne possède la qualité requise pour définir « ce qui est bon pour la famille », les désaccords sur les ressources deviennent rapidement des conflits sur la légitimité des rôles. Rendre explicite la formation des intérêts communs relie donc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ménage à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au niveau des mécanismes, au lieu de traiter les ressources économiques comme une variable d'arrière-plan indépendante.

9.2 Position de négociation et structures de ressources extérieures à la famille

Un développement important des recherches sur la négociation intraménage consiste à étendre le pouvoir de négociation au-delà des ressources situées à l'intérieur du ménage. Agarwal soutient que les normes sociales, la propriété des actifs, les marchés, les communautés et les institutions étatiques affectent tous la négociation au sein des ménages, et que les positions internes et externes interagissent (Agarwal 1997). Les « options de sortie » ne peuvent donc pas être traitées comme des constantes fixes. Possibilités d'emploi, logement public, sécurité sociale, statut migratoire, ré-

seaux de parenté et recours juridiques modifient tous le coût supportable du refus d'un arrangement proposé.

Soit $O_i(t)$ l'ensemble des soutiens extérieurs accessibles à l'agent i, et Z_t les normes sociales et l'environnement institutionnel. Une relation conceptuelle représentant la position pratique de négociation est donnée par l'équation 17.

$$\mathcal{B}_i(t) = F(\mathbf{A}_i(t), O_i(t), Z_t, h_t) \tag{17}$$

La fonction F n'est pas supposée connue. L'objectif de l'équation 17 est d'expliciter que la négociation familiale n'est pas déterminée par le seul revenu courant. Histoire relationnelle, alternatives extérieures, attentes normatives et droits institutionnels influencent conjointement la possibilité qu'un « non » produise un effet pratique.

Cette formulation aide aussi à comprendre comment l'action publique peut remodeler indirectement le pouvoir familial. Des services publics de garde d'enfants peuvent élargir les possibilités d'emploi des personnes assumant le care. Des droits individuels de sécurité sociale peuvent réduire la dépendance à un point unique, par exemple le revenu d'un partenaire. Des transports abordables et un accès numérique étendu peuvent élargir les réseaux extérieurs. Les règles de propriété et de succession influencent le contrôle des actifs. Les institutions publiques n'ont pas besoin de « gérer directement la famille » pour modifier sa grammaire du pouvoir ; elles peuvent le faire en élargissant les options pratiques de ses membres.

Les ressources extérieures ne produisent cependant pas automatiquement des relations plus égalitaires. Un revenu plus élevé peut être absorbé par une structure de contrôle déjà existante, et des prestations publiques peuvent encore être administrées par le même nœud familial. L'analyse politico-économique doit donc revenir aux niveaux de contrôle et de robustesse développés plus haut. Une ressource ne modifie la position de négociation que si l'agent peut effectivement y accéder, l'utiliser et la conserver en situation de conflit.

Les ressources « extérieures à la famille » comprennent aussi l'information fiable et la connaissance institutionnelle. Une personne peut disposer d'un revenu mais connaître peu ses droits juridiques, les prestations disponibles ou les possibilités contractuelles. Une autre peut avoir un revenu plus faible mais une capacité de négociation plus forte grâce à des réseaux professionnels et des connaissances procédurales. Les options extérieures constituent donc des ensembles à la fois matériels et épistémiques. Le capital linguistique et la capacité administrative influencent les options qui peuvent être perçues et mises en œuvre.

Les normes sociales peuvent également modifier l'utilisabilité des ressources extérieures. Des options professionnelles, résidentielles ou de care peuvent exister sur le marché mais entraîner des coûts sociaux importants en raison de la stigmatisation, des obligations identitaires ou de sanctions communautaires. Une économie po-

litique qui n'enregistre que les prix monétaires sous-estimera ces coûts de sortie. Les recherches empiriques doivent donc considérer ensemble les coûts institutionnels, sociaux et symboliques.

9.3 Reproduction sociale, care et valeur invisible

Les familles ne se contentent pas de consommer des revenus marchands. Elles produisent de grandes quantités de valeur non marchande nécessaires à la vie sociale : care des enfants, des personnes âgées et des personnes malades ; entretien du logement et des routines quotidiennes ; soutien à l'éducation et au développement professionnel ; travail émotionnel ; maintien des relations intergénérationnelles. L'analyse de Folbre sur les coûts de la reproduction sociale souligne que la répartition des coûts du care entre familles, marchés et État constitue une question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pas seulement un choix privé (Folbre 1994). Cette perspective élargit l'ensemble des objets compris dans le concept de frontière de la valeur utilisé ici.

Si l'analyse n'enregistre que les flux monétaires, le care non rémunéré peut apparaître comme une condition d'arrière-plan sans valeur. Si elle ne retient que les contributions, elle peut à l'inverse manquer la nature affective et non contractuelle du care. L'article ne soutient donc pas que tout travail domestique devrait être marchandisé. Il exige plutôt que les analyses des ressources, du pouvoir et de la disposition de la valeur reconnaissent les effets structurels des contributions non marchandes. Un care de longue durée peut réduire le salaire, l'ancienneté et la pension de la personne qui l'assume, tout en augmentant le temps dont disposent les autres membres pour participer au travail rémunéré. Même lorsque personne ne fixe un prix à chaque heure de travail, ces répartitions du temps remodèlent les interfaces de ressources futures.

La reproduction sociale explique aussi pourquoi « qui reçoit le revenu » et « qui crée la valeur » ne coïncident pas toujours. Les salaires de marché ne rémunèrent que certaines activités échangeables, alors que le soutien, le care et la prise en charge des risques au sein de la famille peuvent contribuer conjointement aux conditions de génération du revenu. L'analyse d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doit donc distinguer propriété et prétentions fondées sur la contribution. La contribution ne confère pas automatiquement un pouvoir unilatéral de disposition, mais l'exclusion persistante d'une contribution de longue durée des décisions communes ou de la sécurité future constitue un problème distributif d'économie politique.

La reproduction sociale possède aussi une dimension intergénérationnelle. Soutien éducatif, formes de care, apprentissage des langues, réseaux sociaux et transferts d'actifs affectent tous les capacités de la génération suivante à entrer dans les institutions et les marchés. L'allocation des ressources au sein de la famille n'affecte donc pas seulement les membres actuels, mais potentiellement les structures d'opportunité d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L'article ne développe pas une théorie complète

de la justice intergénérationnelle, mais ce constat identifie un canal de long terme reliant pouvoir familial et justice publique.

L'invisibilité de la valeur du care peut également être produite par les systèmes de mesure. Les statistiques de marché enregistrent plus facilement les salaires et les actifs que le temps de disponibilité, le soutien émotionnel, la coordination domestique ou les occasions professionnelles abandonnées. Des recherches fondées uniquement sur des données monétaires sous-estimeront donc systématiquement certaines contributions. Les relevés qualitatifs d'événements et les données d'emploi du temps constituent des compléments importants à l'analyse politico-économique.

9.4 Accumulation de long terme des actifs, du temps et des droits institutionnels

Le pouvoir familial est fortement cumulatif. Les différences salariales deviennent des différences d'actifs ; les différences d'actifs affectent le logement et le crédit ; les interruptions professionnelles influencent le revenu futur et les pensions ; la responsabilité durable de la communication extérieure et des procédures institutionnelles produit une connaissance procédurale. Des divisions du travail de court terme peuvent ainsi devenir des structures de long terme même lorsqu'elles ont été initialement choisies volontairement. L'analyse du pouvoir doit porter non seulement sur le consentement au point de départ, mais aussi sur la question de savoir si un arrangement crée de nouvelles dépendances de plus en plus difficiles à inverser.

Cette dynamique politico-économique peut être reliée à l'équation 7. Les résultats du marché et des institutions modifient l'état relationnel de la période suivante, lequel affecte ensuite le cycle suivant d'allocation des ressources. Une personne qui quitte le marché du travail pour assurer le care peut, par exemple, disposer de moins d'alternatives extérieures, ce qui rend la continuation du care de plus en plus « raisonnable » dans le ménage. Il ne s'agit pas seulement d'un changement de préférences. Il peut s'agir d'une dépendance au sentier produite par les divisions antérieures du travail. Sécurité sociale, soutien au retour à l'emploi et arrangements d'actifs communs peuvent réduire cet enfermement cumulatif.

C'est aussi pourquoi l'article ne réduit pas la justice familiale interne à une égalité approximative de la consommation présente. L'autonomie de long terme dépend davantage des actifs, des compétences, du statut institutionnel, du temps et des capacités professionnelles récupérables. L'économie politique ajoute donc une lecture intertemporelle au vecteur d'autonomie : la distribution actuelle des ressources modifie qui pourra demain formuler des objections efficaces, sortir d'un arrangement et coopérer de manière indépendante avec des tiers.

L'accumulation intertemporelle signifie également que « c'était volontaire au départ » ne suffit pas à démontrer qu'une structure de long terme demeure légitime. Un agent peut accepter initialement une division du travail sur la base des informa-

tions et objectifs communs alors disponibles ; à mesure que actifs, compétences et charges de care divergent, sa capacité de renégociation peut toutefois s'affaiblir. Si l'arrangement initial ne comporte ni révision périodique ni mécanismes de compensation, le consentement initial risque d'être étendu à tort à l'autorisation de toutes les conséquences futures.

À l'inverse, les institutions peuvent réduire activement l'enfermement cumulatif grâce à l'accumulation partagée d'actifs, aux droits de pension des personnes assumant le care, au soutien au retour professionnel, au renouvellement des compétences et à une planification financière de long terme transparente. Ces mécanismes n'éliminent pas la spécialisation domestique. Ils réduisent la probabilité que cette spécialisation se transforme ultérieurement en différence irréversible de statut.

9.5 Capital linguistique, travail administratif et médiation institutionnelle dans la famille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famille comprend une forme de travail facilement sous-estimée : traduire les besoins familiaux dans un langage que les institutions peuvent traiter. Remplir des formulaires scolaires, médicaux, bancaires, fiscaux, migratoires ou organisationnels ; comprendre contrats et politiques ; communiquer entre plusieurs langues ; conserver des archives numériques ; négocier avec des institutions professionnelles exigent du temps, des connaissances et du capital linguistique. L'analyse du capital linguistique de Bourdieu (Bourdieu 1991) ainsi que les travaux d'Irvine et de Gal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Irvine 1989 ; Gal 1989) montrent que ces capacités sont à la fois des ressources culturelles et des moyens d'accès aux possibilités économiques et institutionnelles.

Ce « travail administratif » possède une valeur réelle. Une personne capable de naviguer dans des institutions complexes peut supporter d'importants coûts temporels invisibles et obtenir pour le ménage des possibilités éducatives, sociales, financières ou professionnelles. Une analyse de justice ne peut remarquer uniquement l'avantage interprétatif qui peut en résulter en ignorant la contribution qui le soustend. La question plus complète consiste à savoir si ce travail est reconnu collectivement, s'il peut être appris, partagé et remplacé, si les informations importantes sont conservées de façon commune, et si l'avantage cognitif de l'administrateur est converti en autorité décisionnelle au-delà de ce que la tâche exige.

Lorsque la capacité administrative et linguistique ne peut être partagée, la famille acquiert un nœud de médiation institutionnelle. Les droits et ressources extérieurs des autres membres doivent alors passer par ce nœud pour devenir visibles et utilisables. L'économie politique se couple ainsi au pouvoir interprétatif. La personne qui maîtrise le langage institutionnel contrôle non seulement l'information mais potentiellement le moment de sa transmission, sa catégorisation et les options présentées comme réalistes. Une telle médiation peut être entièrement bienveillante tout

en créant une vulnérabilité structurelle : si le nœud échoue, entre en conflit ou filtre sélectivement l'information, l'accessibilité institutionnelle des autres membres peut s'effondrer rapidement.

Les institutions publiques peuvent remodeler directement cette structure de médiation. Langage clair, conception accessible, services multilingues, accès personnel direct, dispositifs de délégation révocables, et archives numériques partageables et auditables réduisent la dépendance familiale envers un unique « traducteur ».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n'est donc pas un thème culturel additionnel. Elle fait partie du modèle des ressources familiales, de la sortie et de l'autonomie.

9.6 Interface entre structure politico-économique et grammaire du pouvoir

Pris ensemble, les facteurs politico-économiques entrent dans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par au moins quatre voies. Premièrement, ils modifient les alternatives et donc les coûts du refus. Deuxièmement, ils modifient le contrôle des ressources et donc les interfaces décisionnelles. Troisièmement, ils modifient la visibilité et la reconnaissance des contributions et donc les interfaces interprétatives. Quatrièmement, ils modifient l'accès au soutien public et aux recours et donc les interfaces normatives et de sortie. Les « styles de communication » familiaux ne peuvent donc être étudiés séparément des structures de ressources extérieures.

Cette conclusion limite aussi les prétentions normatives de l'article. Une meilleure communication ne peut pas toujours améliorer les relations si les institutions du logement, du travail, du statut et du care continuent de générer des coûts de sortie extrêmement élevés, car l'espace même de la négociation relationnelle demeure structurellement contraint. En même temps, une réforme institutionnelle ne peut résoudre automatiquement des problèmes particuliers d'interprétation, d'autorisation et de règles au sein d'une relation. Économie politique macroscopique et grammaire du pouvoir microscopique se conditionnent mutuellement et doivent entrer conjointement dans le modèle explicatif.

Plus précisément, une même macro-institution peut produire des effets différents selon les familles, car les ressources institutionnelles doivent encore traverser des interfaces relationnelles pour être utilisées. Une même grammaire familiale peut également s'affaiblir ou se renforcer lorsque l'environnement institutionnel change. L'article écarte donc toute réduction unidirectionnelle. Le pouvoir familial ne peut être entièrement réduit au capital, au revenu ou aux institutions étatiques, pas plus qu'il ne peut être entièrement réduit aux habitudes communicatives ou à la psychologie individuelle. L'objet d'analyse est précisément le mécanisme de conversion entre ces niveaux.

Il en résulte une question claire pour la recherche comparative. Lorsque les conditions institutionnelles extérieures sont similaires, quelles règles relationnelles font

que les différences de ressources se convertissent plus fortement en autorité décisionnelle ? Lorsque les règles relationnelles sont similaires, quelles institutions publiques réduisent substantiellement les coûts de sortie ou augmentent la robustesse de l'autonomie ? De telles comparaisons bidirectionnelles correspondent mieux à la structure théorique développée ici que la recherche d'un effet global de la « culture familiale » ou des « ressources économiques ».

Les rétroactions peuvent également aller du micro vers le macro. Les divisions intrafamiliales du care influencent l'offre de travail. Un grand nombre de choix domestiques similaires peuvent, au fil du temps, remodeler les institutions de l'emploi, la demande de services publics et les normes sociales. Ces changements macroscopiques reviennent ensuite vers les ménages. Le présent cadre traite principalement les macro-institutions comme des conditions extérieures, mais cette rétroaction suggère que de futurs travaux d'économie politique pourraient analyser les familles comme des nœuds de reproduction institutionnelle plutôt que comme des récepteurs terminaux de l'environnement.

Cette analyse précise enfin les limites de l'action publique. L'expansion des services publics ou des protections juridiques peut améliorer les options extérieures sans garantir la formation automatique de grammaires contestables au sein des familles. Les interventions éducatives ou communicationnelles peuvent améliorer les structures interprétatives sans remplacer la sécurité du logement, du revenu ou du statut. Les interventions situées à différents niveaux visent des mécanismes différents et ne doivent pas être traitées comme des substituts.

10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structures d'autorisation et transferts intermédiaires

Cette section examine la disposition de la valeur dans les relations privées. La vie familiale comprend nécessairement des dépenses communes, des dons, du care non rémunéré, des transferts intergénérationnels, des actifs partagés et des contributions non monétaires. Le seul fait qu'une valeur soit transférée n'emporte donc aucune conclusion normative. Les travaux philosophiques sur l'exploitation montrent également qu'un jugement d'exploitation exige davantage que le simple fait qu'une personne en bénéficie ; il implique généralement des conditions portant sur l'équité, la vulnérabilité, le consentement ou l'avantage indûment tiré d'autrui (Wertheimer 1996 ; Sample 2003). L'analyse se concentre donc sur la **structure d'autorisation** des flux de valeur.

10.1 Objets de valeur et ensembles d'autorisation

Soient les agents S et B qui créent, détiennent ou disposent de la valeur V_{SB}^{C} dans le cadre de l'arrangement C. La valeur peut comprendre le revenu monétaire, des actifs,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des données, la réputation, des opportunités, du temps,

une autorité de représentation et d'autres intérêts susceptibles de disposition. Soit $\mathcal{M}_C$ l'ensemble des canaux de valeur autorisés par l'arrangement. L'appartenance d'un flux de valeur m à l'ensemble autorisé est testée par l'équation 18.

$$m \in \mathcal{M}_C \tag{18}$$

Si la réponse est positive, il faut encore demander si l'autorisation est valide, si sa portée est claire, si elle peut être révoquée et si des traces suffisantes existent. Si la réponse est négative, le canal justifie un examen plus approfondi plutôt qu'une qualification automatique d'injustice.

Les objets de valeur exigent eux-mêmes de distinguer droits juridiques et prétentions relationnelles fondées sur la contribution. Salaires, actifs,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ou soldes de compte peuvent avoir des titulaires juridiques clairement identifiés, tandis que le care, les investissements en temps, les coûts d'opportunité et la réputation partagée dans une vie commune peuvent produire d'autres prétentions morales ou politico-économiques. L'article ne cherche pas à convertir toutes ces prétentions en droits de propriété. Il exige plutôt que toute analyse des flux de valeur précise si l'enjeu porte sur la propriété, l'autorité de disposition, la reconnaissance de la contribution ou la justification distributive au sein d'une vie commune. Ces quatre dimensions ne sont pas interchangeables.

La distinction importe parce que la proposition « j'ai contribué à cette valeur » n'implique pas automatiquement « je peux en disposer unilatéralement ». À l'inverse, « le droit attribue cette valeur à une personne » ne signifie pas que la contribution durable des autres membres soit normativement dépourvue de pertinence. L'analyse d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vise à séparer les sources de titre afin que les différends puissent être organisés autour d'autorités précises plutôt que condensés dans une question globale de savoir qui « mérite davantage ».

Les valeurs diffèrent également par leur réversibilité. Un transfert d'argent peut être traçable et remboursable. La divulgation d'informations privées, le transfert de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l'abandon d'une possibilité professionnelle ou un engagement public pris au nom d'autrui peuvent être difficiles à inverser. La force des frontières devrait donc correspondre au type et à la réversibilité de la valeur concernée. Plus une valeur est difficilement réversible, plus les exigences ex ante d'autorisation explicite et de conservation de traces sont fortes.

Certains objets de valeur impliquent aussi des droits qui se chevauchent entre plusieurs personnes. Créations communes, réputation produite par un care partagé, données familiales ou comptes joints ne se prêtent pas toujours à une division simple entre « mien » et « tien ». Ces objets exigent des règles procédurales concernant l'accès, la représentation et le niveau de décision conjointe requis pour des dispositions importantes. Des procédures claires peuvent mieux respecter leur caractère

Table 3 – Types de flux de valeur dans les relations familiales

Type	Structure typique	Principales conditions de distinction
Mise en commun	Les parties conviennent à l'avance d'affecter une partie du revenu, du temps ou des actifs à des usages communs	Règles connaissables, portée claire et participation de toutes les parties à la détermination des usages communs
Don ou soutien	Une partie transfère volontairement une valeur à une autre ou à la famille dans son ensemble	Volontariat, connaissance, absence de conditions cachées et distinction d'avec un transfert imposé
Gestion autorisée	Une partie gère des comptes, actifs, contrats ou affaires pour le compte d'une autre	Délégation explicite ou raisonnablement inférable, autorité délimitée, traces, révocation et conditions d'audit
Transfert intermédiaire non autorisé	Un tiers utilise sa position relationnelle pour entrer dans un canal de valeur extérieur à l'arrangement antérieur	Information insuffisante, absence d'autorisation, révocation difficile, opacité et faible traçabilité des responsabilités

relationnel qu'une tentative d'identifier un propriétaire unique.

10.2 Quatre types de flux de valeur

L'objectif du tableau 3 est de distinguer partage et extraction. La vie familiale commune peut légitimement conserver des frontières flexibles. Le problème normatif apparaît lorsque cette flexibilité est unilatéralement convertie en interfaces de ressources invisibles, irrévocables ou soustraites à la responsabilité.

Les quatre types peuvent également se transformer les uns dans les autres. Une mise en commun peut devoir être renégociée lorsque la structure des revenus change. Un don lié à des exigences continues d'obéissance peut progressivement perdre son caractère volontaire. Une gestion autorisée peut devenir un contrôle de fait si son domaine s'étend tandis que la partie qui autorise perd l'accès à l'information. L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ne constituent donc pas des classifications ponctuelles. Ce sont des jugements d'état qui doivent être actualisés avec l'évolution de l'histoire relationnelle.

Une perspective politico-économique exige aussi d'inclure les valeurs monétaires et non monétaires. Care, temps, données, capital social et opportunités professionnelles peuvent être durablement redistribués sans passer par un compte. L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ne concernent donc pas seulement « où est allé l'argent », mais aussi qui décide de l'usage du temps, qui supporte les coûts d'opportunité et qui reçoit les bénéfices réputationnels ou institutionnels externes produits par la vie commune.

Les quatre types possèdent également des structures probatoires par défaut différentes. La mise en commun peut souvent reposer sur une pratique stable, mais des changements importants d'usage exigent une explication renouvelée. Pour les dons, la question centrale concerne le volontariat et l'absence de conditions d'échange dissimulées. La gestion autorisée exige que le gestionnaire puisse expliquer la source

de son autorité et conserver des traces. Les transferts intermédiaires non autorisés nécessitent une vérification ex post plus forte précisément parce qu'ils se situent hors des canaux établis. Appliquer une même règle à tous les types conduirait soit à surformaliser la vie familiale, soit à sous-protéger des intérêts importants.

Le pouvoir interprétatif compte également dans la classification des flux de valeur. Qualifier un transfert de « devoir familial », de « prêt », de « gestion » ou de « dépense commune » entraîne des implications d'autorité différentes. Les chercheurs doivent vérifier si les étiquettes correspondent au contrôle réel au lieu d'accepter sans examen les premières descriptions des participants. Lorsque cela est nécessaire, propriété juridique, flux factuels et récits relationnels doivent être enregistrés séparément.

10.3 Ensemble conditionnel de risque pour les transferts intermédiaires

Si un tiers A crée un canal m_A par sa position relationnelle, l'article décrit son risque au moyen de cinq conditions. Le vecteur de risque est représenté par l'équation 19.

$$\mathbf{B}(m_A) = (K, A, R, T, Q) \tag{19}$$

Ici, K désigne le degré de connaissance, A la qualité de l'autorisation, R la révocabilité, T la traçabilité et Q l'accès à la reddition de comptes. Le risque augmente à mesure que connaissance, autorisation, révocabilité, traçabilité et responsabilité diminuent. Les cinq conditions ne sont ni simplement additionnées ni supposées avoir le même poids.

Lorsque $m_A \notin \mathcal{M}_C$ et que plusieurs conditions de frontière demeurent durablement faibles, la situation peut être décrite comme un **risque de transfert intermédiaire non autorisé**. Une qualification plus forte d'« exploitation » n'est appropriée que si des éléments normatifs supplémentaires tels qu'un avantage injustement tiré d'autrui, un préjudice, une inéquité ou une contrainte sont établis. Cette stratification évite de classer à tort les dons familiaux et arrangements de ressources partagées comme extraction.

Il faut notamment distinguer « absence d'autorisation formelle » et « absence d'autorisation effective ». Les affaires domestiques ordinaires impliquent rarement une autorisation écrite distincte pour chaque acte. Une pratique commune de longue durée peut créer une autorisation implicite raisonnable, mais cette autorisation doit conserver une portée inférable et ne peut s'étendre indéfiniment au seul motif que la relation est intime. L'évaluation de l'autorisation effective requiert donc d'examiner la qualité de l'information, la réalité du choix, les coûts disproportionnés du refus et la capacité de révoquer ou de réviser l'arrangement après coup.

L'analyse d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ne demande donc pas la contractualisation de la vie familiale. Elle demande une clarté croissante pour les canaux portant sur des

valeurs élevées, une faible réversibilité ou des tiers. Plus une activité se rapproche de la consommation commune routinière, plus elle peut raisonnablement reposer sur la convention. Plus elle se rapproche de la disposition d'actifs importants,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de fonds organisationnels ou de contrats avec des tiers, plus l'exigence d'une autorité explicite et de traces devient forte.

Les cinq conditions permettent également de distinguer une défaillance particulière d'autorisation d'une capture structurelle. Un transfert effectué avec une information incomplète peut être réparé par une explication et une confirmation ultérieures. Si la même personne manque répétitivement d'information, ne peut révoquer et ne peut vérifier les traces, le problème n'est plus une simple erreur procédurale et ressemble davantage à une absence stable de frontières. La séquence temporelle est donc centrale pour évaluer l'intensité du risque.

La responsabilité Q ne signifie pas punition. Une responsabilité effective signifie d'abord que quelqu'un doit expliquer ce qui s'est passé, quelle autorité soutenait l'action, comment les pertes seront traitées et comment les règles futures seront révisées. Si la responsabilité n'est accessible que par les options extrêmes de mettre fin à la relation ou d'engager une procédure contentieuse, les capacités ordinaires de correction sont faibles. De meilleures structures offrent des canaux proportionnés d'explication et de réparation.

10.4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et reproduction du pouvoir

Les transferts de valeur peuvent modifier les positions futures de pouvoir. Lorsqu'un canal non autorisé accroît le contrôle d'un tiers sur les ressources, l'information ou les conditions de sortie, le mécanisme de rétroaction représenté par l'équation 20 peut apparaître.

$$\text{transfert de } V \longrightarrow \text{renforcement des interfaces } R, X \longrightarrow \text{déplacement de l'efficacité de } \mathcal{G} \longrightarrow \text{facil} \tag{20}$$

L'équation 20 constitue une hypothèse de mécanisme, et non un cycle inévitable. Chaque transition exige des preuves empiriques. Son intérêt analytique est de distinguer un conflit ponctuel d'intérêts d'une structure capable de se renforcer elle-même.

La reproduction du pouvoir peut aussi se produire hors du domaine monétaire. Une personne qui assure de façon répétée les procédures administratives, la communication extérieure et le filtrage de l'information accumule connaissances procédurales et réseaux sociaux. Si les autres membres demeurent durablement extérieurs à ces processus, leur dépendance peut s'accroître même lorsque les ressources nominales restent inchangées. De même, le care non rémunéré de longue durée peut réduire l'emploi et les réseaux professionnels de la personne qui le fournit, dégradant ainsi ses conditions de sortie.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et formation de l'autonomie interagissent donc dans les deux sens : l'autonomie affecte la capacité de protéger l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tandis que les flux de valeur remodèlent l'autonomie future.

Cette dynamique est également la clé du lien entre problèmes familiaux et éthique organisationnelle. Si des réseaux privés comportent déjà des interfaces opaques vers les fonds, l'information ou l'autorité de représentation, des logiques de conversion similaires peuvent entrer dans les ressources confiées lorsqu'un agent assume un rôle organisationnel. La gouvernance des organisations doit identifier les interfaces avant que des pertes ne surviennent, plutôt que d'attendre pour attribuer ensuite une faute morale.

La reproduction opère non seulement par accumulation de ressources, mais aussi par naturalisation des normes. Des transferts répétés peuvent cesser d'apparaître comme des exceptions nécessitant une autorisation et devenir compris comme « la manière normale de faire ». Une fois qu'une pratique acquiert ce statut par défaut, le refus supporte une charge supplémentaire d'explication.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relie ainsi cycles économiques et interprétatifs : les résultats relatifs aux ressources modifient les récits ultérieurs de position, et ces récits orientent les flux futurs de ressources.

Interrompre la reproduction n'exige pas nécessairement de démanteler tous les arrangements communs. Des changements institutionnels plus légers, tels que des traces indépendantes, des confirmations périodiques, des plafonds, un accès conjoint et une révision par un tiers, peuvent réduire l'auto-renforcement. Des recherches empiriques futures pourront examiner si ces mécanismes légers suffisent à modifier la grammaire ou si un changement stable exige une restructuration plus profonde des ressources.

11 Débordement des réseaux privés dans les rôles organisationnels

Les structures de pouvoir familial acquièrent une signification éthique publique lorsqu'un agent entre dans un rôle comportant des responsabilités envers des tiers. L'article ne soutient pas que la pression privée disqualifie automatiquement un agent de responsabilités professionnelles. L'objet analytique consiste à déterminer **si les réseaux privés disposent de canaux pratiques leur permettant de pénétrer les interfaces d'un rôle et si ces canaux sont contraints par les institutions de l'organisation**.

11.1 Autorisation du rôle et ensembles d'interfaces

Soit une organisation O qui confère à l'agent S les capacités attachées au rôle R. Soit $\mathsf{M}_{O,R}$ l'ensemble autorisé des pouvoirs du rôle et $\mathsf{U}_{S,R}$ l'ensemble effectivement exercé. La condition élémentaire d'intégrité est représentée par l'équation 21.

$$\mathsf{U}_{S,R} \subseteq \mathsf{M}_{O,R} \tag{21}$$

Les interfaces du rôle peuvent comprendre ressources, information, jugement, signatures, achats, représentation, recrutement, accès aux données et communication avec des tiers. Une relation privée ne constitue pas en elle-même un conflit d'intérêts. La question pertinente est de savoir si des intérêts privés ou des canaux d'influence privée sont en position de modifier de façon inappropriée les devoirs primaires du rôle. La littérature sur les conflits d'intérêts traite depuis longtemps ce problème comme un risque structurel, et pas seulement comme une question de caractère moral (Thompson 1993 ; Davis et A. Stark 2001).

La structure est analogue à l'analyse antérieure des relations familiales. Dans la famille, il faut distinguer « être un parent » de « quelle autorité découle de ce statut ». Dans l'organisation, il faut de même distinguer « avoir une relation privée » de « savoir si cette relation peut entrer dans les interfaces du rôle ». Si une organisation repose uniquement sur l'autocontrôle des employés sans définir les limites d'autorité, les procédures de récusation et les mécanismes de révision, elle individualise un problème qui est en partie institutionnel. Une bonne conception institutionnelle permet au contraire l'existence de relations privées complexes tout en réduisant leur capacité à pénétrer des intérêts dus à des tiers.

Du point de vue de la philosophie du droit, les rôles confiés contiennent également un principe de séparation des rôles. Une personne peut simultanément détenir des identités familiale, amicale, commerciale et publique ; les ressources associées à chacune ne peuvent toutefois être utilisées que dans la portée d'autorisation correspondante. Étendre naturellement aux réseaux privés l'information, le jugement ou l'autorité de représentation d'une organisation obscurcit la question fondamentale de savoir qui a confié ce pouvoir à l'origine.

La séparation des rôles comporte aussi des implications de justice. Les ressources d'une organisation ne sont souvent pas la propriété privée des titulaires de fonctions. Elles sont confiées pour des finalités particulières par des membres, donateurs, clients, actionnaires, publics ou autres tiers. Si des réseaux privés peuvent contourner l'autorisation organisationnelle et obtenir un accès privilégié à des informations, des opportunités ou des ressources, des tiers sans connexion peuvent supporter des coûts asymétriques. L'enjeu ne concerne donc pas seulement l'indépendance de l'individu, mais aussi la question de savoir si opportunités et charges sont distribuées selon des règles publiques ou explicitement formulées.

Les interfaces linguistiques et interprétatives peuvent également déborder. Une personne dotée d'une autorité de représentation peut nommer des problèmes, interpréter des données et définir des objets externes au nom de l'organisation. Si des réseaux privés peuvent orienter cette nomination alors que l'organisation ne conserve aucune trace de cette influence, le pouvoir peut circuler par le langage avant tout transfert financier. L'intégrité fiduciaire protège donc non seulement les actifs, mais aussi l'autorité interprétative, l'autorité de représentation et les procédures par les-

quelles les archives officielles sont produites.

11.2 Canaux de débordement et stratification des risques

Soit A un nœud d'un réseau privé et $\mathcal{J}_R$ l'ensemble des interfaces associées au rôle R. La fonction de canal de débordement est représentée par l'équation 22.

$$\pi_A : A \longrightarrow \mathcal{J}_R \tag{22}$$

Trois états doivent être distingués : **existence d'une pression**, **existence d'un canal** et **capture du rôle**. La pression signifie seulement que l'agent fait face à des demandes, attentes ou conflits provenant de relations privées. Un canal existe lorsqu'un réseau privé peut accéder à certaines ressources du rôle. La capture du rôle suppose que l'influence privée modifie durablement le jugement, l'usage des ressources ou l'action de représentation sans contrôle organisationnel suffisant. Les implications éthiques et de gouvernance de ces états diffèrent fortement.

L'évaluation du risque exige au moins quatre dimensions : sensibilité de l'interface S_R, accessibilité du canal privé A_R, visibilité organisationnelle V_R et réversibilité comportementale R_R. L'article n'utilise que des comparaisons ordinales. Une combinaison de forte sensibilité, forte accessibilité, faible visibilité et faible réversibilité justifie des contrôles plus intenses. Cette approche évite la fausse précision de scores numériques non calibrés.

Les quatre dimensions peuvent se compenser. Une interface très sensible peut présenter un risque de capture relativement faible si chaque action requiert plusieurs approbations et produit une trace auditable. Une interface moins sensible sous le contrôle invisible d'une seule personne peut présenter une vulnérabilité pratique supérieure. De même, une forte accessibilité du canal privé n'implique pas automatiquement un comportement fautif, car visibilité et réversibilité peuvent réduire substantiellement le risque. La gouvernance devrait donc abandonner la question « cette personne a-t-elle une situation familiale compliquée ? » au profit de « quelles interfaces permettent quels comportements dans quelles conditions ? ».

Cette structure réduit également les risques d'exclusion discriminatoire. Origine familiale, nationalité, statut matrimonial ou complexité des relations privées sont des proxys grossiers. Ils peuvent à la fois exclure excessivement et échouer à identifier de véritables vulnérabilités d'interface. Une conception institutionnalisée des permissions, de la divulgation et de l'audit permet de concentrer le jugement sur des conduites observables dans le rôle plutôt que sur l'identité.

La stratification du risque devrait aussi considérer la distribution des pertes entre tiers. Certains rôles peuvent impliquer de faibles sommes d'argent mais des données personnelles très sensibles ou des décisions affectant des populations vulnérables. D'autres peuvent porter sur de grands montants tout en fonctionnant avec des li-

Table 4 – Interfaces de gouvernance concernant le débordement des réseaux privés

Interface de risque	Mécanisme institutionnel possible	Finalité principale
Fonds et actifs	Doubles signatures, plafonds, séparation des fonctions, rapprochements périodiques	Réduire les pouvoirs de disposition concentrés en un point et préserver des traces
Informations sensibles	Moindre privilège, journaux d'accès, autorisations classifiées	Réduire les accès non autorisés et la diffusion invisible
Achats et contrats	Déclaration des liens, procédures concurrentielles, révision indépendante	Réduire l'effet opaque des liens privés sur les conditions de transaction
Représentation et communication	Autorisation délimitée, canaux officiels, comptes rendus de réunion	Distinguer opinions personnelles et autorisation de l'organisation
Recrutement et opportunités	Critères structurés, récusation, révision par plusieurs personnes	Réduire l'effet non transparent des réseaux relationnels sur l'allocation des opportunités
Décisions très irréversibles	Confirmation différée, double contrôle, approbation escaladée	Accroître les possibilités de correction aux interfaces à pertes élevées

mites automatisées et un audit intensif. La sensibilité d'une interface doit donc être déterminée conjointement par le type de perte, l'étendue des effets et la réversibilité, plutôt que par le rang ou la seule valeur monétaire.

L'influence privée peut également entrer sous forme de « conseil » sans accès formel. Des proches n'ont pas besoin de se connecter à un système organisationnel pour orienter le jugement du titulaire du rôle ; ils peuvent proposer continuellement des candidats, fournir des informations ou apporter des interprétations. La gouvernance doit donc prêter attention à la transparence des sources du jugement, notamment dans les achats, le recrutement, la sélection de partenaires et la représentation externe, lorsque la discrétion est élevée.

11.3 Isolation institutionnelle et intégrité fiduciaire

Les organisations peuvent réduire les débordements par le principe du moindre privilège, la séparation des fonctions, la double approbation, les barrières d'information, la divulgation des intérêts pertinents, la récusation, les traces transactionnelles, la révision indépendante, la détection d'anomalies et les mécanismes d'arrêt. Le principe central est que les systèmes organisationnels doivent accomplir le travail d'isolation au lieu d'exiger des individus qu'ils résistent seuls, par volonté personnelle, aux pressions relationnelles.

Le tableau 4 montre que la complexité des relations privées ne constitue pas en elle-même une raison d'exclusion. La gouvernance doit séparer institutionnellement les interfaces sensibles des réseaux privés.

L'isolation institutionnelle doit aussi respecter la proportionnalité. Les tâches à faible risque ne requièrent pas des contrôles aussi intenses que la disposition de fonds à haut risque ; dans le cas contraire, les organisations créent des coûts administratifs

excessifs et peuvent dégrader la confiance ordinaire. Les interfaces très irréversibles justifient un double contrôle et une conservation de traces plus fortes. La conception de la gouvernance doit équilibrer prévention du risque, efficacité opérationnelle et respect de la vie privée.

La conception institutionnelle ne devrait pas attendre qu'un conflit d'intérêts se produise pour imposer des sanctions. Une conception ex ante peut réduire la charge morale pesant sur les individus. Des canaux clairs de déclaration des parties liées, des procédures de récusation accessibles, des conseils éthiques disponibles et des limites automatisées de permission facilitent le maintien de l'intégrité du rôle lorsque surgissent des pressions privées.

L'isolation ne doit pas non plus transférer toute la responsabilité sur la divulgation. La divulgation rend un risque visible mais n'élimine pas le biais en elle-même. À certaines interfaces à haut risque, séparation des fonctions, récusation ou approbation indépendante comptent davantage qu'une simple déclaration de relation. À l'inverse, une isolation excessive peut entraver la coopération ordinaire. L'intensité du contrôle doit correspondre au risque de l'interface.

Du point de vue de la philosophie du droit, ces mécanismes réalisent ensemble l'**explicabilité de l'autorité** : l'organisation peut indiquer qui a reçu quelle autorité, pourquoi elle lui a été confiée, qui peut en réviser l'usage et quand elle prend fin. Une telle structure protège à la fois les tiers et les titulaires de rôle, car les réseaux privés peuvent difficilement réinterpréter des liens personnels comme autorisation organisationnelle.

11.4 Prise en charge progressive des rôles

Le principe de contrôlabilité progressive développé plus haut possède un analogue organisationnel. Un agent peut d'abord assumer des tâches dont l'autorité est clairement délimitée, auditable, réversible et faiblement exposée au débordement. La responsabilité peut ensuite s'étendre à mesure que les capacités de maintien des frontières et l'isolation institutionnelle se stabilisent. « Progressif » ne doit pas signifier transférer le risque vers de petites organisations, des tiers vulnérables ou des positions peu visibles. Une intégrité fiduciaire minimale est requise quelle que soit la taille du rôle.

La prise en charge progressive des rôles constitue donc une ingénierie des permissions plutôt qu'un jugement identitaire. Les organisations peuvent intégrer apprentissage, supervision et extension des responsabilités dans la conception des rôles afin que des pratiques stables se développent dans un environnement observable. Une telle conception peut bénéficier à tout membre de l'organisation et ne requiert pas de traiter les relations familiales comme une étiquette spéciale.

Surtout, éthique organisationnelle et autonomie individuelle ne sont pas à somme nulle. Des frontières institutionnelles claires protègent l'organisation tout en proté-

geant l'agent contre les demandes privées d'utiliser des pouvoirs qu'il ne possède pas réellement. Lorsque l'agent peut invoquer des règles organisationnelles explicites, une exigence de double signature ou une barrière d'information, refuser une demande privée ne dépend plus entièrement de sa force de volonté. Les institutions deviennent ainsi des soutiens extérieurs de l'autonomie.

Les arrangements progressifs exigent également des conditions explicites de sortie et d'escalade. Si un agent démontre de façon répétée des traces stables, une divulgation correcte et un maintien efficace des frontières à une interface, la supervision peut diminuer selon les règles institutionnelles. Si de nouveaux canaux privés, intérêts liés ou responsabilités irréversibles apparaissent, les contrôles peuvent à nouveau augmenter. La progression n'est donc pas un récit linéaire de promotion mais un ajustement continu de l'autorité au risque.

Le modèle peut enfin être utilisé dans la conception organisationnelle générale au-delà des débordements familiaux. Tout réseau privé capable d'influencer l'indépendance d'un rôle, y compris partenaires commerciaux, amis, mentors ou autres relations proches, peut être analysé par les mêmes principes d'interface. La famille constitue simplement le cas de départ du présent article.

12 Reconstruction relationnelle, pouvoir contraint et décentrement du pouvoir

L'orientation normative de l'article n'est pas de transférer le pouvoir d'une partie vers l'autre. Elle consiste à permettre aux relations de dépendre progressivement moins de la question « qui peut imposer un résultat ? ». Les capacités de pouvoir sont difficiles à éliminer entièrement des relations complexes. La question essentielle est de savoir si elles sont contraintes par des frontières, des procédures et des possibilités réciproques de contestation.

12.1 Structure minimale d'un pouvoir contraint

L'article décrit comme moins centrée sur le pouvoir une relation satisfaisant plusieurs conditions minimales : aucune partie ne peut facilement déterminer unilatéralement la trajectoire fondamentale de vie de l'autre ; les modifications des règles essentielles reposent sur des raisons et des procédures ; les faits importants peuvent être vérifiés indépendamment ; la dissidence ne déclenche pas automatiquement une sanction disproportionnée au différend ; l'autorisation peut être expliquée et révoquée dans des conditions raisonnables ; la sortie ou la suspension est réalistement possible ; les arrangements de ressources communes conservent des traces et des mécanismes de responsabilité.

Ces conditions n'exigent pas l'égalité des ressources. Une famille peut comporter de grandes différences de revenu, de rôles de care et de compétence professionnelle tout en maintenant une forte transparence des règles et des limites de l'autorité.

À l'inverse, des ressources formelles similaires ne garantissent pas la symétrie de l'autorité interprétative, du pouvoir de modifier les normes ou des coûts de sortie.

Le « pouvoir contraint » ne signifie pas non plus que toute décision doive être négociée jusqu'à l'obtention d'un accord complet. Une vie commune complexe exige délégation, spécialisation et décisions rapides. Les questions décisives sont de savoir qui peut décider quoi et comment cette autorité peut être révisée. Une personne peut disposer d'une autorité opérationnelle supérieure dans un domaine particulier si sa source est claire, sa portée délimitée et si cette autorité ne devient pas automatiquement un droit général de dominer d'autres domaines.

Cette structure est plus proche de l'intuition de non-domination que de l'égalité absolue. Les participants peuvent disposer de ressources et de rôles différents sans rester soumis à la capacité arbitraire d'autrui de modifier leurs conditions fondamentales de vie. La théorie de la non-domination de Pettit situe le noyau de la liberté dans le fait de savoir si une personne est soumise au pouvoir arbitraire d'une autre, et non seulement dans la question de savoir si une interférence a déjà eu lieu (Pettit 1999). L'article ne traite pas la théorie républicaine comme une éthique complète des relations familiales, mais cette intuition structurelle explique pourquoi la seule diminution des interférences effectives peut demeurer insuffisante.

Une perspective de non-domination attire également l'attention sur le **contrôle des capacités de contrôle**. Si la partie forte promet « je n'utiliserai généralement pas ce pouvoir » tout en restant libre de modifier les règles à tout moment, la partie faible doit encore organiser sa vie autour de cette possibilité. Un véritable décentrement convertit donc les promesses de bonne volonté en frontières exécutables : signatures conjointes, accès indépendant, portée explicite des autorisations, révision par des tiers et options de sortie réalistes. La liberté relationnelle dépend ainsi en partie de la structure plutôt que de la seule retenue personnelle.

La non-domination ne peut cependant exclure le care et la dépendance. Les personnes qui assurent le care peuvent avoir besoin de capacités décisionnelles étendues en situation d'urgence, et les enfants ou personnes à capacité limitée peuvent nécessiter une représentation. La question pertinente est de savoir si l'autorité est proportionnée à la finalité protectrice, à la capacité actuelle et aux conditions temporelles, si elle se réduit lorsque les capacités évoluent, et si des structures révisables de responsabilité existent. La proportionnalité relie ainsi non-domination et autonomie relationnelle plutôt qu'un idéal abstrait d'indépendance absolue.

12.2 Croissance des capacités et choix non dominateur

Le développement de capacités économiques, institutionnelles, épistémiques et relationnelles produit un double effet. Il augmente la capacité de résister aux interventions non autorisées et rend aussi plus réaliste le **choix de ne pas recourir à la domination pour résoudre le conflit**. Lorsqu'un agent dépend entièrement d'un

seul nœud, tout désaccord peut être vécu comme existentiel. Une fois assuré un plancher minimal d'autonomie, les coûts d'un échec de la négociation diminuent et les deux côtés peuvent davantage tolérer un désaccord réel.

Cette conception diffère d'une analyse qui comprend le pouvoir uniquement comme domination. Allen rappelle que le pouvoir possède aussi des dimensions d'empowerment et de capacité collective (Allen 1998). L'article traite donc le terme de la formation de l'autonomie comme une **extension de l'espace négociable**, et non comme la maximisation de la capacité de contrôle de l'une ou l'autre partie.

La distinction est particulièrement importante lorsque la position plus faible acquiert des capacités. Revenu indépendant, statut institutionnel ou connaissances juridiques acquis pour protéger ses frontières peuvent temporairement apparaître comme une plus grande force de négociation ; l'objectif normatif n'est pourtant pas une domination inversée. L'amélioration d'une relation dépend de la question de savoir si les nouvelles capacités stabilisent les frontières, augmentent la contestabilité et réduisent les dépendances concentrées, ou si elles servent à reproduire l'arbitraire antérieur de la modification des règles.

La reconstruction relationnelle doit donc être évaluée à travers les institutions et la grammaire, et pas seulement en demandant si « le pouvoir est devenu plus égal ». Une relation peut réduire l'écart de pouvoir tout en restant fortement conflictuelle, imprévisible et punitive. Une autre peut conserver des inégalités de ressources tout en devenant moins dominatrice parce que les autorités sont étroitement contraintes.

La croissance des capacités doit aussi être protégée contre un « dilemme de sécurité ». Si chaque côté interprète l'augmentation des capacités de l'autre comme une menace, tout effort pour construire l'autonomie peut déclencher un contrôle préventif et une spirale d'escalade. Éviter ce résultat exige que croissance des capacités et frontières d'autorité deviennent transparentes simultanément. Un compte séparé ne signifie pas nécessairement des actifs dissimulés, des réseaux extérieurs ne signifient pas l'abandon de la famille, et des règles organisationnelles ne signifient pas l'hostilité. Le changement des cadres interprétatifs est donc aussi important que le changement des capacités matérielles.

Les théories de la justice fournissent ici une contrainte directionnelle : la croissance des capacités doit d'abord réparer un minimum de statut, de choix et de non-domination plutôt que rechercher un avantage illimité. Une fois que l'agent dispose de frontières suffisantes, une capacité supplémentaire de contrôler autrui ne peut être justifiée par la simple invocation de « l'autonomie ». Cette contrainte empêche l'autonomie de devenir une licence générale d'accumuler des ressources de domin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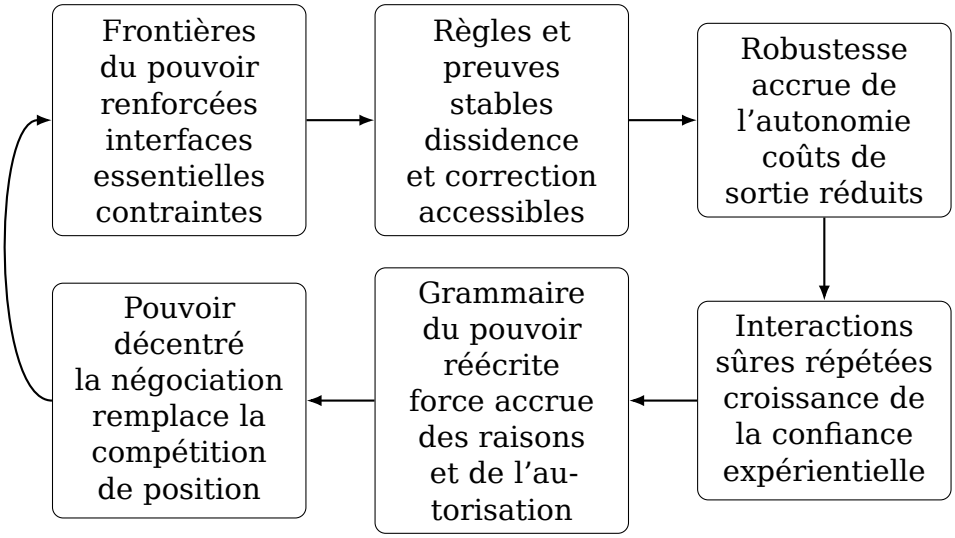

Figure 2 – Mécanisme cyclique possible de reconstruction relationnelle : frontières, règles, autonomie, confiance et changement grammatical

12.3 Réécriture de la grammaire et reconstruction de la confiance

Le décentrement du pouvoir exige une modification des règles de conversion représentées par l'équation 6. Raisons, autorisation, preuves, délibération et procédure acquièrent progressivement davantage d'efficacité, tandis que position nue, menaces fondées sur les ressources et coûts de sortie deviennent moins décisifs. Le changement doit être établi par des événements répétés qui produisent une nouvelle histoire relationnelle h_t. Une seule promesse ne suffit pas à démontrer que la structure a changé.

La figure 2 représente un cycle positif possible et non un modèle fixe par étapes. Les relations réelles peuvent régresser, stagner ou évoluer dans un ordre différent. La validité empirique exige des études longitudinales.

Réécrire la grammaire exige aussi un changement symbolique. Des revendications de frontière autrefois comprises comme « déloyales », « contraires au devoir filial » ou comme « rejet de la famille » peuvent progressivement être réinterprétées comme une gestion ordinaire de l'autorisation. Là où seules la position ou les ressources rendaient auparavant les prétentions efficaces, preuves, procédures et règles partagées peuvent ensuite acquérir une force pratique. De tels changements ne peuvent généralement pas être obtenus par de seules déclarations abstraites de valeurs. Ils doivent être vérifiés à travers des événements concrets répétés.

Du point de vue politico-économique, les conditions institutionnelles extérieures influencent aussi la durabilité du cycle. Une perte soudaine de revenu, de logement ou de statut juridique peut accroître les coûts de sortie et restaurer l'efficacité d'une ancienne grammaire. La reconstruction relationnelle n'est donc pas une transformation psychologique ponctuelle, mais un état dynamiquement stable exigeant simultanément des soutiens matériels, institutionnels et normatifs.

Du point de vue herméneutique, réécrire la grammaire exige également un nouveau récit partagé. Si un ordre ancien décrit répétitivement un membre comme « la personne naturellement responsable » et un autre comme « quelqu'un qui doit être géré », une modification des permissions de compte peut ne pas transformer les présupposés de statut dans d'autres domaines. Les nouvelles règles doivent produire de nouvelles preuves narratives par la pratique répétée : qui peut accomplir des tâches indépendamment, qui respecte les frontières, et si un désaccord peut réellement survenir sans détruire la relation. Changement institutionnel et changement de sens se renforcent ainsi mutuellement.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implique en outre que la reconstruction réduise les monopoles sur le langage institutionnel. Les règles essentielles doivent être intelligibles pour tous les agents concernés, et les institutions extérieures importantes devraient idéalement permettre un accès direct et une vérification indépendante. Dans le cas contraire, de nouvelles règles formelles peuvent encore devoir fonctionner à travers l'ancien nœud interprétatif, laissant le changement grammatical sur le papier plutôt que dans la pratique.

13 Propositions analytiques, opérationnalisation et vérification empirique

Cette section traduit les concepts précédents en propositions susceptibles d'être étudiées. Leur objectif est d'accroître la falsifiabilité, et non de présenter le cadre conceptuel comme s'il avait déjà reçu une validation empirique.

Proposition analytique 1 (Concentration des interfaces de pouvoir) *Toutes choses approximativement égales par ailleurs, plus les interfaces de décision, d'interprétation, de modification des normes, de ressources essentielles et de sortie sont concentrées dans une même position relationnelle, plus un désaccord unique risque de modifier plusieurs domaines de vie pour la position la plus faible au lieu de rester limité à l'objet du différend.*

Empiriquement, la recherche peut comparer la fréquence des « conflits limités à un domaine » avec celle des « conséquences transversales », par exemple en observant si un désaccord financier s'étend répétitivement au logement, à l'activité professionnelle, aux relations sociales ou à l'accès à l'information. Les explications alternatives comprennent les crises communes, la rareté des ressources et les changements d'institutions extérieures.

Proposition analytique 2 (Conversion grammaticale) *Lorsque la structure d'efficacité pratique dépend principalement de la position, des menaces sur les ressources et des coûts de sortie, des prétentions substantiellement similaires produiront systé-*

matiquement des conséquences pratiques différentes selon la position relationnelle de la personne qui les formule.

La vérification exige de contrôler les différences de contenu et de contexte des prétentions et d'observer si le même type d'énoncé de frontière est traité différemment selon l'agent qui le formule.

Proposition analytique 3 (Instabilité normative et exposition de confiance) *Lorsque la modification des règles est faiblement prévisible et que la capacité de contestation est limitée, les agents peuvent réduire leur exposition relationnelle dans les matières à haut risque même s'ils déclarent des jugements relativement positifs sur la bienveillance de l'autre personne.*

Cette proposition distingue confiance structurelle et confiance dans le caractère ; elle peut être examinée par des expériences de scénario, des entretiens ou des relevés longitudinaux d'événements.

Proposition analytique 4 (Rôle médiateur de l'autonomie épistémique) *Plus les canaux permettant de conserver les faits, de comparer les interprétations et d'obtenir une vérification extérieure sont faibles, plus il est difficile pour un agent d'identifier les flux de valeur, les changements d'autorisation et les modifications de règles, ce qui accroît l'incertitude interprétative dans les différends de frontière.*

Cette proposition n'implique pas que le pouvoir cause tout conflit interprétatif. Biais de mémoire, complexité de l'information et échec communicationnel constituent des mécanismes concurrents.

Proposition analytique 5 (Robustesse de l'autonomie) *Une plus grande disponibilité des ressources d'autonomie a davantage de chances de devenir une frontière de vie exécutable lorsque le contrôle effectif et la robustesse à l'interférence augmentent simultanément.*

Revenus, comptes ou statut institutionnel doivent donc être analysés avec les droits d'accès, le contrôle des identifiants, l'information indépendante et les soutiens alternatifs.

Proposition analytique 6 (Portefeuilles de dépendance et défaillance concentrée) *Lorsque plusieurs domaines essentiels de la vie dépendent de soutiens fortement corrélés provenant d'un seul nœud, le contrôle ou la défaillance de ce nœud a davantage de chances de produire une déstabilisation en cascade de l'ordre de vie global que dans un portefeuille comportant des soutiens indépendants.*

Cette proposition peut emprunter des méthodes à la résilience des réseaux et au risque de portefeuille, mais les relations sociales ne doivent pas être traitées mécaniquement comme des nœuds indépendants.

Table 5 – Pistes d'opérationnalisation des variables centrales

Variable	Matériau observable	Principal risque de mauvaise classification
Interface décisionnelle D	Qui peut approuver, opposer un veto ou modifier les conditions d'action ; conséquences pratiques du refus	Confondre conseil professionnel ou tutelle légitime avec contrôle
Interface interprétative I	Manière dont les récits de conflit entrent dans les archives communes, les jugements de tiers et les règles ultérieures	Confondre désaccord ordinaire et monopole interprétatif
Modification normative N	Fréquence, temporalité, procédure, caractère ex post et réciprocité des changements de standards	Confondre adaptation raisonnable et manipulation des règles
Interface de ressources R	Contrôle de l'accès aux comptes, documents, logement, information, réseaux sociaux et institutions	Ignorer la base autorisée de la gestion conjointe
Interface de sortie X	Coûts économiques, affectifs, institutionnels et informationnels du refus, de la suspension, de la séparation ou de la recherche d'aide	Confondre perte relationnelle ordinaire et coûts coercitifs
Confiance structurelle **K**	Stabilité des règles, traces de preuves, plainte, correction et mécanismes de sortie	Remplacer les conditions structurelles par de seuls « niveaux de confiance » autodéclarés
Robustesse de l'autonomie **A**	Disponibilité des ressources, contrôle effectif et continuité d'usage sous interférence extérieure	N'enregistrer que les droits formels ou les quantités de ressources
Frontière de valeur **B**	Connaissance des canaux, autorisation, révocation, traces et responsabilité	Traiter le partage familial lui-même comme anomalie

Proposition analytique 7 (Canaux de valeur non autorisés) *Plus les conditions de connaissance, d'autorisation, de révocation, de traçabilité et de responsabilité entourant un canal de valeur sont faibles, plus le risque qu'il devienne une source persistante de conflit de frontière est élevé. Déterminer s'il constitue une exploitation exige encore des conditions normatives supplémentaires.*

La proposition sépare l'identification du risque du jugement éthique final.

Proposition analytique 8 (Gouvernance des interfaces organisationnelles) *En présence d'une pression privée, le risque de capture du rôle dépend davantage de l'accessibilité, de la visibilité et de la réversibilité des interfaces sensibles que de la complexité des relations privées en elle-même.*

Cette formulation permet à la conception organisationnelle de se concentrer sur les interfaces plutôt que sur une exclusion fondée sur l'identité des personnes ayant des situations familiales complexes.

13.1 Dispositifs de recherche possibles

Une étude empirique rigoureuse exigerait au moins trois types de matériaux. Le premier est constitué de **données de séquences d'événements** : traces de changements de règles, flux de valeur, conséquences du refus et conflits interprétatifs dans le temps, afin de ne pas inférer les mécanismes à partir de seules impressions globales rétrospectives. Le deuxième est constitué de **données multi-acteurs** : lorsque la sécurité et l'éthique le permettent, preuves provenant de différents participants, d'archives institutionnelles et de tiers, afin de réduire la dépendance envers une source narrative unique. Le troisième est constitué de **données sur l'arrière-plan institutionnel** : statut juridique, sécurité sociale, marchés du logement, conditions du travail et obligations culturelles influencent les coûts de sortie et l'autonomie réalisable ; la comparaison entre cas doit donc documenter et contrôler explicitement ces arrière-plans.

La recherche doit aussi traiter les limites éthiques. Les études du pouvoir familial peuvent impliquer des révélations à haut risque, des finances privées, des violences possibles et des mineurs. La collecte de données ne doit pas accroître l'exposition des participants au seul motif de « tester le modèle ». Entretiens, enregistrement des événements et vérification par des tiers exigent des procédures appropriées de sécurité, de confidentialité et de retrait.

Le dispositif le plus informatif n'est peut-être pas une question transversale demandant « qui a le plus de pouvoir dans la famille ? », mais la construction de données au niveau des événements. Les chercheurs pourraient enregistrer le thème du différend, la règle initiale, les raisons de chaque partie, la personne disposant d'un pouvoir d'arrêt ou de veto, la modification éventuelle de la règle, les ressources mobilisées, la manière dont l'événement s'est terminé et la modification éventuelle des règles ultérieures. De telles données correspondent au langage mécaniste du cadre et testent plus directement la dépendance au sentier représentée par l'équation 7.

La recherche comparative devrait sélectionner des cas dont l'arrière-plan institutionnel peut être identifié. Les différences entre systèmes de logement, sécurité sociale, droit de la famille et marchés du travail modifient les alternatives extérieures ; les comparaisons interrégionales ne devraient donc pas attribuer toute différence à la culture familiale. Une stratégie consiste à modéliser les variables institutionnelles comme un arrière-plan de second niveau à côté des séquences d'événements intrafamiliaux. Une autre consiste à comparer différentes configurations relationnelles au sein d'environnements institutionnels similaires, renforçant ainsi l'identification des mécanismes relationnels.

Les matériaux qualitatifs demeurent indispensables.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concerne les raisons qui comptent effectivement dans une relation, et de telles informations exigent souvent entretiens, textes, archives financières et reconstruction

d'événements. Les indicateurs quantitatifs peuvent décrire concentration, fréquence d'événements et coûts de sortie, mais ils ne peuvent à eux seuls expliquer pourquoi une différence de ressources devient autorité décisionnelle. Des méthodes mixtes combinant analyse de séquences, études de cas comparatives et mesures quantitatives limitées peuvent donc être particulièrement adaptées.

Enfin, la participation à la recherche doit elle-même être traitée comme une intervention possible. Poser des questions sur les comptes, le contrôle ou la sortie peut modifier l'interprétation que les participants ont de leur relation et, dans certaines circonstances, augmenter le risque. Les dispositifs de recherche doivent donc appliquer davantage de prudence que les enquêtes familiales ordinaires en matière de consentement éclairé, planification de la sécurité, séparation des données et mécanismes de retrait.

14 Frontières théoriques, explications alternatives et limites d'application

Cette section identifie les conclusions que le cadre ne peut établir à lui seul. La rigueur conceptuelle provient non seulement des définitions, mais aussi de la préservation des contre-exemples et des mécanismes alternatifs.

14.1 Sources multiples d'asymétrie

Les asymétries familiales peuvent provenir de l'âge, des responsabilités de care, de l'expertise, du revenu, du statut institutionnel, de la santé, du statut migratoire et du temps disponible. Certaines asymétries ont des fonctions claires, notamment la représentation en urgence et la protection des enfants. La recherche doit distinguer **asymétrie nécessaire** et **pouvoir extensible et non contraint**. La première possède des limites de domaine, de temps et de raison. Le second traverse plus facilement les domaines, devient récursif et manque de conditions de contestation.

Il faut également distinguer « source légitime » et « usage légitime ». Même une capacité dotée d'une base initiale raisonnable peut subsister au-delà de ce qui est nécessaire. À l'inverse, des conventions familiales sans source formelle d'autorité peuvent acquérir une légitimité importante grâce à une transparence, une réciprocité et une révocabilité durables. La source de l'autorité n'est donc qu'un point de départ ; portée, procédure et conséquences doivent être examinées séparément.

Les sources d'asymétrie se chevauchent souvent. Les différences de revenu peuvent coïncider avec la capacité linguistique, le statut migratoire ou des différences de santé, de sorte qu'une ressource unique est amplifiée par d'autres interfaces. Des études empiriques qui ne mesurent que les salaires peuvent sous-estimer les effets combinés de ces interfaces.

Les chercheurs doivent également observer les **asymétries compensatrices**. Un

membre peut être désavantagé en revenu mais disposer de réseaux de parenté, d'une expertise ou d'un statut institutionnel plus forts. Un autre peut contrôler des actifs importants tout en dépendant du premier pour le care ou la langue. Le pouvoir dans les relations peut donc être multidimensionnel, croisé et parfois compensé. Les cinq interfaces ne doivent ni être comprimées dans un classement unidimensionnel, ni servir à produire une hiérarchie globale de celui qui serait « plus fort ».

L'analyse empirique doit encore distinguer position structurelle et responsabilité pour un événement particulier. Détenir une interface de ressources indique une capacité potentielle, et non la preuve qu'une personne a causé tous les résultats du conflit. À l'inverse, un acteur globalement moins doté en ressources peut détenir une autorité décisive dans un domaine particulier. Une analyse par domaine et par événement est indispensable pour éviter les généralisations excessives.

14.2 Compatibilité entre dépendance, intimité et autonomie

Une idée centrale de l'autonomie relationnelle est que la dépendance n'est pas logiquement incompatible avec l'autonomie. Les agents peuvent rester autonomes au sein d'une profonde intimité, du care et du partage des ressources lorsque la relation soutient la formation, l'expression et la révision des capacités (Mackenzie et Stoljar 2000 ; Nedelsky 2012). L'article ne fait donc pas de « l'indépendance » la mesure unique d'une famille idéale. L'autonomie distribuée ne cherche pas à éliminer l'interdépendance ; elle cherche à éviter que toutes les conditions critiques de la vie dépendent d'un point unique de contrôle irremplaçable.

La dépendance peut même être une condition positive de l'autonomie. Éducation, care, soutien affectif et représentation institutionnelle peuvent élargir les capacités. La distinction essentielle porte sur le caractère capacitant ou capturant du soutien. La recherche doit donc distinguer « j'ai besoin de l'aide d'une autre personne » de « une seule personne particulière peut décider si j'obtiens les conditions qui me sont nécessaires ». La première situation relève de l'interdépendance ordinaire. La seconde se rapproche d'un risque de dépendance concentrée.

Cette limite empêche aussi de lire le cadre comme un programme individualiste. Établir des soutiens extérieurs n'exige pas de réduire l'intimité. Cela permet à l'intimité de ne pas devoir porter toutes les fonctions de subsistance. L'une des valeurs des services publics e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réside précisément dans la réduction de l'irremplaçabilité au sein des relations sans exiger la destruction des liens familiaux.

L'autonomie relationnelle montre également que l'« indépendance complète à l'égard de la dépendance » n'est ni réalisable ni nécessairement souhaitable. Pouvoir confier des tâches, recevoir du care et partager des ressources sans peur constitue une valeur importante des relations intimes. L'article demande si la dépendance possède des frontières intelligibles, si les agents peuvent reprendre le contrôle lorsque nécessaire, si plusieurs sources de soutien existent et si la dépendance continue d'ac-

croître les capacités. Elle peut donc être un médium d'autonomie ou un médium de contrôle ; la différence tient à la structure relationnelle plutôt qu'à la seule intensité de la dépendance.

De même, la capacité de sortie ne signifie pas promouvoir la sortie. Les options de sortie ont une signification normative précisément parce qu'elles peuvent réduire la coercition dans les négociations ordinaires et permettre à un agent d'exprimer un désaccord sans quitter effectivement la relation. La distinction de Hirschman entre exit et voice suggère que les deux peuvent se conditionner mutuellement (Hirschman 1970). Dans les familles, une structure dont la sortie est entièrement impossible peut rendre la « prise de parole » trop risquée, tandis que des garanties extérieures modestes peuvent soutenir la coopération durable à l'intérieur de la relation.

14.3 Différences culturelles, institutionnelles et de parcours de vie

Les obligations familiales et les arrangements de ressources dépendent fortement de l'arrière-plan institutionnel. Des systèmes de sécurité sociale robustes peuvent réduire les coûts de sortie. Les institutions du logement, de la migration, de la succession et du care modifient les interfaces de ressources. Les étapes du parcours de vie comptent également : éducation des enfants, care, chômage, migration, formation et retraite redistribuent la dépendance. Toute utilisation empirique du cadre doit donc indiquer l'étape temporelle et l'environnement institutionnel, et ne devrait pas généraliser les normes de frontière d'une société particulière en modèle universel.

La différence culturelle ne doit pas être simplifiée en opposition binaire entre « collectivisme et individualisme ». Des obligations intergénérationnelles similaires peuvent être mises en œuvre par des procédures très différentes. Certaines familles reposent sur des décisions communes fortement réciproques, tandis que d'autres interprètent l'obligation selon une obéissance unidirectionnelle. La recherche doit examiner comment les devoirs sont négociés, qui peut proposer des exceptions et si les obligations sont réciproques, au lieu d'inférer la nature du pouvoir à partir d'étiquettes culturelles.

L'analyse du parcours de vie doit elle aussi être dynamique. L'espace d'autonomie des membres plus jeunes s'élargit normalement avec l'âge, tandis que le grand âge ou la maladie peuvent accroître à nouveau les besoins de représentation. Une structure d'autorité justifiée à une étape peut devenir inutilement restrictive si elle ne s'ajuste pas à l'évolution des capacités.

Les arrière-plans linguistiques et institutionnels changent également au cours de la vie. Migration, mariage transnational, études à l'étranger, retraite et numérisation peuvent soudain transformer un capital linguistique auparavant marginal en interface essentielle. À l'inverse, un membre qui apprend avec le temps peut réduire une dépendance antérieure à la traduction. Les chercheurs ne doivent pas traiter la répartition du travail linguistique ou administratif à un moment donné comme une

identité permanente. Ils doivent demander si ce travail peut être appris, remplacé et redistribué.

L'explication culturelle doit enfin éviter d'essentialiser les différences normatives. Des concepts tels que devoir filial, loyauté, propriété commune ou représentation familiale peuvent prendre plusieurs significations pratiques selon les institutions et les familles. Une méthode herméneutique exige de montrer comment ces termes sont utilisés dans les relations concrètes, qui les interprète et quelles conséquences d'action ils déclenchent, plutôt que d'inférer directement domination ou légitimité à partir d'étiquettes culturelles.

14.4 Limites de l'identification causale

L'article propose une structure de mécanismes, et non un modèle causal achevé. Une autorité interprétative concentrée peut réduire l'autonomie épistémique, mais elle peut aussi résulter d'un avantage informationnel ancien. Des ressources concentrées peuvent affecter les règles, ou résulter d'une division du travail professionnel mutuellement acceptée. Une faible confiance peut être causée par la structure de pouvoir, mais aussi par une tromperie antérieure, un conflit de personnalité ou une pression extérieure. Les recherches futures auront besoin de séquences temporelles, d'expériences naturelles, de cas comparatifs ou de preuves multi-méthodes pour identifier la direction des effets.

La causalité inverse est particulièrement importante. Un membre de la famille peut acquérir davantage de connaissances sur les ressources en gérant les finances pendant une longue période. Cette position peut être le résultat d'une confiance antérieure et devenir ensuite une condition du contrôle. Des coûts de sortie élevés peuvent réduire la confiance, tandis qu'une faible confiance peut aussi conduire un participant à concentrer les ressources pour réduire l'incertitude. Les schémas mécanistes de l'article proposent donc des trajectoires possibles mais ne peuvent établir la direction causale à partir de seules corrélations transversales.

Des variables omises peuvent également être importantes. Crises de santé, chômage, charges de care, transformations macroéconomiques et changements de statut juridique peuvent affecter simultanément ressources et confiance. Les études empiriques devraient enregistrer ces chocs communs lorsque cela est possible et rester ouvertes à la possibilité que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ne fournisse pas d'explication indépendante.

La mesure peut elle-même rétroagir sur l'objet étudié. Les entretiens peuvent amener les membres d'une famille à réinterpréter des événements passés. Un vocabulaire juridique ou psychologique peut modifier la manière dont ils nomment leur relation. Les questions des chercheurs peuvent accroître la saillance de certains conflits. Une perspective herméneutique traite donc les matériaux de recherche comme des textes produits dans l'interaction plutôt que comme des fenêtres transparentes. La re-

cherche qualitative devrait documenter les conditions d'entretien, les styles de questionnement et les changements de récit. La recherche quantitative devrait de même éviter de traiter les réponses suscitées par une terminologie théoriquement chargée comme des états naturels de la relation.

Enfin, le modèle affronte un risque d'**absorption théorique**. Si toute différence de ressources, de langage, de règles et de résultat conflictuel peut être expliquée par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le concept perd sa falsifiabilité. Les recherches futures doivent préciser les conditions dans lesquelles il devrait être rejeté, par exemple des cas où des différences marquées de ressources et de capacités linguistiques coexistent avec une autorisation et une contestation fortement symétriques, ou lorsque des interfaces de pouvoir concentrées ne produisent pas de conversion interdomaines.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n'a de valeur empirique indépendante que si de tels contre-exemples peuvent subsister.

14.5 Séparation entre analyse conceptuelle et jugement juridique

« Structure orientée vers le pouvoir », « transfert intermédiaire non autorisé » et « risque de capture du rôle » sont des concepts analytiques. Ils ne constituent pas des conclusions judiciaires, cliniques ou disciplinaires. La contrainte juridique, le détournement, le conflit d'intérêts, les devoirs de tutelle et les obligations fiduciaires possèdent chacun des normes législatives et jurisprudentielles distinctes. Le cadre peut identifier des structures exigeant un examen plus approfondi, mais il ne peut remplacer l'établissement des faits dans une juridiction déterminée.

De même, la « philosophie du droit » mobilisée ici concerne des questions générales d'autorité, de procédure, d'autonomie relationnelle et d'ordre privé. Elle ne prétend pas que ces principes possèdent une force juridique identique dans tous les systèmes de droit. Tout différend concret exige de déterminer indépendamment le droit applicable, les standards de preuve et les voies procédurales pertinentes.

Les jugements éthiques et juridiques demeurent également distincts. Un arrangement peut être licite tout en étant éthiquement problématique, ou faire l'objet d'une controverse morale sans être illégal. Préserver cette distinction réduit l'inflation conceptuelle et permet au cadre de fonctionner entre plusieurs juridictions sans présupposer silencieusement le droit substantiel d'un État particulier.

Le cadre ne peut pas non plus inférer directement la responsabilité individuelle à partir du risque structurel. La responsabilité exige de savoir de quelles informations un agent disposait, si des alternatives existaient, si une contrainte était présente, si les conséquences étaient raisonnablement prévisibles et si les institutions offraient des voies praticables de conformité. L'analyse structurelle peut expliquer comment le risque apparaît, mais ne peut déterminer la responsabilité sans ces faits.

Le cadre est donc mieux utilisé comme outil d'identification des problèmes et de conception de recherche. Il indique quelles interfaces exigent des preuves, quels

concepts doivent être séparés et quelles explications concurrentes doivent être considérées. Sa rigueur vient de la limitation de la portée des inférences plutôt que de la maximisation de la force des conclusions.

L'usage des théories de la justice exige la même retenue. Rawls, Young, Sen, Nussbaum, Pettit, Okin et les théories de l'autonomie relationnelle diffèrent sur des points importants. L'article n'a pas démontré qu'elles peuvent être fusionnées sans perte dans un système normatif unique. Il les utilise pour fournir des dimensions diagnostiques distinctes : équité institutionnelle, domination relationnelle, capacité substantielle, justice au sein de la famille et non-domination. Des conclusions normatives plus fortes exigeraient une théorie supplémentaire de la priorité lorsque ces approches entrent en conflit.

L'herméneutique et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n'attribuent pas davantage automatiquement une responsabilité. Une personne possédant un capital linguistique supérieur, une maîtrise de la langue standard ou la responsabilité de la traduction institutionnelle peut simplement accomplir un travail supplémentaire pour la famille plutôt que rechercher le contrôle. Le risque structurel n'apparaît que lorsque cette capacité se couple durablement à une fermeture informationnelle, une irremplaçabilité, une modification des règles et des interfaces de ressources. La théorie doit augmenter le pouvoir de discrimination plutôt qu'élargir le champ de la suspicion.

15 Conclusion

Cet article reconstruit le pouvoir dans les relations familiales comme un mécanisme relationnel à plusieurs niveaux. Le premier niveau comprend cinq interfaces de pouvoir : décision, interprétation, modification des normes, ressources et sortie. Le deuxième est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c'est-à-dire le processus par lequel ces interfaces et les différences de position sont converties en efficacité pratique dans la relation. Le troisième comprend confiance structurelle, autonomie épistémique et autonomie multidimensionnelle, toutes affectées par ces conversions. Le quatrième comprend les frontières de la valeur et les interfaces des rôles organisationnels, où les relations privées peuvent entrer dans la coopération avec des tiers, les ressources confiées et les domaines de responsabilité publique.

Cette structure permet de séparer plusieurs confusions courantes. La capacité de pouvoir diffère de son exercice effectif. L'exercice diffère du résultat. Le résultat diffère de la légitimité. Le partage familial diffère du transfert non autorisé. La pression privée diffère de la capture d'un rôle organisationnel. L'asymétrie diffère de la domination, et la croissance des capacités diffère de la croissance de la domination. Ces distinctions permettent de rester analytiquement attentif à l'instabilité persistante des règles, à la concentration de l'interprétation, au contrôle transversal et aux coûts de sortie tout en préservant la complexité de l'intimité, de l'interdépendance et du care.

Le concept de « grammaire du pouvoir » possède une fonction théorique précise et limitée. Il décrit comment les relations convertissent position, ressources, statut, interprétation et coûts du refus en décisions effectivement opérantes. Sa valeur n'est maintenue que s'il permet d'expliquer des phénomènes que la théorie des ressources, l'étude des décisions individuelles ou une analyse purement discursive ne peuvent expliquer séparément. À cette fin, l'article a spécifié des variables opérationnelles, des contre-exemples, des explications alternatives et des propositions empiriques. Les recherches futures devront tester si des interfaces distinctes de pouvoir forment réellement des couplages stables, si la conversion grammaticale présente des régularités reconnaissables entre cas, comment les conditions de confiance structurelle interagissent avec la confiance dans le caractère, et quand l'autonomie distribuée accroît la résilience ou augmente au contraire les coûts de coordination.

L'ajout des théories de la justice, de la philosophie du droit, de l'herméneu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et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famille clarifie la position théorique du concept. Les théories de la justice fournissent des dimensions d'évaluation portant sur les ressources, les capacités, le statut et la non-domination. La philosophie du droit explique comment autorisation, procédure, stabilité des règles et recours contraignent le pouvoir privé. L'herméneutique montre comment l'histoire relationnelle et les récits participent à la constitution du sens des événements. L'économie politique du langage montre comment capital linguistique, expression légitime et traduction institutionnelle produisent des effets réels sur les ressources.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famille explique comment revenu, care, actifs, temps et institutions extérieures modifient les positions de négociation. Ensemble, ces conditions entrent dans l'état relationnel z_t sans prédéterminer les résultats concrets des interactions.

La grammaire du pouvoir se situe entre ces conditions d'arrière-plan et les événements particuliers. Elle décrit comment différentes structures de ressources et de sens sont converties en décisions effectives. Elle ne peut remplacer ni la théorie des ressources, ni les théories de la justice, ni la philosophie du droit, ni l'herméneutique. Son apport théorique réside seulement dans l'identification des situations où ces dimensions deviennent structurellement couplées. Si des recherches empiriques ultérieures montrent que l'avantage linguistique, les différences de ressources et la position normative ne se convertissent pas de manière stable en résultats décisionnels, ou que cette conversion est entièrement expliquée par des théories existantes, le concept de grammaire du pouvoir devra être restreint ou abandonné. Cette révisabilité fait partie de la discipline théorique que l'article cherche à préserver.

Normativement, l'article comprend l'autonomie comme une capacité relationnelle permettant aux agents de résister aux interventions non autorisées lorsque cela est nécessaire et d'entrer dans une coopération non dominatrice lorsque les conditions le permettent. La finalité de la contrainte du pouvoir n'est pas d'éliminer les relations

mais de leur permettre de supporter un désaccord réel. La finalité de la croissance des capacités n'est pas de permettre à la position plus faible de reproduire la domination antérieure, mais d'élargir l'espace pratique de négociation, d'autorisation, de correction et de sortie. Lorsque raisons, preuves, autorisation et procédures deviennent progressivement les principales sources d'efficacité pratique, une relation peut évoluer d'une comparaison persistante de « qui possède le plus de pouvoir » vers une vie commune dans laquelle le pouvoir occupe une place moins centrale.

Références

Agarwal, Bina (1997). “Bargai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 : 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In : *Feminist Economics* 3.1, p. 1-51. doi : 10.1080/135457097338799.

Allen, Amy (1998). “Rethinking Power”. In : *Hypatia* 13.1, p. 21-40. doi : 10.1111/j.1527-2001.1998.tb01350.x.

Baier, Annette (1986). “Trust and Antitrust”. In : *Ethics* 96.2, p. 231-260. doi : 10.1086/292745.

Blood, Robert O. et Donald M. Wolfe (1960). *Husbands & Wives :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 Glencoe, IL : Free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Sous la dir. de John B. Thompson. Trad. par Gino Raymond et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oudhury, Arshia Amin, Natasha Martland et Olga Luzon (2025). “Women’s Experiences of Coercive Control in Intimate Partner Relationships : A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 In :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doi : 10.1007/s10896-025-00970-6.

Cover, Robert M. (1983). “The Supreme Court, 1982 Term : Foreword : Nomos and Narrative”. In : *Harvard Law Review* 97.1, p. 4-68. doi : 10.2307/1340787.

Davis, Michael et Andrew Stark, éd. (2001).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the Professions*.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 10.1093/oso/9780195128635.001.0001.

Emerson, Richard M. (1962). “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 In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1, p. 31-41. doi : 10.2307/2089716.

Folbre, Nancy (1994). *Who Pays for the Kids ? Gender and the Structures of Constraint*. London : Routledge.

Fricker, Miranda (2007). *Epistemic Injustice :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 10.1093/acprof:oso/9780198237907.001.0001.

Friedman, Marilyn (2003). *Autonomy, Gender, Politics*.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 10.1093/0195138503.001.0001.

Fuller, Lon L. (1969).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New Haven, CT : Yale University Press.

Gadamer, Hans-Georg (2013). *Truth and Method*. Trad. par Joel Weinsheimer et Donald G. Marshall. Revised. London : Bloomsbury Academic.

Gal, Susan (1989). “Lang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8, p. 345-367. doi : 10.1146/annurev.an.18.100189.002021.

Habermas, Jürgen (1996).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d. par William Rehg. Cambridge, MA : MIT Press.

Hardin, Russell (2002).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New York :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Heller, Monica (2003). “Globalization,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7.4, p. 473-492. doi : 10.1111/j.1467-9841.2003.00238.x.

Hesse-Biber, Sharlene et John Williamson (1984). “Resource Theory and Power in Families : Life Cycle Considerations”. In : *Family Process* 23.2, p. 261-278. doi : 10.1111/j.1545-5300.1984.00261.x.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rvine, Judith T. (1989). “When Talk Isn’t Cheap : Lang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 *American Ethnologist* 16.2, p. 248-267. doi : 10.1525/ae.1989.16.2.02a00040.

Komter, Aafke (1989). “Hidden Power in Marriage”. In : *Gender & Society* 3.2, p. 187-216. doi : 10.1177/089124389003002003.

Lukes, Steven (2021). *Power : A Radical View*. 3e éd. London : Bloomsbury Academic.

Mackenzie, Catriona et Natalie Stoljar, éd. (2000). *Relational Autonomy :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utonomy, Agency, and the Social Self*.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 10.1093/oso/9780195123333.001.0001.

Mnookin, Robert H. et Lewis Kornhauser (1979). “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Law : The Case of Divorce”. In : *Yale Law Journal* 88.5, p. 950-997. doi : 10.2307/795824.

Nedelsky, Jennifer (2012). *Law’s Relations : A Relational Theory of Self, Autonomy, and Law*.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 10.1093/acprof:oso/9780195147964.001.0001.

Nussbaum, Martha C. (2006). *Frontiers of Justice :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oi : 10.4159/9780674041578.

Okin, Susan Moller (1989). *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 Basic Books.

Pettit, Philip (1999). *Republicanism :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 10.1093/0198296428.001.0001.
Rawls, John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Cambridge, MA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icoeur, Paul (1992). *Oneself as Another*. Trad. par Kathleen Blame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i : 10.7208/chicago/9780226844541.001.0001.
Sample, Ruth J. (2003). *Exploitation : What It Is and Why It's Wrong*. 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Sen, Amartya (1990). "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 In :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 Women and World Development*. Sous la dir. d'Irene Tinker.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9).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tark, Evan (2007). *Coercive Control : The Entrapment of Women in Personal Lif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 10.1093/oso/9780195154276.001.0001.
Thompson, Dennis F. (1993).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29.8, p. 573-576. doi : 10.1056/NEJM199308193290812.
Walker, Margaret Urban (2006). *Moral Repair : Reconstructing Moral Relations after Wrongdoing*.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 10.1017/CBO9780511618024.
Wertheimer, Alan (1996). *Exploitation*.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oi : 10.2307/j.ctv10vm173.
Westlund, Andrea C. (2009). "Rethinking Relational Autonomy". In : *Hypatia* 24.4, p. 26-49. doi : 10.1111/j.1527-2001.2009.01056.x.
White, James Boyd (1990). *Justice as Translation : An Essay in Cultural and Legal Criticism*.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oi : 10.2307/j.ctvcm4g4q.

Estructuras orientadas al poder y formación de la autonomía en las relaciones familiares

Gramática del poder, confianza estructural, fronteras del valor y ética organizacional

HUANG WANHONG □□ □□□

huangwanhong@serendip.ngo

Resumen

Este artículo construye un marco conceptual para analizar estructuras orientadas al poder en las relaciones familiares y examina cómo se conectan la autonomía, la confianza, las fronteras del valor y la integridad de los roles organizacionales bajo condiciones persistentes de asimetría de poder. El objeto de análisis no es un «tipo de familia» fijo ni un juicio sobre la personalidad o el estado clínico de sus miembros. Es, más bien, un conjunto de mecanismos identificables dentro de configuraciones relacionales delimitadas: la concentración, conversión mutua y persistencia temporal de la capacidad de decisión, la ventaja interpretativa, la capacidad de modificar normas, el control de interfaces clave de recursos y los costos de salida. Para mejorar la precisión conceptual, el artículo distingue primero capacidad de poder, ejercicio del poder, control de resultados y legitimidad normativa. Después define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como una estructura relacional de reglas de segundo orden que determina qué diferencias de posición, recursos, atribuciones de competencia y costos de rechazo pueden convertirse en decisiones efectivas, interpretaciones autorizadas y modificación de reglas.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no es idéntica a los recursos, a las órdenes ni a la conducta de control. Es una estructura de conversión que conecta múltiples interfaces del poder.

Sobre esta base, el artículo desarrolla un modelo condicional de confianza estructural y autonomía epistémica. La confiabilidad se analiza en relación con las restricciones al poder, la estabilidad de las reglas, la posibilidad de impugnación, la verificabilidad, la corregibilidad y la capacidad realista de salida. La autonomía se modela como una estructura multidimensional compuesta por capacidades económicas, institucionales, de red relacional, epistémicas, de disposición del valor y de salida, distinguiendo además entre disponibilidad del recurso, control efectivo y robustez frente a la interferencia. Se proponen dos vías complementarias, la controlabilidad progresiva y la autonomía distribuida, para explicar cómo los actores pueden reducir la dependencia de un único punto manteniendo una responsabilidad localmente trazable. La teoría de la justicia, la filosofía del derecho, la hermenéutica,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lenguaje y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 la familia se incorporan como fundamentos teóricos. La teoría de la justicia distingue distribución, capacidades, posición relacional y no dominación; la filosofía del derecho aborda ordenación privada, autorización, estabilidad normativa y límites procedimentales; la hermenéutica analiza historia relacional, identidad narrativa y atribu-

ción de responsabilidad;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lenguaje explica cómo la expresión legítima, el capital lingüístico y la traducción institucional adquieren consecuencias materiales y organizacionales; y la economía política familiar examina cómo recursos, cuidados, mercados, Estado y opciones externas remodelan las posiciones internas de negociación. En materia de fronteras del valor, el artículo distingue puesta en común, don, gestión autorizada y transferencias intermediarias no autorizadas, e identifica riesgos mediante las condiciones de conocimiento, autorización, revocabilidad, trazabilidad y rendición de cuentas. En ética organizacional, el desbordamiento de redes privadas se trata como un problema de gobernanza de interfaces de rol. El análisis distingue presión privada, canales identificables y captura efectiva del rol, y estudia respuestas institucionales como divulgación, separación de funciones, mínimo privilegio, doble control, recusación y auditoría.

El artículo ofrece tres contribuciones teóricas principales. Primero, transforma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de una metáfora descriptiva en un concepto de conversión de segundo orden distinguible del poder de recursos, de las estructuras interpretativas y del discurso concreto, anclándolo al mismo tiempo en teoría de la justicia, filosofía del derecho, hermenéutica y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lenguaje. Segundo, conecta confianza estructural, formación de autonomía y fronteras del valor como secciones distintas de un mismo mecanismo relacional. Tercero, aclara la interfaz entre estructuras de poder intrafamiliares e integridad de roles organizacionales, manteniendo casos límite de cuidado, autorización legítima, agencia de emergencia, vida compartida y diferencia cultural. La formalización se utiliza para aumentar la transparencia de definiciones, inferencias y vías de comprobación empírica; no se presenta como un modelo cuantitativamente estimado. Las secciones finales formulan proposiciones analíticas falsables, orientaciones de operacionalización, explicaciones alternativas y posibles diseños empíricos, con el fin de ofrecer un marco ampliable para investigación comparativa y teoría normativa.

Palabras clave: relaciones familiares; gramática del poder; autonomía relacional; confianza estructural; teoría de la justicia; filosofía del derecho; hermenéutica;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lenguaje; economía política familiar; ética organizacional

Nota de investigación preliminar

Este manuscrito presenta un estudio conceptual y formal de las estructuras orientadas al poder en las relaciones familiares. Su objeto inmediato es el mecanismo relacional mediante el cual la capacidad de decisión, la ventaja interpretativa, la capacidad de modificar normas, las interfaces de recursos y las condiciones de salida pueden concentrarse, convertirse mutuamente y persistir en el tiempo. El manuscrito desarrolla el concepto de gramática del poder y lo utiliza para articular la confianza estructural, la autonomía relacional, las fronteras del valor y la integridad de los roles organizacionales.

La investigación adopta una perspectiva estructural y normativa acotada. No trata a la familia como un actor único ni infiere la identidad moral última o el estado clínico de una persona a partir de una asimetría local de poder. A lo largo del texto se mantienen las distinciones entre capacidad de poder, ejercicio del poder, control de resultados y legitimidad normativa. Las construcciones matemáticas y esquemáticas cumplen una función de clarificación, y su alcance, supuestos y límites inferenciales deben permanecer explícitos.

La economía formal y la disciplina conceptual funcionan como restricciones rectoras. El trabajo hereda preocupaciones de la autonomía relacional, la teoría de la justicia, la filosofía del derecho, la hermenéutica,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lenguaje y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 la familia, e introduce nueva notación solo cuando el vocabulario heredado resulta insuficiente. Términos como gramática del poder, confianza estructural, autonomía distribuida, transferencia intermediaria no autorizada y gobernanza de interfaces de rol reciben significado técnico únicamente después de definir de manera explícita los dominios y las relaciones pertinentes.

La presente edición contiene el manuscrito completo en formato multilingüe. Refleja varias rondas de revisión estructural, lógica y estilística, incluidas la aclaración de definiciones conceptuales, la ampliación del razonamiento en lenguaje natural, la incorporación de fundamentos teóricos, la armonización de las referencias a ecuaciones y la preparación de las versiones en las seis lenguas oficial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 calibración empírica, la comparación de casos y varias extensiones formales quedan como trabajo futuro.

Uso responsable y reserva de derechos

El autor alienta la discusión de buena fe, la crítica, la indagación independiente y el uso responsable del material presentado en este trabajo. Al margen de los términos jurídicos de la licencia, se pide a quienes adapten o apliquen el marco propuesto que consideren los daños previsibles. Esta solicitud ética no modifica los permisos ni las limitaciones establecidos en la licencia.

El autor conserva los derechos preservados por la licencia CC BY-NC 4.0 y podrá ejercer los recursos legales disponibles en caso de incumplimiento de la licencia o de violación de otros derechos aplicables. La reutilización permanece separada del aval del autor. Los derechos de terceros requieren, cuando corresponda, la autorización de sus respectivos titulares. Las excepciones y limitaciones legales siguen siendo plenamente aplicables.

Avisos

Estado. Este borrador de trabajo contiene la versión completa actual del manuscrito sobre poder familiar, autonomía, confianza, fronteras del valor y ética organizacional. La presente versión también incluye ediciones multilingües preparadas en las seis lenguas oficial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 revisión comprobó definiciones conceptuales, continuidad argumentativa, referencias a ecuaciones, referencias cruzadas, maquetación y consistencia entre versiones lingüísticas. El manuscrito sigue siendo una nota de investigación preliminar: la validación empírica y varias extensiones formales y comparativas quedan para trabajos futuros.

Licencia. Salvo indicación en contrario, copyright © 2026 Wanhong Huang. Esta obra se ofrece bajo la licenci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CC BY-NC 4.0), sujeta a sus términos.

Declaración sobre el uso de modelos de lenguaje. Las discusiones exploratorias y la preparación de este artículo implicaron el uso de ChatGPT de OpenAI. ChatGPT apoyó el diálogo exploratorio, la elaboración multilingüe, la asistencia de redacción, el formateo en LaTeX y la verificación técnica. El autor seleccionó las preguntas de investigación, dirigió y aprobó los compromisos teóricos y el estatuto epistémico de las afirmaciones, y asume la responsabilidad exclusiva del manuscrito, incluidas sus definiciones, construcciones formales, argumentos, conclusiones, traducciones y errores. La autoría corresponde al autor humano.

1 Introducción

La familia es simultáneamente un espacio de intimidad, cuidado, asignación de recursos, formación de identidad y aprendizaje normativo. Precisamente porque estas dimensiones se superponen, el poder dentro de la familia resulta difícil de captar mediante un único modelo de mando y obediencia. Muchas interacciones con consecuencias decisivas no adoptan la forma de coerción explícita. Operan a través de preguntas como quién está autorizado a definir el problema, qué interpretación puede incorporarse a las reglas comunes, quién controla cuentas y documentos, quién representa a la familia ante instituciones externas y quién soporta los costos del rechazo y la salida. Este poder posee fundamentos materiales e interpretativos. Puede derivar de una autoridad reconocida por el derecho y las instituciones, pero también de convenciones de larga duración, relaciones de cuidado, capacidades lingüísticas e historia compartida.

La pregunta de este artículo no es, por tanto, si existe poder en las familias en un sentido general. Es una pregunta estructural más acotada. Cuando la capacidad de decisión, la ventaja interpretativa, la capacidad de modificar normas, las interfaces esenciales de recursos y los costos de salida se concentran de manera persistente en determinadas posiciones relacionales, ¿cómo se convierten esas diferencias en decisiones, interpretaciones y reglas prácticamente efectivas? ¿Cómo afecta después esa conversión a la confianza estructural, la autonomía epistémica, la disposición del valor y la integridad fiduciaria cuando una persona asume un rol organizacional? El artículo denomina **gramática del poder** a esta capa de conversión. «Gramática» no se usa como sinónimo de sintaxis lingüística ni para rebautizar cualquier problema de comunicación como poder. Se refiere a una estructura de validez de segundo orden dentro de una relación que determina qué tipos de razones serán reconocidas como eficaces, qué formas de rechazo pueden detener efectivamente una acción y qué interpretaciones pueden incorporarse a reglas posteriores.

El problema se encuentra en la intersección de varias tradiciones maduras de investigación. La sociología familiar y la investigación sobre poder y dependencia han estudiado desde hace décadas las relaciones entre recursos, alternativas y posiciones decisorias (Blood and Wolfe 1960; Emerson 1962; Hesse-Biber and Williamson 1984; Komter 1989). Las teorías de la autonomía relacional subrayan que la autonomía no es una propiedad interna de una persona aislada, sino que se ve promovida o debilitada por relaciones sociales, condiciones institucionales y estructuras de reconocimiento (Mackenzie and Stoljar 2000; Friedman 2003; Westlund 2009; Nedelsky 2012). La economía política familiar muestra que la familia es a la vez una unidad de cooperación y un campo institucional en el que intereses, cuidados, tiempo y activos pueden distribuirse de manera asimétrica (Sen 1990; Agarwal 1997; Folbre 1994). Estas literaturas ofrecen fundamentos indispensables, pero suelen tratar recursos, normas, negociación o autonomía por separado. Aquí se pregunta cómo se convierten las diferencias entre estos niveles dentro de configuraciones relacionales concretas.

Una segunda laguna se refiere a la interpretación y el lenguaje. Los conflictos familiares rara vez se limitan a recursos cuantificables. También versan sobre el significado de una acción, sobre si una conducta debe llamarse cuidado, deber, ingratitud, lealtad o traición, y sobre qué versión de los hechos puede convertirse en base de reglas futuras. La hermenéutica recuerda que la comprensión está situada históricamente y que las narraciones participan en la constitución de identidad y responsabilidad (**gadamer2004**; Ricoeur 1992).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lenguaje añade que la capacidad lingüística y el reconocimiento institucional de determinadas formas de expresión se distribuyen desigualmente y pueden convertirse en recursos sociales (**irvinegal2000**; **heller2010**; Bourdieu 1991). En una familia, quien domina documentos administrativos, lenguaje jurídico o financiero, o la interacción con instituciones externas puede controlar una interfaz de poder que no se reduce a la propiedad económica.

Una tercera laguna aparece entre relaciones privadas y roles organizacionales. Los estudios sobre la familia suelen detenerse en el hogar, mientras que la ética organizacional aborda conflictos de interés e integridad de rol como problemas internos de las instituciones. Sin embargo, una red privada puede cruzar esa frontera si una persona encargada de un rol recibe presiones, peticiones, flujos de recursos o demandas de representación procedentes de vínculos familiares. La cuestión no es presumir que todo vínculo privado compromete el rol. Consiste en identificar las condiciones bajo las cuales una capacidad privada puede convertirse en acceso a recursos, información, juicio o autoridad representativa que pertenecen a la organización.

El artículo persigue cuatro objetivos. El primero es conceptual: distinguir capacidad de poder, ejercicio, resultado y legitimidad, y definir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como un mecanismo de conversión de segundo orden. El segundo es normativo: conectar esta estructura con dimensiones de justicia, no dominación, autonomía relacional, legalidad y procedimiento sin convertir toda asimetría en injusticia. El tercero es explicativo: mostrar cómo esa estructura puede afectar a confianza, autonomía, fronteras del valor e integridad de rol a lo largo del tiempo. El cuarto es metodológico: ofrecer una formalización suficientemente precisa para revelar supuestos y relaciones, manteniendo al mismo tiempo la diferencia entre modelo conceptual y estimación cuantitativa.

El método es un análisis teórico de configuraciones. No pretende establecer la frecuencia empírica de los mecanismos ni diagnosticar familias particulares. Los formalismos son instrumentos de clarificación. Indican qué objetos deben distinguirse, qué dependencias se proponen y qué observaciones podrían contradecir las proposiciones. También se conservan casos límite importantes, como cuidado, representación de emergencia, responsabilidades parentales, puesta en común voluntaria y diferencias culturales. Una concentración de capacidad puede ser necesaria o legítima; la cuestión es cómo se autoriza, limita, impugna, revisa y conecta con la posibilidad de una autonomía sustantiva.

La organización del texto sigue este razonamiento. Las secciones 2 a 4 definen el objeto y establecen los fundamentos normativos, jurídicos, hermenéuticos y político-económicos.

Las secciones 5 y 6 introducen las primitivas formales y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Las secciones 7 a 10 estudian confianza, autonomía, economía política familiar y fronteras del valor. La sección 11 analiza el desbordamiento hacia roles organizacionales. La sección 12 estudia la reconstrucción relacional. Las secciones 13 y 14 formulan proposiciones comprobables y examinan límites. La conclusión reúne las implicaciones del marco.

2 Objeto de análisis, unidad de análisis y tarea teórica

La unidad de análisis es una **configuración relacional delimitada**. Puede incluir a dos o más personas, pero se define mediante un conjunto identificable de interacciones, reglas, interfaces de recursos e historias pertinentes. Esta elección evita convertir observaciones sobre algunas relaciones en una caracterización de toda la familia. Una persona puede participar en una estructura orientada al poder sin aprobarla; puede aprender a anticipar sus reglas para sobrevivir, negociar o proteger un límite y, al mismo tiempo, rechazarla como ideal normativo.

Una **estructura orientada al poder** es una configuración en la que varias capacidades relacionadas con el poder se concentran de manera persistente y esa concentración influye repetidamente en la gestión del conflicto. «Orientada» indica una tendencia estructural, no una esencia psicológica. Una asimetría puntual, una división funcional de tareas o una decisión de emergencia no bastan. Deben examinarse repetición, dirección, convertibilidad de una capacidad en otra, alcance entre dominios y reproducción temporal.

Esta definición distingue cuatro niveles analíticos. La **capacidad de poder** es la posibilidad de alterar el conjunto de acciones, interpretaciones, reglas, recursos o condiciones de salida de otra persona. El **ejercicio del poder** es el uso situado de esa capacidad. El **control de resultados** se refiere a la medida en que un resultado corresponde efectivamente a la acción o preferencia de un actor. La **legitimidad** es una evaluación normativa de la fuente, procedimiento, proporcionalidad y efectos de la intervención. Los cuatro niveles pueden divergir. Una persona puede poseer capacidad sin ejercerla; ejercerla sin lograr el resultado; lograr un resultado sin poseer capacidad general; o disponer de autoridad legítima pero limitada.

Separar estos niveles evita dos errores. El primero es inferir dominación a partir de una mera diferencia de recursos. El segundo es deducir, de un resultado desfavorable, que necesariamente existió intención de control. En las relaciones familiares, los resultados suelen derivarse de varios mecanismos simultáneos: restricciones materiales, hábitos, deberes de cuidado, expectativas culturales, limitaciones jurídicas y elecciones voluntarias. Una teoría rigurosa debe identificar el trayecto causal propuesto antes de extraer una conclusión normativa.

La noción de estructura incorpora además el tiempo. Un episodio aislado puede ser moralmente grave sin constituir por sí mismo una estructura duradera. A la inversa, actos individualmente modestos pueden acumularse y producir una asimetría robusta. El

análisis debe estudiar trayectorias: quién obtiene gradualmente el control de documentos, cuentas, relaciones externas o criterios interpretativos; cómo se refuerzan esas posiciones; y qué posibilidades existen para revisarlas.

Los estudios clásicos sobre recursos familiares y poder-dependencia proporcionan un punto de partida. Blood y Wolfe relacionaron el poder decisorio con los recursos en la pareja (Blood and Wolfe 1960); Emerson formuló el poder de un actor sobre otro en función de la dependencia del segundo (Emerson 1962). Investigaciones posteriores mostraron que los procesos de poder pueden permanecer implícitos cuando normas, expectativas y rutinas naturalizan ciertas decisiones (Komter 1989). Este artículo conserva la importancia de recursos y dependencia, pero añade la pregunta de la conversión: ¿cómo se transforma una diferencia de recursos en autoridad interpretativa, capacidad de modificar normas o costo de rechazo?

La tarea teórica consiste, por ello, en hacer explícito este nivel de conversión. Una estructura orientada al poder no se define solo por la cantidad de recursos de cada actor. Depende también de reglas relacionales que determinan qué recursos importan, qué motivos son aceptables, quién es considerado competente y qué consecuencias se asocian al rechazo. En este nivel la noción de gramática del poder adquiere utilidad específica.

La tabla 1 consolida las fronteras conceptuales utilizadas en todo el artículo. Las formalizaciones y proposiciones posteriores dependen de estas distinciones.

3 Fundamentos en teoría de la justicia y filosofía del derecho

Esta sección establece la base normativa. No intenta derivar una evaluación completa de las relaciones familiares de una sola teoría de la justicia ni identificar directamente la familia con el Estado. Una estrategia más prudente consiste en extraer de tradiciones complementarias las dimensiones normativas relevantes para los mecanismos aquí estudiados: distribución de recursos y oportunidades, capacidades reales, posición relacional, libertad frente a dominación arbitraria, previsibilidad de las reglas, impugnación y revisión procedimental, y formas en que el derecho estructura relaciones privadas. Así se evitan dos simplificaciones: reducir la justicia familiar a «quién recibe cuánto» y convertir todo problema íntimo en una disputa jurídica formal.

3.1 Distribución, capacidades y estructura relacional

Las teorías modernas de la justicia suelen centrarse en la forma en que las instituciones distribuyen derechos básicos, oportunidades, ingresos y beneficios de la cooperación social. Rawls ofrece una formulación clásica: la justicia evalúa no solo la buena voluntad individual, sino también los arreglos institucionales fundamentales que estructuran el trasfondo de la cooperación (Rawls 1999). Su importancia aquí no consiste en modelar la familia como toda la «estructura básica», sino en reconocer que la capacidad de vivir autónomamente depende de condiciones institucionales duraderas. Vivienda, propiedad, educación, cuidado y división del trabajo familiar alteran las oportunidades futuras, de modo que sus efectos

Table 1: Conceptos centrales, niveles analíticos y exclusiones

Concepto	Definición de trabajo	Confusiones que deben excluirse
Capacidad de poder	Capacidad potencial para alterar acciones, interpretaciones, reglas, recursos o condiciones de salida de otra persona	No es idéntica al ejercicio real, al éxito del resultado ni a una autorización legítima
Estructura orientada al poder	Concentración direccional de múltiples capacidades a través del tiempo y los dominios que estructura de forma estable el tratamiento del conflicto	No es idéntica a cualquier asimetría, una orden aislada o un tipo de familia
Gramática del poder	Reglas relacionales de segundo orden que determinan qué diferencias de posición y qué razones pueden convertirse en decisiones, interpretaciones y modificaciones normativas efectivas	No es idéntica a un estilo verbal, un recurso individual o un acto concreto de control
Confianza estructural	Estado previsible en el que límites al poder, reglas, hechos, disenso y condiciones de salida presentan una robustez mínima	No es idéntica a un juicio general favorable sobre el carácter de otra persona
Autonomía relacional	Capacidad multidimensional para formar, expresar y ejecutar juicios sobre la vida básica dentro de relaciones sociales e institucionales	No es idéntica al aislamiento, la autosuficiencia o la ausencia de toda influencia
Frontera del valor	Estructura de conocimiento, autorización, revocación, trazabilidad y rendición de cuentas que gobierna los flujos de valor	No es idéntica a una prohibición de compartir, regalar o vivir en común
Integridad del rol	Condición en la que recursos, juicio y autoridad representativa de la organización permanecen dentro del mandato del rol	No es idéntica a afirmar que tener relaciones privadas constituye por sí mismo un conflicto de interés

de largo plazo no pueden juzgarse solo por la igualdad del consumo actual.

La crítica de Okin sobre familia y justicia muestra que cuando las teorías de justicia tratan la familia como una esfera privada exenta de evaluación interna, las divisiones del trabajo y las asimetrías de género pueden remodelar oportunidades y posición en la vida pública (Okin 1989). Este artículo adopta esa intuición estructural y la generaliza: todo arreglo familiar de largo plazo que modifique sistemáticamente activos, tiempo, capital profesional, conocimiento institucional y condiciones de salida puede convertirse en un lugar de producción de diferencias posteriores de capacidad pública. La familia no es solo trasfondo externo de la justicia pública; es un espacio intermedio donde se forman capacidades.

Una perspectiva únicamente distributiva sigue siendo insuficiente. Young critica la reducción de la justicia a bienes distribuibles y subraya que dominación, autoridad decisoria, expresión cultural y división social del trabajo poseen relevancia normativa propia (Young 1990). Esto es directamente pertinente para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Dos miembros pueden recibir recursos monetarios similares y, sin embargo, permanecer en una relación muy asimétrica si solo uno puede definir el problema, modificar procedimientos, interpre-

tar la conducta ajena y decidir qué razones cuentan como «razonables». La justicia debe preguntar tanto qué se recibe como quién participa en la decisión, qué interpretación es reconocida como competente y quién puede cambiar las reglas.

El enfoque de las capacidades desplaza nuevamente el objeto de evaluación. Sen enfatiza vidas realmente factibles y libertad sustantiva más que recursos o derechos formales por sí solos (Sen 2009); Nussbaum conecta la justicia social con capacidades centrales realmente ejercibles y presta especial atención a dependencia, discapacidad y cooperación entre sujetos desiguales (Nussbaum 2006). Por ello, el marco distingue disponibilidad de recursos, control efectivo y robustez frente a la interferencia. Un derecho, cuenta o ingreso amplía de verdad las acciones factibles solo si la persona puede acceder a él, usarlo y no perderlo fácilmente durante un conflicto. La igualdad formal puede coexistir con desigualdad sustantiva de capacidad.

Estas tradiciones imponen una limitación importante: «justicia» no se trata como un único indicador. Distribución, capacidad, posición relacional y estructura decisoria pueden alinearse o entrar en conflicto. Un arreglo puede aumentar el bienestar total de la familia y reducir al mismo tiempo las capacidades de largo plazo de un miembro. Puede respetar formalmente la propiedad e imponer costos de oportunidad invisibles. Puede ser aproximadamente igual en distribución y mantener una autoridad interpretativa o de modificación normativa muy concentrada. Un análisis riguroso debe identificar la dimensión concreta de justicia en juego en vez de permitir que «equidad» absorba todas las evaluaciones.

3.2 No dominación, autonomía relacional y restricciones al poder

La orientación normativa hacia la limitación del poder está estrechamente relacionada con la intuición republicana de no dominación. Pettit entiende la libertad como libertad frente al dominio arbitrario de otra persona y no solo como ausencia de interferencia actual (Pettit 1999). Esto importa especialmente en la familia. Un miembro puede abstenerse durante largos periodos de bloquear las acciones de otro, pero si puede cambiar sin límites reales la vivienda, las cuentas, los documentos o reglas básicas, el otro sigue teniendo que anticipar permiso. La cuestión no es solo cuántas veces ocurre una interferencia, sino si la capacidad misma de interferir está limitada por fronteras ejecutables.

La no dominación también explica por qué el crecimiento de una capacidad no equivale al crecimiento de la dominación. Cuando una parte más débil obtiene ingreso independiente, conocimiento jurídico, redes externas u opciones de salida, aumenta su capacidad de resistencia, pero no obtiene por ello licencia para controlar arbitrariamente a otros. Se distinguen así **capacidades protectoras de fronteras** y **capacidades dominantes**. Las primeras aseguran espacios mínimos de decisión, rechazo y verificación; las segundas permiten que las preferencias de una persona se extiendan entre dominios y se conviertan en condiciones para la conducta de otra. La formación de autonomía busca ampliar las primeras para hacer viable la negociación, no reproducir las segundas.

Las teorías de la autonomía relacional proporcionan una base social más detallada.

Los trabajos asociados con Mackenzie y Stoljar sitúan la autonomía dentro de relaciones sociales, identidad y desarrollo de capacidades (Mackenzie and Stoljar 2000). Friedman subraya que intimidad y autonomía no son intrínsecamente opuestas (Friedman 2003). Westlund destaca la capacidad de responder a demandas normativas y pedir razones (Westlund 2009). Nedelsky propone pensar derecho y autonomía en términos relacionales (Nedelsky 2012). Estas perspectivas sugieren que una persona no tiene que abandonar sus relaciones para ser autónoma; importa que la relación preserve espacio para reflexión, expresión, revisión, rechazo y renegociación.

La misma comprensión evita describir el cuidado como excepción a la autonomía. El cuidado puede aumentar las capacidades reales de quien lo recibe y ofrecer al cuidador significado, identidad y reciprocidad. El problema surge cuando la dependencia del cuidado se convierte en competencia decisoria ilimitada o cuando la contribución del cuidador se excluye persistentemente de decisiones comunes sobre recursos y reglas. El análisis posterior de interfaces de recursos y gramática del poder pretende distinguir dependencia que promueve capacidad de dependencia que permite control arbitrario.

3.3 Legalidad, estabilidad normativa y razón procedimental

La filosofía del derecho aporta una segunda base. Incluso en relaciones privadas, la calidad de un orden normativo depende en parte de su previsibilidad. La discusión de Fuller sobre legalidad destaca exigencias de publicidad, coherencia, posibilidad de seguir las reglas y cierta congruencia entre reglas anunciadas y administración efectiva (Fuller 1969). Estas exigencias se refieren primero al orden jurídico y no deben trasladarse mecánicamente a la intimidad familiar. Sin embargo, expresan una idea más general: una regla no puede orientar razonablemente la acción si es desconocida, retroactivamente modificada, contradictoria o continuamente ajustada por una parte según el resultado.

En la familia, estabilidad normativa no significa rigidez. Las reglas deben poder cambiar cuando cambian salud, ingresos, cuidado, circunstancias o preferencias. La cuestión es si el cambio incluye razones accesibles, tiempo razonable, posibilidad de impugnación y una aplicación que no se reescribe selectivamente después de los hechos. Una relación en la que una parte satisface cada requisito y descubre después que el criterio ha cambiado produce incertidumbre estructural que no se resuelve con mayor obediencia.

Las teorías procedimentales de legitimidad añaden otra dimensión. Habermas conecta validez normativa con procesos en los que quienes se ven afectados pueden participar en la justificación de las normas (Habermas 1996). Una familia no es un parlamento pequeño y algunas decisiones requieren rapidez o responsabilidades diferenciadas. Aun así, sigue siendo pertinente que quienes soportan duraderamente los efectos de una regla tengan una oportunidad significativa de comprender sus razones y cuestionar su aplicación. El peso de esta exigencia aumenta con la amplitud, duración e irreversibilidad de la intervención.

De aquí se sigue una distinción entre cuatro dimensiones de la autoridad: **fuente**, **alcance**, **procedimiento de ejercicio** y **consecuencias**. Una autoridad puede tener una

fuente legítima, como responsabilidad parental o poder de representación, y exceder su alcance. Puede mantenerse dentro de ese alcance y ejercerse sin la consulta requerida. Puede ser procedimentalmente correcta y producir consecuencias desproporcionadas. La legitimidad no puede inferirse de un estatus abstracto.

3.4 Ordenación privada, derecho de familia y posición de negociación

Las relaciones familiares se desarrollan en un espacio llamado privado, pero ese espacio está estructurado jurídicamente. Mnookin y Kornhauser mostraron que las partes negocian «a la sombra del derecho»: sus opciones privadas están influidas por derechos, obligaciones y consecuencias que el sistema jurídico hace disponibles en segundo plano (**mnookinkornhauser1979**). Propiedad, estado civil, responsabilidad parental, sucesiones, protección social, fiscalidad y acceso a remedios alteran la posición de negociación aunque nadie llegue a un tribunal.

El derecho también configura relaciones distribuyendo formas de autoridad y reconocimiento. Desde una perspectiva relacional, Nedelsky sostiene que el derecho contribuye a producir relaciones que promueven o dañan la autonomía (Nedelsky 2012). No protege simplemente a individuos ya constituidos; influye en la estructura de dependencias y posibilidades desde la cual las personas llegan a actuar. Esto es especialmente importante para recursos compartidos. Que una cuenta, vivienda o contrato esté registrado jurídicamente a nombre de una persona puede modificar acceso, prueba y salida aunque verbalmente la familia lo considere «común».

La ordenación privada es así un mecanismo intermedio entre derecho formal y normas familiares. Los miembros crean reglas informales sobre dinero, tareas, visitas, cuidados, confidencialidad y representación. Estas reglas pueden ser cooperativas y eficientes. Se vuelven problemáticas cuando costos, revisabilidad o condiciones de acceso se distribuyen de manera persistentemente unilateral. El análisis jurídico y normativo debe examinar la interacción entre reglas internas y derechos externos en vez de usar unas como sustituto de los otros.

La interacción tiene además un efecto distributivo. Quien posee conocimiento jurídico, documentos, estatus administrativo o contactos institucionales puede convertir esa ventaja en capacidad de negociación. Inversamente, una persona puede ser formalmente titular de un derecho y ser incapaz de ejercerlo por falta de información, idioma, dinero, tiempo o seguridad. La distinción posterior entre disponibilidad, control y robustez representa este desfase entre titularidad formal y capacidad real.

3.5 Puente normativo entre estructura de poder e injusticia

La existencia de una estructura orientada al poder no establece por sí sola injusticia. Algunas asimetrías responden a funciones legítimas: proteger a un niño, actuar por una persona temporalmente incapaz, gestionar una emergencia, coordinar un presupuesto común o asumir una responsabilidad especializada. La valoración normativa exige un paso adi-

cional, un **puente normativo** que conecte la asimetría observada con criterios de justificación.

Ese puente incluye al menos cinco preguntas. Primero, ¿posee la asimetría una fuente identificable de autorización, necesidad o consentimiento? Segundo, ¿es su alcance proporcional a la función que la justifica? Tercero, ¿tienen las personas afectadas acceso razonable a información y razones? Cuarto, ¿existen mecanismos de impugnación, revisión o revocación adecuados al contexto? Quinto, ¿destruye la asimetría las propias condiciones que permitirían discutirla o abandonarla después? Cuanto más falla una estructura simultáneamente en estas dimensiones, más se aproxima a dominación o restricción injustificada de autonomía.

Este enfoque combina sensibilidad a la justicia y prudencia descriptiva. Evita presuponer que toda dependencia es opresiva, pero impide que las categorías de «familia», «cuidado» o «tradición» sustraigan relaciones a la exigencia de justificación. Las secciones siguientes conectan estos criterios con interpretación, lenguaje y conversión de poder.

4 Fundamentos en hermenéutica y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lenguaje

Una teoría del poder familiar queda incompleta si trata los conflictos como simples elecciones entre opciones materiales. Las relaciones se organizan también mediante significados: quién puede nombrar una conducta, qué historias explican una deuda u obligación, qué vocabulario hace inteligible una reivindicación y qué lengua permite acceder a instituciones externas. Esta sección combina dos recursos teóricos. La hermenéutica ayuda a comprender la historicidad de la interpretación y la construcción narrativa de responsabilidad.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lenguaje analiza la distribución desigual de capacidades de expresión, traducción y reconocimiento institucional.

4.1 Historicidad de la interpretación y horizonte relacional

Gadamer recuerda que la comprensión nunca parte de un punto totalmente neutral. Está situada en tradiciones, expectativas y horizontes formados históricamente (**gadamer2004**). En la familia, esa historicidad es especialmente densa. Un enunciado presente puede interpretarse a través de décadas de experiencias, roles generacionales, expectativas de reciprocidad y relatos sobre sacrificios pasados. Dos personas pueden atribuir significados radicalmente distintos al mismo acto sin que la diferencia se reduzca a un simple error factual.

Esto no implica que todas las interpretaciones tengan igual valor. Significa que discutir un acto exige distinguir evento, marco interpretativo y consecuencias normativas atribuidas al evento. «Rechazaste esta petición» es diferente de «tu rechazo prueba que eres desleal». La segunda proposición añade una interpretación y puede usarse después para justificar una sanción, una nueva regla o una restricción de recursos. El poder inter-

pretativo aparece cuando determinadas personas pueden convertir persistentemente tales interpretaciones de lecturas discutibles en premisas institucionales de la relación.

El horizonte relacional es dinámico. Interpretaciones presentes reorganizan la memoria del pasado y el pasado seleccionado hace más plausibles ciertas interpretaciones futuras. Si el desacuerdo se interpreta reiteradamente como falta de lealtad, episodios previos de desacuerdo se convierten después en «prueba» de esa falta. El problema no es solo lexical; es la construcción acumulativa de un expediente interpretativo que altera posibilidades de acción.

4.2 Identidad narrativa, imputación y posibilidad de revisión

Ricoeur conecta identidad personal, narración y capacidad de imputar acciones a agentes (Ricoeur 1992). Esto ayuda a comprender por qué los conflictos familiares versan con frecuencia sobre continuidad personal: «siempre has sido así», «nuestra familia siempre hace esto», «después de todo lo que hicimos por ti». Tales afirmaciones organizan el pasado como relato y producen expectativas sobre la conducta futura.

La narración cumple una función legítima. Hace inteligibles compromisos de largo plazo y permite reconocer contribuciones no reducibles a una transacción puntual. Pero puede rigidizar la identidad. Si una persona no puede cuestionar el relato que define su carácter, su deuda o su lugar, se reduce su espacio de autorrevisión. La autonomía epistémica no exige ausencia de historia, sino posibilidad de participar en su interpretación y de producir descripciones alternativas que puedan ser escuchadas.

Esto se conecta con la responsabilidad. Imputar una acción requiere identificar qué estaba bajo control del agente, qué información poseía y qué alternativas eran realistas. Una gramática del poder puede distorsionar la imputación al atribuir a una persona consecuencias producidas por una estructura que no controla o al llamar «elección libre» a una opción cuyo costo de salida es prohibitivo. Aclarar capacidades y costos es, por tanto, condición de una atribución razonable.

4.3 Lenguaje, capital simbólico y mercados de legitimidad

Bourdieu rechaza la idea de que la eficacia de un enunciado dependa solo de su estructura lingüística. Las palabras adquieren fuerza distinta según posición social del hablante, instituciones que reconocen su lenguaje y mercado en el que se reciben (Bourdieu 1991). Esto puede trasladarse al análisis familiar sin convertir toda conversación en mercado económico. Algunos miembros poseen vocabulario jurídico, financiero, administrativo o profesional que hace que sus enunciados sean reconocidos con mayor facilidad por bancos, escuelas, hospitales, empleadores o administraciones.

El **capital lingüístico** puede así convertirse en interfaz de recursos. Quien puede leer un contrato, llenar formularios, explicar una situación a una institución o traducir entre idiomas ocupa una posición de intermediación. Esa posición puede usarse cooperativamente y aumentar las capacidades de toda la familia. También puede convertirse en punto de de-

pendencia si los demás no pueden verificar la información, acceder directamente a la institución o cuestionar la traducción. La cuestión normativa no es la competencia lingüística en sí, sino la gobernanza de la interfaz que crea.

Irvine y Gal muestran además que las ideologías lingüísticas conectan formas de habla, categorías sociales y estructuras políticas (**irvinegal2000**). Algunas maneras de hablar pueden considerarse más racionales, educadas o autorizadas. En un conflicto familiar, esa jerarquía puede volver invisible el contenido de una reivindicación porque su forma se juzga inadecuada. Una persona puede tener una razón sustantiva y carecer del registro que permite que se reconozca como argumento en lugar de emoción, queja o falta de respeto.

La consecuencia analítica es importante: igualdad en la posibilidad de hablar no equivale a igualdad de participación. También debe examinarse la posibilidad de ser comprendido, traducido, registrado y reconocido como fuente pertinente de información. Esta dimensión se incorpora después a la autonomía epistémica y la posibilidad estructural de impugnación.

4.4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lenguaje, traducción institucional y trabajo administrativo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lenguaje insiste en que las competencias lingüísticas están vinculadas a mercados laborales, instituciones, regímenes de movilidad y jerarquías económicas (**heller2010**). En familias multilingües, migrantes o intensamente conectadas con instituciones especializadas, traducir no es un simple servicio simbólico. Puede condicionar acceso a empleo, vivienda, prestaciones, salud, crédito o estatus administrativo.

La traducción es también trabajo. Leer correspondencia, llevar cuentas, llenar formularios, organizar citas, gestionar identidades digitales, conservar documentos y comunicarse con instituciones produce una infraestructura cotidiana. Este trabajo administrativo suele permanecer invisible en el análisis de la división doméstica y, sin embargo, puede crear una fuerte dependencia. Quien lo realiza puede soportar una carga importante; quien lo controla de manera exclusiva puede convertirse además en paso obligatorio hacia derechos o recursos.

Conviene distinguir **intermediación útil** y **monopolio de interfaz**. En la primera, una persona competente facilita acceso manteniendo verificación, transferencia de conocimiento y alternativas. En el segundo, información y acceso quedan concentrados de modo que otra persona no puede verificar, aprender ni sustituir al intermediario sin un costo desproporcionado. Así, una competencia aparentemente benévola puede tener efectos de poder muy diferentes según su arquitectura institucional.

4.5 Normas, denominación y reproducción de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Hermenéutica y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lenguaje convergen en un punto: las categorías usadas para describir una relación pueden modificar la relación misma. Llamar a una con-

ducta «cuidado», «irresponsabilidad», «ingratitud», «deber» o «peligro» no es simplemente describir un hecho. Según el contexto, la denominación puede abrir o cerrar posibilidades institucionales, justificar transferencias de recursos, activar obligaciones o redistribuir la carga de la prueba.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estudia precisamente las condiciones bajo las cuales ese paso se vuelve estable. Una interpretación ocasional es distinta de una estructura en la que ciertas categorías pesan siempre más cuando proceden de una posición determinada. El problema no es eliminar la diferencia interpretativa, algo imposible, sino preguntar si las interpretaciones pueden someterse a pruebas, contrarrelatos, terceros y revisión.

Esta dimensión conecta lenguaje y justicia. Si una persona no consigue que su experiencia sea reconocida como pertinente, sus derechos formales o recursos materiales pueden ser difíciles de ejercer. Inversamente, canales de traducción, documentación e impugnación pueden aumentar autonomía sin exigir igualdad perfecta de recursos. Las siguientes secciones formales representan estos mecanismos como interfaces diferentes pero convertibles.

5 Primitivas formales de la estructura de poder y del estado relacional

Esta sección establece un lenguaje formal mínimo. Su objetivo es descomponer formulaciones comprimidas como «quién es más fuerte» o «quién controla a quién» en variables relacionales distinguibles y precisar sobre qué objetos actúan. La formalización no presupone que las cinco dimensiones puedan medirse en una escala común ni que exista una medida escalar única de «poder total».

5.1 Historia relacional, dominios y conjuntos de acciones factibles

Sea el conjunto de sujetos en una relación familiar $\mathcal{I} = \{1, \ldots, n\}$ y el conjunto de dominios $\mathcal{D}$, por ejemplo residencia, finanzas, ocupación, educación, salud, relaciones sociales, información y cuidados. La relación posee una historia $h_t \in \mathcal{H}$ que incluye compromisos previos, cambios normativos, asignaciones de recursos, gestión de conflictos e intervenciones de terceros. El conjunto de acciones prácticamente factibles del sujeto i en el momento t, en el dominio d y dada la historia h_t, se representa mediante la ecuación 1.

$$\mathcal{A}_i(t, d \mid h_t) \tag{1}$$

«Acción prácticamente factible» es una noción más exigente que lo que resulta jurídica o lógicamente posible. Una opción puede existir formalmente y seguir siendo difícil de ejecutar por costos económicos, falta de información, sanciones sociales, dependencia de estatus o riesgos de salida. El análisis del poder debe examinar tanto la existencia de una opción como si su ejercicio es soportable.

Esta distinción separa el presente análisis de las aproximaciones basadas solo en dere-

chos formales. Una persona puede tener derecho a contratar, abandonar una vivienda, abrir una cuenta o buscar ayuda externa y, sin embargo, esos derechos pueden ser difíciles de convertir en acción de corto plazo si ingreso, documentos, transporte, información o apoyo social están centralizados. A la inversa, recursos sociales sin etiqueta jurídica explícita, como amistades de confianza, redes profesionales, cuentas digitales controladas de forma independiente y conocimiento procedimental, pueden ampliar de manera sustancial el conjunto de acciones.

La ecuación 1 debe entenderse, por tanto, como un conjunto factible institucionalmente situado y no como un mero conjunto psicológico de elección. Calificación jurídica,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redes sociales e historia relacional forman parte de las condiciones de la acción. Esto crea una interfaz en la que derechos jurídicos y recursos político-económicos pueden entrar en un mismo análisis.

Si una intervención del sujeto j altera el conjunto de acciones del sujeto i, la transformación se representa por la ecuación 2.

$$\mathcal{A}_i'(t, d \mid h_t) = \Phi_{j\to i}^{d,t}(\mathcal{A}_i(t, d \mid h_t), h_t) \tag{2}$$

Aquí $\Phi_{j\to i}^{d,t}$ es una transformación dependiente de relación y contexto. Puede reducir opciones, elevar el costo de algunas, modificar la disponibilidad de información o incluso ampliar posibilidades. Por ello, la existencia de capacidad no determina por sí misma su carácter normativo.

5.2 Cinco interfaces del poder

El marco descompone las capacidades de poder relevantes en cinco interfaces. Su vector relacional se presenta en la ecuación 3.

$$\mathbf{P}_{j|i}^{d}(t) = \left(D_{j|i}^{d}, I_{j|i}^{d}, N_{j|i}^{d}, R_{j|i}^{d}, X_{j|i}^{d}\right)_t \tag{3}$$

D es la **interfaz decisoria**, capacidad de alterar directamente acciones o resultados; I la **interfaz interpretativa**, capacidad de estabilizar la denominación de hechos, roles y responsabilidades; N la **interfaz de modificación normativa**, capacidad de cambiar estándares de juicio, condiciones de obligación o reglas procedimentales; R la **interfaz de recursos**, capacidad de controlar dinero, vivienda, documentos, información, redes sociales u otros recursos clave; y X la **interfaz de salida**, capacidad de aumentar costos de rechazo, suspensión, separación o búsqueda de apoyo externo.

La ecuación 3 ofrece coordenadas, no un índice escalar. Las coordenadas pueden tener tipos de datos distintos. Algunas admiten aproximaciones cuantitativas, otras comparaciones ordinales y otras codificación de eventos. Por ello, el artículo evita índices aditivos no verificados como $D + I + N + R + X$.

Las cinco interfaces no son independientes. R puede fortalecer X cuando el control de vivienda o documentos aumenta el costo del rechazo. I puede fortalecer N porque quien

define el significado de un conflicto suele tener mayor capacidad para formular la regla posterior. El ejercicio repetido de D puede sedimentarse como convención esperada. Una «orientación al poder» se refiere a la formación de un acoplamiento estable entre interfaces, no a la maximización de una sola dimensión.

La base legítima de cada interfaz también puede diferir. Una interfaz decisoria puede proceder de tutela legal, autorización conjunta o responsabilidad profesional. La autoridad interpretativa puede provenir de pericia y seguir sometida a verificación factual. Una interfaz de recursos puede proceder de propiedad o administración fiduciaria sin crear por ello autoridad sobre la ocupación, la vida social o la información de otra persona. Separar interfaces permite distinguir «¿posee una persona un derecho específico?» de «¿hasta qué punto puede ese derecho expandirse a otros dominios relacionales?».

5.3 Actualización normativa y estado interpretativo

Sea $\mathcal{N}_t$ el conjunto de normas relacionales, ω_t un evento y $\chi_{i,t}$ el peso de influencia del sujeto i en el proceso de actualización normativa. La relación se expresa en la ecuación 4.

$$\mathcal{N}_{t+1} = \Psi(\mathcal{N}_t, \omega_t, \{\chi_{i,t}\}_{i \in \mathcal{I}}) \tag{4}$$

Cuando una posición puede cambiar repetidamente los criterios de cumplimiento, las condiciones de competencia o las asignaciones de responsabilidad después de un resultado desfavorable, mientras los demás carecen de medios para impugnar, registrar o salir, disminuye la estabilidad normativa. El problema no es que las reglas cambien. Las reglas familiares deben adaptarse a etapas de vida y circunstancias. Lo relevante es si los cambios tienen razones, procedimientos, oportunidades comparables de impugnación y límites previsibles.

La distinción tiene importancia jurídico-filosófica. Estabilidad no significa codificar relaciones privadas. Significa que las reglas que afectan intereses básicos deben poseer un mínimo de prospectividad, publicidad y posibilidad de impugnación. Las familias no son tribunales, pero cuando las decisiones privadas afectan continuamente vivienda, finanzas, estatus u oportunidades ofrecidas por terceros, las condiciones procedimentales importan para saber si el poder está limitado.

El estado interpretativo también tiene dimensión temporal. La clasificación de un evento influye en la comprensión de eventos posteriores, en qué hechos se conservan y en qué conducta se considera razonable. Actualización normativa y actualización interpretativa entran conjuntamente en la historia relacional.

La correspondencia entre evento y etiqueta interpretativa se representa en la ecuación 5.

$$\mathcal{L}_{j,t} : \omega_t \longmapsto \ell_t \tag{5}$$

Aquí ℓ_t puede ser una etiqueta como «responsable», «egoísta», «inmaduro», «desleal» o «cuidado razonable». La autoridad interpretativa se convierte en variable estructural

solo cuando esas etiquetas pueden alterar de forma estable reglas, recursos o evaluaciones posteriores de terceros. Un desacuerdo aislado de opinión no basta para establecer concentración de poder interpretativo.

5.4 Condiciones de identificación de una estructura orientada al poder

El artículo no define una estructura orientada al poder mediante un único umbral. Propone cinco condiciones conjuntas. Para un intervalo T y un conjunto de dominios $\mathcal{D}^* \subseteq \mathcal{D}$, una configuración puede analizarse como fuertemente orientada al poder cuando se observa la combinación siguiente:

1. **repetición**: las diferencias relevantes reaparecen en múltiples eventos;
2. **direccionalidad**: varias interfaces centrales permanecen concentradas en la misma posición relacional;
3. **convertibilidad**: diferencias de recursos, posición o salida cambian de manera estable decisiones, interpretaciones o resultados normativos;
4. **alcance entre dominios**: la ventaja en un dominio penetra otros, por ejemplo cuando el control financiero restringe decisiones profesionales o sociales;
5. **recursividad**: la ventaja existente modifica reglas, recursos o condiciones de salida futuras, facilitando el mantenimiento de desigualdades posteriores.

Estas condiciones identifican intensidad estructural y no establecen por sí mismas una conclusión ética. Tutela legítima, arreglos financieros comunes, agencia de cuidado y autorización de emergencia pueden satisfacer temporalmente algunas de ellas y aun así ser justificables por autorización, procedimiento y proporcionalidad. Tampoco deben tratarse como condiciones mecánicas necesarias y suficientes. Una relación puede mostrar fuerte concentración solo en finanzas y, sin embargo, producir grandes efectos entre dominios; otra puede presentar asimetrías en varios dominios con fronteras claras, verificación y revocación.

6 Estructura de conversión de segundo orden de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Las interfaces anteriores describen capacidades, pero todavía no explican cómo una diferencia determinada adquiere eficacia práctica.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designa reglas relacionales de segundo orden que convierten diferencias de posición, recursos, competencia atribuida o costos en efectos decisorios, interpretativos o normativos.

6.1 De los recursos a la eficacia

Sea q una pretensión o razón, p la posición de quien la formula, r los recursos pertinentes, c los costos asociados al rechazo y h_t la historia relacional. La estructura de conversión se

representa en la ecuación 6.

$$\mathcal{G}_t : (q, p, r, c, h_t) \longmapsto \big(e_D, e_I, e_N\big)_t \tag{6}$$

e_D, e_I y e_N indican eficacia en decisión, interpretación y modificación normativa. No se presupone que sean magnitudes cuantitativas comparables. La ecuación expresa una estructura analítica: el mismo contenido proposicional puede tener efectos diferentes según posición, recursos, costo del rechazo e historia relacional.

La formulación distingue contenido de una razón y fuerza social de esa razón. Una petición puede estar bien fundada y tener poca eficacia si quien la plantea carece de canales de ejecución y soporta en solitario el costo de rechazar. Otra afirmación puede estar mal justificada y modificar inmediatamente una regla porque su autor controla recursos o sanciones decisivas.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no determina si una razón es verdadera o moralmente buena; analiza cómo su posición relacional se convierte en eficacia.

El concepto no sustituye la teoría de recursos ni las teorías multidimensionales del poder. Ocupa un nivel intermedio. La teoría de recursos explica cómo alternativas y dependencia influyen en la negociación; las teorías multidimensionales muestran que el poder actúa sobre decisiones, agendas, preferencias e interpretación.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pregunta cómo estos niveles se convierten unos en otros en una configuración concreta mediante autorización, reglas, registros y costos de salida.

La hermenéutica y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lenguaje dan fundamento explícito a esta conversión. Las razones no existen primero en una forma perfectamente neutral. Deben comprenderse mediante lenguaje, narrativas y categorías institucionales. Al mismo tiempo, dominar un lenguaje legítimo o un formato administrativo no confiere por naturaleza autoridad decisoria sobre asuntos ajenos. La cuestión está en los pasos intermedios: cuándo la ventaja lingüística es reconocida como competencia, cuándo la competencia altera el procedimiento y cuándo esa alteración entra en las interfaces de recursos y salida.

Se distingue así **eficacia lingüística** de **eficacia de poder**. Un enunciado puede ser semánticamente claro y fácticamente correcto y no cambiar ningún resultado porque su hablante carece de acceso institucional. Otro puede ser lingüísticamente breve y producir consecuencias inmediatas porque quien lo emite controla una cuenta, documentos de identidad o autoridad organizacional. El mercado lingüístico y el poder simbólico de Bourdieu (Bourdieu 1991) ayudan a explicar la desigualdad de fuerza social;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examina si esa desigualdad entra establemente en decisiones, modificación normativa y costos de salida.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sigue siendo distinta de la hermenéutica. Que toda comprensión tenga preestructuras históricas no implica dominación. La historia compartida puede facilitar coordinación eficiente. Las diferencias interpretativas entran en el mecanismo de poder cuando determinadas interpretaciones quedan estructuralmente exentas de verificación, las alternativas pierden canales de acceso al juicio común y la ventaja interpretativa

modifica de manera persistente reglas o recursos.

6.2 Bloqueo gramatical y dependencia de trayectoria

La historia h_t influye en la interpretación de las pretensiones actuales. Si rechazar ha tenido repetidamente costos elevados, los participantes pueden modificar su conducta antes de que ocurra un nuevo evento. Si las reglas se reescriben con frecuencia después de conocer los resultados, un sujeto puede aprender que «cumplir» es un objetivo inalcanzable. En este sentido,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depende de la trayectoria.

La actualización histórica se representa mediante la ecuación 7.

$$\mathcal{G}_{t+1} = \Xi(\mathcal{G}_t, \omega_t, \mathbf{P}_t, \mathcal{N}_t) \tag{7}$$

Hay **bloqueo gramatical** cuando ejercicios previos de poder aumentan repetidamente la aceptabilidad, ejecutabilidad o bajo costo de ejercicios similares posteriores. No hace falta una orden explícita cada vez. Aprender las consecuencias de eventos anteriores puede alterar por sí mismo la conducta. Por ello, descentrar el poder toma tiempo. Una declaración de buena voluntad no reescribe automáticamente expectativas de eficacia producidas por una interacción prolongada.

El bloqueo puede surgir por al menos tres vías. Primero, aprendizaje conductual: las personas descubren que determinadas declaraciones de frontera fallan y dejan de formularlas. Segundo, sedimentación institucional: arreglos inicialmente temporales sobre cuentas, documentos o comunicación se convierten en rutinas de hecho, haciendo más difícil el acceso de los demás. Tercero, sedimentación semántica: etiquetas como «la persona sensata», «la responsable» o «la que necesita cuidado» quedan ligadas a una autoridad concreta y ofrecen apoyo narrativo a la expansión de jurisdicción.

Esto no implica determinismo. La dependencia de trayectoria explica por qué el cambio requiere experiencias nuevas y repetibles: autorización clara, disenso que tenga éxito, reglas estables, apoyo externo disponible y errores corregibles. Cuando se acumulan esos eventos, los participantes pueden revisar sus predicciones sobre consecuencias relacionales. La reconstrucción es por ello un proyecto normativo y un proceso de aprendizaje.

La figura 1 separa cuatro niveles. Esto impide pasar directamente de «existe capacidad» a «ocurrió control» y también evita inferir de un resultado que un actor tuvo necesariamente responsabilidad causal exclusiva.

6.3 Casos límite y contraejemplos

Para aumentar su capacidad discriminatoria, el marco mantiene explícitamente varios casos límite.

La tabla 2 muestra que la distinción central es si el poder está limitado por autorización, razones, procedimiento, proporcionalidad y condiciones de salida. Los casos límite también aclaran el mecanismo: la tutela infantil puede ser legítima porque la jurisdicció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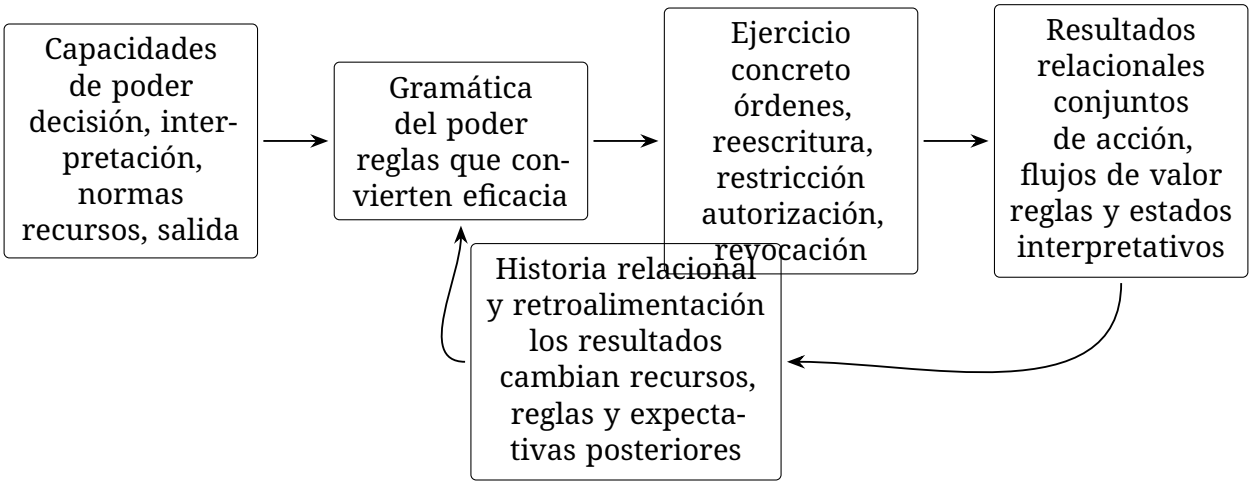

Figure 1: Distinción entre capacidades de poder, gramática del poder, ejercicio concreto y resultados relacionales

Table 2: Casos límite de relaciones asimétricas y variables discriminantes

Situación	Posible base legítima de la asimetría	Variables estructurales que deben seguir examinándose
Cuidado y tutela infantil	Edad, deberes de protección, diferencias de capacidad y responsabilidad jurídica	Proporcionalidad al desarrollo; preservación de expresión, revisión y autonomía creciente
Enfermedad o agencia de emergencia	Presión temporal, límites temporales de capacidad y necesidades de vida y seguridad	Alcance de autorización, necesidad, duración, explicación posterior y condiciones de terminación
Gestión financiera conjunta	Reducción de costos, especialización y fines comunes	Visibilidad de información, autorización recíproca, revocación y esfera mínima de control individual
Relación de cuidado muy dependiente	Concentración de recursos de cuidado y diferencias de pericia	Posible expansión a dominios no relacionados; apoyo de terceros y canales de queja
Obligaciones culturales o familiares	Vida común estable, responsabilidades intergeneracionales y normas compartidas	Posibilidad de impugnación, distribución de costos de salida y existencia de un piso mínimo de autonomía

está vinculada a fines protectores y al desarrollo; la agencia de emergencia puede justificarse por necesidad, límites temporales y deberes posteriores de explicación. Cuando estos límites desaparecen, una capacidad de origen legítimo puede sufrir deriva funcional.

El marco rechaza cualquier oposición simple entre autonomía e influencia externa. Los órdenes relacionales maduros permiten autorización, confianza, cuidado y gestión conjunta, pero exigen fronteras inteligibles.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advierte específicamente contra la conversión repetida de una autorización limitada en una pretensión más amplia de competencia que cambia la eficacia de las razones en otros dominios.

7 Confianza estructural, previsibilidad y autonomía epistémica

La confianza suele tratarse como actitud psicológica o juicio sobre el carácter de otra persona. En una relación fuertemente asimétrica, esa concepción es insuficiente. Confiar también significa exponerse a la conducta futura de otro. Cuando el otro puede modificar reglas, controlar recursos esenciales o hacer costosa la salida, aumenta el riesgo de equivocarse al confiar. Debe distinguirse, por ello, confianza personal y **confianza estructural**.

7.1 Base estructural de la confiabilidad

La base mínima se representa por la ecuación 8.

$$\mathbf{T}_i(t) = \big(L_i, S_i, Q_i, V_i, C_i, E_i\big)_t \tag{8}$$

L representa límites a la intervención ajena; S estabilidad de reglas esenciales; Q posibilidad de impugnar decisiones e interpretaciones; V verificabilidad de hechos y compromisos; C corregibilidad, es decir, capacidad de reconocer y reparar errores; E posibilidad realista de rechazar, suspender o salir sin perder de inmediato condiciones básicas de vida.

Estos componentes no son una fórmula psicométrica de confianza. Identifican condiciones que reducen exposición arbitraria. Una persona puede seguir dudando de la benevolencia de otra y, al mismo tiempo, saber que ninguna parte puede vaciar unilateralmente una cuenta común, reescribir retroactivamente una regla o eliminar acceso a documentos. Esa previsibilidad institucional puede sostener cooperación mientras la confianza personal todavía se reconstruye.

La corregibilidad merece especial atención. Una relación en la que todo error se interpreta como mala intención es frágil porque cualquier reparación exige redefinir por completo a la persona. Una estructura que conserva registros, permite reconocer daños y distingue error, negligencia y abuso posibilita reparación gradual. Esta dimensión se relaciona con la literatura sobre confianza y reparación moral (Baier 1986; Walker 2006).

La salida no debe entenderse como valoración del abandono. Una opción de salida creíble puede hacer más voluntaria la cooperación y reducir precisamente la necesidad de salir. Cuando el rechazo no produce colapso inmediato de vivienda, ingresos o estatus, el acuerdo alcanzado después de deliberar contiene más información sobre asentimiento real.

7.2 Distribución del riesgo y carga de la prueba

La confianza distribuye riesgo. En una relación aproximadamente simétrica, un error de juicio puede generar costos comparables. En una relación asimétrica, el error de la parte débil puede producir pérdida de vivienda, recursos o credibilidad, mientras el error de la parte fuerte es fácilmente reversible. Exigir «igual confianza» en esas condiciones puede significar una distribución desigual del riesgo.

La carga de la prueba exige igual atención. Si una persona controla documentos, cuentas y canales institucionales, normalmente puede producir pruebas con mayor facilidad. Exigir a quien está menos informado que demuestre completamente una irregularidad puede convertir la asimetría informativa en ventaja procedimental. Una estructura más robusta distribuye las obligaciones de documentación según el control efectivo de la información, mantiene registros compartidos y evita que el dueño de la interfaz sea el único árbitro de lo que cuenta como prueba.

Esto vincula confianza, justicia procedimental y autonomía epistémica. La confianza razonable no requiere transparencia total de la vida privada. Requiere que los hechos decisivos para derechos comunes, obligaciones o transferencias de valor sean suficientemente verificables para impedir que una sola parte redefina unilateralmente la historia pertinente.

7.3 Autonomía epistémica e injusticia interpretativa

La autonomía epistémica es la capacidad de describir la propia experiencia, conservar registros, comparar explicaciones, buscar validación externa y revisar el propio juicio sin necesitar autorización interpretativa de otra persona. No implica infalibilidad. Supone precisamente la posibilidad de corregirse mediante múltiples fuentes.

Esta dimensión se relaciona con la injusticia epistémica de Fricker (Fricker 2007). Una persona puede sufrir desventaja como fuente de conocimiento si su testimonio recibe sistemáticamente menos credibilidad o si carece de recursos interpretativos para nombrar su experiencia. En la familia, estos fenómenos pueden reforzarse por dependencia material y narrativas de rol. Quien ya es etiquetado como «inmaduro» puede ver su impugnación reinterpretada como nueva prueba de inmadurez, generando un bucle difícil de romper.

La autonomía epistémica requiere por ello interfaces de información independientes. Acceso directo a documentos, instituciones, asesoría profesional o terceros de confianza puede ser tan importante como una fuente de ingresos. En contextos multilingües, la posibilidad de obtener traducción independiente puede impedir que un mismo actor controle simultáneamente la información original y su interpretación.

7.4 Formación progresiva de confianza basada en experiencia

En una relación marcada por reescritura repetida de reglas o fronteras, la confianza no puede exigirse razonablemente como punto de partida. Una trayectoria más robusta limita poder, estabiliza reglas, acumula interacciones seguras y permite después una confianza empírica. La dirección se representa en la ecuación 9.

$$\Delta L > 0, \quad \Delta S > 0, \quad \Delta Q > 0, \quad \Delta V > 0, \quad \Delta C > 0, \quad \Delta E > 0 \Longrightarrow \Pr(\text{confianza basada en experiencia}) \uparrow \tag{9}$$

La ecuación 9 indica una dirección condicional, no una ley determinista. Mejorar la estructura no garantiza afecto ni reconciliación. Sí reduce razones estructurales para la

cautela y vuelve informativas las nuevas experiencias. Cuando las interacciones seguras se repiten y la parte vulnerable conserva verificación y salida, la confianza emergente depende menos de una demanda moral abstracta y más de una historia observable.

8 Estructura multidimensional de las capacidades de autonomía

La autonomía no se entiende como ausencia de relaciones ni independencia absoluta. Una persona autónoma sigue dependiendo de instituciones, personas cercanas, mercados y sistemas de cuidado. La pregunta es si posee una combinación suficiente de capacidades para formar, expresar y ejecutar un juicio sobre su trayectoria vital básica sin que un único punto de dependencia pueda anular todas las alternativas.

8.1 Seis dimensiones de la autonomía

El vector de autonomía se expresa mediante la ecuación 10.

$$\mathbf{A}_i(t) = \left(A_i^{\text{econ}}, A_i^{\text{inst}}, A_i^{\text{rel}}, A_i^{\text{epist}}, A_i^{\text{value}}, A_i^{\text{exit}}\right)_t \tag{10}$$

Las seis dimensiones son autonomía económica, institucional, de redes relacionales, epistémica, de disposición del valor y de salida. Están conectadas pero no son sustituibles. Un ingreso alto no garantiza acceso independiente a documentos o instituciones. Un estatus jurídico independiente no garantiza medios materiales para abandonar una vivienda. Una red social extensa puede ser poco útil si todas sus conexiones pasan por el mismo miembro de la familia.

La autonomía económica concierne al control real de recursos capaces de sostener la vida cotidiana y elecciones significativas. La institucional se refiere a acceso directo a cuentas, contratos, servicios, identificadores, documentos y remedios. La relacional se refiere a vínculos que no estén totalmente mediados por una única relación. La epistémica comprende información y capacidad interpretativa. La autonomía sobre el valor se refiere a decidir sobre contribuciones, ingresos o creaciones vinculadas a la persona. La de salida concierne a opciones realistas de rechazo, pausa o cambio relacional.

8.2 Disponibilidad, control y robustez

Cada dimensión debe descomponerse en tres capas. Para un recurso o capacidad k, la ecuación 11 representa la distinción.

$$A_{i,k}(t) = \left(\text{Avail}_{i,k}, \text{Ctrl}_{i,k}, \text{Rob}_{i,k}\right)_t \tag{11}$$

Avail es disponibilidad formal o material; Ctrl control efectivo; Rob robustez del control frente a conflicto, interferencia o cambio de relación. La distinción evita identificar posesión nominal y autonomía sustantiva. Puede existir una cuenta cuyo titular desconoce la contraseña; un ingreso puede pagarse a una persona y transferirse automáticamente; un

derecho jurídico puede ser fuerte en teoría y casi inutilizable sin documentos o transporte.

La robustez importa porque la autonomía debe evaluarse precisamente cuando se necesita. Un recurso disponible solo mientras no haya desacuerdo no proporciona una frontera fiable. Esto no exige individualizar todos los activos. Los recursos comunes pueden ser robustos cuando su gobernanza impide retirada unilateral, garantiza visibilidad y organiza procedimientos de decisión compartida.

8.3 Orden de vida propio y fronteras relacionales

Sea O_i el orden de vida que una persona puede mantener y O_F el conjunto de arreglos que la estructura familiar puede reorganizar directamente. Existe vulnerabilidad fuerte cuando el orden propio queda totalmente absorbido por el familiar, situación expresada en la ecuación 12.

$$O_i \subseteq O_F \tag{12}$$

El objetivo no es hacer a O_i independiente de toda relación. Es mantener una frontera tal que ciertos elementos esenciales, documentos, opciones profesionales, redes externas, espacio informativo o remedios institucionales, no puedan desaparecer por una sola decisión familiar. Esa frontera hace más real el consentimiento a la cooperación, porque cooperar deja de ser la única condición de supervivencia.

La distancia geográfica puede contribuir a esta diferenciación, pero no es necesaria ni suficiente. Dos personas que conviven pueden mantener interfaces autónomas robustas; dos personas alejadas pueden seguir fuertemente vinculadas por dinero, documentos o información. La arquitectura de interfaces importa más que la distancia física por sí sola.

8.4 Controlabilidad progresiva y expansión de responsabilidades

Cuando una persona todavía construye autonomía frente a una relación restrictiva, asumir de inmediato roles muy sensibles, irreversibles o fiduciarios puede aumentar riesgos de desbordamiento. La exclusión completa de la participación social puede, a su vez, reforzar dependencia. La controlabilidad progresiva ofrece una vía intermedia: aumentar primero capacidades y controlabilidad, y ampliar responsabilidades cuando las interfaces se vuelvan más robustas.

La dirección se expresa mediante la ecuación 13.

$$\Delta A_t > 0, \quad \Delta C_t > 0 \Longrightarrow \text{ampliación prudente de } T_t \tag{13}$$

C_t designa la controlabilidad de un rol, es decir, la posibilidad de aislar interfaces, observar anomalías, suspender actividad, trazar decisiones y limitar consecuencias. T_t representa la extensión de responsabilidad fiduciaria. La ecuación 13 no significa que una persona deba «probar» su autonomía ante una autoridad familiar. Es una regla institucional prudente para alinear responsabilidades crecientes con capacidad real de mantener fronteras.

La progresividad debe ser reversible y revisable. Si una organización convierte una protección temporal en una restricción indefinida sin criterios de salida, crea un nuevo paternalismo. Hacen falta criterios explícitos, revisión periódica y posibilidad real de ampliar responsabilidades.

8.5 Autonomía distribuida y dependencia de punto único

Sea el conjunto de apoyos de una persona el de la ecuación 14.

$$\mathcal{S}_i = \{s_{i1}, s_{i2}, \ldots, s_{im}\} \tag{14}$$

Para pesos normalizados de dependencia w_{ik}, la concentración puede representarse mediante la ecuación 15.

$$H_i = \sum_{k=1}^{m} w_{ik}^2, \qquad \sum_{k=1}^{m} w_{ik} = 1 \tag{15}$$

Un H_i alto indica dependencia concentrada. Pero aumentar el número de nodos no basta. Si varios apoyos fallan juntos porque dependen del mismo actor o institución, la diversificación nominal no proporciona robustez. La autonomía distribuida exige diversidad funcional y correlación limitada de fallos.

El principio combinado se expresa mediante la ecuación 16.

$$\text{dependencia distribuida} \; + \; \text{responsabilidad localizada} \tag{16}$$

La dependencia puede distribuirse entre ingreso, vivienda, redes, instituciones y apoyos profesionales, pero la responsabilidad por cada contrato, transferencia o decisión debe seguir siendo trazable. Diversificar soportes no debe convertirse en una forma de dispersar responsabilidad hasta hacerla invisible.

9 Economía política familiar: dependencia, reproducción social y posición de negociación

Si el poder familiar se entiende únicamente como comunicación interpersonal o interacción psicológica, desaparecen sus fundamentos materiales. Ingresos, activos, vivienda, tiempo de cuidado, oportunidades laborales, seguro social y servicios públicos determinan conjuntamente las alternativas de los miembros y las pérdidas que genera el fracaso de un arreglo. La contribución de la economía política consiste en tratar estas condiciones como parte de la estructura de poder, no como un «fondo» fijo anterior a la relación. Esta sección conecta las interfaces de recursos con mercados, Estado y normas sociales a partir de la negociación familiar, los conflictos cooperativos y la reproducción social.

9.1 La familia como unidad institucional de cooperación y conflicto

Las familias pueden producir intereses genuinamente comunes. La residencia compartida, el cuidado, la mutualización de riesgos y las inversiones de largo plazo suelen requerir co-

operación, y muchos beneficios no pueden dividirse con exactitud. Un modelo que reduzca la familia a individuos competidores pierde esa dimensión. Sin embargo, tratarla como si poseyera una preferencia única o una función de bienestar unificada también oculta diferencias internas. El análisis de Sen sobre los «conflictos cooperativos» muestra que los miembros pueden beneficiarse de cooperar y tener, al mismo tiempo, intereses diferentes en la distribución de beneficios, trabajo y recursos (Sen 1990).

Esto conecta directamente con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La cooperación no determina cómo se interpretan las contribuciones ni quién posee autoridad final de decisión. Una familia puede beneficiarse del cuidado no remunerado de una persona, pero si esa contribución no puede convertirse en seguridad económica, compensación profesional o posición de negociación futura, aparece una tensión entre beneficio cooperativo y autonomía individual. A la inversa, activos comunes, garantías de cuidado y presupuestos transparentes pueden convertir los beneficios compartidos en capacidades más equilibradas.

La economía política familiar debe preguntar no solo si aumentan los recursos totales, sino cómo ese aumento cambia los conjuntos de acción de cada miembro. Si el ingreso del hogar crece mientras se concentran control, acceso a cuentas y oportunidades profesionales, la interfaz R de la ecuación 3 puede hacerse más asimétrica. Si el crecimiento va acompañado de propiedad conjunta, cuentas independientes y apoyo externo, puede fortalecer la robustez de la autonomía de varios miembros. Cantidad agregada, distribución, control y salida son niveles distintos.

Los conflictos cooperativos implican además desacuerdos genuinos sobre qué es el «interés común». Una estrategia de ahorro elevado puede aumentar activos futuros y reducir el cuidado presente. Invertir en la carrera de una persona puede incrementar el ingreso futuro del hogar y concentrar los costos de tiempo en otra. La economía política no puede presuponer una utilidad doméstica única. Debe examinar cómo se formulan las compensaciones, quién soporta costos de oportunidad y quién puede modificar los arreglos.

9.2 Posición de negociación y recursos externos

Agarwal muestra que normas sociales, propiedad de activos, mercados, comunidades e instituciones estatales influyen en la negociación doméstica y que posiciones externas e internas interactúan (Agarwal 1997). Las opciones de salida no son constantes. Empleo, vivienda pública, seguridad social, estatus migratorio, redes de parentesco y remedios jurídicos modifican el costo soportable de rechazar un arreglo.

Sea $O_i(t)$ el conjunto de apoyos externos de i y Z_t el entorno social, normativo e institucional. La posición efectiva de negociación se representa mediante la ecuación 17.

$$\mathcal{B}_i(t) = F(\mathbf{A}_i(t), O_i(t), Z_t, h_t) \tag{17}$$

No se presupone conocida la función F. La ecuación 17 hace explícito que la negociación familiar no depende solo del ingreso actual. Historia relacional, alternativas ex-

ternas, expectativas normativas y derechos institucionales influyen conjuntamente en las consecuencias prácticas de decir «no».

Esto ayuda también a explicar cómo la política pública puede modificar indirectamente el poder familiar. El cuidado infantil público puede ampliar oportunidades laborales; la elegibilidad individual para seguridad social puede reducir dependencia de un ingreso conyugal; transporte y acceso digital pueden ampliar redes externas; y los regímenes de propiedad y herencia afectan el control de activos. Las instituciones públicas no necesitan administrar directamente a las familias para modificar su gramática del poder. Pueden ampliar alternativas prácticas.

Los recursos externos no producen automáticamente igualdad. Un aumento de ingreso puede quedar absorbido por estructuras de control existentes y una prestación pública puede seguir siendo administrada por el mismo nodo familiar. Por eso debe analizarse el nivel de control y robustez. Un recurso altera la posición de negociación solo cuando la persona puede acceder a él, usarlo y conservarlo durante un conflicto.

Las alternativas externas incluyen además información fiable y conocimiento institucional. Una persona puede tener ingreso e ignorar derechos, prestaciones u opciones contractuales; otra puede ganar menos y poseer mayor capacidad de negociación por sus redes y conocimiento procedimental. Capital lingüístico y capacidad administrativa condicionan qué alternativas pueden verse y ejecutarse. Las normas sociales también modifican su usabilidad: una opción de empleo, vivienda o cuidado puede existir en el mercado y tener costos simbólicos o comunitarios severos.

9.3 Reproducción social, cuidado y valor invisible

Las familias producen grandes volúmenes de valor no mercantil: cuidado de niños, mayores y personas enfermas, mantenimiento del hogar, apoyo a educación y carrera, trabajo emocional y reproducción de relaciones intergeneracionales. Folbre subraya que la distribución de estos costos entre familias, mercados y Estado es un problema de economía política (Folbre 1994).

Si solo se registran flujos monetarios, el cuidado no remunerado puede desaparecer como si careciera de valor. Si se registra únicamente la contribución, puede perderse el carácter afectivo y no contractual del cuidado. El artículo no propone mercantilizar todo trabajo familiar. Exige que sus efectos estructurales sean reconocidos al analizar recursos, poder y disposición del valor. El cuidado prolongado puede reducir salarios, antigüedad y pensiones de quien cuida y aumentar el tiempo disponible de otra persona para el trabajo de mercado. Aun sin precio por hora, la asignación del tiempo modifica interfaces futuras.

La reproducción social explica por qué «quién recibe el ingreso» y «quién creó las condiciones de valor» pueden divergir. El salario de mercado remunera determinadas actividades, mientras cuidado, apoyo y asunción de riesgo familiar contribuyen a las condiciones de posibilidad del ingreso. La propiedad y la contribución deben mantenerse separadas: contribuir no confiere autoridad ilimitada, pero excluir de manera persistente una

contribución de las decisiones comunes o de garantías de seguridad genera una cuestión distributiva.

También existe una dimensión intergeneracional. Apoyo educativo, formación lingüística, redes sociales, patrones de cuidado y transferencias de activos configuran el acceso de la siguiente generación a instituciones y mercados. La asignación intrafamiliar puede transmitir oportunidades y desventajas al futuro. Además, los sistemas de medición captan mejor salarios y activos que tiempo de disponibilidad, coordinación familiar o oportunidades laborales perdidas; por ello, los datos de uso del tiempo y los registros cualitativos son complementos necesarios.

9.4 Acumulación de activos, tiempo y derechos institucionales

El poder familiar es acumulativo. Diferencias salariales se convierten en diferencias de activos; los activos afectan vivienda y crédito; vivienda y crédito alteran redes y opciones profesionales; y estas opciones modifican ingreso, pensión y estatus. El tiempo también se acumula. Quien asume cuidado duradero puede perder formación y antigüedad; quien asume mediación institucional puede acumular contactos y conocimiento.

Una fotografía estática de la distribución puede, por ello, ser engañosa. Dos personas pueden disfrutar hoy de consumos semejantes y seguir trayectorias de capacidad divergentes. Una acumula activos, calificaciones y derechos; otra acumula obligaciones y costos de salida. La evaluación debe incluir efectos intertemporales.

La especialización no es necesariamente injusta. Puede ser voluntaria y eficiente. La cuestión normativa es cómo se reparten sus beneficios y riesgos. Una estructura más robusta puede reconocer costos de oportunidad, crear derechos comunes sobre determinados activos, conservar ámbitos individuales de control y prever compensación o revisión cuando cambia la división del trabajo.

9.5 Lenguaje, trabajo administrativo y poder económico

Lenguaje y trabajo administrativo forman una infraestructura político-económica frecuentemente ignorada. En familias multilingües o intensamente conectadas con instituciones, leer contratos, comunicarse con administraciones, gestionar cuentas digitales y comprender procedimientos constituye trabajo real. Puede representar una carga considerable y, al mismo tiempo, concentrar acceso estratégico a información.

Quien posee esas competencias puede volverse indispensable al funcionamiento colectivo. La autonomía no exige que todos adquieran todas las habilidades, sino que existan mecanismos de transferencia de conocimiento, acceso compartido, documentación y apoyo externo. Así la especialización puede seguir siendo eficiente sin transformarse en monopolio.

Este mecanismo conecta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lenguaje y economía política familiar. El capital lingüístico puede convertirse en poder material porque abre o cierra acceso a instituciones que controlan ingresos, derechos y movilidad. A su vez, los recursos económicos

pueden financiar formación lingüística, asesoría y redes que refuercen la ventaja institucional.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analiza estas conversiones cruzadas.

10 Fronteras del valor, estructuras de autorización y transferencias intermediarias

La autonomía no concierne solo a la capacidad de decidir, sino también a si el valor creado por una persona o con terceros puede ser conocido, autorizado, trazado y dispuesto conforme a reglas comprensibles. La familia posee fronteras naturalmente flexibles: ingresos comunes, regalos, cuidados y gastos compartidos hacen inviable contractualizar cada interacción. La dificultad aparece cuando la flexibilidad se transforma en un canal unilateral, opaco o no revocable.

10.1 Creación de valor, contribución y autorización

Sea S un sujeto y B un colaborador externo que crean un valor $V(S, B)$ mediante un arreglo C. El conjunto de canales de disposición autorizados se denota $\mathcal{M}_C$. Un canal conforme se expresa en la ecuación 18.

$$m \in \mathcal{M}_C \quad \Longrightarrow \quad V(S,B) \xrightarrow{m} \left(V_S, V_B, V_{\text{com\={u}n}}\right) \tag{18}$$

La ecuación 18 no presupone propiedad individualista completa ni reparto igual. Requiere que el canal relevante forme parte de una estructura de disposición que las partes puedan conocer y cuya autoridad pueda explicarse.

Deben distinguirse **propiedad**, **contribución** y **autoridad de disposición**. Alguien puede contribuir mucho sin ser propietario jurídico; puede ser propietario y delegar administración; varias personas pueden poseer intereses superpuestos en un recurso común. Ninguna categoría debe convertirse en una clave universal.

En la vida común existen contribuciones difíciles de separar. El marco no pretende asignarles siempre un precio individual. Pregunta si las reglas para disponer de recursos importantes siguen siendo inteligibles y si los participantes comprenden los efectos de los cambios. En transferencias de bajo valor y alta reversibilidad, las convenciones tácitas pueden ser suficientes. Cuanto mayor sea el valor, menor la reversibilidad o mayor la conexión con terceros, más fuertes son las razones para autorización explícita, registro y revisión.

10.2 Cuatro tipos de flujo de valor

La tabla 3 distingue compartir de extraer. La vida familiar permite legítimamente fronteras elásticas. La dificultad normativa aparece cuando la elasticidad se convierte unilateralmente en una interfaz de recursos invisible, no revocable o sin rendición de cuentas.

Los cuatro tipos pueden transformarse. La puesta en común puede necesitar renegociación cuando cambian los ingresos. Un regalo unido a exigencias continuas de obediencia

Table 3: Tipos de flujo de valor en las relaciones familiares

Tipo	Estructura típica	Condiciones principales de distinción
Puesta en común	Las partes acuerdan destinar parte de ingresos, tiempo o activos al uso común	Reglas conocidas, alcance claro y participación en la definición de usos comunes
Regalo o apoyo	Una parte transfiere voluntariamente valor a otra persona o a la comunidad familiar	Voluntario e informado, sin condición oculta, distinguible de una transferencia forzada
Gestión autorizada	Una parte administra cuentas, activos, contratos o asuntos por cuenta de otra	Delegación, alcance de autoridad, registros, revocación y condiciones de auditoría
Transferencia intermediaria no autorizada	Un tercero usa su posición relacional para entrar en un canal de valor no previsto en el arreglo original	Conocimiento insuficiente, falta de autorización, dificultad de revocación, opacidad y baja trazabilidad

puede perder su voluntariedad. Una gestión autorizada puede convertirse en control de hecho cuando quien autorizó pierde acceso a información mientras la autoridad del gestor continúa ampliándose. Las fronteras del valor son estados que requieren actualización histórica.

También deben analizarse valor monetario y no monetario. Cuidados, tiempo, datos, capital social y oportunidades profesionales pueden redistribuirse sin transferencias bancarias. Las fronteras del valor conciernen a quién decide cómo se usa el tiempo, quién soporta costos de oportunidad y quién obtiene beneficios reputacionales o institucionales de la vida común.

10.3 Condiciones de riesgo de transferencia intermediaria

Cuando un tercero A forma un canal m_A mediante su posición relacional, el riesgo se describe con cinco condiciones en la ecuación 19.

$$\mathbf{B}(m_A) = (K, A, R, T, Q) \tag{19}$$

K es conocimiento, A calidad de autorización, R revocabilidad, T trazabilidad y Q accesibilidad de la rendición de cuentas. El riesgo aumenta cuando disminuyen estas dimensiones. No se suman mecánicamente ni se supone igual peso.

Cuando $m_A \notin \mathcal{M}_C$ y varias condiciones permanecen débiles de modo persistente, puede hablarse de **riesgo de transferencia intermediaria no autorizada**. El juicio más fuerte de explotación requiere evidencia adicional de perjuicio, injusticia, coerción u otros elementos normativos. Esta estratificación evita clasificar regalos y recursos compartidos como extracción.

Debe distinguirse falta de autorización formal de falta de autorización válida. La vida diaria rara vez usa autorización escrita para cada acto y una práctica compartida estable puede constituir autorización implícita razonable. Sin embargo, la autorización implícita necesita un alcance inferible y no puede expandirse indefinidamente por la sola intimidad de la relación. Su validez depende de información adecuada, realidad de elección, propor-

cionalidad del costo de rechazo y capacidad de revocar o revisar.

El análisis no exige contractualizar la familia. Exige mayor claridad en canales de alto valor, baja reversibilidad o participación de terceros. Lo cercano al consumo común ordinario puede depender más de convenciones. La disposición de activos importantes, propiedad intelectual, fondos organizacionales o contratos con terceros requiere razones más fuertes para autoridad explícita y registros.

La rendición de cuentas Q no equivale a castigo. Significa, primero, que alguien debe explicar qué ocurrió, bajo qué autoridad, cómo se tratarán las pérdidas y cómo se modificarán reglas futuras. Si solo existe mediante ruptura o litigio, la capacidad cotidiana de corrección es débil.

10.4 Fronteras del valor y reproducción del poder

Las transferencias pueden remodelar posiciones futuras de poder. Si un canal no autorizado aumenta el control de un tercero sobre recursos, información o salida, el mecanismo de retroalimentación posible se representa en la ecuación 20.

$$\text{transferencia de } V \longrightarrow \text{interfaces } R, X \text{ más fuertes} \longrightarrow \text{desplazamiento de la eficacia de } \mathcal{G} \longrightarrow \text{transfere} \tag{20}$$

La ecuación 20 expresa una hipótesis de mecanismo, no un ciclo necesario. Cada vínculo requiere evidencia. Sirve para distinguir una disputa puntual por beneficios de una estructura que se refuerza a sí misma.

La reproducción también puede ser no monetaria. Quien maneja reiteradamente procedimientos administrativos, comunicación externa y filtrado de información acumula conocimiento y redes; quien queda fuera puede hacerse más dependiente incluso si los recursos nominales no cambian. El cuidado no remunerado prolongado puede reducir empleo y redes profesionales, elevando gradualmente costos de salida. Autonomía y fronteras del valor se influyen en ambas direcciones.

También existe normalización normativa. Tras repetirse una transferencia, puede dejar de verse como acto excepcional que requiere autorización y convertirse en «la forma en que se hacen las cosas». Rechazarla después adquiere un costo explicativo adicional.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conecta así ciclos económicos e interpretativos: resultados de recursos cambian narrativas de competencia que condicionan nuevos flujos.

11 Desbordamiento de redes privadas hacia roles organizacionales

Las estructuras familiares adquieren relevancia ética pública cuando una persona asume un rol con responsabilidades frente a terceros. El artículo no afirma que la presión privada descalifique profesionalmente a una persona. Analiza si una red privada posee canales prácticos para penetrar interfaces del rol y si esos canales están limitados por la organi-

zación.

11.1 Autorización del rol y conjuntos de interfaces

Sea una organización O que confía un rol R al sujeto S. El uso de las capacidades del rol debe permanecer dentro de su mandato, como expresa la ecuación 21.

$$\text{Use}(R_S) \subseteq \text{Mandate}(O, R) \tag{21}$$

El mandato puede incluir acceso a fondos, datos, decisiones, compras, contratación, comunicación o representación. Que esas capacidades sean ejercidas por una persona no las convierte en propiedad privada. Siguen condicionadas por fines, procedimientos y responsabilidades organizacionales.

Un familiar no recibe automáticamente derechos derivados sobre los recursos o autoridad de un rol por la relación íntima con su titular. Tampoco el titular pierde autonomía privada por tener un rol. El problema surge cuando interfaces privadas y organizacionales son tan porosas que una petición familiar puede convertirse en uso no autorizado de poder organizacional.

11.2 Presión privada, canal identificable y captura efectiva

Deben distinguirse tres niveles. **Presión privada** es una demanda, expectativa o influencia procedente de una red personal. Existe un **canal identificable** cuando hay una vía práctica para que esa influencia alcance recursos, información o decisiones del rol. La **captura efectiva** aparece cuando la vía modifica realmente el ejercicio del rol fuera del mandato. Confundir los niveles puede subestimar riesgos o sospechar indebidamente de toda persona sometida a presión.

La estructura general de desbordamiento potencial se representa mediante la ecuación 22.

$$O \xrightarrow{R} S \xrightarrow{m_A} A, \qquad m_A \notin \text{Mandate}(O, R) \tag{22}$$

La ecuación 22 no demuestra que haya ocurrido captura. Identifica un canal que debe estudiarse. La evaluación debe considerar visibilidad, detectabilidad, autoridad real del sujeto, reversibilidad de la decisión e intereses de terceros.

El riesgo no se limita a puestos altos. Una función modesta puede controlar una base de datos sensible, un acceso administrativo, un pago o un proceso de selección. Lo relevante es la combinación de poder de interfaz, observabilidad, reversibilidad y consecuencias, no el prestigio del título.

11.3 Gobernanza de interfaces organizacionales

Las respuestas institucionales deben ser proporcionales a las interfaces. La tabla 4 resume mecanismos principales.

La tabla 4 muestra que la gobernanza no puede depender únicamente del carácter

Table 4: Interfaces organizacionales y mecanismos de gobernanza

Interfaz	Riesgo de penetración privada	Mecanismos pertinentes
Fondos y pagos	Transferencias, reembolsos o orientación de valor fuera del mandato	Separación de funciones, doble control, límites de autorización, pista de auditoría
Información sensible	Divulgación a personas cercanas, uso personal o filtrado	Mínimo privilegio, registro de accesos, clasificación, supervisión
Compras y contratos	Favoritismo o ventaja indirecta a una red privada	Declaración, recusación, revisión independiente, competencia documentada
Representación externa	Uso de autoridad organizacional en asuntos privados	Mandato claro, aprobación y trazabilidad de comunicaciones
Contratación y selección	Conversión de obligación personal en acceso institucional	Criterios explícitos, paneles múltiples, declaración de relaciones, documentación
Decisiones muy irreversibles	Consecuencias graves difíciles de corregir	Umbrales de aprobación más altos, revisión independiente, separación de interfaces

moral del titular. Debe reducir estructuralmente oportunidades de conversión no autorizada. El mínimo privilegio limita el alcance del acceso; el doble control evita que una sola persona complete una operación sensible; la recusación protege decisiones cuando existen intereses privados; la auditoría crea registros verificables.

Esto coincide con la literatura sobre conflictos de interés, que distingue un interés secundario de la corrupción efectiva del juicio profesional (Thompson 1993). El conflicto de interés es una condición de riesgo que debe gobernarse, no una prueba automática de mala conducta. El mismo principio se aplica a las redes familiares.

11.4 Justicia hacia terceros e integridad de representación

El desbordamiento afecta también a terceros que esperan procedimientos imparciales, colegas que soportan costos adicionales o beneficiarios cuyos recursos pueden desviarse. Por ello, se trata de justicia relacional y procedimental. La autoridad de representación crea deberes hacia personas fuera de la red privada.

La autoridad interpretativa importa igualmente. Un titular puede no transferir fondos y, sin embargo, usar su estatus para hacer aceptar la versión de una persona cercana, desacreditar a un tercero o enmarcar información de modo que altere una decisión. Las fronteras del rol deben abarcar recursos materiales y poder de representación.

La finalidad institucional no es prohibir relaciones privadas, sino impedir que modifiquen silenciosamente criterios de decisión pública u organizacional. Las organizaciones robustas permiten declarar relaciones relevantes, limitan interfaces sensibles, ofrecen recusación y evitan obligar a elegir entre lealtad familiar y violación del rol por falta de alternativas procedimentales.

12 Reconstrucción relacional, poder limitado y descentramiento del poder

Si el objetivo fuera únicamente enseñar a la parte débil a ejercer un contrapoder más fuerte, el análisis permanecería dentro de la misma gramática. La cuestión más importante es cómo un aumento de capacidades puede crear condiciones para reducir la centralidad del poder. La no dominación guía esta parte: no se busca igualar todos los recursos, sino limitar la capacidad de cualquier persona para decidir arbitrariamente la trayectoria básica de otra.

12.1 Equilibrio, seguridad y problema del contrapoder

Cierto equilibrio de capacidades puede ser necesario para que la negociación sea real. Una persona sin recursos, apoyo externo ni salida no puede convertir una negativa verbal en una frontera práctica. Construir capacidad económica, institucional y epistémica puede ser una etapa protectora.

Pero el contrapoder encierra un riesgo. Si la nueva capacidad se usa solo para invertir la dirección de la dominación, la arquitectura se conserva y cambia el centro. El criterio de progreso no es «quién gana», sino la presencia de límites que impiden la expansión arbitraria del poder entre dominios.

La transformación puede concebirse como paso de poder unilateral a poder limitado y luego a una relación más negociable. No exige desaparición del poder. Seguirán existiendo responsabilidades y asimetrías. Exige que su conversión sea más previsible, discutible y acotada.

12.2 Descentramiento de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Descentrar significa que el poder deja de ser el principal medio por el que las razones adquieren eficacia. Una pretensión ya no necesita apoyarse en control superior de recursos o amenaza de salida para ser escuchada. Las razones pueden entrar en la decisión por su pertinencia, documentación y posibilidad de discusión.

El proceso requiere experiencias repetidas: rechazos aceptados sin represalias desproporcionadas, reglas que permanecen estables pese a resultados desfavorables para quien antes era fuerte, acceso independiente a información, reparación de errores y posibilidad de consultar a terceros. Esos eventos modifican gradualmente h_t y $\mathcal{G}_t$.

La figura 2 muestra un bucle, no una secuencia irreversible. Puede haber regresión si desaparecen apoyos externos, una crisis vuelve a concentrar autoridad o las reglas se hacen opacas. La reconstrucción es mantenimiento institucional y aprendizaje continuo.

12.3 Memoria, narración y reconocimiento mutuo

La reconstrucción no puede ser solo material. Una relación puede redistribuir recursos y conservar relatos que asignan de manera permanente a alguien el papel de dependien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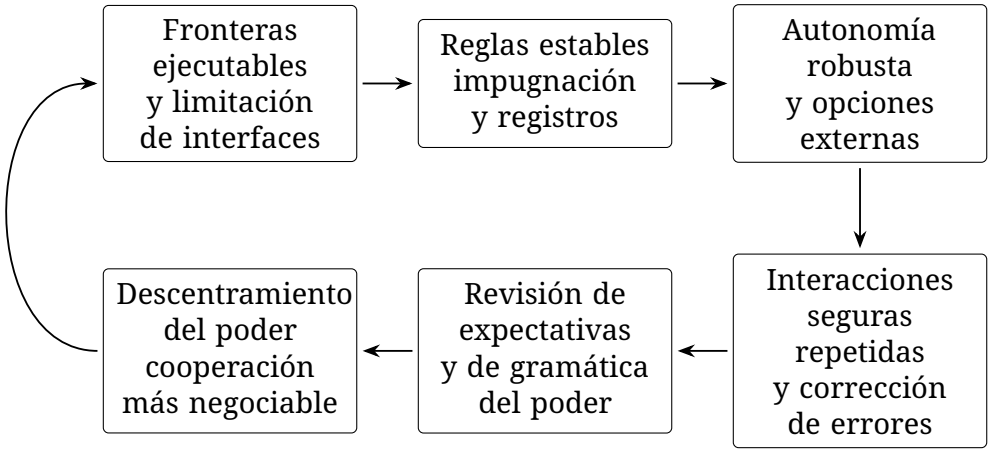

Figure 2: Bucle de reconstrucción relacional y descentramiento del poder

ingrato o incapaz. Mientras esas narrativas determinen credibilidad y competencia, la autonomía epistémica seguirá limitada.

Un proceso sostenible exige reinterpretar la historia sin borrarla. Reconocer que una intervención pasada tenía una razón comprensible no impide reconocer que produjo dependencia excesiva. Aceptar una contribución familiar no implica aceptar deuda ilimitada. La pluralidad narrativa permite separar gratitud, responsabilidad y competencia futura.

Esto explica por qué descentrar no equivale a contractualizar toda la familia. Las relaciones conservan afecto, memoria y obligaciones difusas. Se trata de hacer esos elementos compatibles con impugnación y revisión, no de eliminarlos.

13 Proposiciones analíticas, operacionalización y comprobación empírica

El marco debe producir proposiciones confrontables con observaciones. Las siguientes son condicionales y no pretenden constituir leyes universales.

Proposición analítica 1 *Manteniendo comparables las condiciones contextuales, una concentración más fuerte y duradera de las interfaces D, I, N, R, X en una misma posición debería asociarse con mayor capacidad de transformar desacuerdos en resultados unilaterales.*

Proposición analítica 2 *Cuando las diferencias de recursos no alteran resultados porque reglas transparentes, derechos de rechazo o supervisión externa bloquean su conversión, la distribución de recursos debería predecir peor el control que la estructura de conversión $\mathcal{G}$.*

Proposición analítica 3 *Mayor estabilidad normativa, posibilidad de impugnación y verificabilidad deberían asociarse con mayor confianza basada en experiencia incluso si la confianza personal inicial sigue siendo baja.*

Proposición analítica 4 *El acceso directo a documentos, información y fuentes externas de validación debería reducir la brecha entre autoridad interpretativa y control factual, reforzando la autonomía epistémica.*

Table 5: Ejemplos de operacionalización de conceptos centrales

Concepto	Posibles indicadores observables	Posibles fuentes de datos
Interfaz decisoria D	Quién puede bloquear, autorizar o modificar una acción; frecuencia de decisiones unilaterales	Cronologías de eventos, entrevistas cruzadas, documentos
Interfaz interpretativa I	Qué versión se conserva en decisiones posteriores; acceso a pruebas y terceros	Mensajes, actas, entrevistas, expedientes
Modificación normativa N	Cambios de reglas, momento del cambio, simetría de impugnación	Historiales de reglas, diarios, testimonios múltiples
Interfaz de recursos R	Acceso a cuentas, documentos, vivienda, información, redes y servicios	Documentos, registros de acceso, encuestas
Interfaz de salida X	Costos materiales, jurídicos, sociales y simbólicos del rechazo o salida	Datos de mercado, estatus jurídico, entrevistas
Confianza estructural	Previsibilidad percibida, estabilidad verificada, reparaciones exitosas, opciones de salida	Medidas repetidas, eventos, observaciones longitudinales
Autonomía	Disponibilidad, control y robustez en seis dimensiones	Encuestas, documentos, análisis de redes, trayectorias
Frontera del valor	Conocimiento, autorización, revocabilidad, trazabilidad y rendición de cuentas	Contratos, transacciones, comunicaciones, auditorías

Proposición analítica 5 *La robustez de la autonomía debería depender más de la combinación entre disponibilidad, control y resistencia a la interferencia que de la mera presencia nominal de un recurso.*

Proposición analítica 6 *Reducir la dependencia de un punto único debería disminuir la capacidad de un nodo familiar para alterar simultáneamente varios dominios, siempre que los nuevos apoyos no compartan una alta correlación de fallo.*

Proposición analítica 7 *Las transferencias no autorizadas deberían ser más susceptibles de auto-reforzarse cuando aumentan el control del beneficiario sobre recursos y salida y cuando su repetición normaliza el canal.*

Proposición analítica 8 *En organizaciones, mínimo privilegio, separación de funciones, divulgación, recusación y auditoría deberían reducir la probabilidad de que una presión privada identificable se convierta en captura efectiva del rol.*

Las proposiciones pueden estudiarse mediante comparación de casos, entrevistas longitudinales, análisis de eventos, datos administrativos o experimentos procedimentales. La formalización hace explícitas variables y relaciones, pero no impone un único método.

La tabla 5 muestra que ningún concepto central debería medirse con una única pregunta subjetiva. Siempre que sea posible, los datos deben combinar descripciones de participantes, huellas conductuales y documentos. Las discrepancias entre fuentes también son informativas, especialmente en materia de autoridad interpretativa.

La investigación causal debe atender factores de confusión. Una crisis económica puede aumentar simultáneamente el control de recursos y reducir confianza. Una enfermedad puede concentrar decisiones legítimamente y disminuir autonomía observable. Las diferencias culturales pueden afectar normas de puesta en común y declaraciones subjetivas de satisfacción. Diseños longitudinales y comparaciones antes y después de cambios institucionales resultan especialmente útiles.

14 Fronteras teóricas, explicaciones alternativas y límites de aplicación

El marco posee varias limitaciones. Primero, está diseñado para analizar mecanismos y no para diagnosticar personas o clasificar familias. Gramática del poder, bloqueo o transferencia no autorizada no sustituyen evaluación clínica, juicio jurídico ni investigación empírica detallada.

Segundo, las asimetrías observadas pueden tener causas alternativas. Especialización, preferencia por delegar, emergencia, enfermedad, edad o restricciones institucionales pueden concentrar interfaces sin dominación. Toda interpretación debe comprobar esas alternativas y examinar autorización, duración, proporcionalidad y revisabilidad.

Tercero, las variables son heterogéneas. Sería metodológicamente frágil combinarlas demasiado pronto en un índice global. Algunas dimensiones son cuantitativas, otras ordinales o narrativas. La formalización es principalmente relacional y lógica; las funciones introducidas no son ecuaciones estructurales estimadas.

Cuarto, la cultura afecta el significado de recursos, obligaciones y salida. Una práctica de puesta en común puede vivirse como solidaridad en un contexto y como restricción en otro. El análisis comparativo debe separar diferencia de contenido normativo de ausencia de impugnación. La diversidad cultural no elimina la pregunta de si una persona puede comprender las reglas, expresar disenso y conservar condiciones mínimas de vida.

Quinto, el artículo no desarrolla una teoría completa de justicia familiar. Utiliza varias tradiciones porque cada una ilumina una dimensión diferente. Persisten tensiones entre autonomía individual, obligaciones de cuidado, eficiencia colectiva, justicia distributiva y continuidad relacional. No se resuelven mediante un criterio único.

Sexto, el concepto de gramática del poder corre riesgo de absorción teórica si se usa de forma excesivamente amplia. No añade nada si se vuelve otro nombre de «estructura de poder». Su utilidad exige mostrar un mecanismo de conversión identificable entre diferencias de posición o recursos y eficacia decisoria, interpretativa o normativa. Si no puede observarse una conversión distintiva, deben preferirse conceptos existentes más simples.

Séptimo, la medición puede modificar el fenómeno. Pedir a participantes que documenten decisiones o reflexionen sobre autorizaciones puede aumentar temporalmente la posibilidad de impugnación y alterar rutinas. La investigación misma puede ser una intervención relacional.

Octavo, las trayectorias vitales cambian la interpretación de la asimetría. Las necesidades de un niño, una persona gravemente enferma o un adulto plenamente autónomo son diferentes. La misma estructura puede ser justificable en una etapa y excesiva en otra. La evaluación debe incorporar tiempo, transiciones de capacidad y criterios para terminar una autoridad.

Finalmente, los efectos de dependencia pueden ser ambivalentes. Una dependencia puede reducir opciones y, al mismo tiempo, hacer posibles capacidades que de otro modo no existirían. Cuidado, educación y mutualización de riesgos son ejemplos evidentes. El objetivo no es maximizar independencia, sino distinguir formas de dependencia que aumentan capacidades sin convertir esa contribución en dominación arbitraria.

15 Conclusión

Este artículo ha propuesto un marco para analizar una clase limitada pero teóricamente importante de configuraciones familiares en las que varias capacidades de poder se concentran, convierten y reproducen en el tiempo. Su concepto central, la gramática del poder, designa una estructura de segundo orden que determina cómo diferencias de posición, recursos, competencia atribuida y costos del rechazo se convierten en decisiones, interpretaciones y modificaciones normativas efectivamente operativas. Esta definición permite distinguir capacidad, ejercicio y resultado y evita identificar toda asimetría con dominación.

El marco conecta esta estructura con cuatro grupos de problemas. Primero, confianza: en relaciones asimétricas depende no solo del carácter, sino también de límites al poder, estabilidad normativa, posibilidad de impugnación, verificabilidad, corregibilidad y salida. Segundo, autonomía: se entiende como una estructura multidimensional de capacidades económicas, institucionales, relacionales, epistémicas, de valor y de salida, y cada dimensión se analiza en términos de disponibilidad, control y robustez. Tercero, economía política: mercados, Estado, cuidado, activos, tiempo y competencias lingüísticas influyen en la negociación y reproducción de capacidades. Cuarto, fronteras del valor y roles organizacionales: canales de transferencia e influencia deben evaluarse según autorización, trazabilidad y mandato.

La teoría de la justicia, la filosofía del derecho, la hermenéutica y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lenguaje proporcionan los principales fundamentos normativos e interpretativos. Muestran, respectivamente, por qué distribución y no dominación deben distinguirse, por qué importan estabilidad normativa y procedimiento, por qué la interpretación está históricamente situada y por qué determinadas formas de expresión adquieren mayor eficacia material. El artículo no intenta fusionar estas tradiciones en una teoría única. Las pone en relación alrededor de un problema preciso de conversión.

La conclusión normativa es deliberadamente limitada. El objetivo no es sustituir una dominación por otra, exigir igualdad perfecta de recursos ni abolir dependencia. Consiste en construir condiciones bajo las cuales una persona pueda resistir control no autorizado

y, al mismo tiempo, participar en cooperación que no necesite dominación como principal mecanismo de coordinación. Limitar interfaces, estabilizar reglas, distribuir apoyos y mantener abierta la revisión de interpretaciones son formas de hacer esa cooperación más real.

El marco sigue siendo una propuesta teórica. Su valor dependerá de su capacidad para distinguir configuraciones empíricas, generar observaciones refutables y ser corregido por casos que no encajen. Las propuestas de operacionalización ofrecen una vía para estudios comparativos, longitudinales e institucionales. El propósito final no es añadir vocabulario, sino mejorar la precisión con que pueden describirse las relaciones entre poder, confianza, autonomía, valor y responsabilidad.

Referencias

Agarwal, Bina (1997). "Bargai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 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In: *Feminist Economics* 3.1, pp. 1–51. DOI: 10.1080/135457097338799.

Baier, Annette (1986). "Trust and Antitrust". In: *Ethics* 96.2, pp. 231–260. DOI: 10.1086/292745.

Blood, Robert O. and Donald M. Wolfe (1960). *Husbands &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 Glencoe, IL: Free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 by John B. Thompson. Trans.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merson, Richard M. (1962). "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1, pp. 31–41. DOI: 10.2307/2089716.

Folbre, Nancy (1994). *Who Pays for the Kids? Gender and the Structures of Constraint*. London: Routledge.

Fricker, Miranda (2007).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8237907.001.0001.

Friedman, Marilyn (2003). *Autonomy, Gender,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0195138503.001.0001.

Fuller, Lon L. (1969).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abermas, Jürgen (1996).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ns. by William Reh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esse-Biber, Sharlene and John Williamson (1984). "Resource Theory and Power in Families: Life Cycle Considerations". In: *Family Process* 23.2, pp. 261–278. DOI: 10.1111/j.1545-5300.1984.00261.x.

Komter, Aafke (1989). "Hidden Power in Marriage". In: *Gender & Society* 3.2, pp. 187–216. DOI: 10.1177/089124389003002003.

Mackenzie, Catriona and Natalie Stoljar, eds. (2000). *Relational Autonom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utonomy, Agency, and the Social Sel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oso/9780195123333.001.0001.

Nedelsky, Jennifer (2012). *Law's Relations: A Relational Theory of Self, Autonomy, and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5147964.001.0001.

Nussbaum, Martha C. (2006).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4159/9780674041578.

Okin, Susan Moller (1989). *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Pettit, Philip (1999). *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0198296428.001.0001.

Rawls, John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icoeur, Paul (1992). *Oneself as Another*. Trans. by Kathleen Blam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I: 10.7208/chicago/9780226844541.001.0001.

Sen, Amartya (1990). "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 In: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Women and World Development*. Ed. by Irene Tink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9).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Dennis F. (1993).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29.8, pp. 573–576. DOI: 10.1056/NEJM199308193290812.
Walker, Margaret Urban (2006). *Moral Repair: Reconstructing Moral Relations after Wrongdo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17/CBO9780511618024.
Westlund, Andrea C. (2009). “Rethinking Relational Autonomy”. In: *Hypatia* 24.4, pp. 26–49. DOI: 10.1111/j.1527-2001.2009.01056.x.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OI: 10.2307/j.ctvcm4g4q.

Влас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автономии в семей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доверие, границы ценности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этика

HUANG WANHONG □□ □□□

huangwanhong@serendip.ngo

Аннотация

В статье разрабатывается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 рамка для анализа влас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х структур в семей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исследуется связь автономии, доверия, границ ценности и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х ролей в условиях устойчивой асимметрии власти. Объектом анализа не является фиксированный «тип семьи» или суждение о личности либо клиническом состоянии членов семьи. 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 набор механизмов, различимых в ограниченных реляционных конфигурациях: 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взаимная конверсия и временная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принимать решения,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ог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изменять нормы,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ключевыми ресурсными интерфейсами и издержек выхода. Для повышения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ой точности различаютс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власт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власти, контроль результата и нормативная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Затем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как реля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правил второго порядка, задающая, какие различия в позиции, ресурсах, признанной компетенции и издержках отказа могут быть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ы в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решения, авторитетные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и изменение правил. Поэтому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не тождественна ресурсам, приказам или контролирующему поведению; это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нверсии, связывающая несколько интерфейсов власти.

На этой основе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условная модель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и эпистемической автономии. Надежность отношений связывается с ограничениями власти,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ю правил, оспоримостью, проверяемостью, исправимостью и реалистичн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выхода. Автономия моделируется как многомер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включающ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реляционно-сетевые, эпистемические, ценностно-распорядительные и выходн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 различаются доступность ресурса, фактический контроль и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к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у. Предлагаются два взаимодополняющих пути, прогрессивная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сть и распределенная автономия, позволяющие снизить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точки при сохранении локально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В качеств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оснований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теори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герменев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язык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семьи. Теори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различает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еляционный статус и не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частное нормотворчество, авторизацию,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правил и процедурные границы; герменевтика анализирует реляционную историю, нарратив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вменени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языка объясняет, как легитимное выражение, языковой капитал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 получают 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семьи показывает, как ресурсы, забота, рын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внешние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изменяют внутрисемей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ные позиц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границ ценности различаются обще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дарение, авторизова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 неавторизованные посреднические трансферты, а риск оценивается по знанию, авторизации, отзывности,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ости и подотчетности.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й этик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частных сетей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как пробл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интерфейсами роли. Различаются частное давление, идентифицируемый канал и фактический захват роли; обсуждаются раскрытие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азделение функций, минимальные привилегии, двойной контроль, самоотвод и аудит.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вклад состоит в трех основных пунктах. Во-первых,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из описательной метафоры в концепт конверсии второго порядка, отличимый от ресурсной власти,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ых структур 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и укорененный в теори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философии права, герменевтик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языка. Во-вторых,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довер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автономии и границы ценности связываются как разные срезы одного реляционного механизма. В-третьих, проясняется интерфейс между внутрисемейными структурами власти и целостностью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х ролей при сохранении пограничных случаев заботы, законной авторизации, экстрен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овместной жизни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различий. Формализация служит прозрачности определений, выводов и эмпирической проверки и н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как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 оцененная модель. В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ых разделах предлагаются фальсифицируемы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е положения,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опе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е объяснения и возможные эмпирические дизайн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емей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реляционная автономия;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доверие; теори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герменев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язы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семь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этика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ая записка

Настоящая рукопись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ое и форм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лас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х структур в семей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Ее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й объект — реляционный механизм,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которого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инимать решения,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зменять нормы, интерфейсы ресурсов и условия выхода могут концентрироваться, взаимно преобразовываться и сохраняться во времени. В рукописи разрабатывается понят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власти, с помощью которого связываются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доверие, реляционная автономия, границы ценности и целостность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х роле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ридерживается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и норматив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Оно н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семью как единого актора и не выводит окончательную мораль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ли клинический статус человека из локальной асимметрии власти.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работы сохраняется различие между способностью власт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м власти, контролем результата и нормативной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ю.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и схематически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выполняют проясняющую функцию; их область применимост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и пределы вывода должны оставаться явными.

Форм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я и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 выступают в качестве направляющи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Текст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еляционной автономии, теори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философии права, герменевтик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язык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семьи и вводит новую нотацию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когда унаследованный словарь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точен. Такие термины, как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доверие, распределенная автономия, неса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ный посреднический перенос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интерфейсами роли, получают свое техн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явного определени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областей и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стоящее издание содержит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рукописи в многоязычном формате. Оно отражает несколько раундов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логической и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й переработки, включая уточнение понятий, расширение аргументации н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м языке, добавлени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оснований, унификацию ссылок на уравнения и подготовку версий на шести официальных языках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Эмпирическая калибровка,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случаев и ряд дальнейших формальных расширений остаются задачами будущей работы.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и сохранение прав

Автор поощряет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е обсуждение, критику,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материалов данной работы.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й лицензии пользователям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учитывать предсказуемые риски и возможный вред при адаптации или применении предложенной рамки. Эта этическая просьба не изменяет разрешений и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закрепленных в лицензии.

Автор сохраняет права,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ые лицензией CC BY-NC 4.0, и мож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средства правовой защиты, доступные в случае нарушения лицензии или иных применимых прав. Повтор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не означает одобрен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автора. Права третьих лиц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требуют разрешени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правообладателей. Законные исключения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продолжают полностью действовать.

Уведомления

Статус. Данный рабочий вариант содержит текущий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рукописи о семейной власти, автономии, доверии, границах ценности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й этике. Настоящее издание также включает многоязычные версии,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е на шести официальных языках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В ходе ревизии были проверены понятийные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непрерывность аргументации, ссылки на уравнения, перекрестные ссылки, верстка и согласованность между языковыми версиями. Рукопись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запиской: эмпирическая проверка и ряд открытых формальных 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х расширений остаются предметом будущей работы.

Лицензия. Если не указано иное, copyright © 2026 Wanhong Huang. Работ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тся по лицензии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CC BY-NC 4.0) на условиях данной лицензии.

Заявление об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языковых моделей. В ход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обсуждений и подготовки статьи использовался ChatGPT компании OpenAI. ChatGPT поддерживал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диалог, многоязычное оформление, помощь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текста, форматирование в LaTeX и техническую проверку. Автор выбрал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определил и утвердил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и эпистемический статус утверждений и несет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рукопись, включая ее определения, формальны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аргументы, выводы, переводы и ошибки. Авторство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за человеком-автором.

1 Введение

Семья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являетс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 близости, заботы,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ресурсо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норматив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и измерения тесно переплетены, семейную власть трудно описать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моделью приказа и подчинения. Многие действия с решающим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и не имеют формы явного принуждения. Они проявляются в вопросах о том, кто вправе определять проблему, чь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включается в общие правила, кто контролирует счета и документы, к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емью перед внешними институтами и кто несет издержки отказа или выхода. Такая власть имеет 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и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ые основания. Она может исходить из юридически ил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 признанных полномочий, но также из устойчивых обычаев, отношений заботы, языковых компетенций и 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Поэтому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статьи не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существует ли власть в семье вообще. Вопрос более узок и структурен. Если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инимать решения,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зменять нормы, контроль ключевых ресурсов и издержки выхода устойчиво концентрируются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реляционных позициях,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эти различия превращаются в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действенные решени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и правила? Как такая конверсия влияет на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доверие, эпистемическую автономию,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ценностью и фидуциарную целостность, когда человек занимает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ую роль? Эту конверсионную прослойку статья называет **грамматикой власти**. Термин «грамматика» не означает языковой синтаксис и не превращает любую коммуникационную проблему в проблему власти. Он обозначает структуру действенности второго порядка внутри отношений, определяющую, какие виды оснований признаются эффективными, какие формы отказа способ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действие и какие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входят в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правила.

Проблема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пересечени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зрелы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традиций. Социология семьи и теория власть-зависимость давно изучают связи между ресурсам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ми и позициями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Blood and Wolfe 1960; Emerson 1962; Hesse-Biber and Williamson 1984; Komter 1989). Теории реляционной автономии подчеркивают, что автономия не является внутренним свойством изолированного индивида, а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ся или подрывается социальными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ми условиями и структурами признания (Mackenzie and Stoljar 2000; Friedman 2003; Westlund 2009; Nedelsky 2012).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семьи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семья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является единицей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м полем, где интересы, забота, время и активы могут распределяться асимметрично (Sen 1990; Agarwal 1997; Folbre 1994). Эти традиции необходимы, но част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 ресурсы, нормы,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ли автономию раздельно. Здесь исследуется именно конверсия между уровнями.

Вторая лакуна связана с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ей и языком. Семейные споры редко касаются только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 измеримых ресурсов. Они затрагивают смысл поступка, квалификацию поведения как заботы, долга, не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 лояльности или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 а также вопрос о том, чья версия событий становится основанием будущих правил. Герменевтика показывает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обусловленность понимания и роль нарратива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gadamer2004**; Ricoeur 1992).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языка добавляет, что языков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форм выражения распределены неравномерно и могут конвертироваться в социальные ресурсы (**irvinegal2000**; **heller2010**; Bourdieu 1991). Член семьи, владеющий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м, юридическим или финансовым языком и каналами внешн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может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особый властный интерфейс, не сводимый к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Третья лакуна лежит между частными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ми роля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емьи часто заканчиваются у порога дома, тогда как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этик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конфликт интересов и целостность роли как внутренние вопросы института. Однако частная сеть может пересечь эту границу, если обладатель доверенной роли подвергается семейному давлению, получает просьбы о ресурсах ил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е. Задача состоит не в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и, что всякая частная связь компрометирует роль, а в выявлении условий, при которых частна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онвертируется в доступ к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м ресурсам, информации, суждению ил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ким полномочиям.

Статья преследует четыре цели. Первая,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 различить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результат и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и определить грамматику власти как механизм конверсии второго порядка. Вторая, нормативная: связать эту структуру с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ю, не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м, реляционной автономией, законностью и процедурой, не объявляя всякую асимметрию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й. Третья,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ая: показать влияние структуры на доверие, автономию, границы ценности и целостность роли во времени. Четвертая,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редложить формализацию, достаточно точную для выявления предпосылок и связей, сохраняя различие между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ой моделью и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й оценкой.

Метод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конфигураций. Он не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эмпирическую частоту механизмов и не диагностирует конкретные семьи. Формализмы служат инструментами уточнения: показывают, какие объекты следует различать, каки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предполагаются и каки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могли бы опровергнуть положения. Сохраняются важные пограничные случаи, включая заботу, экстренно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дительску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доброволь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ресурсов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может бы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й и законной; вопрос в том, как она авторизуется,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ся, оспаривается, пере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и соотносится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ой автономии.

Структура стать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этому ходу рассуждения. Разделы 2–4 определяют

объект и нормативные, правовые, герменевтические и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ания. Разделы 5–6 вводят формальные примитивы и грамматику власти. Разделы 7–10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 доверие, автономию, семейн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экономию и границы ценности. Раздел 11 анализирует выход частных сетей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 роли. Раздел 12 посвящен реляционной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Разделы 13–14 формулируют проверяем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и пределы применимости. Заключение объединяет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рамки.

2 Объект анализа, единица анализа 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задача

Единицей анализа является **ограниченная реляционная конфигурация**. Она может включать двух и более лиц, но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идентифицируемым набором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й, правил, ресурсных интерфейсов и релевантной истории. Такой выбор предотвращает превращение наблюдений о некотор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в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всей семьи. Человек может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о влас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е, не одобряя ее; он может изучать ее правила, чтобы выжить,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или защищать границы, не принимая ее как нормативный идеал.

Влас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означает конфигурацию, в которой несколько властных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устойчиво концентрируются и эта 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повторно влияет на обработку конфликта. «Ориентация» обозначает структурную тенденцию, а не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ую сущность. Единичная асиммет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е разделение труда или экстр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 Необходимо исследовать повторяемость,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онверсии одн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 другую,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е между сферами жизни и временное 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различает четыре уровн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власти** есть потенциальн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зменить действи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правила, ресурсы или условия выхода другого.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власти** есть конкрет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эт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онтроль результата** относится к степени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результата действию или предпочтению актора.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есть нормативная оценка источника, процедуры,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Уровни могут расходитьс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может не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с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может не достигать результата, результат может возникать без обще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а легитимное полномочие может быть узко ограничено.

Это разделение предотвращает две ошибки: вывод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из простого различия ресурсов и вывод намерения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из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го результата. В семейной жизни результаты часто порождаются совместно материальным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ми, привычками, обязанностями заботы, культурными ожиданиями, юридическими рамками и добровольным выбором. Поэтому перед нормативным выводом необходимо указать предполагаемый причинный путь.

Структура также имеет временное измерение. Отдельный эпизод может быть морально серьезным, не образуя долговреме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напротив, множество малых действий способно накопиться в устойчивую асимметрию. Анализ должен прослеживать траектории: кто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олучает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документами, счетами, внешними связями или критериям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как эти позиции усиливаются; как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уществуют для их пересмотра.

Класс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емей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и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дают отправную точку. Blood и Wolfe связывали власть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с ресурсами супругов (Blood and Wolfe 1960); Emerson формулировал власть одного актора через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другого (Emerson 1962). Позднейшие работы показали, что власт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могут оставаться скрытыми, когда нормы и рутины делают решения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и или невидимыми (Komter 1989). Настоящая работа сохраняет значение ресурсов и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но добавляет вопрос конверсии: как ресурсное различие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ый авторит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менять нормы или повышать цену отказа?

Таблица 1 фиксирует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е границы, от которых зависят последующие формализации.

3 Основания в теори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и философии права

Нормативная рамка статьи не выводится из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теори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и не отождествляет семью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з нескольких традиций выделяются измерени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относящиеся к исследуемым механизмам: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ресурсов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реальн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реляционный статус, свобода от произвольного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ь правил, процедурное оспаривание и влияние права на част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Это позволяет избежать как редукции семейно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к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ю, так и превращения интимной жизни в полностью юридизированный спор.

3.1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реля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теори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часто исследуют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базовых прав,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доходов и выго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Rawls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оценке подлежит не только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ая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ьность, но и основны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условия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Rawls 1999). Для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и важно не считать семью всей «базов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а признать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автономной жизни от долговременных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условий. Жилье,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забота и семейное разделение труда изменяют будущ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этому 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нельзя оценивать только по текущему равенству потребления.

Критика Okin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исключение семьи из внутренней оценк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позволяет разделению труда и гендерным асимметриям перестраивать

Table 1: Ключевые понятия, уровни анализа и исключаемые смешения

Понятие	Рабочее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Что не следует смешивать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власт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а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зменять действи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правила, ресурсы или условия выхода другого	Не тождественна фактическому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успешному результату или законной авторизации
Влас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Направленная 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нескольких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во времени и между сферами, устойчиво формирующая обработку конфликтов	Не тождественна любой асимметрии, единичному приказу или типу семьи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Реляционные правила второго порядка, определяющие, какие позицион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и основания превращаются в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решени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и изменение норм	Не тождественна стилю речи, отдельному ресурсу или конкретному контролирующему действию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доверие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в котором границы власти, правила, факты, несогласие и условия выхода обладают минимальной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ю	Не тождественно общему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му суждению о характере другого
Реляционная автономия	Многомерна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формировать, выражать и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суждения о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базовой жизни внутр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е тождественна изоляции, 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ости или отсутствию всякого влияния
Граница ценности	Структура знания, авторизации, отзыва,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ости и подотчетности, управляющая потоками ценности	Не является запретом на совмест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дарение или общую жизнь
Целостность роли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и котором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 ресурсы, суждение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кая власть остаются в пределах мандата роли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наличие част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амо по себе образует конфликт интересов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положение в публичной жизни (Okin 1989). Эта идея обобщается: долговременное семей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меняющее активы, время,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й капитал,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знание и условия выхода, может производить последующие различия публичны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Семья выступает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м место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Одной распределитель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Young у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власть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культурное выражени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деление труда имеют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нормативное значение (Young 1990). Даже при схожем денежном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и отношения могут оставаться крайне асимметричными, если только один участник определяет проблему, процедуру,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ю поведения и критерии «разумности». Поэтому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должна спрашивать не только о том, кто что получает, но и о том, кто участвует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решения и правил.

Подход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смещает объект оценки к реально достижимым формам жизни и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ой свободе. Sen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фактическ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а Nussbaum связывает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с центральными способностями и уделяет внимани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неравных субъектов (Sen 2009; Nussbaum 2006). Отсюда различие между доступностью ресурса, фактическим контролем и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ю к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у. Формальное право, счет или доход расширяют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ействий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когда субъект реально может ими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и не теряет их при конфликте.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поэтому не является единым показателем.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реляционный статус и структура решений могут совпадать или конфликтовать. Устройство может увеличивать совокупное благополучие и уменьшать долговременн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одного участника; формально уважать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возлагать скрытые издержки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быть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равным по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ю и оставаться асимметричным по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и нормотворчеству.

3.2 Не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реляционная автономия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власти

Норматив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статьи близко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й идее не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Pettit определяет свободу как отсутствие произвольно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 а не только как отсутствие фактическог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Pettit 1999). Член семьи может длительное время не блокировать действия другого, но если способен без эффективны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менять жилье, счет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ли базовые правила, другой все равно вынужден 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ся на предполагаемое разрешение. Вопрос состоит не только в частоте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но и в ограниченности сам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мешиваться.

Отсюда следует, что рост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е тождествен росту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ый доход, правовые знания, внешние сет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ыхода усиливают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слабой стороны сопротивляться, но не дают ей права произвольн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других. Поэтому различаются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защищать границы** и **доминирующи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Первые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минимальны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ешения, отказа и проверки; вторы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ют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 одного актора на другие сферы жизни другого. Цель автономии состоит в укреплении первых без 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торых.

Теории реляционной автономии уточняют социальное основание этого различия. Mackenzie и Stoljar помещают автономию в соци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развитие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Mackenzie and Stoljar 2000); Friedman показывает совместимость интимности и автономии (Friedman 2003); Westlund акцентирует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отвечать на норматив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и требовать оснований (Westlund 2009); Nedelsky предлагает реляцион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права и автономии (Nedelsky 2012). Автономия не требует выхода из отношений, но требует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для рефлексии,

выражения, пересмотра, отказа 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Забота также не является исключением из автономии. Она может расширять реальн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получателя и придавать смысл заботящемуся. Проблема возникает, когда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заботы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ую решающую компетенцию или когда вклад заботящегося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исключается из общих решений. Далее ресурсные интерфейсы и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позволяют различить зависимость, расширяющую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и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поддерживающую произвольный контроль.

3.3 Законность,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правил и процедурное основание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добавляет вопрос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и нормативного порядка. Fuller выделяет публичность, согласованность, исполнимость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объявленных правил их применению (Fuller 1969). Эти требования относят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к правовому порядку и не должны механически переноситься на семью. Однако общий принцип полезен: правило не может разумно направлять действие, если оно неизвестно, ретроактивно меняется,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 или постоянно корректируется одной стороной после получения результат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не означает неподвижность. Семейные правила должны меняться с жизненными стадиями, здоровьем, доходами и заботой. Вопрос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наличии понятных причин, времени на адаптацию,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спаривания и неприменении разных стандартов задним числом. Если человек каждый раз выполняет заявленное условие и затем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 новый критерий, возникает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 которую нельзя устранить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м послушанием.

Процедурные теории 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добавляют участие затронутых лиц в обосновании норм. Habermas связывает нормативную валидность с процедурами аргументации (Habermas 1996). Семья не является миниатюрным парламентом, и некоторые решения требуют скорости или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чем шире, долговременнее и необратимее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тем сильнее основание требовать понятных причин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спаривания.

Полномочие следует 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по четырем измерениям: **источник**, **объем**, **процедура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Законный источник не оправдывает превышение объема; правильный объем не гарантирует надлежащую процедуру; процедурная корректность не исключает не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ых последствий.

3.4 Частное нормотворчество, семейное право и переговорная позиция

Семей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отекают в «частной» сфере, но эта сфера юридически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а. Mnookin и Kornhauser показали, что семейные стороны ведут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тени права»: частные варианты зависят от фоновых прав,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mnookinkornhauser1979**).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семейный статус, родительск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следование, социальная защита, налогообложение и доступ к средствам защиты формируют переговорные позиции даже без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раво распределяет формы признания 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В реляцион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Nedelsky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право производит отно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могут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или подрывать автономию (Nedelsky 2012).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егистрация счета, жилья или контракта на имя одного лица влияет на доступ, доказуемость и выход даже тогда, когда семья называет ресурс «общим».

Частное нормотворчество выступает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м механизмом между формальным правом и семейными нормами. Участники создают неформальные правила денег, домашних задач, ухода, конфиденциальност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а. Они могут быть кооперативными и эффективными, но становятся проблемными, когда издержк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ересмотра и доступ устойчиво распределены в одну сторону. Анализ должен сопоставлять внутренние правила с внешними правами, а не подменять одно другим.

Формальное право также не гарантирует фактическ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 может иметь юридический титул и не уметь им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из-за отсутствия информации, языка, денег, времени ил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азличие доступности, контроля и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дале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именно этот разрыв.

3.5 Нормативный мост между властн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и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ю

Влас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ама по себе не доказывает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имметрии служат законным функциям: защите ребенк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у временно недееспособного лица, чрезвычай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общему бюджету или специализирован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Нужен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нормативный мост**, связывающий наблюдаемую асимметрию с критериями оправдания.

Он включает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пять вопросов. Имеет ли асимметрия идентифицируемый источник авторизац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или согласия?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ен ли ее объем функции? Имеют ли затронутые лица разумный доступ к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основаниям? Существуют ли адекватные механизмы оспаривания, пересмотра или отзыва? Разрушает ли асимметрия сами условия, которые позволили бы обсуждать ее или выйти из нее позднее? Чем больше одновременных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х ответов, тем ближе структура к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ю или неоправданному ограничению автономии.

4 Герменев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ани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языка

Теория семейной власти неполна, если конфликт понимается только как выбор между материальным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ми. Отношения организуются значениями:

кто вправе назвать поведение, какие истории объясняют долг, какой словарь делает требование понятным и какой язык открывает внешние институты. Герменевтика объясняет историчность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и нарративную конструкци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языка исследует неравное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ыражать, переводить и получать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4.1 Историчность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и реляционный горизонт

Gadamer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что понимание никогда не начинается с полностью нейтральной точки. Оно сформировано традициями, ожиданиями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и горизонтами (**gadamer2004**). В семье это особенно заметно: настояще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нтерпретируется через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опыта, поколенческие роли, ожидания взаимно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о прошлых жертвах. Два человека могут придавать одному действию разные значения без простого фактического заблуждения.

Это не означает равенства всех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й. Следует различать событие,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ую рамку и норматив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Ты отказал в просьбе»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твой отказ доказывает нелояльность». Второ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добавляет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ю, которая может оправдать санкцию, новое правило или ограничение ресурса.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ая власть возникает, когд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лица устойчиво превращают такие толкования из спорных чтений в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отношений.

Реляционный горизонт динамичен. Настоящие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перестраивают память прошлого, а отобранное прошлое делает некоторые будущие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более вероятными. Если несогласие регулярно читается как нелояльность, прошлые эпизоды несогласия становятся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м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м». Проблема касается накопительного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ого досье, меняюще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ействия.

4.2 Нарратив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менение 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ересмотра

Ricoeur связывает лич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 наррацией и вменением действия агенту (Ricoeur 1992). Семей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часто формулируются как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о длите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ты всегда был таким», «в нашей семье всегда делают так», «после всего, что мы для тебя сделали». Такие фразы организуют прошлое в рассказ и задают будущие ожидания.

Нарратив имеет законную функцию: он делает понятными длительные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и позволяет признать вклад, не сводимый к отдельной сделке. Но он может и фиксировать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Если человек не может оспорить рассказ, определяющий его характер, долг или мест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самоизменения сужается. Эпистемическая автономия требует не отсутствия истории, а участия в ее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редлагать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е описани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также требует различать то, что было под контролем агента,

доступ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и реалистичные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может искажать вменение, возлагая на человек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структуры, которую он не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л, или называя «свободным выбором» вариант с запретительной ценой выхода.

4.3 Язык,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и рынки 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Bourdieu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зависит не только от языка, но и от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зиции говорящего, институтов признания и рынка, гд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принимается (Bourdieu 1991). В семье один участник может владеть юридическим, финансовым,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м ил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м регистром, который легче признают банки, школы, больницы, работодатели 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Такой **языковой капитал** может стать ресурсным интерфейсом.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читать договор, заполнять форму, объяснять ситуацию институту или переводить между языками создает посредническую позицию. Она может кооперативно расширять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сей семьи. Но она становится точк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если другие не могут проверить информацию, напрямую обратиться в институт или оспорить перевод. Нормативный вопрос касается не самой компетенции, а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доступа вокруг нее.

Irvine и Gal показывают связь языковых идеологий с социальными категориям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структурами (**irvinegal2000**). Некоторые формы речи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ся как более рациональные, образованные или авторитетные. В семейном споре содержани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может исчезнуть из-за формы его выражения.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равн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говорить не равна равному участию. Необходимо исследова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быть понятым, переведенным,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ным и признан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релевант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4.4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языка,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 и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труд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языка связывает языковые компетенции с рынками труда, институтами, режимами мобильност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иерархиями (**heller2010**). В многоязычных или мигрантских семьях перевод способен определять доступ к работе, жилью, социальным выплатам,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ю, кредиту и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му статусу.

Перевод и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е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являются трудом. Чтение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ии, ведение счетов, заполнение форм,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стреч, управление цифровыми 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ами, хране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с институтами создают повседневную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Этот труд может быть тяжелым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оздавать зависимость. Тот, кто выполняет его, может стать единственным шлюзом к правам и ресурсам.

Следует различать **полезное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и **монополию интерфейса**. В первом случае компетентное лицо облегчает доступ, сохраняя проверку, передачу знаний 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Во втором информация и доступ концентрируются так, что другой не может проверить, научиться или заменить посредника без не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ых издержек.

4.5 Нормы, именование и 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грамматики власти

Категории, которыми описываютс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огут изменять сами отношения. Назвать поведение «заботой», «без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не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ю», «долгом» или «опасностью» означ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описать факт. Такое именование может открыть или закрыть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правдать трансферт, активировать обязанность или перераспределить бремя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исследует условия, при которых этот переход становится устойчивым. Разова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структуры, в которой одни категории всегда имеют больший вес, когда исходят из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позиции. Цель не в устранении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ых различий, а в обеспечении проверяемости, контрнарративов, участия третьих лиц и пересмотра.

5 Формальные примитивы власт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и реляцион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Здесь вводится минимальный формальный язык, позволяющий разложить выражения вроде «кто сильнее» или «кто кого контролирует» на различимые переменные и указать объекты их действия. Не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ся, что пять измерений измеримы на общей шкале или сводимы к одному скалярному показателю «общей власти».

5.1 Реляцио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сферы и множества осуществимых действий

Пусть множество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емей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mathcal{I} = \{1, \ldots, n\}$, а множество сфер $\mathcal{D}$ включает, например, жилье, финансы, профессию,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здоровье, социальные связи, информацию и заботу. История отношений $h_t \in \mathcal{H}$ включает прежние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изменения правил,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ресурсов, обработку конфликтов и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третьих лиц.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осуществимое множество действий участника i во время t в сфере d при истории h_t задается уравнением 1.

$$\mathcal{A}_i(t, d \mid h_t) \tag{1}$$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осуществимость сильнее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или логическ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ариант может формально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но быть трудно реализуемым из-з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здержек, отсутствия информации,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анкций, статусн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ли риска выхода. Поэтому анализ должен учитывать как наличие варианта, так и переносимость его цены.

Это отличает рамку от подходов, основанных только на формальных правах. Человек может юридически иметь право заключить договор, уйти из жилья, открыть счет или обратиться за помощью, но 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я дохода, документов, транспорта,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поддержки делает такие права трудно конвертируемыми в действие. Напротив, друзья,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сети, независимые цифровые учетные записи и процедурное знание могут существенно расширять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ействий без отдельного правового статуса.

Если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j изменяет множество действий i,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задается уравнением 2.

$$\mathcal{A}_i'(t, d \mid h_t) = \Phi_{j \to i}^{d,t}(\mathcal{A}_i(t, d \mid h_t), h_t) \tag{2}$$

$\Phi_{j \to i}^{d,t}$ зависит от отношений и контекста. Она может сокращать варианты, повышать издержки, менять доступ к информации или расширя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этому сама по себ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не определяет норматив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5.2 Пять интерфейсов власти

Реляционный профиль властных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представлен уравнением 3.

$$\mathbf{P}_{j|i}^{d}(t) = \left(D_{j|i}^{d}, I_{j|i}^{d}, N_{j|i}^{d}, R_{j|i}^{d}, X_{j|i}^{d}\right)_t \tag{3}$$

D обозначает **интерфейс решени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менять действия или результаты; I означает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ый интерфейс**,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стабилизировать именование событий, ролей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N есть **интерфейс изменения норм**,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менять критерии оценки, услови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и процедуры; R есть **ресурсный интерфейс**, контроль денег, жиль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информации, сетей и иных ключевых ресурсов; X есть **интерфейс выхода**,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овышать издержки отказа, паузы, отделения или обращения за внешней помощью.

Уравнение 3 задает координаты, а не единый индекс. Измерения могут иметь разные типы данных, поэтому необоснованные суммы вроде $D + I + N + R + X$ не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Интерфейсы взаимозависимы: контроль жилья или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пособен усилить X;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может усиливать N; повтор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D может стать ожидаемой конвенцией. Властная ориентация касается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сцепления интерфейсов.

Законное основание каждого интерфейса может быть разным. Решающее полномочие может вытекать из опеки или совместной авторизации,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из экспертизы, а ресурсный контроль из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ли довер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Ни одно такое основание само по себе не дает прав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 контроль на несвязанные сферы жизни.

5.3 Обновление норм и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Пусть $\mathcal{N}_t$ есть множество реляционных норм, ω_t событие, а $\chi_{i,t}$ веса влияния участников при обновлении норм. Тогда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уравнение 4.

$$\mathcal{N}_{t+1} = \Psi(\mathcal{N}_t, \omega_t, \{\chi_{i,t}\}_{i \in \mathcal{I}}) \tag{4}$$

Если одна позиция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меняет критерии завершения, квалификации ил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сле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ного результата, а другие не могут спорить, фиксировать или выходить,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правил падает. Проблема не в самой изменяемости норм. Семейные правила должны адаптироваться; важно наличие оснований, процедур,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оспаривания и предсказуемых границ.

Правовая аналогия здесь ограничена, но полезна. Речь не о кодификации частной жизни, а о минималь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ности, известности и оспоримости правил, затрагивающих базовые жизн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Когда стандарты можно менять только одной стороне после получения результата, другая сторона не способна планировать поведение, ориентируясь на прежнее правило.

Отнесение события к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ой категории задается уравнением 5.

$$\mathcal{L}_{j,t} : \omega_t \longmapsto \ell_t \tag{5}$$

ℓ_t может означать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эгоистичный», «незрелый», «нелояльный» или «разумная забота».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ое полномочие становится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переменной, когда такие категории устойчиво меняют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правила, ресурсы или оценки третьих лиц. Одиночного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5.4 Условия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влас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Предлагаются пять совместных индикаторов: **повторяемость**,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конвертируемость**, **межсферное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екурсивность**. Повторяемость требует нескольких событий;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означает концентрацию центральных интерфейсов в одной позиции; конвертируемость означает устойчивое превращение ресурсов или статуса в решения и нормы; межсферность означает переход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например из финансов в профессию или социальную жизнь; рекурсивность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сегодняшне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изменяет завтрашние правила и ресурсы.

Эти признаки описывают структурную интенсивность, а не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 моральную неправомерность. Законная опека, общее финансов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забота и экстренно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могут временно 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ть часть признаков, оставаясь оправданными при надлежащей авторизации и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6 Конверс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второго порядка грамматики власти

Предыдущие интерфейсы описывают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о не объясняют,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различие получает практическую силу.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есть набор реляционных правил второго порядка, превращающих различия позиции, ресурсов, признанной компетенции и цены отказа в решающие,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ые и нормативные эффекты.

6.1 От ресурса к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Пусть q есть требование или основание, p позиция говорящего, r релевантные ресурсы, c издержки отказа, а h_t история. Конверси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уравнением 6.

$$\mathcal{G}_t : (q, p, r, c, h_t) \longmapsto \big(e_D, e_I, e_N\big)_t \tag{6}$$

e_D, e_I, e_N обозначают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в решении,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и изменении норм. Они не предполагаются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 соизмеримыми. Один и тот же пропозициональный смысл может иметь раз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позиции, ресурсов, цены отказа и истории.

Так различаются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ая обоснованность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сила основания. Хорошо обоснованное требование может иметь слабый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эффект, если его автор не имеет каналов исполнения и один несет цену отказа. Плохо обоснованное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может немедленно менять правило, если исходит из позиции, контролирующей критические ресурсы.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не определяет истинность или моральность основания; она описывает конверсию позиции в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Концепт не заменяет ресурсную теорию или многомерные теории власти. Он занимает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й уровень и спрашивает, как ресурсы,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нормы, записи и издержки выхода связывают разные измерения в конкретной конфигурации. Герменевтик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языка уточняют этот переход: языковая компетентность не должна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 становиться решающим полномочием, однако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 признанный язык может увеличивать фактическую силу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Поэтому различаются **языкова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и **властна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 ясное и истинно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может ничего не изменить без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оступа; краткий приказ может иметь огромный эффект при контроле счета или документа. Bourdieu объясняет неравен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й силы речи (Bourdieu 1991), а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исследует ее устойчивую конверсию в решения, нормы и издержки выход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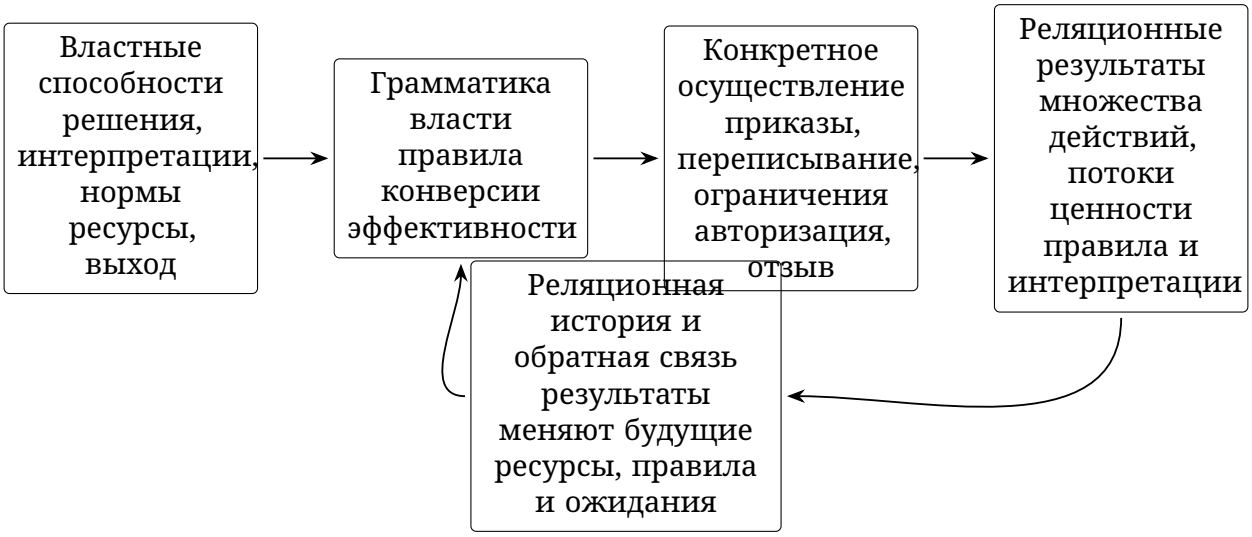

Figure 1: Различение властных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власт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и реляцион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6.2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фиксация и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траектории

История h_t изменяет восприятие настоящих требований. Если отказ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дорого стоил, участники адаптируют поведение еще до нового события. Если правила меняются после результата, «соблюдени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й целью. Обновл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задается уравнением 7.

$$\mathcal{G}_{t+1} = \Xi(\mathcal{G}_t, \omega_t, \mathbf{P}_t, \mathcal{N}_t) \tag{7}$$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фиксация возникает, когда прежни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власти повышают приемлемость, исполнимость или низкую стоимость сходных будущих действий. Это может происходить через поведенческое обучени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ую седиментацию временных механизмов 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ую фиксацию ролей. Децентрация власти, напротив, требует повторяемых новых опытов: ясной авторизации, успешного несогласия, стабильных правил, внешней поддержки и исправимых ошибок.

Рисунок 1 не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прямую переходить от наличия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 выводу о контроле и от результата к выводу об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й причин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одного участника.

6.3 Пограничные случаи и контрпримеры

Таблица 2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главный вопрос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ограниченности власти авторизацией, основаниями, процедурой,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остью и условиями выхода. Законн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полномочия не исключает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рейфа.

Table 2: Пограничные случаи асимметрич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различающие переменные

Ситуация	Возможное законное основание асимметрии	Что еще требуется исследовать
Забота о ребенке и опека	Возраст, защитные обязанности, различия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юридическ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развитию; сохранение выражения, пересмотра и растущей автономии
Болезнь или экстренно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Дефицит времени, временны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Объем авторизац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длительность, последующее объяснение и прекращение
Совместное финансов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я издержек,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я, общие цели	Видимость информации, взаимная авторизация, отзыв и минимальна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ая сфера
Высокозависимая забота	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ресурсов заботы и экспертизы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контроля на несвязанные сферы; внешняя поддержка и жалобы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семейные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Общая жизнь, межпоколенческие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общие нормы	Оспоримость,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издержек выхода и минимальный уровень автономии

7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доверие,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ь и эпистемическая автономия

Доверие часто по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установка или суждение о характере. В асимметрич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этог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доверять означает подвергать себя будущим действиям другого. Если другой может менять правила,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критические ресурсы или делать выход дорогим, ошибка доверия имеет повышенную цену. Поэтому различаются личное и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доверие**.

7.1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основа надежности

Минимальная база задается уравнением 8.

$$\mathbf{T}_i(t) = \big(L_i, S_i, Q_i, V_i, C_i, E_i\big)_t \tag{8}$$

L означает границы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S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ключевых правил, Q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спаривания, V проверяемость фактов и обещаний, C исправимость и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E реалистичн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тказа, паузы или выхода без немедленной утраты базовых условий жизни.

Это не психометрическая формула доверия, а набор условий, уменьшающих произвольную уязвимость. Человек может сомневаться в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другого, но знать, что никто не может единолично опустошить общий счет, переписать правило задним числом или лишить доступа к документам. Такая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ь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даже д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лич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Исправимость особенно важна. Если всякая ошибка трактуется как злой умысел,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требует полной моральной переквалификации личности. Когда же система различает ошибку, небрежность и зло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сохраняет записи и допускает исправлени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возможным постепенное морально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Baier 1986; Walker 2006).

7.2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риска и бремя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Доверие распределяет риск. При асимметрии ошибка слабой стороны может стоить жилья, ресурсов или репутации, тогда как ошибка сильной стороны легко обратима. Требование «равного доверия» способно тем самым означать неравное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риска.

Бремя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также зависит от контроля информации. Тот, кто контролирует документы, счета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каналы, легче производит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Возложить полно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на менее информированную сторону означает превратить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ую асимметрию в процедур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Более надеж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распределяет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по фактическому контролю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общие проверяемые записи.

7.3 Эпистемическая автономия и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ая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Эпистемическая автономия означает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описывать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опыт, сохранять записи, сравнивать объяснения, искать внешнюю верификацию и пересматривать суждение без разрешения другого на саму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ю. Она не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непогрешимости, а требует доступа к множественным источникам коррекции.

Это связано с эпистемической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ю у Fricker (Fricker 2007).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 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может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придаваться меньшая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ь; ему может не хватать понятий для описания опыта. Семейная роль усиливает этот эффект: участник, уже названный «незрелым», может обнаружить, что само возражение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как ново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незрелости. Независимый доступ к документам,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м советам, третьим лицам и переводу становится условием эпистемической автономии.

7.4 Постепенно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доверия из опыта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неоднократным изменением правил доверие нельзя разумно требова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исходной точки. Более надежная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 власть, стабилизирует правила, накапливает безопасны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лишь затем формирует эмпирическое доверие. Это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выражено уравнением 9.

$$\Delta L > 0, \quad \Delta S > 0, \quad \Delta Q > 0, \quad \Delta V > 0, \quad \Delta C > 0, \quad \Delta E > 0 \Longrightarrow \Pr(\text{доверие, основанное на опыте}) \uparrow \tag{9}$$

Уравнение 9 задает услов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а не детерминистский закон. Улучшение структуры не гарантирует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имирения, но уменьшает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основания осторожности и делает новы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нформативными.

8 Многомер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автономии

Автономия не означает отсутств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или абсолютну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Автономный человек зависит от институтов, близких, рынков и систем заботы. Вопрос в наличии достаточной комбинации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позволяющей формировать, выражать и реализовывать суждение о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ен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так, чтобы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точка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не могла обнулить все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8.1 Шесть измерений автономии

Вектор автономии задан уравнением 10.

$$\mathbf{A}_i(t) = \left(A_i^{\text{econ}}, A_i^{\text{inst}}, A_i^{\text{rel}}, A_i^{\text{epist}}, A_i^{\text{value}}, A_i^{\text{exit}}\right)_t \tag{10}$$

Измерения относятся 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сетевой, эпистемической, ценностно-распорядительной автономии и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ыхода. Они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ы, но не взаимозаменяемы. Доход не гарантирует доступа к документам; правовой статус не гарантирует жилья; широкая сеть может быть бесполезной, если все ее связи контролируются одним посредником.

8.2 Доступность, контроль и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Для каждого ресурса или способности k различаются три слоя согласно уравнению 11.

$$A_{i,k}(t) = \left(\text{Avail}_{i,k}, \text{Ctrl}_{i,k}, \text{Rob}_{i,k}\right)_t \tag{11}$$

Avail означает формальную или материальную доступность, Ctrl фактический контроль, Rob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к конфликту,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у и изменению отношений. Номина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ий счет без пароля или право бе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е образуют полноценной автономии. Особенно важно, остается ли ресурс доступным именно в момент разногласия.

8.3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жизненный порядок и реляционные границы

Пусть O_i обозначает жизненный порядок, который субъект способен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а O_F набор устроений, которые семей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может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ре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Высокая уязвимость возникает при полном поглощени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ом уравнением 12.

$$O_i \subseteq O_F \tag{12}$$

Цель не в полном отделении O_i, а в сохранении таких границ, при которых ключе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решения, внешние сет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и средства защиты не могут исчезнуть по единственному семейному решени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дистанция иногда помогает, но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интерфейсов важнее расстояния.

8.4 Прогрессивная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сть и расширени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Немедленное приняти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х, необратимых или фидуциарных ролей при еще нестабильной автономии может увеличить риск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частной власти. Полное исключение из соци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напротив, усиливает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й путь выражен уравнением 13.

$$\Delta A_t > 0, \quad \Delta C_t > 0 \Longrightarrow \text{осторожное расширение } T_t \tag{13}$$

C_t означает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сть роли, включая изоляцию интерфейсов, наблюдение аномалий, остановку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ость решений и ограничен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й; T_t означает объем доверен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Это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принцип, а не требование «доказать» автономию семь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должны иметь критерии пересмотра и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иначе временная защита сам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патернализмом.

8.5 Распределенная автономия и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одной точки

Множество поддержек задается уравнением 14.

$$\mathcal{S}_i = \{s_{i1}, s_{i2}, \ldots, s_{im}\} \tag{14}$$

При нормированных весах зависимости w_{ik} 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уравнением 15.

$$H_i = \sum_{k=1}^{m} w_{ik}^2, \qquad \sum_{k=1}^{m} w_{ik} = 1 \tag{15}$$

Высокое H_i означает концентрированную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днако число узлов само по себе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если они зависят от одного источника, их отказы коррелированы. Распределенная автономия требует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нообразия и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корреляции сбоев.

Комбинированный принцип дан уравнением 16.

$$\text{распределенная зависимость } + \text{ локализованн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tag{16}$$

Опоры могут быть множественными, но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конкретный договор, трансферт или решение должна оставаться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ой.

9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семьи: зависимость, социальное 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и переговорная позиция

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основания власти включают доход, активы, жилье, время заботы,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труда, социальное страхование и публичные услуг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их не как внешний фон, а как часть власт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9.1 Семья как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единиц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конфликта

Семьи создают реальные общие интересы через совместное жилье, заботу, страхование рисков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Но единая «семейная функция полезности» скрывает внутренние различия. Sen называет это «кооперативными конфликтам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риносит выгоду всем, но интересы в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и выгод, труда и ресурсов различаются (Sen 1990).

Кооперация не определяет, как оценивается вклад и кто принимает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е решение. Неоплачиваемая забота может повышать общее благополучие, но не превращаться в будущ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заботящегося. И наоборот, общая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прозрачный бюджет и гарантии способны преобразовать совместные выгоды в более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необходимо различать рост совокуп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их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фактический контроль и влияние на выход. Семейный доход может увеличиться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концентрацией счета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о «совместном интересе» также реальны: сбережения будущего конкурируют с текущей заботой,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карьеру одного могут возложить временные издержки на другого.

9.2 Переговорная позиция и внешние ресурсы

Agarwal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домашн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зависят от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орм,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рынков, сообществ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Agarwal 1997). Пусть $O_i(t)$ обозначает внешние условия поддержки, а Z_t социально-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ую среду. Тогда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уравнение 17.

$$\mathcal{B}_i(t) = F(\mathbf{A}_i(t), O_i(t), Z_t, h_t) \tag{17}$$

Функция F не считается известной. Уравнение 17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что переговорная позиция не сводится к текущему доходу. Работа, публичное жилье, социальная защита, миграционный статус, сети и юридические средства меняют цену отказ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может косвенно менять внутрисемейную власть, расширяя реальные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Внешний ресурс действует только при фактическом доступе и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в конфликте. Информация, правовое знание, язык и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ая компетентность

также являются внешними ресурсами. Социальные санкции и стигма способны сделать формально доступный рыночный вариант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переносимым.

9.3 Социальное 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забота и невидимая ценность

Семьи создают огромный объем нерыночной ценности: заботу, домашнюю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ую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эмоциональный труд и межпоколенческие связи. Folbre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издержек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между семьей, рынком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является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роблемой (Folbre 1994).

Если учитываются только деньги, неоплачиваемая забота исчезает из анализа. Но полная монетизация заботы также искажает ее характер. Важно фиксировать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эффекты: длительная забота может снижать зарплату, стаж и пенсию одного и освобождать время другого для рынка. Поэтому получатель рыночного дохода и участники создания условий для этого дохода не всегда совпадают.

Социальное 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действует межпоколенчески через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язык, сети, заботу и активы. Оно также плохо отражается в стандарт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е, поэтому денежные данные нужно дополня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времени и качественными историями.

9.4 Долговременное накопление активов, времени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прав

Власт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накапливаются. Зарплатный разрыв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имущественный, активы влияют на жилье и кредит, а те влияют на карьеру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сети. Длительная забота может уменьшать квалификацию и мобильность, тогда как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накапливает контакты и процедурное знание. Поэтому равное потребление сегодня совместимо с расходящимися будущими траекториями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я может быть добровольной и эффективной. Нормативный вопрос состоит в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и ее выгод и рисков. Более надежные устройства признают издержки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создают общие права на некоторые активы, сохраняют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е сферы контроля и позволяют пересматривать разделение труда.

9.5 Язык,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труд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власть

Чтение контрактов, заполнение форм, управление цифровыми учетными данными и общение с институтами образуют важную семейную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Такая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я может быть тяжелым вкладом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источником концентрации доступа. Автономия не требует, чтобы каждый умел все, но требует передачи знания, совместного доступа,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и внешних альтернатив, чтобы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я не превращалась в монополию.

Языковой капитал конвертируется в материальную власть через институты, контролирующие доход, статус и мобильность; ресурсы,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озволяют покупать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онсультации и сети. Это пример взаимной конверсии, которую фиксирует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10 Границы ценности, структуры авторизации и посреднические трансферты

Автономия каса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но и того, как создаваемая ценность становится известной, авторизованной,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ой и распределяемой. Семейные границы неизбежно эластичны из-за общих доходов, подарков и заботы. Нормативная трудность возникает, когда эластичность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й, непрозрачный или неотзываемый канал.

10.1 Создание ценности, вклад и авторизация

Пусть субъект S и внешний партнер B создают ценность $V(S,B)$ в рамках соглашения C. Множество авторизованных канало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обозначается $\mathcal{M}_C$. Авторизованный канал задается уравнением 18.

$$m \in \mathcal{M}_C \quad \Longrightarrow \quad V(S,B) \xrightarrow{m} \big(V_S, V_B, V_{\text{common}}\big) \tag{18}$$

Уравнение 18 не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равного деления или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Оно требует, чтобы канал входил в понят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с объяснимым основанием полномочия.

Необходимо различать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вклад** и **полномочие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Вклад не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 создает титул;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не исключает делегирования; общий ресурс может содержать перекрывающиеся интересы. Чем выше ценность, ниже обратимость и сильнее связь с третьими лицами, тем весомее основания для явной авторизации, записи и пересмотра.

10.2 Четыре типа потока ценности

Таблица 3 отделяет совмест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от извлечения. Четыре типа способны переходить друг в друга: обще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требует пересмотра при изменении доходов; подарок, связанный с постоянным требованием послушания, теряет добровольность; авторизова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может стать фактическим контролем при утрате доступа к информации.

Ценность включает не только деньги, но и время, заботу, данные, социальный капитал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ая власть также влияет на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ю потока: названия «семейная обязанность», «заем», «управление» и «общий расход» несут раз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и не должны приниматьс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м без проверки фактичес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Table 3: Типы потоков ценности в семей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Тип	Типич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Основные различающие условия
Обще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Стороны заранее помещают часть дохода, времени или активов в обще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Известные правила, ясный объем и участие релевантных сторон в определении общег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Дар или поддержка	Добровольная передача ценности другому или семейному сообществу	Информированная добровольность, отсутствие скрытого встречного условия
Авторизова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счетами, активами, договорами или делами от имени другого	Делегирование, объем полномочия, записи, отзыв и аудит
Неавторизованный посреднический трансферт	Третье лицо использует реляционную позицию для входа в канал ценности вне исходн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Недостаток знания, авторизации, отзывности, прозрачности и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ости

10.3 Условия риска посреднического трансферта

Когда третье лицо A формирует канал m_A, риск описывается вектором из уравнения 19.

$$\mathbf{B}(m_A) = (K, A, R, T, Q) \tag{19}$$

K означает знание, A качество авторизации, R отзывность, T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ость, Q доступность подотчетности. Риск возрастает при ослаблени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компонентов; они не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механически.

Если $m_A \notin \mathcal{M}_C$ и несколько условий устойчиво слабы, можно говорить о **риске неавторизованного посреднического трансферта**. Более сильный вывод об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требуе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признаков вреда,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принуждения или неправомерног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Это предотвращает ошибочную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ю обычных подарков и совместного потребления.

Отсутствие письменной авторизации не означает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 отсутств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й авторизации. Повседневные семейные практики могут создавать разумное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мое согласие, но его объем должен быть выводим и отзывен. Чем выше необратимость и влияние на третьих лиц, тем сильнее аргументы в пользу явных полномочий и записей.

Подотчетность Q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знач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бъяснить, что произошло, на каком основании, как будут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ы потери и как изменятся будущие правила. Если единственными каналами остаются разрыв отношений или суд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исправимость слаба.

10.4 Границы ценности и 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власти

Неавторизованный трансферт может изменить будущую властную позицию. Возможный механизм обратной связи задается уравнением 20.

трансферт $V \longrightarrow$ усиление интерфейсов $R, X \longrightarrow$ сдвиг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mathcal{G} \longrightarrow$ последующие тран (20)

Уравнение 20 является гипотезой механизма и требует эмпирической проверки каждого звена. 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может идти и без денег: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е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накапливает знания и сети, а длительная неоплачиваемая забота снижает внешнюю занятость и ухудшает условия выхода. Повторение также нормализует канал: исключение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обычный порядок», и последующий отказ требуе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оправданий.

11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е частных сетей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 роли

Семей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приобретают публично-э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когда человек занимает доверенную роль перед третьими лицами. Частное давление не означает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ой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непригодности. Важно, существуют л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каналы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частной сети в интерфейсы роли и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 ли 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

11.1 Авторизация роли и интерфейсы

Пусть организация O доверяет субъекту S роль R.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ролевых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долж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в мандате согласно уравнению 21.

$$\text{Use}(R_S) \subseteq \text{Mandate}(O, R) \tag{21}$$

Мандат может включать фонды, данные, решения, закупки, найм, коммуникацию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То, что полномочие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конкрет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не превращает его в частную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Родственник также не получает произв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на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й ресурс только по факту близости.

11.2 Частное давление, идентифицируемый канал и фактический захват

Различаются **частное давление**, **идентифицируемый канал** и **фактический захват роли**. Первое означает просьбу или ожидание из личной сети; второ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путь к ресурсу или решению; третье фактическое изменени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роли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мандата.

Table 4: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 интерфейсы и механиз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Интерфейс	Риск частного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Релевантные механизмы
Фонды и платежи	Перевод или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ценности вне мандата	Разделение функций, двойной контроль, лимиты, аудит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Раскрытие близким, лич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фильтрация	Минимальные привилегии, журналы доступа,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надзор
Закупки и договоры	Фаворитизм или косвенная выгода частной сети	Раскрытие, самоотвод,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проверка,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Внешне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го авторитета в частном деле	Ясный мандат, одобрение,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ость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Найм и отбор	Конверсия личной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в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ступ	Ясные критерии, коллективный отбор, раскрытие связе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я
Высоконеобратимые решения	Тяжел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трудно исправимые после захвата	Повышенные пороги одобр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ый пересмотр, разделение интерфейсов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й канал представлен уравнением 22.

$$O \xrightarrow{R} S \xrightarrow{m_A} A, \qquad m_A \notin \text{Mandate}(O, R) \tag{22}$$

Уравнение 22 не доказывает захват, а указывает объект проверки. Следует оценить видимость канала, обнаружимость, реальное полномочие, обратимость и интересы третьих лиц. Высокий риск мож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и на невысокой должности, если она контролирует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е данные, платеж или отбор.

11.3 Управлен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ми интерфейсами

Таблица 4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хороше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не может опираться только на моральные качества носителя роли. Оно структурно уменьш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еавторизованной конверсии. Минимальные привилегии ограничивают доступ; двойной контроль мешает одному лицу завершить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ую операцию; самоотвод защищает решение при частном интересе; аудит создает проверяемые следы.

Это согласуется с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о конфликте интересов, где различаются вторичный интерес и фактическое искажени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суждения (Thompson 1993). Конфликт интересов есть условие риска, а не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ое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ступка.

11.4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к третьим лицам и целостность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е частной сети способно повредить третьим лицам, коллегам и бенефициарам, поэтому речь идет о реляционной и процедурно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кое полномочие создает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перед теми, кто не входит

в частную сеть.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ая власть также важна: даже без денежных трансфертов должностное лицо мож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статус, чтобы придать версии близког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или дискредитировать третью сторону.

Цель института не в запрете част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а в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и их скрытой конверсии в критерии публичного ил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го решения. Для этого нужны раскрыти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х интерфейсов, самоотвод 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е процедуры.

12 Реляционная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ограниченная власть и децентрация

Если задача сводится к усилению контрвласти слабой стороны, анализ остается внутри той же грамматики. Более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как рост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может уменьши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сть власти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Не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 требует не равенства всех ресурсов, а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произво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ть базовую траекторию другой.

12.1 Баланс,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проблема контрвласти

Некоторый баланс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ужен для реаль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без ресурсов, поддержки и выхода словесный отказ 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границей. Но нова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может просто перевернуть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Критерий прогресс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не в том, «кто выигрывает», а в ограничениях, мешающих любой стороне расширять власть между сферами.

12.2 Децентрац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власти

Децентрация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власть перестает быть главным механизмом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оснований. Требование может учитываться благодаря релевантности и проверяемости, а не только потому, что за ним стоит контроль ресурса. Для этого нужны повторяемые опыты безопасного отказа, устойчивых правил,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доступа к информации, исправления ошибок и обращения к третьим лицам.

Рисунок 2 показывает цикл, а не необратимую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 Исчезновение внешней поддержки, кризис или новая непрозрачность правил могут вызвать регрессию.

12.3 Память, нарратив и взаим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пере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если сохраняются истории, навсегда закрепляющие за одним участником образ зависимого, неблагодарного или неспособного. Устойчивая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требу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ереинтерпретировать историю без ее стирания. Признание понятных причин прошлог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совместимо с признанием его чрезмерно зависимых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Признание вклада не создает бесконечного долг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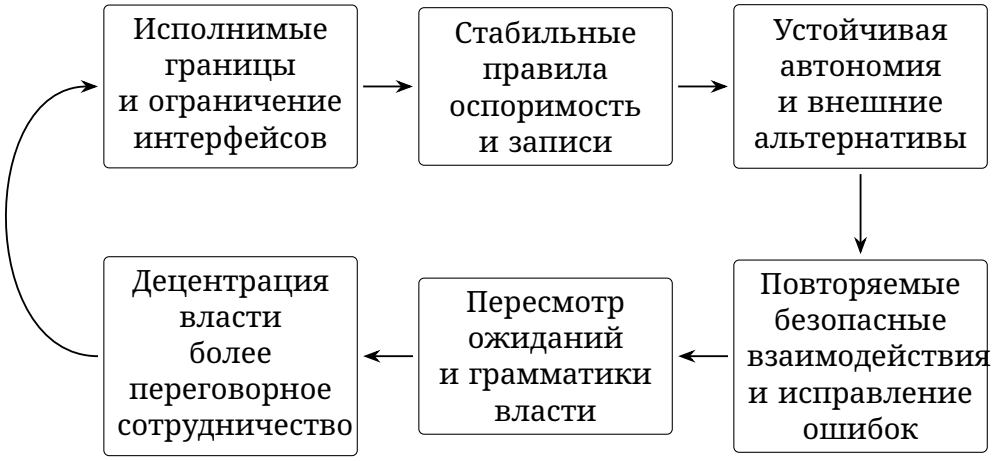

Figure 2: Цикл реляционной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и децентрации власти

Децентрация не равна полной контрактуализации семьи. Аффект, память и диффузные обязанности сохраняются, но должны оставаться совместимыми с оспариванием и пересмотром.

13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е положения, опе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и эмпирическая проверка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1 *При сопоставимых контекстах более сильная и длительная 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интерфейсов* D, I, N, R, X *в одной позиции должна быть связана с большей способностью превращать несогласие в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й результат.*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2 *Если прозрачные правила, право отказа или внешний надзор блокируют конверсию ресурсных различий, структура* $\mathcal{G}$ *должна лучше предсказывать контроль, чем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ресурсов само по себ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3 *Больш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правил, оспоримость и проверяемость должны быть связаны с ростом доверия из опыта даже при низком исходном личном довери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4 *Прямой доступ к документам,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внешней верификации должен уменьшать разрыв между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ым авторитетом и фактическим контролем, укрепляя эпистемическую автономию.*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5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автономии должна сильнее зависеть от сочетания доступности, контроля и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к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у, чем от номинального наличия ресурса.*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6 *Снижени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одной точки должно уменьшать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семейного узла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изменя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жизненных сфер, если новые опоры не имеют высокой корреляции отказов.*

Table 5: Примеры опе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ключевых понятий

Понятие	Возможные наблюдаемые признаки	Возможные источники данных
Интерфейс решения D	Кто способен блокировать, разрешать или менять действие; частота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х решений	Хронологии событий, перекрестные интервью, документы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ый интерфейс I	Чья версия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в последующих решениях; доступ к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м	Сообщения, протоколы, интервью, записи
Изменение норм N	Изменение правил, момент изменения, симметрия оспаривания	Истории правил, журналы, множественны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Ресурсный интерфейс R	Доступ к счета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жилью, информации, сетям и услугам	Документы, журналы доступа, опросы
Интерфейс выхода X	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правовы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и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е издержки отказа или ухода	Рыночные данные, правовой статус, интервью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доверие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ь, подтвержденн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успешное исправление, варианты выхода	Повторные измерения, события, продольные наблюдения
Автономия	Доступность, контроль и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в шести измерениях	Опросы, документы, сетевой анализ, траектории
Граница ценности	Знание, авторизация, отзывность,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ость, подотчетность	Договоры, транзакци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аудит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7 *Неавторизованные трансферты должны чаще становиться самоподдерживающимися, когда они увеличивают ресурсный и выходной контроль получателя и повторение нормализует канал.*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8 *В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минимальные привилегии, разделение функций, раскрытие, самоотвод и аудит должны снижать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превращения идентифицируемого частного давления в фактический захват роли.*

Положения допускают проверку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ми кейсами, продольными интервью, событийным анализом,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ми данными и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ми над процедурами. Формализация не навязывает единственную методологию.

Таблица 5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что центральные понятия нельзя надежно измерять одним субъективным вопросом. Следует сочетать рассказы участников, поведенческие след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Расхождения источников сами по себе информативны, особенно для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ой власти.

Кауза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должен учитывать смешивающие фактор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силивает ресурсный контроль и снижает доверие; болезнь может законно концентрировать решения и уменьшать наблюдаемую автономию; культура влияет на нормы совместног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и субъективную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ность. Поэтому особенно ценны продольные дизайны и сравнения до и посл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14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границы,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е объяснения и пределы применения

Рамка анализирует механизмы, а не диагностирует людей или типы семей. Ее понятия не заменяют клиническую, юридическую или конкретно-эмпирическую оценку. Наблюдаемая асимметрия может объясняться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ей, добровольным делегированием, чрезвычайной ситуацией, болезнью, возрастом ил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м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ми, поэтому всегда нужно проверять авторизацию, длительность,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и пересмотр.

Предложенные переменные неоднородны и не должны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 объединяться в глобальный индекс. Некоторые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 другие порядковы или нарративны. Формализаци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реляционная и логическая, а не оцененная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ая модель.

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нтекст влияет на значение ресурсов,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и выхода. Совмест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может означать солидарность в од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и ограничение в другом.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должен различать норматив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отсутствие оспоримости. Культурное различие не отменяет вопроса о понятности правил,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есогласия и сохранении минимальных жизненных условий.

Статья не предлагает полной теории семейно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Между автономией, заботой,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ю, распределительной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ю и непрерывностью отношений остаются напряжения. Концепт грамматики власти также рискует потерять различительную ценность, если станет просто новым названием люб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ласти». Его полезность зависит от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показать идентифицируемый механизм конверсии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иями позиции или ресурсов и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ю решений,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й или норм.

Измерение может изменять объект: требование вести записи или обсуждать авторизацию временно повышает оспоримость. Жизненный цикл также меняет нормативный смысл асимметрии. То, что оправдано для ребенка или тяжело боль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может быть чрезмерным для автономного взрослого. Наконец,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амбивалентна: забота,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разделение рисков могут сокращать одни варианты и создавать други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Цель состоит не в максимиз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а в различени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ще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 произвольного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15 Заключение

Статья предложила рамку для анализа семейных конфигураций, в которых несколько властных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концентрируются, взаимно конвертируются и воспроизводятся

во времени.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нцепт, грамматика власти, обозначает структуру второго порядка, через которую различия позиции, ресурсов, признанной компетенции и цены отказа превращаются в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решени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и изменение норм. Это позволяет различать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и результат и не приравнивать всякую асимметрию к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ю.

Рамка связывает этот механизм с четырьмя проблемными блоками.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доверие зависит от границ власт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правил, оспоримости, проверяемости, исправимости и выхода. Автономия является многомерной комбинацие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сетевых, эпистемических, ценностных и выходных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и должна оцениваться по доступности, контролю и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показывает влияние рынк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аботы, активов, времени и языковых компетенций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ную позицию и накопление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Анализ границ ценности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х ролей,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оказывает, почему каналы трансферта и влияния требуют авторизации, прослеживаемости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мандату.

Теори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философия права, герменевтик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языка дают нормативные и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ые основания: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нельзя смешивать с не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м;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правил и процедура имеют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расположена; формы выражения имеют неравную материальную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Эти традиции не сводятся к единой теории, но соединяются вокруг конкрет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конверсии.

Нормативный вывод ограничен. Цель не в замене одного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другим, не в совершенном равенстве ресурсов и не в устранении зависимости. Цель состоит в создании условий, в которых человек способен сопротивляться неавторизованному контролю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не нуждающемся в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и как основном механизме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Ограничение интерфейсов,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правил,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поддержек 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ересмотра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й делают та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более реальным.

Рамка остаетс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м предложением. Ее ценность зависит от эмпирической различимости механизмов, фальсифицируемости выводов и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орректировать категории на случаях, где они не работают. Цель состоит не в добавлении еще одного словаря, а в повышении точности описания связей между властью, доверием, автономией, ценностью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Литература

Agarwal, Bina (1997). “Bargai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 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In: *Feminist Economics* 3.1, pp. 1–51. DOI: 10.1080/135457097338799.

Baier, Annette (1986). “Trust and Antitrust”. In: *Ethics* 96.2, pp. 231–260. DOI: 10.1086/292745.

Blood, Robert O. and Donald M. Wolfe (1960). *Husbands &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 Glencoe, IL: Free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 by John B. Thompson. Trans.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merson, Richard M. (1962). "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1, pp. 31–41. DOI: 10.2307/2089716.
Folbre, Nancy (1994). *Who Pays for the Kids? Gender and the Structures of Constraint*. London: Routledge.
Fricker, Miranda (2007).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8237907.001.0001.
Friedman, Marilyn (2003). *Autonomy, Gender,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0195138503.001.0001.
Fuller, Lon L. (1969).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abermas, Jürgen (1996).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ns. by William Reh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esse-Biber, Sharlene and John Williamson (1984). "Resource Theory and Power in Families: Life Cycle Considerations". In: *Family Process* 23.2, pp. 261–278. DOI: 10.1111/j.1545-5300.1984.00261.x.
Komter, Aafke (1989). "Hidden Power in Marriage". In: *Gender & Society* 3.2, pp. 187–216. DOI: 10.1177/089124389003002003.
Mackenzie, Catriona and Natalie Stoljar, eds. (2000). *Relational Autonom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utonomy, Agency, and the Social Sel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oso/9780195123333.001.0001.
Nedelsky, Jennifer (2012). *Law's Relations: A Relational Theory of Self, Autonomy, and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5147964.001.0001.
Nussbaum, Martha C. (2006).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4159/9780674041578.
Okin, Susan Moller (1989). *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Pettit, Philip (1999). *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0198296428.001.0001.
Rawls, John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icoeur, Paul (1992). *Oneself as Another*. Trans. by Kathleen Blam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I: 10.7208/chicago/9780226844541.001.0001.
Sen, Amartya (1990). "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 In: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Women and World Development*. Ed. by Irene Tink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9).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Dennis F. (1993).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29.8, pp. 573–576. DOI: 10.1056/NEJM199308193290812.
Walker, Margaret Urban (2006). *Moral Repair: Reconstructing Moral Relations after Wrongdo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17/CBO9780511618024.
Westlund, Andrea C. (2009). "Rethinking Relational Autonomy". In: *Hypatia* 24.4, pp. 26–49. DOI: 10.1111/j.1527-2001.2009.01056.x.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OI: 10.2307/j.ctvcm4g4q.

البنى الموجهة نحو السلطة وتكوّن الاستقلالية في العلاقات الأسرية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الثقة البنيوية، حدود القيمة، و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تنظيمية

黄 WANHONG HUANG (万鸿)
huangwanhong@serendip.ngo

ملخص

يبني هذا البحث إطارا مفاهيميا لتحليل البنى الموجهة نحو السلطة في العلاقات الأسرية، ويدرس كيفية اتصال الاستقلالية والثقة وحدود القيمة ونزاهة الأدوار التنظيمية في ظل تفاوتات مستمرة في السلطة. موضوع التحليل ليس «نوعا أسريا» ثابتا، ولا حكما على شخصية أفراد الأسرة أو حالتهم السريرية، بل مجموعة من الآليات التي يمكن تمييزها داخل تكوينات علائقية محددة: تركز قدرة اتخاذ القرار، والميزة التفسيرية، والقدرة على تعديل المعايير، والسيطرة على واجهات الموارد الأساسية، وتكاليف الخروج، إلى جانب قابلية هذه العناصر للتحول المتبادل والاستمرار عبر الزمن. ومن أجل مزيد من الدقة، يميز البحث بين القدرة السلطوية، وممارسة السلطة، والتحكم في النتائج، والمشروعية المعيارية. ثم يعرّف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بوصفها بنية علائقية من المرتبة الثانية تحدد أي فروق في الموقع أو الموارد أو الأهلية المعترف بها أو تكلفة الرفض يمكن تحويلها إلى قرارات فعالة وتفسيرات ذات سلطة وتعديلات في القواعد. وعلى هذا الأساس لا تختزل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في الموارد أو الأوامر أو السلوك المسيطر، بل تشير إلى بنية تحويل تصل بين واجهات متعددة للسلطة.

انطلاقا من ذلك، يطور البحث نموذجا شرطيا للثقة البنيوية و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معرفية. تُحلل موثوقية العلاقة من خلال القيود على السلطة، واستقرار القواعد، وقابلية الاعتراض، وقابلية التحقق، وإمكان التصحيح، والقدرة الواقعية على الخروج. وتُمثل الاستقلالية كبنية متعددة الأبعاد تشمل قدرات اقتصادية ومؤسسية وعلائقية وشبكية ومعرفية وقدرات على التصرف في القيمة والخروج، مع التمييز بين توافر المورد والسيطرة الفعلية عليه ومتانته في مواجهة التدخل. ويقترح البحث مسارين متكاملين، هما قابلية التحكم التدريجية و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موزعة، لتفسير كيفية خفض الاعتماد على نقطة واحدة مع الإبقاء على مسؤولية يمكن تتبعها محليا. ويستند الإطار إلى نظرية العدالة وفلسفة القانون والتأويلية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غة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أسرة. فتنظر نظرية العدالة في التوزيع والقدرات والمكانة العلائقية وعدم الهيمنة؛ وتتناول فلسفة القانون التنظيم الخاص والتفويض واستقرار القواعد والحدود الإجرائية؛ وتحلل التأويلية التاريخ العلائقي والهوية السردية وإسناد المسؤولية؛ ويبين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غة كيف تكتسب أشكال التعبير المشروعة ورأس المال اللغوي والترجمة المؤسسية آثارا مادية وتنظيمية؛ فيما يدرس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أسرة أثر الموارد والرعاية والأسواق والدولة والبدائل الخارجية في مواقع التفاوض داخل الأسرة. وفي حدود القيمة يميز البحث بين التجميع المشترك والهبة والإدارة المفوضة والتحويلات الوسيطة غير المصرح بها، ويقيّم المخاطر من خلال المعرفة والتفويض وقابلية الإلغاء والتتبع والمساءلة. أما في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تنظيمية فيُعالج امتداد الشبكات الخاصة بوصفه مسألة حوكمة لواجهات الدور، مع التمييز بين الضغط الخاص والقناة القابلة للتحديد والاستحواذ الفعلي على الدور، ومناقشة الإفصاح وفصل الوظائف وأقل قدر من الصلاحيات والتحكم المزدوج والتنحي والتدقيق.

يسهم البحث نظريا في ثلاثة اتجاهات رئيسية. أولا، يحول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من استعارة وصفية إلى مفهوم لتحويل من المرتبة الثانية يمكن تمييزه عن سلطة الموارد والبنى التفسيرية والخطاب الملموس، مع تأسيسه في نظرية العدالة وفلسفة القانون والتأويلية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غة. ثانيا، يصل بين الثقة البنيوية وتكوّن الاستقلالية وحدود القيمة باعتبارها مقاطع مختلفة لآلية علائقية واحدة. ثالثا، يوضح الواجهة بين بنى السلطة داخل الأسرة ونزاهة الأدوار التنظيمية مع الإبقاء على الحالات الحدية المتعلقة بالرعاية والتفويض المشروع والوكالة الطارئة والحياة المشتركة والاختلاف الثقافي. والغرض من الصياغة الشكلية هو زيادة شفافية التعريفات والاستدلالات ومسارات الاختبار التجريبي، لا تقديم نموذج كمي مقدر. وتعرض الأقسام الأخيرة قضايا تحليلية قابلة للدحض واتجاهات للتشغيل التجريبي وتفسيرات بديلة وتصاميم بحثية ممكنة.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العلاقات الأسرية،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علائقية، الثقة البنيوية، نظرية العدالة، فلسفة القانون، التأويلية،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غة،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أسرة،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تنظيمية

مذكرة بحثية أولية

تقدم هذه المخطوطة دراسة مفاهيمية وشكلية للبنى الموجهة نحو السلطة في العلاقات الأسرية. ويتمثل موضوعها المباشر في الآلية العلائقية التي يمكن عبرها لقدرة اتخاذ القرار والميزة التفسيرية والقدرة على تعديل المعايير وواجهات الموارد وشروط الخروج أن تتركز وتتبادل التحول وتستمر عبر الزمن. وتطوّر المخطوطة مفهوم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من أجل وصل الثقة البنيوية و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علائقية وحدود القيمة ونزاهة الأدوار التنظيمية في إطار تحليلي واحد.

يتخذ البحث منظورا بنيويا ومعياريا محدودا. فهو لا يعامل الأسرة بوصفها فاعلا واحدا، ولا يستنتج هوية أخلاقية نهائية أو حالة سريرية من مجرد تفاوت محلي في السلطة. ويحافظ النص في جميع أجزائه على التمييز بين القدرة السلطوية وممارسة السلطة والتحكم في النتائج والمشروعية المعيارية. أما البنى الرياضية والتخطيطية فتؤدي وظيفة إيضاحية، ويجب أن تبقى مجالاتها وافتراضاتها وحدودها الاستدلالية مصرحا بها بصورة واضحة.

وتعد الاقتصاديات الشكلية والانضباط المفاهيمي قيودا موجهة لهذا العمل. فالمخطوطة تستفيد من أبحاث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علائقية ونظرية العدالة وفلسفة القانون والتأويلية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غة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أسرة، ولا تستحدث ترميزا جديدا إلا عندما يكون المعجم الموروث غير كاف للدقة المطلوبة. ولا تكتسب مصطلحات مثل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والثقة البنيوية و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موزعة والتحويل الوسيط غير المصرح به وحوكمة واجهات الدور معناها التقني إلا بعد تحديد المجالات والعلاقات ذات الصلة تحديدا صريحا.

تتضمن هذه النسخة النص الكامل الحالي في صيغة متعددة اللغات. وهي ثمرة عدة جولات من المراجعة البنيوية والمنطقية والأسلوبية، بما في ذلك توضيح المفاهيم، وتوسيع الشرح باللغة الطبيعية، وإضافة الأسس النظرية، وتوحيد الإحالات إلى المعادلات، وإعداد نسخ باللغات الرسمية الست ل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أما المعايرة التجريبية، والمقارنة بين الحالات، وعدد من الامتدادات الشكلية الإضافية، فما تزال من أعمال المستقبل.

الاستخدام المسؤول والتحفظ على الحقوق

يشجع المؤلف النقاش الحسن النية، والنقد، والاستقصاء المستقل، والاستخدام المسؤول للمواد الواردة في هذا العمل. وبصرف النظر عن الشروط القانونية للترخيص، يُطلب إلى المستخدمين مراعاة الأضرار المتوقعة عند تكييف الإطار المقترح أو تطبيقه. ولا يغيّر هذا الطلب الأخلاقي الأذونات أو القيود المنصوص عليها في الترخيص.

ويحتفظ المؤلف بالحقوق المصونة بموجب BY-NC CC 0.4، ويجوز له طلب سبل الانتصاف التي يجيزها القانون في حالة خرق الترخيص أو انتهاك حقوق أخرى مستقلة التطبيق. كما أن إعادة الاستخدام لا تعني اعتمادا أو تزكية من المؤلف. وتستلزم حقوق الأطراف الثالثة، عند الاقتضاء، إذنا من أصحابها المعنيين. وتظل الاستثناءات والقيود القانونية المتاحة نافذة بالكامل.

تنبيهات

الحالة. تتضمن هذه المسودة الحالية النص الكامل للمخطوطة المتعلقة بسلطة الأسرة والاستقلالية والثقة وحدود القيمة و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تنظيمية. كما تشتمل هذه النسخة على إصدارات متعددة اللغات أُعدت باللغات الرسمية الست ل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وقد تحققت المراجعة من التعريفات المفاهيمية، واستمرارية الحجاج، والإحالات إلى المعادلات، والإحالات الداخلية، وتخطيط الصفحات، والاتساق بين النسخ اللغوية. وتظل المخطوطة مذكرة بحثية أولية؛ أما التحقق التجريبي وعدد من الامتدادات الشكلية والمقارنة المفتوحة فما تزال ضمن أعمال المستقبل.

الترخيص. ما لم يُذكر خلاف ذلك، فإن حقوق النشر © 2026 محفوظة لـ Huang، Wanhong وهذا العمل متاح بموجب ترخيص المشاع الإبداعي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0.4 International (CC BY-NC 0.4) وفقا لشروط ذلك الترخيص.

بيان بشأن استخدام النماذج اللغوية. تضمنت المناقشات الاستكشافية وإعداد هذه الورقة استخدام ChatGPT من OpenAI. وقد دعم ChatGPT الحوار الاستكشافي، والإخراج متعدد اللغات، والمساعدة في الصياغة، والتنسيق باستخدام LaTeX والفحص التقني. واختار المؤلف أسئلة البحث، ووجّه واعتمد الالتزامات النظرية والوضع المعرفي للادعاءات، ويتحمل وحده المسؤولية عن المخطوطة، بما في ذلك تعريفاتها وبناها الشكلية وحججها ونتائجها وترجماتها وأخطاؤها. وتبقى نسبة التأليف للمؤلف البشري.

١ مقدمة

الأسرة في الوقت نفسه فضاء للعلاقات الحميمة والرعاية وتخصيص الموارد وتكوين الهوية والتعلم المعياري. ولهذا التداخل يصعب اختزال السلطة داخل الأسرة في نموذج واحد للأمر والطاعة. فكثير من التفاعلات ذات النتائج الحاسمة لا تظهر في صورة إكراه صريح، بل من خلال أسئلة مثل: من يملك صلاحية تعريف المشكلة؟ وأي تفسير يدخل في القواعد المشتركة؟ ومن يسيطر على الحسابات والوثائق؟ ومن يمثل الأسرة أمام المؤسسات الخارجية؟ ومن يتحمل كلفة الرفض أو الخروج؟ لهذه السلطة أسس مادية وتفسيرية معا. فقد تستند إلى صلاحية يمنحها القانون أو المؤسسة، وقد تنشأ أيضا من أعراف طويلة الأمد وعلاقات رعاية وقدرات لغوية وتاريخ مشترك.

ومن ثم لا يسأل البحث السؤال العام عما إذا كانت السلطة موجودة داخل الأسر. السؤال أضيق وأكثر بنيوية: عندما تتركز بصورة مستمرة قدرة القرار والميزة التفسيرية وقدرة تعديل المعايير وواجهات الموارد المهمة وتكاليف الخروج في مواقع علائقية بعينها، كيف تتحول هذه الفروق إلى قرارات وتفسيرات وقواعد ذات أثر عملي؟ وكيف يؤثر هذا التحويل في الثقة البنيوية و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معرفية والتصرف في القيمة والنزاهة الائتمانية عندما يشغل الفرد دورا تنظيميا؟ يطلق البحث على طبقة التحويل هذه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ولا يقصد بالقواعد النحو اللغوي، ولا تحويل كل مشكلة تواصل إلى مشكلة سلطة. المقصود بنية من المرتبة الثانية داخل العلاقة تحدد أي أنواع من الأسباب تصبح فعالة، وأي صور من الرفض تستطيع إيقاف الفعل، وأي تفسيرات تدخل في القواعد اللاحقة.

تقع المشكلة عند تقاطع عدة تقاليد بحثية راسخة. فقد درست سوسيولوجيا الأسرة وبحوث السلطة والاعتماد منذ وقت طويل العلاقات بين الموارد والبدائل ومواقع اتخاذ القرار (Wofle and Blood 1960; Emerson 1962; Hesse-Biber and Williamson 1984; Komter 1989). وتؤكد نظريات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علائقية أن الاستقلالية ليست صفة داخلية لفرد معزول، بل تتشكل أو تتضرر بفعل العلاقات الاجتماعية والظروف المؤسسية وبنى الاعتراف (Stoljar and Mackenzie 2000; Friedman 2003; Westlund 2009; Nedelsky 2012). كما يبين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أسرة أنها وحدة تعاون ومجال مؤسسي قد تتوزع فيه المصالح والرعاية والوقت والأصول بصورة غير متكافئة (Sen 1990; Agarwal 1997; Folbre 1994). غير أن هذه الأدبيات كثيرا ما تعالج الموارد أو المعايير أو التفاوض أو الاستقلالية كل على حدة، بينما يهتم هذا البحث بكيفية التحويل بين هذه المستويات.

وتتعلق فجوة ثانية بمكانة التفسير واللغة. فالنزاعات الأسرية لا تتناول الموارد القابلة للقياس فقط، بل معنى الفعل، وتسمية السلوك رعاية أو واجبا أو جحودا أو ولاء أو خيانة، وكذلك أي رواية للوقائع تصبح أساسا للقواعد المستقبلية. تذكرنا التأويلية بأن الفهم تاريخي التموضع وأن السرد يشارك في تكوين الهوية والمسؤولية (Gadamer 2013; Ricoeur 1992). ويضيف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غة أن الكفاءة اللغوية والاعتراف المؤسسي ببعض أشكال التعبير موزعان بصورة غير متساوية ويمكن تحويلهما إلى موارد اجتماعية (Bourdieu 1991; Irvine 1989; Gal 1989; Heller 2003). وقد يملك فرد يجيد الوثائق الإدارية أو اللغة القانونية والمالية أو التعامل مع المؤسسات الخارجية واجهة سلطة لا تختزل في الملكية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تظهر فجوة ثالثة بي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خاصة والأدوار التنظيمية. تتوقف تحليلات الأسرة غالبا عند حدود المنزل، بينما تتناول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تنظيمية تضارب المصالح ونزاهة الدور بوصفهما مشكلتين داخليتين للمؤسسة. لكن الشبكة الخاصة قد تتجاوز هذه الحدود إذا تعرض حامل الدور لضغوط أسرية أو مطالب بالموارد أو التمثيل. لا يفترض البحث أن كل علاقة خاصة تفسد الدور، بل يبحث الشروط التي يمكن فيها لقدرة خاصة أن تتحول إلى وصول إلى موارد أو معلومات أو سلطة تمثيل تخص المنظمة.

للبحث أربعة أهداف. الأول مفاهيمي: التمييز بين القدرة والممارسة والنتيجة والمشروعية، ثم تعريف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كآلية تحويل من المرتبة الثانية. والثاني معياري: وصل هذه البنية بالعدالة وعدم الهيمنة و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علائقية والشرعية والإجراء من دون تحويل كل تفاوت إلى ظلم. والثالث تفسيري: بيان تأثيرها في الثقة والاستقلالية وحدود القيمة ونزاهة الدور عبر الزمن. والرابع منهجي: تقديم صياغة شكلية تكشف الافتراضات والعلاقات من دون الخلط بين النموذج المفاهيمي والتقدير الكمي.

يعتمد البحث تحليلا نظريا للتكوينات. وهو لا يدعي تقدير تواتر الآليات تجريبيا ولا تشخيص أسر بعينها. الصيغ الشكلية أدوات للوضوح، تبين ما الذي يجب تمييزه وما العلاقات المقترحة وما الملاحظات التي قد تدحض القضايا. ويحافظ الإطار على حالات حدية مهمة مثل الرعاية والتمثيل الطارئ والمسؤولية الأبوية والتقاسم الطوعي والاختلاف الثقافي. قد يكون تركز القدرة ضروريا أو مشروعا، لكن يجب السؤال عن مصدر التفويض وحدوده وقابليته للاعتراض والمراجعة وصلته بإمكان استقلالية فعلية.

تتبع بنية البحث هذا المسار. تحدد الأقسام 2 إلى 4 موضوع التحليل والأسس المعيارية والقانونية والتأويلية والسياسية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تقدم الأقسام 5 و6 العناصر الشكلية وقواعد السلطة. وتحلل الأقسام 7 إلى 10 الثقة والاستقلالية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أسرة وحدود القيمة. ويدرس القسم 11 الامتداد إلى الأدوار التنظيمية، والقسم 12 إعادة بناء العلاقة، فيما تعرض الأقسام 13 و14 القضايا القابلة للاختبار والحدود النظرية، ثم تجمع الخاتمة النتائج.

٢ موضوع التحليل ووحدة التحليل والمهمة النظرية

وحدة التحليل هي **تكوين علائقي محدد**. وقد يشمل شخصين أو أكثر، لكنه يحدد بمجموعة قابلة للتعيين من التفاعلات والقواعد وواجهات الموارد والتاريخ ذي الصلة. يمنع ذلك تحويل ملاحظات عن بعض العلاقات إلى وصف للأسرة كلها. ويمكن للفرد أن يشارك في بنية موجهة نحو السلطة من دون أن يقبلها معياريا، وأن يتعلم قواعدها لحماية حدوده أو التفاوض أو البقاء.

تعني **البنية الموجهة نحو السلطة** تكوينا تتركز فيه عدة قدرات سلطوية بصورة مستمرة بحيث يؤثر هذا التركز مرارا في معالجة الخلاف. كلمة «موجهة» تشير إلى نزعة بنيوية لا إلى سمة نفسية ثابتة. لا تكفي لا مساواة عابرة أو قسمة وظيفية للعمل أو قرار طارئ. يجب النظر إلى التكرار والاتجاه وقابلية التحويل بين القدرات والامتداد بين مجالات الحياة وإعادة الإنتاج عبر الزمن.

يميز التعريف أربعة مستويات. **القدرة السلطوية** هي الإمكان المحتمل لتغيير أفعال شخص آخر أو تفسيراته أو قواعده أو موارده أو شروط خروجه. **ممارسة السلطة** هي الاستخدام الموقفي لهذه القدرة. **التحكم في النتيجة** يتعلق بمدى مطابقة النتيجة لفعل الفاعل أو تفضيله. أما **المشروعية** فهي تقييم معياري لمصدر التدخل وإجرائه وتناسبه وآثاره. قد تتباعد هذه المستويات: يمكن امتلاك قدرة من دون ممارستها، أو ممارستها من دون تحقيق النتيجة، أو تحقق نتيجة من دون قدرة عامة، أو وجود صلاحية مشروعة لكنها محدودة.

يساعد هذا الفصل على تجنب خطأين: استنتاج الهيمنة من مجرد تفاوت في الموارد، واستنتاج نية التحكم من مجرد نتيجة ضارة. غالبا ما تنتج النتائج الأسرية عن قيود مادية وعادات وواجبات رعاية وتوقعات ثقافية وحدود قانونية وخيارات طوعية في الوقت نفسه. لذلك يجب تحديد المسار السببي المقترح قبل الحكم المعياري.

وللبنية بعد زمني. قد يكون حدث منفرد خطيرا أخلاقيا من دون أن يشكل بنية دائمة، بينما قد تتراكم أفعال صغيرة لتنتج تفاوتا متينا. لذلك يهتم التحليل بالمسارات: من يكتسب تدريجيا السيطرة على الوثائق والحسابات والعلاقات الخارجية أو معايير التفسير، وكيف تتعزز هذه المواقع، وما إمكان مراجعتها.

توفر نظريات الموارد والاعتماد نقطة انطلاق. ربط Blood وWofle سلطة القرار بالموارد داخل الأسرة (Blood and Wofle 1960)، وربط Emerson سلطة فاعل باعتماد الآخر عليه (Emerson 1962). وأظهرت بحوث لاحقة أن السلطة قد تظل خفية عندما تجعل المعايير والروتين بعض القرارات طبيعية أو غير مرئية (Komter 1989). يحتفظ البحث بأهمية الموارد والاعتماد، لكنه يضيف سؤال التحويل: كيف يصبح فرق الموارد سلطة تفسيرية أو قدرة على تغيير القاعدة أو رفع كلفة الرفض؟

المهمة النظرية هي إظهار هذه الطبقة بوضوح. لا تتحدد البنية الموجهة نحو السلطة فقط بحجم الموارد، بل بالقواعد العلائقية التي تحدد أي الموارد ذات صلة، وأي الأسباب مقبولة، ومن يعترف به كصاحب أهلية، وما العواقب المرتبطة بالرفض. هنا تظهر الفائدة الخاصة لمفهوم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جدول ١: المفاهيم الأساسية ومستويات التحليل والالتباسات الواجب استبعادها

المفهوم	التعريف العملي	ما لا ينبغي الخلط به
القدرة السلطوية	قدرة محتملة على تغيير أفعال الآخر أو تفسيراته أو قواعده أو موارده أو شروط خروجه	ليست هي الممارسة الفعلية أو نجاح النتيجة أو التفويض المشروع
البنية الموجهة نحو السلطة	تركز اتجاهي لعدة قدرات عبر الزمن والمجالات يؤثر باستمرار في معالجة النزاعات	ليست كل لا مساواة أو أمرا منفردا أو نوعا من الأسرة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قواعد علائقية من المرتبة الثانية تحدد أي فروق وأسباب تتحول إلى قرارات وتفسيرات وتعديلات معيارية فعالة	ليست أسلوبا لغويا أو موردا منفردا أو فعلا ملموسا للسيطرة
الثقة البنيوية	حالة متوقعة تتمتع فيها حدود السلطة والقواعد والوقائع والاعتراض وشروط الخروج بحد أدنى من المتانة	ليست حكما عاما إيجابيا على شخصية الآخر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علائقية	قدرة متعددة الأبعاد على تكوين أحكام عن الحياة الأساسية والتعبير عنها وتنفيذها داخل العلاقات الاجتماعية والمؤسسية	ليست العزلة أو الاكتفاء الذاتي أو غياب كل تأثير
حدود القيمة	بنية المعرفة والتفويض والإلغاء والتتبع والمساءلة التي تحكم تدفقات القيمة	ليست حظرا على المشاركة أو الهبة أو الحياة المشتركة
نزاهة الدور	بقاء موارد المنظمة وحكمها وسلطة تمثيلها داخل حدود تفويض الدور	لا تعني أ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خاصة تشكل بذاتها تضارب مصالح

يلخص الجدول ١ الحدود المفاهيمية التي تعتمد عليها الصياغات اللاحقة.

٣ الأسس في نظرية العدالة وفلسفة القانون

لا يشتق البحث حكما كاملا على الأسرة من نظرية عدالة واحدة، ولا يساوي بين الأسرة والدولة. بل يستخلص من تقاليد متكاملة أبعادا تتصل مباشرة بالآليات المدروسة: توزيع الموارد والفرص، والقدرات الفعلية، والمكانة العلائقية، والتحرر من الهيمنة التعسفية، واستقرار القواعد، وإمكان الاعتراض والمراجعة، ودور القانون في تشكيل العلاقات الخاصة.

١٠٣ التوزيع والقدرات والبنية العلائقية

تبحث نظريات العدالة الحديثة في توزيع الحقوق والفرص والدخل ومنافع التعاون. يبين Rawls أن العدالة تتعلق أيضا بالبنى المؤسسية التي تشكل خلفية التعاون (Rawls 1999). لا يعني ذلك أن الأسرة هي «البنية الأساسية» كلها، بل أن القدرة على حياة مستقلة تتوقف على شروط مؤسسية طويلة الأمد. فالسكن والملكية والتعليم والرعاية وتقسيم العمل الأسري تغير الفرص المستقبلية، ولا يكفي تقييمها عبر استهلاك لحظي متساو.

يوضح نقد Okin أن استبعاد الأسرة من التقييم الداخلي للعدالة يسمح لتقسيم العمل وعدم المساواة الجندرية بإعادة تشكيل الفرص والمكانة العامة (Okin 1989). ويعمم البحث هذه الفكرة: كل ترتيب أسري طويل الأمد يغير الأصول والوقت ورأس المال المهني والمعرفة المؤسسية وشروط الخروج يمكن أن يصنع فروقا لاحقة في القدرة العامة.

ولا يكفي المنظور التوزيعي. تؤكد Young أن الهيمنة وسلطة القرار والتعبير الثقافي وتقسيم العمل لها أهمية معيارية لا تختزل في السلع الموزعة (Young 1990). فقد يحصل فردان على موارد نقدية متقاربة مع بقاء أحدهما وحده قادرا على تعريف المشكلة وتغيير الإجراء وتفسير سلوك الآخر وتحديد الأسباب المقبولة. لذلك يجب أن تسأل العدالة عما يحصل عليه الأفراد وعن مشاركتهم في تشكيل القرار والقواعد معا.

ينقل نهج القدرات التقييم إلى الحريات الفعلية. يؤكد Sen الإمكانات الواقعية، فيما تربط Nussbaum العدالة بالقدرات المركزية وتعطي أهمية للاعتماد والإعاقة والتعاون بين فاعلين غير متساوين (Sen 2009; Nussbaum 2006). لذلك يميز الإطار بين توافر المورد والسيطرة الفعلية والمتانة في مواجهة التدخل. فالحق أو الحساب أو الدخل لا يوسع مجال الفعل فعليا إذا تعذر الوصول إليه أو فقد بسهولة عند النزاع.

وعليه لا تعامل «العدالة» كمؤشر واحد. قد تتفق أو تتعارض أبعاد التوزيع والقدرة والمكانة والبنية القرارّية. وقد يرفع ترتيب ما رفاه الأسرة الإجمالي ويضعف قدرة فرد على المدى الطويل، أو يحترم الملكية شكليا ويحمّل فردا آخر تكاليف فرصة غير مرئية.

٢.٣ عدم الهيمنة و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علائقية وقيود السلطة

يتصل اتجاه البحث بفكرة عدم الهيمنة لدى Pettit، حيث تعني الحرية التحرر من سلطة تعسفية لا مجرد غياب التدخل الفعلي (Pettit 1999). قد لا يمنع فرد تصرفات الآخر لفترة طويلة، لكن إذا كان يستطيع تغيير السكن أو الحسابات أو الوثائق أو القواعد الأساسية بلا قيود فعالة، يظل الآخر مضطرا إلى توقع الإذن. المسألة إذاً تتعلق بحدود القدرة على التدخل، لا بتواتر التدخل وحده.

كما يفسر عدم الهيمنة لماذا لا يساوي نمو القدرة نمو الهيمنة. حصول الطرف الأضعف على دخل مستقل أو معرفة قانونية أو شبكات خارجية أو خيار خروج يزيد قدرة المقاومة من دون أن يمنحه ترخيصا للسيطرة على الآخرين. لذلك يميز البحث بين **قدرات حماية الحدود وقدرات الهيمنة.** الأولى تؤمن مجالا أدنى للقرار والرفض والتحقق، والثانية توسع تفضيلات شخص عبر مجالات حياة شخص آخر.

تقدم نظريات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علائقية أساسا اجتماعيا أعمق. تضع أعمال Mackenzie وStoljar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داخل العلاقات والهوية وتطور القدرات (Stoljar and Mackenzie 2000)، وتبين Friedman أن الحميمية لا تناقض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بالضرورة (Friedman 2003)، وتؤكد Westlund القدرة على طلب الأسباب والاستجابة لها (Westlund 2009)، فيما تقترح Nedelsky فهما علائقيا للقانون والاستقلالية (Nedelsky 2012). لا يلزم الخروج من العلاقات كي يكون الفرد مستقلا، بل يلزم مجال للتفكير والتعبير والمراجعة والرفض وإعادة التفاوض.

ولا تعد الرعاية استثناء من الاستقلالية. قد توسع الرعاية قدرات متلقيها وتمنح مقدمها معنى وهوية متبادلة. تبدأ المشكلة عندما تتحول الحاجة إلى الرعاية إلى أهلية قرار غير محدودة، أو عندما يستبعد إسهام مقدم الرعاية باستمرار من القرارات المشتركة. لذلك نحتاج إلى التمييز بين اعتماد يدعم القدرة واعتماد يتيح تحكما تعسفيا.

٣.٣ المشروعية واستقرار القواعد والعقل الإجرائي

تقدم فلسفة القانون أساسا ثانيا. يناقش Fuller شروطا مثل علنية القواعد واتساقها وقابليتها للاتباع والتطابق بين القاعدة المعلنة والتطبيق (Fuller 1969). هذه شروط للنظام القانوني أساسا ولا ينبغي نقلها آليا إلى الأسرة، لكنها تكشف فكرة عامة: يصعب أن توجه القاعدة الفعل بصورة معقولة إذا كانت مجهولة أو رجعية أو متناقضة أو يعدلها طرف واحد باستمرار بعد ظهور النتيجة.

لا يعني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جمود. يجب أن تتغير القواعد الأسرية مع الصحة والدخل والرعاية والظروف، لكن التغيير المعقول يحتاج أسبابا مفهومة ووقتا ملائما وإمكانا للاعتراض وعدم إعادة كتابة المعيار انتقائيا بعد الواقعة. وإلا يصبح الامتثال نفسه هدفا غير متوقع.

وتضيف النظريات الإجرائية للمشروعية بعد المشاركة في تبرير المعايير. يربط Habermas صحة المعايير بإجراءات يمكن للمتأثرين بها أن يشاركوا فيها (Habermas 1996). الأسرة ليست برلمانا صغيرا، وبعض القرارات تحتاج سرعة أو مسؤوليات غير متساوية، لكن كلما زادت سعة التدخل وطوله ولا رجعته، قويت الحاجة إلى أسباب مفهومة وإمكان اعتراض حقيقي.

يجب لذلك تمييز أربعة أبعاد للسلطة: **المصدر والنطاق وإجراء الممارسة والنتائج.** قد يكون المصدر مشروعا ويُتجاوز النطاق، أو يكون النطاق صحيحا والإجراء ناقصا، أو يكون الإجراء سليما والنتيجة غير متناسبة.

٤.٣ التنظيم الخاص وقانون الأسرة وموقع التفاوض

تجري العلاقات الأسرية في مجال خاص لكنه مشكل قانونيا. بين Mnookin وKornhauser أن التفاوض الأسري يتم «في ظل القانون»، إذ تؤثر الحقوق والواجبات والعواقب القانونية الخلفية في البدائل الخاصة حتى من دون اللجوء إلى المحكمة (Kornhauser and Mnookin 1979). فالملكية والحالة المدنية والمسؤولية الأبوية والميراث والحماية الاجتماعية والضرائب وسبل الانتصاف تعيد تشكيل مواقع التفاوض.

كما يوزع القانون أشكال السلطة والاعتراف. وتوضح Nedelsky أن القانون يساهم في إنتاج علاقات تعزز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أو تضرها (Nedelsky 2012). فتسجيل حساب أو مسكن أو عقد باسم شخص واحد قد يغير الوصول والإثبات والخروج حتى إن سمته الأسرة «ملكا مشتركا».

ويعمل التنظيم الخاص وسيطا بين القانون الرسمي والمعايير الأسرية. يضع أفراد الأسرة قواعد غير رسمية للمال والعمل المنزلي والرعاية والخصوصية والتمثيل. قد تكون تعاونية وفعالة، لكنها تصبح إشكالية عندما تتوزع تكاليفها وإمكان مراجعتها والوصول إليها باتجاه واحد باستمرار. كما أن الحق الرسمي لا يضمن القدرة الفعلية إذا غابت المعلومات أو اللغة أو المال أو الوقت أو الأمان.

٥.٣ الجسر المعياري بين بنية السلطة والظلم

وجود بنية موجهة نحو السلطة لا يثبت وحده وقوع ظلم. فبعض التفاوتات يخدم وظائف مشروعة مثل حماية طفل أو تمثيل شخص عاجز مؤقتا أو إدارة طارئ أو تنسيق ميزانية مشتركة أو مسؤولية متخصصة. لذلك يحتاج الحكم إلى **جسر معياري** يربط التفاوت بمعايير التبرير.

يشمل هذا الجسر خمسة أسئلة على الأقل: هل للتفاوت مصدر واضح من التفويض أو الضرورة أو الرضا؟ هل نطاقه متناسب مع الوظيفة؟ هل للمتأثرين وصول معقول إلى المعلومات والأسباب؟ هل توجد سبل للاعتراض والمراجعة والإلغاء؟ وهل يدمر التفاوت الشروط نفسها التي تسمح بمناقشته أو الخروج منه لاحقا؟ كلما تعددت الإجابات السلبية اقتربت البنية من الهيمنة أو التقييد غير المبرر للاستقلالية.

٤ الأسس التأويلية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غة

لا تكتمل نظرية السلطة الأسرية إذا عالجت النزاع كاختيار بين موارد مادية فقط. فالعلاقات تنظمها المعاني أيضا: من يسمي السلوك، وأي قصة تفسر الدين أو الواجب، وأي مفردات تجعل المطالبة قابلة للفهم، وأي لغة تفتح أبواب المؤسسة. تساعد التأويلية في فهم تاريخية التفسير والبناء السردي للمسؤولية، بينما يفسر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غة التوزيع غير المتساوي لقدرات التعبير والترجمة والاعتراف المؤسسي.

١.٤ تاريخية التفسير والأفق العلائقي

يؤكد Gadamer أن الفهم لا يبدأ من نقطة محايدة تماما، بل من تقاليد وتوقعات وآفاق تشكلت تاريخيا (Gadamer 2013). وفي الأسرة قد يقرأ كلام حاضر عبر عقود من الخبرة وأدوار الأجيال وتوقعات المعاملة بالمثل وسرديات التضحية. يمكن لشخصين أن يعطيا الفعل نفسه معنيين مختلفين من دون أن يكون الخلاف مجرد خطأ في الواقعة.

ولا يعني ذلك تساوي كل التفسيرات. يجب فصل الحدث عن إطاره التفسيري وعن الآثار المعيارية الملحقة به. «رفضت هذا الطلب» يختلف عن «رفضك يثبت أنك غير وفي». العبارة الثانية تضيف تفسيرا قد يبرر عقوبة أو قاعدة جديدة أو تقييد مورد. تنشأ السلطة التفسيرية حين يستطيع بعض الأشخاص تحويل مثل هذه القراءات من روايات قابلة للاعتراض إلى مقدمات مؤسسية ثابتة للعلاقة.

والأفق العلائقي ديناميكي. يعيد التفسير الحالي تنظيم ذاكرة الماضي، ويجعل الماضي المختار بعض تفسيرات المستقبل أكثر ترجيحا. إذا فسر الخلاف دائما كعدم ولاء، تصبح الخلافات الماضية أدلة إضافية. ومن ثم تنشأ تراكمات تفسيرية تغير إمكانات الفعل.

٢.٤ الهوية السردية والإسناد وإمكان المراجعة

يربط Ricoeur الهوية الشخصية بالسرد وبإسناد الأفعال إلى الفاعلين (Ricoeur 1992). ولهذا تظهر في النزاعات الأسرية عبارات مثل «كنت دائما هكذا» أو «أسرتنا تفعل هذا دائما» أو «بعد كل ما فعلناه من أجلك». تنظم هذه العبارات الماضي في قصة وتخلق توقعات للمستقبل.

للسرد وظيفة مشروعة، فهو يجعل الالتزامات طويلة الأمد مفهومة ويعترف بمساهمات لا تختزل في معاملة منفردة. لكنه قد يجمد الهوية أيضا. إذا تعذر على الشخص الاعتراض على السرد الذي يحدد شخصيته أو دينه أو مكانه، ضاق مجال مراجعة الذات. لذلك تتطلب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معرفية القدرة على المشاركة في تفسير التاريخ وصياغة أوصاف بديلة يمكن سماعها.

كما يتطلب إسناد المسؤولية معرفة ما كان تحت سيطرة الفاعل وما المعلومات المتاحة وما البدائل الواقعية. قد تشوه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هذا الإسناد عندما تحمل شخصا نتائج بنية لا يسيطر عليها، أو تسمي «اختيارا حرا» خيارا ذا كلفة خروج باهظة.

٣.٤ اللغة ورأس المال الرمزي وأسواق المشروعية

يبين Bourdieu أن قوة القول لا تعتمد على بنيته اللغوية وحدها، بل على موقع المتكلم والمؤسسة التي تعترف بلغته والسوق الذي يتلقى القول (Bourdieu 1991). قد يمتلك بعض أفراد الأسرة سجلا قانونيا أو ماليا أو إداريا يسهل قبوله لدى البنوك والمدارس والمستشفيات والجهات الرسمية.

يمكن أن يصبح **رأس المال اللغوي** واجهة موارد. فقراءة العقود وملء الاستمارات وشرح الحالة للمؤسسة أو الترجمة بين اللغات تضع الشخص في موقع وسيط. قد يوسع ذلك قدرات الأسرة كلها بصورة تعاونية، وقد يتحول إلى نقطة اعتماد إذا تعذر على الآخرين التحقق من المعلومات أو الوصول المباشر إلى المؤسسة أو الاعتراض على الترجمة. المشكلة ليست الكفاءة في ذاتها بل حوكمة الواجهة التي تنشئها.

وتبين Irvine وGal أن الأيديولوجيات اللغوية تربط أشكال الكلام بالفئات الاجتماعية والبنى السياسية (Irvine 1989; Gal 1989). قد تعد بعض طرائق التعبير أكثر عقلانية أو تعليما أو شرعية. وعليه لا يساوي حق الكلام قدرة المشاركة؛ يجب أيضا فحص إمكان أن يُفهم الفرد ويترجم قوله ويسجل ويعترف به كمصدر ذي صلة.

٤.٤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غة والترجمة المؤسسية والعمل الإداري

يربط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غة الكفاءات اللغوية بسوق العمل والمؤسسات وأنظمة التنقل والتراتبات الاقتصادية (Heller 2003). في الأسر متعددة اللغات أو المهاجرة قد تحدد الترجمة الوصول إلى العمل والسكن والمنافع والصحة والائتمان والوضع الإداري.

والترجمة عمل أيضا. قراءة البريد وإدارة الحسابات وملء النماذج وتنظيم المواعيد وإدارة الهويات الرقمية وحفظ الوثائق والتواصل مع المؤسسات كلها تنتج بنية تحتية يومية. قد يكون هذا العمل عبئا كبيرا، وقد يصنع في الوقت نفسه نقطة اعتماد

إذا صار شخص واحد البوابة الوحيدة إلى الحقوق والموارد.

لذلك يميز البحث بين **الوساطة المفيدة واحتكار الواجهة.** في الأولى يسهل المختص الوصول مع بقاء التحقق ونقل المعرفة والبدائل. وفي الثانية تتركز المعلومات بحيث لا يستطيع الآخر التحقق أو التعلم أو استبدال الوسيط إلا بكلفة غير متناسبة.

٥.٤ المعايير والتسمية وإعادة إنتاج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يمكن للفئات المستخدمة في وصف العلاقة أن تغير العلاقة نفسها. فتسمية سلوك «رعاية» أو «لامسؤولية» أو «جحودا» أو «واجبا» أو «خطرا» قد تفتح إمكانات مؤسسية أو تغلقها، وتبرر تحويلات أو تفرض التزامات أو تعيد توزيع عبء الإثبات. تدرس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متى تتحول هذه التسمية من تفسير عابر إلى نمط ثابت تكون فيه بعض الفئات أثقل وزنا لأنها تأتي من موقع معين.

الهدف ليس إلغاء الاختلاف التفسيري، بل ضمان إمكان الاختبار والسرد المضاد والاستعانة بطرف ثالث والمراجعة. فإذا لم تستطع خبرة شخص أن تُعترف بها بوصفها ذات صلة، قد تصبح حقوقه الشكلية وموارده صعبة الممارسة. والعكس صحيح: الترجمة والتوثيق والاعتراض قد تعزز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حتى من دون مساواة كاملة في الموارد.

٥ العناصر الشكلية لبنية السلطة والحالة العلائقية

يقدم هذا القسم لغة شكلية دنيا تفكك عبارات مضغوطة من قبيل «من الأقوى» أو «من يسيطر على من» إلى متغيرات علائقية متميزة، وتحدد الأشياء التي تؤثر فيها. ولا يفترض النموذج أن الأبعاد الخمسة قابلة للقياس على مقياس واحد، ولا أن هناك مؤشرا عدديا واحدا لـ«السلطة الكلية».

١٠٥ التاريخ العلائقي والمجالات ومجموعات الأفعال الممكنة

لتكن مجموعة أطراف العلاقة الأسرية $\mathcal{I} = \{1, \ldots, n\}$، ولتكن $\mathcal{D}$ مجموعة المجالات، مثل السكن والمال والعمل والتعليم والصحة والعلاقات الاجتماعية والمعلومات والرعاية. وللعلاقة تاريخ $h_t \in \mathcal{H}$ يشمل الالتزامات السابقة وتغير القواعد وتخصيص الموارد ومعالجة النزاعات وتدخل الأطراف الثالثة. تُمثل مجموعة الأفعال الممكنة عمليا للفاعل i في الزمن t والمجال d مع التاريخ h_t بالمعادلة ١.

$$\mathcal{A}_i(t, d \mid h_t) \tag{١}$$

الفعل الممكن عمليا أضيق من الفعل الممكن قانونيا أو منطقيا. فقد يكون الخيار موجودا رسميا ولكنه عسير التنفيذ بسبب التكلفة الاقتصادية أو نقص المعلومات أو العقوبات الاجتماعية أو الاعتماد على الوضع القانوني أو مخاطر الخروج. لذلك ينبغي أن يسأل تحليل السلطة عن وجود الخيار وعن إمكان تحمل كلفته معا.

يفصل هذا التمييز الإطار عن المقاربات التي تعتمد على الحقوق الشكلية وحدها. قد يملك الشخص قانونيا حق التعاقد أو مغادرة المسكن أو فتح حساب أو طلب مساعدة خارجية، ولكن تركز الدخل والوثائق والنقل والمعلومات والدعم قد يجعل هذه الحقوق صعبة التحول إلى فعل. وفي المقابل قد توسع موارد اجتماعية بلا تسمية قانونية صريحة، مثل الأصدقاء الموثوقين والشبكات المهنية والحسابات الرقمية المستقلة والمعرفة الإجرائية، مجال الفعل بصورة كبيرة.

إذا غيّر تدخل الفاعل j مجموعة أفعال الفاعل i، تُمثل عملية التحول بالمعادلة ٢.

$$\mathcal{A}'_i(t, d \mid h_t) = \Phi^{d,t}_{j \to i}(\mathcal{A}_i(t, d \mid h_t), h_t) \tag{٢}$$

تمثل $\Phi^{d,t}_{j\to i}$ تحولا يعتمد على العلاقة والسياق. وقد تقلل الخيارات أو ترفع تكلفة بعضها أو تغير المعلومات المتاحة أو توسع الخيارات. لذلك لا تحدد القدرة وحدها قيمتها المعيارية.

٢.٥ خمس واجهات للسلطة

تفكك الصياغة قدرات السلطة الأكثر صلة إلى خمس واجهات، ويمثلها المتجه في المعادلة ٣.

$$\mathbf{P}^{d}_{j|i}(t) = \left(D^{d}_{j|i}, I^{d}_{j|i}, N^{d}_{j|i}, R^{d}_{j|i}, X^{d}_{j|i}\right)_t \tag{٣}$$

يشير D إلى **واجهة القرار**، أي القدرة على تغيير الأفعال أو النتائج مباشرة، ويشير I إلى **الواجهة التفسيرية**، أي القدرة على تثبيت تسمية الأحداث والأدوار والمسؤوليات؛ ويشير N إلى **واجهة تعديل المعايير**، أي القدرة على تغيير معايير الحكم وشروط الالتزام والإجراءات؛ ويشير R إلى **واجهة الموارد**، أي التحكم في المال والسكن والوثائق والمعلومات والشبكات وغيرها؛ ويشير X إلى **واجهة الخروج**، أي القدرة على رفع تكلفة الرفض أو التوقف أو الانفصال أو طلب الدعم الخارجي.

تقدم المعادلة ٣ إحداثيات لا درجة واحدة. وقد تكون الأبعاد من أنواع بيانات مختلفة، ولهذا يتجنب البحث مؤشرات جمع غير مبررة مثل $D + I + N + R + X$. كما أن الواجهات مترابطة: السيطرة على السكن أو الوثائق قد تقوي X، والميزة التفسيرية قد تقوي N، والتكرار في D قد يتحول إلى عرف متوقع. ولذلك تتعلق «نزعة السلطة» بتشكل اقتران مستقر بين الواجهات، لا بارتفاع بعد واحد إلى أقصاه.

وقد تختلف الأسس المشروعة لكل واجهة. فسلطة القرار قد تنتج من ولاية قانونية أو تفويض مشترك أو مسؤولية مهنية. وقد تنشأ ميزة تفسيرية من الخبرة مع بقائها خاضعة للتحقق. وقد تنتج واجهة الموارد من الملكية أو الإدارة المفوضة من دون أن تمنح حقا تلقائيا في التحكم في عمل الآخر أو حياته الاجتماعية أو معلوماته. يسمح الفصل بين الواجهات بالتمييز بين وجود حق معين وبين مدى امتداده إلى مجالات أخرى.

٣.٥ تحديث المعايير والحالة التفسيرية

لتكن $\mathcal{N}_t$ مجموعة المعايير العلائقية، وω_t حدثا، و$\chi_{i,t}$ أوزان تأثير الفاعلين في تحديث المعايير. تُمثل العلاقة بالمعادلة ٤.

$$\mathcal{N}_{t+1} = \Psi(\mathcal{N}_t, \omega_t, \{\chi_{i,t}\}_{i\in\mathcal{I}}) \tag{٤}$$

إذا استطاع موقع معين أن يغير بصورة متكررة معايير الإنجاز أو الأهلية أو المسؤولية بعد نتيجة غير مواتية له، بينما يفتقر الآخرون إلى الاعتراض أو التوثيق أو الخروج، يخفض استقرار القواعد. ليست المشكلة في إمكان تغير القواعد، فالحياة الأسرية تتغير، وإنما في وجود أسباب وإجراءات وفرص للاعتراض وحدود يمكن توقعها.

لهذا التمييز دلالة قانونية. لا يعني الاستقرار تقنين الحياة الخاصة، بل وجود حد أدنى من الاستباقية والوضوح وقابلية الاعتراض في القواعد التي تمس مصالح أساسية. إذا كان طرف واحد يعيد تعريف المعيار بعد معرفة النتيجة، يتعذر على الآخر تخطيط سلوكه بالامتثال إلى معيار سابق.

وللحالة التفسيرية بعد زمني أيضا. فتسمية حدث تؤثر في فهم أحداث لاحقة وفي الوقائع التي تحفظ وفي السلوك الذي يعد معقولا. وتُمثل علاقة الحدث بالتسمية التفسيرية بالمعادلة ٥.

$$\mathcal{L}_{j,t} : \omega_t \longmapsto \ell_t \tag{٥}$$

يمكن أن تكون ℓ_t تسمية مثل «مسؤول» أو «أناني» أو «غير ناضج» أو «غير وفي» أو «رعاية معقولة». تصبح السلطة التفسيرية متغيرا بنيويا حين تغير هذه التسميات بصورة ثابتة القواعد أو الموارد أو تقييمات الأطراف الثالثة. ولا يكفي اختلاف رأي منفرد لإثبات تركز سلطة تفسيرية.

٤.٥ شروط التعرف على بنية موجهة نحو السلطة

يقترح البحث خمسة شروط مشتركة بدلا من عتبة واحدة. أولها **التكرار**، أي عودة فروق السلطة عبر أحداث متعددة. وثانيها **الاتجاه**، أي بقاء واجهات أساسية متركزة في الموقع نفسه. وثالثها **قابلية التحويل**، أي قدرة فروق الموارد أو الموقع أو الخروج على تغيير القرارات أو التفسيرات أو النتائج المعيارية بصورة مستقرة. ورابعها **الامتداد بين المجالات**، كتحول السيطرة المالية إلى قيد على العمل أو العلاقات الاجتماعية. وخامسها **العودية**، أي أن يغير الامتياز الحالي القواعد أو الموارد أو شروط الخروج المستقبلية بما يجعل استمرار التفاوت أسهل.

تصف هذه الشروط شدة بنيوية ولا تنتج حكما أخلاقيا آليا. فقد تحقق الولاية المشروعة أو الإدارة المالية المشتركة أو الرعاية أو الوكالة الطارئة بعض الشروط مؤقتا مع بقائها مبررة إذا كان التفويض والإجراء والتناسب واضحا. لذلك لا تستخدم الشروط كاختبار ميكانيكي، بل كدليل على ما يحتاج إلى تحليل أعمق.

٦ بنية التحويل من المرتبة الثانية لقواعد السلطة

تصف الواجهات السابقة قدرات، لكنها لا تفسر كيف تكتسب الفروق فعالية عملية. تشير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إلى القواعد العلائقية من المرتبة الثانية التي تحول فروق الموقع أو الموارد أو الأهلية أو التكلفة إلى آثار قرارية وتفسيرية ومعيارية.

١٠٦ من الموارد إلى الفعالية

لتكن q مطالبة أو سببا، وp موقع المتكلم، وr الموارد ذات الصلة، وc تكاليف الرفض، وh_t تاريخ العلاقة. تُمثل بنية التحويل بالمعادلة ٦.

$$\mathcal{G}_t : (q, p, r, c, h_t) \longmapsto \left(e_D, e_I, e_N\right)_t \tag{٦}$$

تعبر e_D, e_I, e_N عن فعالية المطالبة في القرار والتفسير وتعديل المعيار. ولا يفترض أنها قابلة للقياس على مقياس واحد. الغرض إظهار أن المحتوى نفسه قد تكون له نتائج مختلفة بسبب الموقع والموارد وتكلفة الرفض والتاريخ.

يفصل هذا بين صحة السبب وقوته الاجتماعية. فقد تكون مطالبة مبررة لكنها قليلة الأثر لأن صاحبها لا يملك قناة للتنفيذ ويتحمل وحده كلفة الرفض. وقد يكون ادعاء ضعيف التعليل شديد الأثر لأن صاحبه يتحكم في حساب أو وثائق أو مورد أساسي.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لا تحكم على الحقيقة أو الصلاح الأخلاقي، بل تحلل كيفية تحويل الموقع العلائقي إلى فعالية.

ولا يحل المفهوم محل نظرية الموارد أو نظريات السلطة متعددة الأبعاد. إنه يقع بين توزيع الموارد وتوزيع النتائج، ويسأل كيف تصل التفويضات والقواعد والسجلات وتكاليف الخروج بين المستويات في تكوين ملموس. وتعطي التأويلية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غة أساسا أدق لهذا التحويل. فالكفاءة اللغوية لا تمنح بذاتها سلطة القرار، لكنها قد تتحول إلى أهلية معترف بها، ثم إلى تغيير إجرائي، ثم إلى تأثير في الموارد أو الخروج.

لذلك يميز البحث بين **الفعالية اللغوية والفعالية السلطوية**. قد يكون قول صحيح وواضح بلا أثر لغياب الوصول المؤسسي، وقد يكون قول مقتضب ذا أثر فوري لأن صاحبه يتحكم في حساب أو وثيقة. يفسر Bourdieu تفاوت القوة الاجتماعية للقول (Bourdieu 1991)، بينما تبحث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في تحوله المستقر إلى قرار ومعيار وكلفة خروج.

٣.٦ الحالات الحدية والأم

يبين الجدول ٢ أن القضية الحاسم
الصلاحية مشروعا ثم يحدث انح

٧ الثقة البنيوية وقابلية

تعامل الثقة أحيانا بوصفها موقفا
أيضا قبول التعرض للفعل المستق
مكلفا، ترتفع كلفة الخطأ في الثق

١.٧ الأساس البنيوي للموثو

يمثل الأساس الأدنى للثقة البنيو

(٨)

يرمز L إلى حدود تدخل الآ
وV إلى قابلية التحقق من الوقائع
أو التوقف أو الخروج من دون -

هذه المكونات ليست مقيا
لكنه يعرف أن أحدا لا يستطيع
يمكن لهذا التوقع المؤسسي أن يد

وقابلية التصحيح مهمة بوج
إعادة تعريف أخلاقي كامل للشخ
يصبح الإصلاح التدريجي ممكنا (

ولا ينبغي فهم الخروج ك
الموافقة نتيجة غياب البديل.

٢.٧ توزيع المخاطر وعبء ا

الثقة توزيع للمخاطر أيضا. في علا
السكن أو الموارد أو المصداقية بي
غير متساو للمخاطر.

ويجب تحليل عبء الإثبات
إنتاج الأدلة. فإذا طلب من الط
الأكثر متانة توزع التوثيق بحسب

٣.٧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معرفية و

تعني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معرفية القدرة
من دون الحاجة إلى إذن تفسيري

يرتبط ذلك بمفهوم الظلم الم
يفتقر إلى موارد تفسيرية لتسمية
يُستخدم اعتراضه نفسه دليلا جدي
شرطا مهما ل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معرفية.

٤.٧ التكوين التدريجي لثقة

في علاقة عرفت تغييرا متكررا للث
وتكرار التفاعل الآمن ثم يتيح الث

(٩) $\uparrow$ (ثقة قائمة على الخبرة)r

لا تمثل المعادلة ٩ قانونا ح
الخبرات الجديدة أكثر دلالة.

٨ البنية متعددة الأبعاد

لا تعني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غياب العلاقا
السؤال هو امتلاك مزيج كاف م
تستطيع نقطة اعتماد واحدة إلغا

١.٨ ستة أبعاد للاستقلالية

يمثل متجه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بالمعادلة

(١٠)

تشير الأبعاد إلى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على الخروج. وهي مترابطة لكنها
مسكنا قابلا للاستمرار، والشبكة ال

٢.٨ التوافر والسيطرة والمتان

لكل مورد أو قدرة k ثلاث طبق

(١١)

تعني Avail التوافر الرسمي
يتيح هذا تجنب الخلط بين الملك
استخدامه عند النزاع لا يمثل حد

٣.٨ نظام الحياة الخاص وا

ليكن O_i نظام الحياة الذي يستط
تظهر هشاشة مرتفعة في حالة الا

(١٢)

لا يهدف الإطار إلى فصل
والخيارات المهنية والشبكات الخ
ولا كافية. بنية الواجهات أهم م

٤.٨ قابلية التحكم التدريجية

إذا كانت الاستقلالية ما تزال ه
الخاص. وفي المقابل قد يعزز الإ

(١٣)

يشير C_t إلى قابلية التحكم
العواقب، ويشير T_t إلى حجم المسؤ
أن تكون القيود المؤقتة قابلة للمرا

٥.٨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موزعة وا

تُمثل مجموعة الدعم بالمعادلة ٠١٤.

(١٤)

ومع أوزان اعتماد معيارية

(١٥)

يشير H_i المرتفع إلى اعتماد
لذلك تتطلب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موزعة

ويمثل المبدأ المزدوج بالمعاد

(١٦)

يمكن تنويع مصادر البقاء،

٩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ياسي لل

إذا حُصرت السلطة الأسرية في
العمل والتأمين الاجتماعي والخ
الشروط كجزء من بنية السلطة لا

١٠٩ الأسرة كوحدة مؤسس

تنتج الأسر مصالح مشتركة حقيق
أفراد متنافسين فقط يفقد هذا الب
التعاونية»: يمكن أن يستفيد الجمي
لا يحدد التعاون كيفية تق
تتحول مساهمة مقدم الرعاية إلى
وضمانات الرعاية أن تحول مكاس
لذلك يجب فصل كمية الم
وتزداد في الوقت نفسه مركزية ال
المشتركة»، مثل المفاضلة بين الاد

٢٠٩ موقع التفاوض والموار

يبين Agarwal أن المعايير الاجت
1997). لتكن $O_i(t)$ شروط
بالمعادلة ٠١٧.

(١٧)

لا تفترض معرفة الدالة F
الاجتماعية والوضع القانوني والش
الأسرة بطريقة غير مباشرة عبر تو
لكن المورد الخارجي لا يغ
أيضا المعلومات والمعرفة المؤسسية
موجود في السوق عالي الكلفة عم

٣.٩ إعادة الإنتاج الاجتما

لا تستهلك الأسر الدخل السوقي
اليومية ودعم التعليم والعمل والع
والدولة مسألة اقتصاد سياسي (e

إذا سُجلت التدفقات النقدي
وغير التعاقدي. المطلوب هو الا
تزيد الوقت المتاح لعمل شخص آ

ولإعادة الإنتاج بعد بين ال
ترى الأجور والأصول بسهولة أ
بيانات استخدام الوقت والسرد ا

٤.٩ التراكم طويل الأمد لل

السلطة الأسرية تراكمية. تتحول
والعمل، ثم في الدخل والتقاعد.
المؤسسية تراكم المعرفة والاتصالا

قد يكون التخصص طوعيا
بتكاليف الفرصة وتخلق حقوقا م

٥.٩ اللغة والعمل الإداري

تشكل قراءة العقود وملء النماذج
مساهمة ثقيلة وأن يركز الوصول الا
للمعرفة ووصول مشترك وتوثيق و

وهكذا يتحول رأس المال الل
الاقتصادية تمويل التعليم والاستد
السلطة.

١٠ حدود القيمة وبنى

لا تتعلق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باتخاذ القرا
تُفوض طرق التصرف فيها وتُتبع
والنفقات المشتركة. تظهر الصعوب

النوع	البنية الم
التجميع المشترك	اتفاق ال أو الأص
الهبة أو الدعم	نقل طو
الإدارة المفوضة	إدارة ا
التحويل الوسيط غير المصرح به	استخدا قيمة خا

١٠١٠ إنتاج القيمة والمساهم

ليكن S فاعلا وB شريكا خارج
القناة المصرح بها بالمعادلة ١٨.

(١٨)

لا تفترض المعادلة ١٨ ملك
معرفتها ويمكن تفسير أساس سلط

يجب التمييز بين **الملكية** والم
الأصل ويفوض إدارته، وقد تكو
ثالثة، قويت الحاجة إلى تفويض

٢٠١٠ أربعة أنواع من تدفق

يميز الجدول ٣ بين المشاركة والا
واحد إلى واجهة موارد غير مرئي

يمكن للأنواع أن تتغير عبر
إذا ارتبطت بطلبات دائمة للطاعة
تتوسع سلطة المدير. كما تشمل الق

٣٠١٠ شروط مخاطر التحوي

حين يشكل طرف ثالث A قناة

(١٩)

يرمز K إلى المعرفة، وA إل
حين تضعف هذه العناصر، من

إذا كان $m_A \notin \mathcal{M}_C$ وظ
الانتقال إلى حكم أقوى بالاستغ
تصنيف الهبات العادية أو المشار

عدم وجود تفويض مكتو
لكنه يحتاج نطاقا يمكن استنتاجه
زادت القيمة أو انخفضت قابلية

ولا تعني المساءلة Q العقاب
القاعدة المستقبلية. إذا لم توجد م

٤٠١٠ حدود القيمة وإعادة

يمكن لتدفقات القيمة أن تغير موا
أو الخروج، يمكن تمثيل التغذية ا

(٢٠) سهولة التحويل

المعادلة ٢٠ فرضية آلية لا
الوساطة الإدارية المتكررة تراكم م
كلفة الخروج. كما يؤدي التكرار
حيث التبرير.

١١ امتداد الشبكات ا

تكتسب بنى السلطة الأسرية أهمي
أن الضغط الخاص يسقط الأهلية
الدور ومدى تقييد المؤسسة لهذه

١٠١١ تفويض الدور ومجموع

لتكن منظمة O تفوض دورا R

(٢١)

قد يشمل التفويض الأموال
لا تحولها إلى ملك خاص. ولا ي

الواجهة	خطر
الأموال والمدفوعات	تحويل
المعلومات الحساسة	كشف للمعلوم
المشتريات والعقود	محاباة
التمثيل الخارجي	استخد
التوظيف والاختيار	تحويل
قرارات شديدة اللا رجعة	نتائج

٢٠١١ الضغط الخاص والق

يجب التمييز بين **الضغط الخاص**، بموارد أو معلومات أو قرار الدور

تُمثل البنية العامة بالمعادلة ٢

(٢٢)

لا تثبت المعادلة ٢٢ وقوع وحجم الصلاحية الفعلية وقابلية ال قاعدة بيانات حساسة أو دفع أو

٣٠١١ حوكمة الواجهات الت

يبين الجدول ٤ أن الحوكمة الجيد به. تقلل الصلاحيات الدنيا نطاق وجود مصلحة خاصة، ويخلق الت

يتوافق ذلك مع أدبيات تض تضارب المصالح حالة خطر تحتاج

٤٠١١ العدالة تجاه الأطراف

قد يضر امتداد الشبكة الخاصة بأ الموارد. ولهذا فالمسألة تتعلق بال مكانته لترجيح رواية قريب أو إ

ليست الغاية منع العلاقات الواجهات الحساسة والتنحي والم

١٣ قضايا تحليلية وتشغيل المفاهيم والاخ

ينبغي أن ينتج الإطار قضايا يمكن مقارنتها بالملاحظة.

قضية تحليلية ١ مع ثبات السياق نسبيا، ينبغي أن يرتبط
أكبر على تحويل الخلاف إلى نتائج أحادية.

قضية تحليلية ٢ عندما تمنع قواعد شفافة وحق الرفض أ
التحويل $\mathcal{G}$ التحكم أفضل من توزيع الموارد وحده.

قضية تحليلية ٣ ينبغي أن يرتبط ارتفاع استقرار القواعد
الثقة الشخصية الأولية منخفضة.

قضية تحليلية ٤ ينبغي أن يقلل الوصول المباشر إلى الو
والسيطرة على الوقائع، بما يعزز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معرفية.

قضية تحليلية ٥ ينبغي أن تعتمد متانة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على ا
الاسمي للمورد.

قضية تحليلية ٦ ينبغي أن يقلل خفض الاعتماد على نق
واحد، شريطة ألا تكون مصادر الدعم الجديدة شديدة

قضية تحليلية ٧ يُتوقع أن تصبح التحويلات غير المصر
والخروج وحين يطبع التكرار القناة.

قضية تحليلية ٨ في المنظمات، يُتوقع أن يخفض أقل قدر
تحول ضغط خاص قابل للتحديد إلى استحواذ فعلي على

يمكن فحص هذه القضايا بالمقارنة بين الحالات والمق
الصياغة الشكلية توضح المتغيرات والعلاقات ولا تفرض

يبين الجدول ٥ أن المفاهيم المركزية لا ينبغي قياسه
والوثائق. كما أن اختلاف المصادر ذاته قد يكون معلوما

ويجب على التحليل السببي معالجة العوامل المربكة
والمرض قد يركز القرار بصورة مشروعة ويخفض الاستقلا
المعلن. لذلك تفيد التصاميم الطولية والمقارنات قبل تغير

١٤ الحدود النظرية والتفسيرات البديلة

للإطار عدة قيود. أولا، هو إطار لتحليل الآليات لا لتـ
التثبيت أو التحويل غير المصرح به محل التقييم السريري

جدول ٥: أ

المفهوم	مؤشرات ملاحظة محتملة
واجهة القرار D	من يستطيع المنع أو الإذن القرارات الأحادية
الواجهة التفسيرية I	أي رواية تبقى في القرارات الل الأدلة والأطراف الثالثة
تعديل المعايير N	تغير القواعد وتوقيته وتماثل الاع
واجهة الموارد R	الوصول إلى الحسابات والوثائق والشبكات والخدمات
واجهة الخروج X	التكاليف المادية والقانونية وال للرفض أو الخروج
الثقة البنيوية	قابلية التوقع والاستقرار المتحق ووجود خيارات خروج
الاستقلالية	التوافر والسيطرة والمتانة في الأب
حدود القيمة	المعرفة والتفويض وقابلية الإلغا

ثانيا، قد تنتج التفاوتات من تخصص مشروع أو ت هيمنة. لذلك يجب اختبار التفسيرات البديلة وفحص الت

ثالثا، المتغيرات غير متجانسة، ولا ينبغي دمجها سر علائقية ومنطقية وليست معادلة هيكلية مقدرة.

رابعا، يؤثر السياق الثقافي في معنى الموارد والواج ينبغي التمييز بين اختلاف المحتوى المعياري وغياب قابلية والحفاظ على شروط حياة دنيا.

خامسا، لا يقدم البحث نظرية كاملة للعدالة الأس والعدالة التوزيعية واستمرارية العلاقة، ولا يحلها معيار و

سادسا، يخاطر مفهوم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بفقدان قيمت بإظهار آلية تحويل قابلة للتحديد بين فرق الموقع أو الموارد الأبسط أولى.

سابعا، قد يغير القياس الظاهرة نفسها. مطالبة المش الروتين. البحث نفسه يمكن أن يصبح تدخلا علائقيا.

ثامنا، يغير مسار الحياة معنى التفاوت. حاجات مبررة في مرحلة ومفرطة في أخرى، ولذلك يلزم إدخال

وأخيرا، الاعتماد ملتبس القيمة. فقد يقلل بعض المخاطر أمثلة واضحة. الهدف ليس تعظيم الاستقلال المنف هيمنة تعسفية.

١٥ خاتمة

قدم البحث إطارا لتحليل فئة محددة ولكنها مهمة نظريا م
عبر الزمن. المفهوم المركزي، قواعد السلطة، يصف بنية م
الرفض إلى قرارات وتفسيرات وتعديلات معيارية ذات
مساواة كل تفاوت بالهيمنة.

يربط الإطار هذا الميكانيزم بأربع مجموعات من الم
حدود السلطة واستقرار القواعد وقابلية الاعتراض والت
بالاستقلالية، بوصفها بنية متعددة الأبعاد تشمل الاقتصا
تحليل كل بعد عبر التوافر والسيطرة والمتانة. وتتعلق الث
والوقت والقدرات اللغوية في مواقع التفاوض وتراكم ال
تقييم قنوات التحويل والتأثير وفقا للتفويض والتتبع والو

تقدم نظرية العدالة وفلسفة القانون والتأويلية والا
عدم الهيمنة، واستقرار القواعد والإجراء لهما قيمة مستق
لا يدمج البحث هذه التقاليد في نظرية واحدة، بل يربطه

وتبقى الخلاصة المعيارية محدودة. الغاية ليست ا
الاعتماد. الغاية هي بناء شروط يستطيع فيها الفرد مقاو
تنسيق رئيسية. تقييد الواجهات واستقرار القواعد وتوز
واقعية.

ويظل الإطار اقتراحا نظريا. تعتمد قيمته على قد
والتصحيح أمام الحالات التي تفشل فيها فئاته. الهدف ا
السلطة والثقة والاستقلالية والقيمة والمسؤولية.

المراجع

ns: 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In:
57097338799.
6.2, pp. 231–260. DOI: 10.1086/292745.
s &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

r. Ed. by John B. Thompson. Trans. by Gin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ons."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1,

d the Structures of Constraint. London: Rout-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
07.001.000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8, pp. 345–

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 MIT Press.
,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92. DOI: 10.1111/j.1467-9841.2003.00238.x.
esource Theory and Power in Families: Life
261–278. DOI: 10.1111/j.1545-5300.1984.

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American*
16.2.02a00040.
: *Gender & Society* 3.2, pp. 187–216. DOI: 10.

lational Autonom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93/oso/

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Law: The Case
OI: 10.2307/795824.
Theory of Self, Autonomy, and Law. New York:
780195147964.001.0001.
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
ess. DOI: 10.4159/9780674041578.
y. New York: Basic Books.
and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leen Blam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
cts." In: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Women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niversity Press.
onflicts of Interest." In: *New England Journal*
308193290812.
tructing Moral Relations after Wrongdoing.
7/CBO9780511618024.
onomy." In: *Hypatia* 24.4, pp. 26–49. DOI: 10.

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